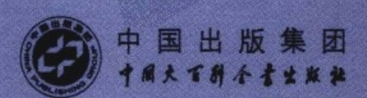


保加利亚史

R.J.克兰普顿 著　周旭东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Bulgaria



A Concise History of Bulga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定价：36.00元



保加利亚史

兰普顿 著　周旭东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Bulgaria

中国出版集团

图字:01 - 2009 - 5508

A Concise History of Bulgaria[2](0 - 521 - 61637 - 9) by R. J. Crampto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加利亚史/克兰普顿著;周旭东译.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000 - 8232 - 3
(世界历史文库)

Ⅰ.保… Ⅱ.①克…②周… Ⅲ.保加利亚 - 历史 Ⅳ.K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212 号

责任编辑 李 毅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在一个繁忙夏季的星期日，盖特威克（Gatwick）机场的候机室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要从这里去了解最近东欧变化的影响，似乎不太合适。但是，看到年轻的英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排队，不是去度假而是去黑海沿岸工作，装配英国汽车销往巴尔干，这在十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在1967年，当我第一次到保加利亚时，如此情形更多的是幻想。保加利亚已经向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及商业开放。

正因为如此，完全有理由这样推测：在西方，人们希望了解在最近50年里很少引起人们关注的国家的简明历史，这样的需要正在不断增长。希望本书将或多或少有助于向西方读者显示，如同经济上给予的回报一样，保加利亚至少在历史的兴趣方面也能提供许多。

在西方，我们总是倾向于模糊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第一次会议上，当葡萄牙代表建议这个组织最好称之为“国家联盟”（League of States）时，他被告知，区别太微不足道，没有必要为此去费脑筋。任何同巴尔干有联系的人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虽然本书取名为《保加利亚史》，它一定程度上同样是7世纪时到达巴尔干的保加利亚人的简史，本书的大部分集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保加利亚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保加利亚长达500多年，当时的保加利亚人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不存在保加利亚国，本书不会忽视这一

时期保加利亚人的命运。即使在1878年,当保加利亚国重新建立时,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人之间仍然是有差异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但生活在保加利亚之外。更多的是在保加利亚之外但被保加利亚说成保加利亚人。确实,保加利亚的领土和由保加利亚人居住的土地之间的差异是现代保加利亚历史的主题之一。

本书主要涉及现代史,尽管我也试图去阐明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和第三个25年保加利亚民族和保加利亚国家是如何出现的,在这个进程中,保加利亚文学的新生和文化的复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本限于7万多字(英文原版字数——译者注)的综合性的书中,不可能去作更详尽的探讨,但是,希望这方面简短的介绍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并对这一引人入胜的进程作更深入的研究。

撰写巴尔干或东欧历史的学者,在名称、日期和拼写方面有一些困难。总的来说,当不存在相应的英语词形时,我使用现代保加利亚名字命名城镇或地理方面的特征。当然会有一些例外。在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占领伊斯坦布尔以前,伊斯坦布尔似乎是一个不合适的用法。因此我更愿意用拜占庭或君士坦丁堡。在史前保加利亚的短短一章中,我一般使用古典时代的而不是现在的名字,虽然有例外,如“巴尔干”是古典时代后的名称。熟悉保加利亚的读者会惊讶于我使用“特尔诺沃”(Tûrnovo)而不是“大特尔诺沃”(Veliko Tûrnovo)。为了简洁,我省略了形容词“马尔科”(Malko)。我希望我在日期上也一直是始终如一的。我一直使用格雷果里历而不是由东正教使用的儒略历。第130页(原英文版——译者注)的脚注在这一点上有更多的信息。

在英国和保加利亚,许多人帮助我提出设想、收集出现在本书中的材料,要直接感谢是不可能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和索非亚的基里尔(Kiril)和梅托迪(Metodi)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让我的生活轻松许多。此外,当我在保加利亚时,萨索(Sasho)、丹妮拉·舒尔博诺夫(Daniella Shûrbanov)和安德烈·潘特夫(Andrei Pantev)给我提供许许多多的帮助。在英国,与迈克尔·赫斯特(Michael Hurst)的教学是一段非常有收获的经历。我总是从我的学生中学到不少,特别是基里洛·特雷佐夫

(Kyril Drezov)、伊万·克勒斯特夫(Ivan Krûstev)、玛丽埃塔·斯坦科娃(Marietta Stankova)和纳乌姆·凯切夫(Naoum Kaytchev)。除了他们已经给予的智力上的激励外,看到聪明的保加利亚年轻人在艰难世界中的行进,并证明保加利亚学者是世界上最优秀中的一员,这是双重的满足。艾格利凯·马尔科夫娃(Aglika Markova)和伊万·斯坦西奥夫(Ivan Stanciov)改变了保加利亚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印象,为此我感谢他们,还有,因为他们,我与保加利亚人交往变得容易许多。瓦尼奥·斯托杨诺娃(Vanya Stoyanova)发现了109页(原英文版——译者注)上那张恐怖的照片。塞拉·凯恩(Sheila Kane)以专业的敏锐阅读全文,本书的诸多改进要归功于他。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温和而优雅的指导使我的工作轻松许多,他是一位杰出的非凡的人才,一个完美的编辑。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感谢我的妻子,为她三十多年来的耐心、理解和慷慨的支持。

1995年9月于剑桥圣埃德蒙学院

第二版序言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位观察家都明白一点,10 年里许多变化将会发生。就前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这一点特别确切,而且,没有一个地方比巴尔干变化更大。保加利亚自然也不能幸免于这一进程。自本书第一版发行以后,保加利亚经受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从此,它重建其经济基础,向融入欧洲—大西洋组织迈进一大步。随着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历史迈入新的一页,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欧洲另一些国家联系在一起。这种巨大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保加利亚和它的人民将由未来的历史学家去描述。

自本书第一次出版后,就今后再版,朋友、同事和我以前不认识但向我表示祝愿的人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们作了建设性的评论和建议。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不过我要特别感谢加拿大卡尔加里(Calgary)大学的马丁·明切夫(Martin Minchev)教授。在本书初版至今的几年里,又有许多学生来到剑桥大学,丰富了校园和我的生活。除了在初版时提到的几位,我要对下列同学表示感谢,他们分别是:特奥多拉·帕尔维瓦(Teodora Parveva)、迪米特尔·贝切夫(Dimitûr Bechev)、帕特里夏·柯蒂斯(Patricia Curtis)、特蕾萨·吉佩(Tressa Gipe)、伊万娜·戈戈娃(Ivana Gogova)、米莱娜·格里佐(Milena Grizo)、迪米特里娜·米哈伊洛娃(Dimitrina Mihaylova)、亚沃尔·锡德罗夫(Yavor Siderov)和马

修·特哈达(Matthew Tejada)。

萨索和丹妮拉·舒尔博诺夫的友善对第二版的贡献和对第一版的贡献一样多。特别要提到的是马尔科夫娃所做的工作,没有她,本书的插图将会更加匮乏,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封面设计。她在时间上的慷慨以及不知疲倦的作风,使我对她的依赖远远超过以前做工作时的状况,我对她的感激无以言表。

我必须提及伊莎贝尔·丹布里库尔(Isabelle Dambricourt),在极短的时间里,他已经有了专长、耐心和良好的幽默感,这一切会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

2004年10月于剑桥圣埃德蒙学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从史前至保加利亚王国建立时的保加利亚

现在构成保加利亚国家的这块土地，是最早见证欧洲出现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地区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约从公元前 10 万年到公元前 4 万年，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在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离开洞穴迁往平原，开始在土地上劳作。到公元前 2 000 多年，他们培育出非粮食植物如亚麻，并逐渐精于金属加工。在公元前 5 000 多年，一支不为人们所知的人群生产出极具创造力的物品，专家们认为是自发产生而不是外来文明的产物。这一文明崇拜的主要对象似乎是母亲女神，它在公元前 3 000 多年发展到顶点。

到公元前 2000 年末，摩拉瓦—瓦尔达尔（Morava-Vardar）流域以东的地区受到色雷斯文明的影响。色雷斯人属印欧语系族群，生活在组织较为松散的部落社会之中。他们擅长于金属加工，特别是金和银的加工。目前，保加利亚在诸如帕纳吉尤里希特（Panagiurishte）、韦尔奇特鲁纳（Velchitrun）、弗拉察（Vratsa）等地，考古发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文物，更多的文物有待发掘。除了在金属加工上有较高的水平外，色雷斯人以马术著称。音乐也是色雷斯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因为俄耳甫斯[①]（Orpheus）是早期色雷斯的国王，他曾设法将各个色雷斯部落和马其顿人短暂地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功绩，因为色雷斯人并不倾向政治联合和合作，希罗多德曾经写道，假如色雷斯能联合起来，让他们处于一个人的统治之下，那他们将无敌于天下。巴尔干的情况往往是这样，是外部压力而不是内部的意愿导致各方的联合。



地图1　今日保加利亚的古遗址

外部的压力来自希腊，希腊已在黑海沿岸建立商业中心和殖民地。希腊人不太瞧得起色雷斯人，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色雷斯人不仅在手工和马术方面的水平能与希腊相匹敌，而且，与傲慢的希腊人差不多同时开始铸造硬币。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波斯人侵巴尔干，这比希腊人的傲慢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正是因为这一外来的威胁，奥德里西王国（Odryssian Kingdom）将巴尔干中部的色雷斯各部落联合起来。

① 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善音律、诗歌，特别长于竖琴，根据传说，他的父亲是太阳神兼音乐之神阿波罗，母亲是司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卡利俄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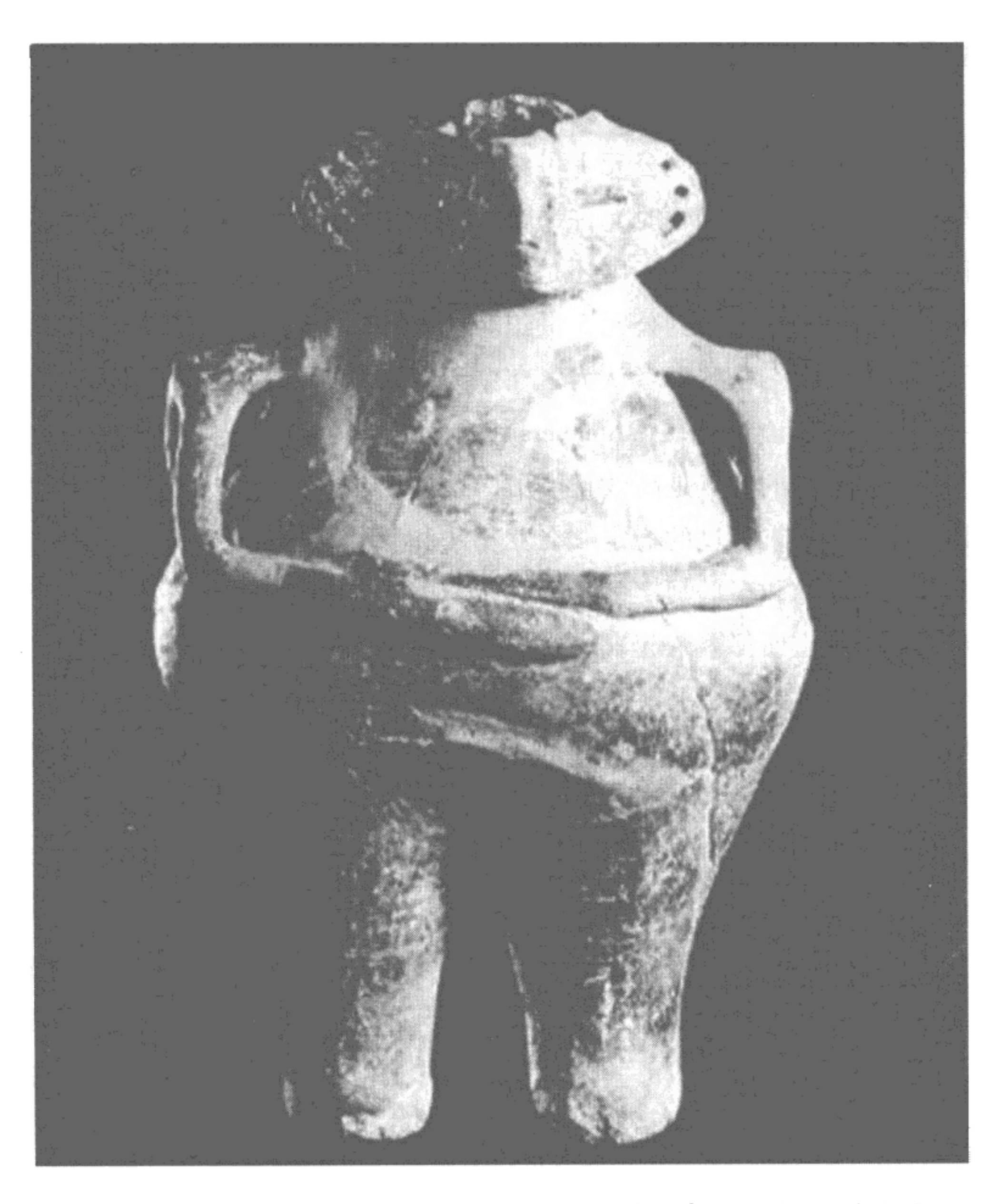


插图 1　母亲女神像，公元前 5000 多年时兴旺地生活在保加利亚土地上的一支身份未明的人群制作。

波斯的风暴被击退了，但在公元前 4 世纪，另一个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是来自巴尔干内部。强有力的马其顿不久就同色雷斯发生了冲突。色雷斯人文化上的成就延续下来，但他们在政治上长期处于虚弱地位。色雷斯人接受了马其顿人的统治，他们的弓箭手和骑兵成为亚历山大统率的军队中重要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带着这支军队一直推进

到印度。在马其顿消失后，一个更不祥的威胁到来了。

公元前3世纪，罗马帝国无情地向内陆扩张，他们首先在巴尔干以西登陆镇压海盗。到公元1世纪后，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半岛都在罗马的掌控之下。他们暂时允许一个残缺的色雷斯王国作为附庸继续生存下去，但最终色雷斯王国还是消失了。色雷斯语在较偏远的地区仍然在使用，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他们对马的崇拜被后来迁居至此的人们所承继。一些学者认为，在今天保加利亚西南的部分地区仍然能发现的“哑剧演员”（Mummers）是色雷斯文化的遗迹。

罗马统治的特点是高效且严厉，这使巴尔干能联合起来，并享有此前和此后从未有过的稳定。在罗马法和罗马军团的强力控制下，位于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摩西亚（Moesia）行省，和从巴尔干到爱琴海的色雷斯都繁荣起来。新的公路体系将巴尔干联结在南北和东西两条主干道的轴心上。两条重要的对角公路线穿越半岛，在其十字路口，能找到塞尔迪卡（Serdica）城，正好是今天索非亚所处的位置。另一些城市也兴盛起来，特别是特里蒙蒂姆（Trimontium）即今天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当1970年建造新的公路时，在这里发现了宏伟的罗马剧场。

最后，与罗马统治一起带来的是基督教，公元395年，当帝国分裂时，摩西亚和色雷斯成为定都在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以后的1 500多年中，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将在保加利亚的历史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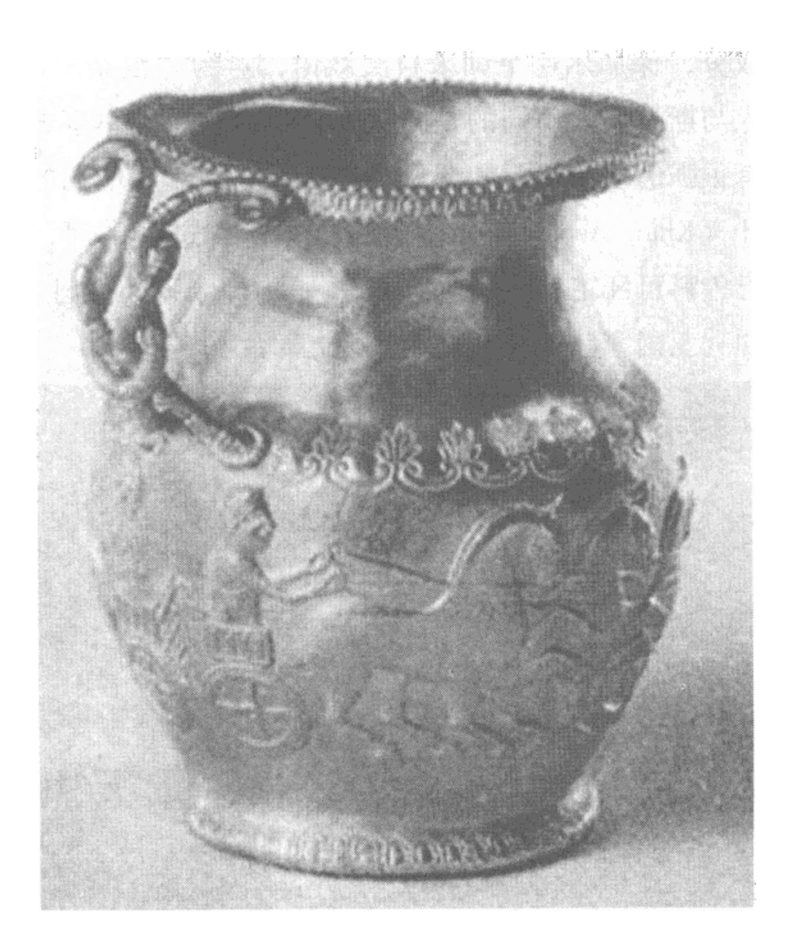


插图2　公元前380年至前350年间的单柄花瓶，是出土于弗拉察的珍品。花瓶高9厘米，上刻图画表明色雷斯人在马术方面的技能。

到4世纪，罗马的势力逐渐衰落。随着来自亚洲西伯利亚大平原的部落攻击巴尔干东北部，罗马帝国的内部问题更复杂化了。5世纪，阿兰人（Alani）、哥特人和匈奴人的一系列入侵给了罗马帝国最致命的一击，洗劫传说中的拜占廷财富的前景吸引了他们，但他们在这方面未能如愿。不久，他们离开巴尔干寻求进一步的劫掠。如果说这些入侵者是过客，那么，在5世纪最先出现的斯拉夫人则不是。斯拉夫人是定居者。他们在东巴尔干一带开拓，在7世纪，另一些斯拉夫部落联合突厥血缘的古保加尔人（Proto-Bulgars）发动新的攻击进入巴尔干。古保加尔人起源于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有多个种

8

族血缘的成分，保加尔这个词来自突厥语，意为“混杂”（to mix）。古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不同的是，除了有令人生畏的军事方面的声誉外，他们有很强的政治组织和合作观念。在680年，他们的首领阿斯巴鲁赫可汗（Khan Asparukh）带着一支军队渡过多瑙河，在随后一年，阿斯巴鲁赫可汗定都普利斯卡（Pliska）即今天的舒门（Shumen）附近。保加利亚国家登上了巴尔干的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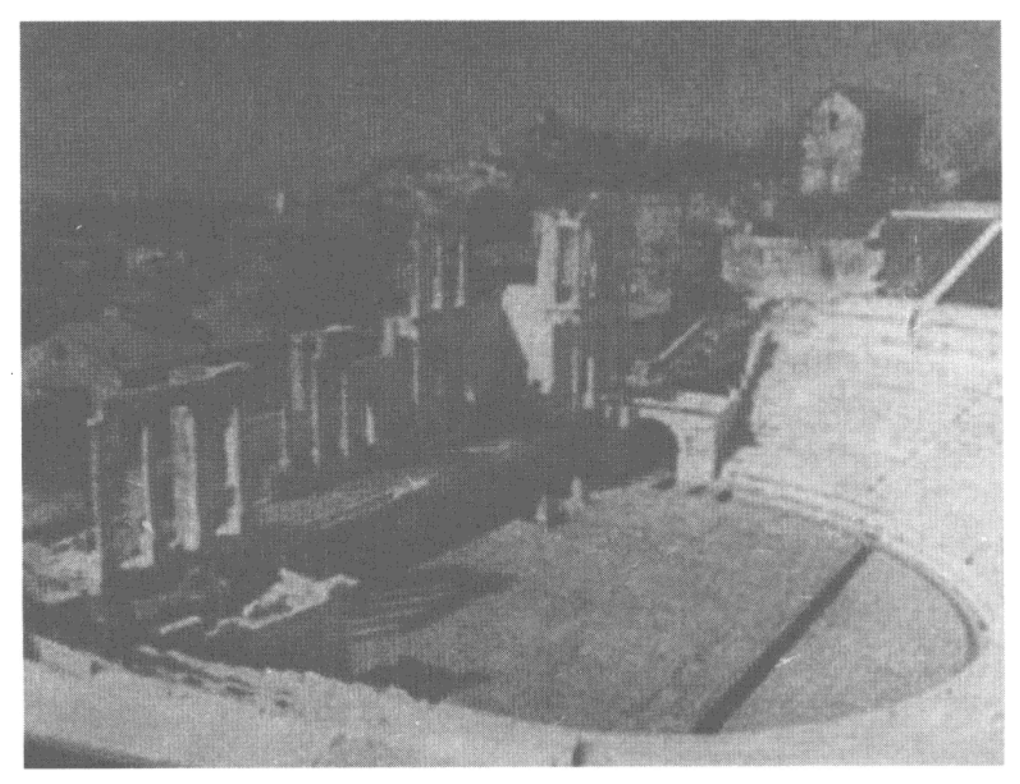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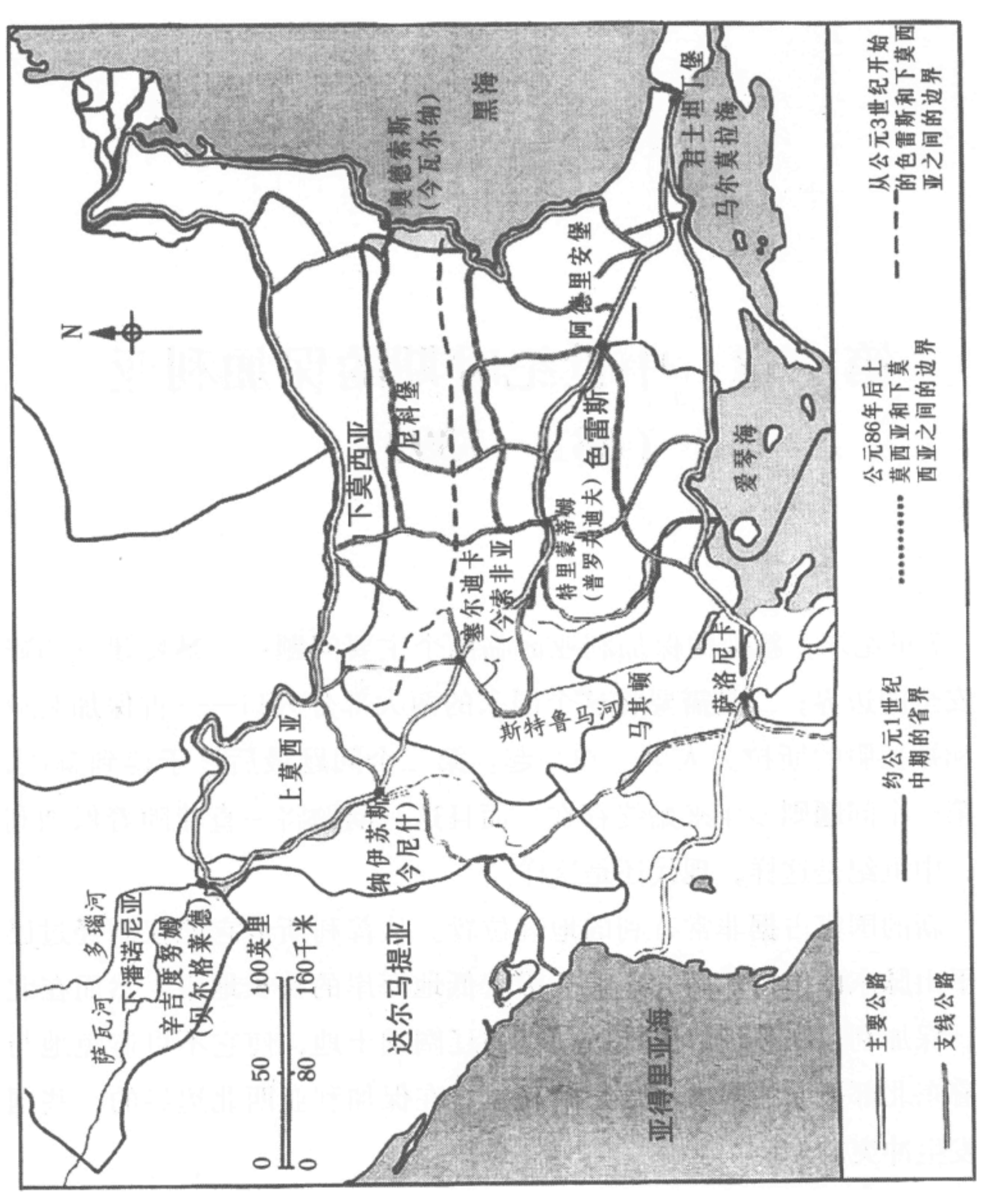


插图3　普罗夫迪夫的罗马剧场，它直到20世纪70年代建造新的市中心道路时才为世人所知。



地图2　罗马帝国时期的巴尔干

第二章　中世纪时期的保加利亚（681—1393）

9

7 世纪末，新生的保加利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要建立明确和安全的边界；二是需要将这个国家的两大部分人口——古保加利亚人和被征服的斯拉夫人融合在一起。第二个问题最后终于得到解决，但第一个问题则多年来始终存在。而且这一问题将一直伴随着保加利亚，中世纪是这样，现代还是这样。

新的国家占据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从普利斯卡它能控制经过巴尔干山脉东面出口的南北路线和沿着低地海岸的狭长地带。然而在北部，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以外所拥有的辽阔的土地，使它不可避免地与绕着东北部平原的两大部落集团和建立在保加利亚西北边界的一些国家发生冲突。

不过，对于中世纪保加利亚的国王来说，最直接和最持久的问题是确定同南方强国的关系。中世纪第一个保加利亚国家就被拜占廷摧毁。第二个保加利亚国则落入拜占廷的后继者奥斯曼帝国之手。

一、可汗统治下的保加利亚（681—852）

公元 681 年，新的保加利亚王国建立后，差不多享有一个世纪的

10

平稳发展时期。最初同拜占廷的紧张关系因公元 716 年的条约得到控制和处理，该条约将色雷斯北部给了保加利亚，这在中世纪是不平常

的，它相当于一个纯粹的经济条款。条约签署后不久，拜占廷与阿拉伯在小亚细亚发生冲突，保加利亚站在拜占廷一边。到8世纪中期，摩拉瓦河流域的一部分并入保加利亚，当时的保加利亚还包括现在罗马尼亚南方的大部和今天乌克兰的一部分。

到黑海事实上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内湖时，拜占廷在这一地区未曾受到来自保加利亚的挑战，因为保加利亚从未发展大规模的海上力量。即使意识到从战略考虑需要这样一支力量，保加利亚也认为在用其他手段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拥有这样的力量。保加利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在一个甚至硬币都不能铸造，而情愿使用拜占廷货币的国家，建造一支海军所需要的一定的设计、协作能力是难以取得的。

没有海军，保加利亚也就不可能沿着黑海海岸向北或向南扩张，就像混乱的大草原使保加利亚难向东北扩张领土。保加利亚领土延伸的自然方向因此是西北和西南。在西北，阿瓦尔王国[①]的崩溃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保加利亚的统治者逐渐向这一地区推进，这使保加利亚的边界到了梯沙河（Tisza）[②]，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成为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在西南的扩张就不那么容易了。8世纪晚期，在付出失去色雷斯的一些领地的代价后，保加利亚才获得了马其顿的一部分。克鲁姆可汗（Khan Krum，803—814在位）决定改变这一局面。在811年，保加利亚从拜占廷手中夺得了新近加固的塞尔迪卡，接着又占领了黑海沿岸的内塞勃尔（Neseûr），最远推进到拜占廷城下。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811年，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成为近500年来第一位战死在战场上的拜占廷皇帝，克鲁姆用银包起死对头的头颅作为酒杯。

11

814年，克鲁姆的继承者奥穆尔塔格（Omurtag，814—831在位）同拜占廷签署了和平条约，根据条约，保加利亚获得了登萨河流域

① 6世纪下半叶阿瓦尔人以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建立帝国，6世纪末达到极盛时期。7世纪后半叶开始衰落。805年被查理曼大帝征服。——译者注

② 今匈牙利境内。——译者注

（Tundja valley），并且在他统治时期，贝尔格莱德（旧称辛吉度努姆 Singidunum）以及周边地区都纳入保加利亚的版图。在9世纪的第二个25年时，保加利亚利用拜占廷忙于“圣像破坏之争”[①]（Iconoclast controversy）和在小亚细亚面临的威胁，向斯拉夫人占优势的马其顿扩张，斯拉夫人欢迎保加利亚人替代希腊人和拜占廷的统治。到9世纪中期，奥赫里德（Ohrid）[②]、普雷斯帕（Prespa）[③]和南阿尔巴尼亚的许多地区一样，并入了保加利亚。这样，拜占廷在欧洲的势力仅限于西阿尔巴尼亚、希腊、南瓦尔达尔流域和色雷斯。

然而，奥穆尔塔格不是一介武夫。他继续克鲁姆未完成的事业，将适当的法律体系引进保加利亚。他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建设者，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最出色的成就是重建在811年被烧毁的普利斯卡。现存的有关奥穆尔塔格的铭文超过保加利亚中世纪时期任何一位统治者。

二、鲍里斯一世（BORIS I）统治时期（852—888）和皈依基督教

从鲍里斯一世（Boris I）取得的成就来看，对奥穆尔塔格的赞美也许是令人吃惊的，在鲍里斯统治的36年里，他使保加利亚发生了惊人的巨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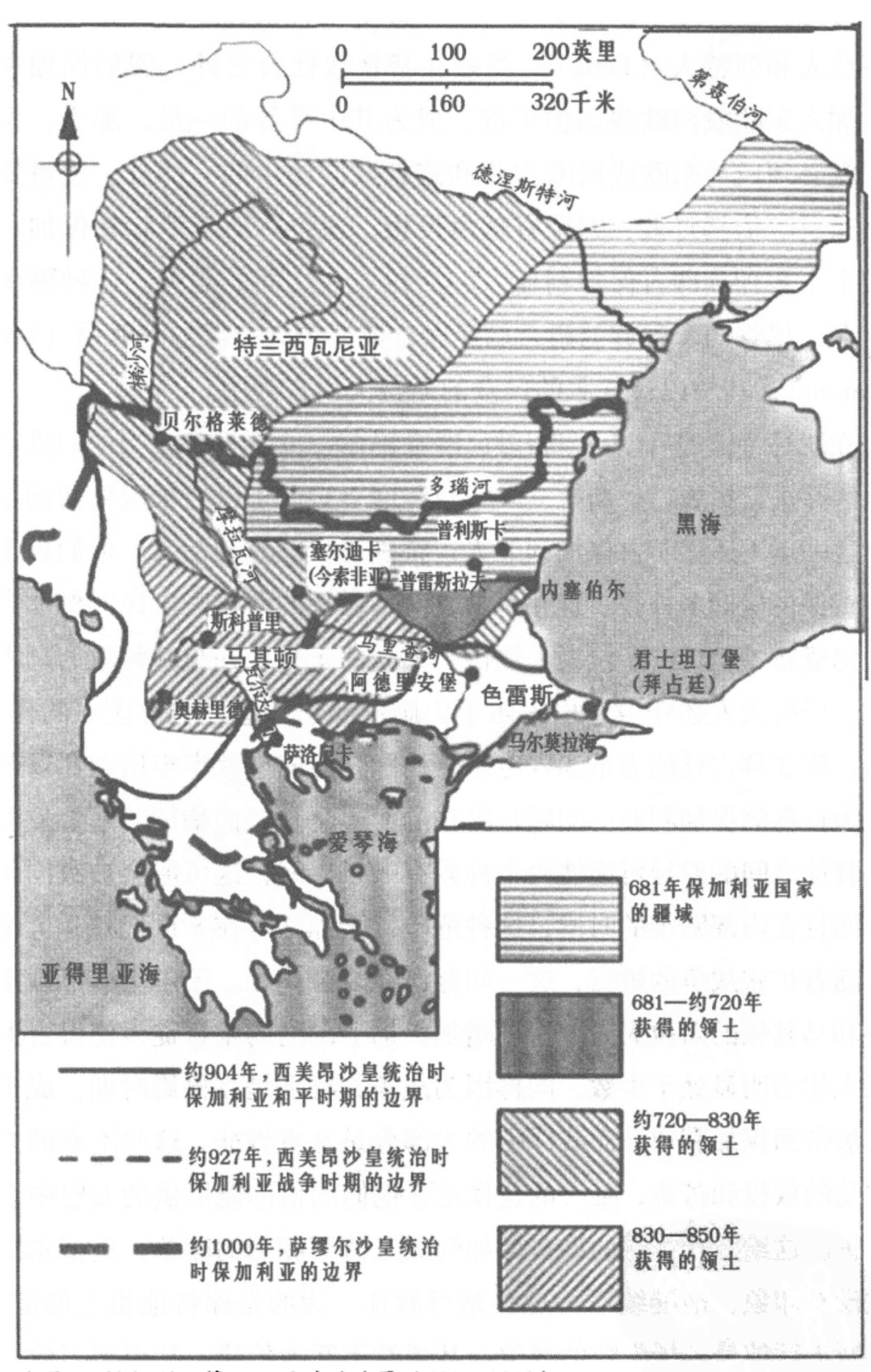
与名声显赫的奥穆尔塔格一样，鲍里斯是战场上的勇士，但他最重要的举措是强使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奥穆尔塔格这样做，部分原因是避免直接面临的军事上的窘境，特别是减轻来自拜占廷方面的军事压力。但是，鲍里斯做出这一决策有更长远的考虑，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

---

① 8、9世纪拜占廷帝国内部关于使用圣像的争论。730年，利奥三世下令禁止圣像，迫害拜圣像派。787年，伊林娜皇后宣布恢复使用圣像。反反复复，至843年宣布恢复圣像崇拜才告结束。——译者注

② 今阿尔巴尼亚境内。——译者注

③ 今阿尔巴尼亚境内。——译者注



地图3 保加利亚第一王国时的边界（681—1018）

首先，当时差不多整个文明世界都是基督教徒，只有遥远的部落像芬兰人和列特人（Letts）[①] 尚处在基督教社会之外。假如保加利亚希望加入东欧或西欧强国俱乐部，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那么，保加利亚就必须成为东欧或西欧文化和宗教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皈依基督教，完全有理由设想，这将有助于消除在保加利亚的两个主要种族即古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一直存在，尽管两个种族的语言已经融合成斯拉夫—保加利亚语（Slavo-Bulgarian），其中以被征服的民众的斯拉夫语言为主。

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基督教已经在巴尔干立下根基，当他们进入这一地区并进行拓展时，斯拉夫人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已经征服他们的基督教。这一点不适用于古保加利亚人，特别是贵族和统治者，他们数十年来一直保持信仰多神教。这并不是说信基督教的斯拉夫臣民对保加利亚有任何威胁，相反，斯拉夫人提供了大量的士兵，并与基督教的拜占廷交战。斯拉夫人还守卫进出巴尔干山脉的要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假如拜占廷的力量渗入巴尔干山脉，他们早就牢牢压制住以普利斯卡为首都的保加利亚。问题是潜在的而不是直接面临的。基督教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可能使两个种族有一条界线，这可能会被敌国所利用，而且在内部困难的时候，这种危险性会加深。在8世纪和9世纪期间，随着扩张战争的进行，这一问题已经复杂化了。巴尔干南部领土的获得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大规模增加，加上国内的基督徒，使得古保加利亚人相当明显处于少数。同样因为战争，特别是克鲁姆时期，成千的战俘被带回保加利亚，而战俘中的大部分是基督教徒。这些不幸的人因为遭受的奴役和苦难，唯一的选择是在他们的信仰能提供的安慰中去寻求庇护。这给抓获他们的许多保加利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奥穆尔塔格对此没有印象，他继续虐待这些基督教徒，为的是保持他祖先的信仰，但他所进行的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基督教不断地传播，甚至到了他自己家庭，他的一个儿子接受了新的信仰。

① 拉脱维亚的一个民族。———译者注

奥穆尔塔格试图把保加利亚建成集权制国家，他增加统治者的权力，削弱强大的原始保加利亚贵族的权力。同时，拜占廷基督教是同中央集权的专制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鲍里斯时，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导致他在 864 年做出决定，让他本人和他的全部臣民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之一。保加利亚的一些贵族反应强烈，他们强调与多神教信仰相联系的分权传统。结果，这些贵族中的 52 人被处死。

14

皈依基督教并没有给鲍里斯带来完全令人满意的结果。保加利亚成为拜占廷教会的一部分，但无权拥有保加利亚自己的宗主教（patriarch）或任命主教（bishops）。这在保加利亚加深了人们原有的担忧，因为在保加利亚国内，人们视教会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保加利亚的教会成为拜占廷帝国的一部分，将可以用来干涉保加利亚的内部事务。出于对通过拜占廷教会进行潜在颠覆的担心，鲍里斯向拜占廷的宗教竞争对手罗马方面提出，是否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受命前往的秘密使者询问，教皇是否允许鲍里斯提名保加利亚主教并任命保加利亚宗主教。与此同时，鲍里斯要求对宗教政体和教义的某些要点做出澄清：鲍里斯询问，根据保加利亚的传统，统治者单独进餐，而妻子和侍者要分隔安排在较低的餐桌，这是否可以继续？在什么时候允许打猎？星期日能否性交？罗马教会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是宽容的，这使鲍里斯受到鼓舞。但是，在宗主教和次一级主教任命这样关键的政治问题上，罗马教会没有答应。罗马教会在拒绝允许世俗权力任命主教方面和拜占廷一样固执；罗马教会也不允许保加利亚有自己的宗主教，尽管教皇确实同意允许保加利亚有自己的大主教，但必须由教皇任命。这些条件并不比拜占廷皇帝提供的好多少，因此，鲍里斯没有取得进展。870 年，管理保加利亚教会机构的宗教会议由大主教（archbishop）主持，而这位大主教由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提名并任命。

皈依基督教也引发了另一些难题。大批民众需要就新的信仰进行教育，虽然希腊派传教士去完成这一任务，但数量实在太少。此外，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斯拉夫人和古保加利亚人一样一直习惯于将希腊人视作是无法宽恕的狡诈的敌人，因此，对希腊的传教士有强烈的

15 不信任感。保加利亚本地人也难平和地对待这样的事实：大量的新牧师特别是上层是希腊人。正因为当地有这么多的猜疑，对要求他们宣誓信奉的新教义也不了解，所以，异端（heresy）在保加利亚的土地上获得了一个牢固的立足点，是一点都不会使人感到惊奇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对保加利亚今后的历史产生影响。尽管皈依基督教引发这样和那样的困难，但是，这一举措确实加速了这个国家两大部分人口的融合。斯拉夫人现在更乐意接受这个国家，因为它是信奉基督教的，而古保加利亚人对基督教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它不再与这个国家相分离，因为它不再是斯拉夫和希腊人占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皈依基督教，到 10 世纪，与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和古保加利亚臣民相对应，有了保加利亚人的称呼。

10 世纪中期到晚期，在斯拉夫语言中字母开始应用，这是与皈依基督教在时间上平行、在重要性相等的另一个发展。这一发展的起源，据认为是 862 年摩拉维亚统治者要求在他的民众中使用字母，以便控制法兰克和德国的影响。对西里尔字母的起源人们知之甚少，所了解的是极具争议的，一般认为是两位生于萨洛尼卡（Salonika）的教士西里尔（Cyril）和美多德（Methodius）创立了西里尔字母。

西里尔字母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超过任何别的发展，它防止保加利亚南部被希腊人同化，西部被法兰克人同化。它使保加利亚人能够创建自己的文学。他们在这方面非常迅速地做出了成绩。奥赫里德的克利门特（Kliment）（即克利门特·奥赫里德斯基），建立了一所很受人欢迎的学校，学校抓住了技术方面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在建校的头 7 年就吸引了 3 千多学生，他死于 896 年，后来索非亚大16 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①]。新的字母同样加速了重要的世俗课本诸如法典《里乌蒂姆审判法》（Zakon Sudnii Liudim）的出现。而如果没有字母，保加利亚国家如何用斯拉夫——保加利亚语进行管理，那是难以想象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新的字母使保加利亚教会能使用斯拉

① 索非亚大学的全称为索非亚“圣徒克利门特·奥赫里德斯基”大学。——译者注

夫——保加利亚语作为宗教仪式的语言，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保加利亚教会是不可能逃脱希腊的全盘控制的。

在 893 年，名人会议宣布：斯拉夫—保加利亚语或者以后我们所称的保加利亚语，将成为国家和教会的官方语言。

三、西美昂大帝时期（893— 927）

名人会议规定保加利亚语应该是国家和教会的官方语言，同时接受经过宫廷政变上台的西美昂（Simeon）作为统治者。在中世纪保加利亚历史中，西美昂并不特别，但他是那几个世纪里唯一一个被授予“大帝”称号的君主。

西美昂是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的，原先打算献身宗教，已被安排为保加利亚教会领导的候选人。尽管西美昂与君士坦丁堡有这样的渊源，但西美昂上台后，其初期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与君士坦丁堡和另一些邻国的交战上。他拓展了保加利亚的版图，向西到了亚得里亚海，向南到了爱琴海，西北方向则吞并了现代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他两次带军队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其中第二次是因为来自北部马扎尔人的压力，西美昂才被迫解围，事实上，西美昂亲眼目睹了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以外的大部分领土的丧失。896 年，西美昂与拜占廷缔结和约，拜占廷同意接受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30 年后，经过不断的战争，双方筋疲力尽，又一次缔约。拜占廷再次确认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承认西美昂为巴塞列斯（Basileus），意为国王或沙皇。君士坦丁堡以后只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拥有这样的称号。

西美昂做了进一步的有意义的变革，他将保加利亚的都城从普利斯卡迁至普雷斯拉夫（Preslav）附近。在新的都城，多神教的传统稍弱一些。普雷斯拉夫见证了保加利亚艺术和文学繁荣时期前所未有的辉煌，西美昂长时期来一直让文人们在自己身边，这些文人有蒙克·赫拉伯勒（Monk Hrabr）、约翰督主教（John the Exarch）、普鲁斯拉夫的康斯坦丁（Konstantin）等等。

896 年与君士坦丁堡的和约带来了 20 年的和平和繁荣，这有助于

文学的昌盛。“黄金时代”的繁荣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与拜占廷大规模的密切的商业联系，尽管与威尼斯以及西方的联系也同样在发展。然而，好景不长，西美昂统治的最后几年，保加利亚再一次陷人主要针对君士坦丁堡的战争。

四、保加利亚第一王国的结束（896—1018）

927年，西美昂去世，按照他的旨意，次子彼得成为继承人。彼得在位时间之长是很罕见的，他保持王位一直到970年，但这是一段保加利亚衰落的岁月。照例有战争发生，但那是防御性而不是扩张性战争，主要的威胁是北方的马扎尔人。同南方的强国有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些连续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国力的衰落也有一些重要的内部因素。整个国家即使不曾预期至少也希望保加利亚回到和平的黄金时代。马扎尔的入侵打破了保加利亚人的幻想。失望的贵族梦想回到过去的时光，而日益拜占廷化的宫廷想的是自己的问题。同时，教会开始腐败，考虑的是自己如何收敛财富。

后来的发展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有深远的影响。10世纪，由于国家的权力不像鲍里斯和西美昂统治时那么集中，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和经济权力稳步增长。教会拥有的土地和财富一直在大规模扩展。当少数人逐渐富裕起来时，穷人的境况则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况下，与社会疏远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自从皈依基督教后，许多保加利亚人并没有在这方面得到充分的教育，因此，他们对把自己托付给新的教会缺乏安全感。即使他们愿意，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先前的多神教（paganism），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毫无疑问地服从官方的教会：即使这些人不能回到多神教，那么他们至少会循入异端。异端是与基督教一起进入保加利亚。最初是由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带来一些非正式的教义，不久，隐逸主义（Hermitism）在虔诚的宗教信徒中变得流行起来。保加利亚的民族圣徒伊万·里奥斯基（Ivan Rilski）——里拉的约翰（John of Rila）就是一个隐士，里奥斯基大致出生于876年至880年间，947年去世。隐逸

主义明显地提出从世俗世界和世俗世界的问题中退出的愿望，随着更大更持久的异端——鲍格米勒派（bogomilism）进入保加利亚，进一步鼓励了这种“内在迁徙”或从世俗世界分离出来的观念。



插图4　西美昂沙皇击败拜占廷，约12—13世纪伊万·斯基利扎（Ivan Skilitsa）《编年史》中马德里手稿里的一幅小画像，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鲍格米勒派认为，整个世界包括人类，都是由撒旦创造的，唯有人的灵魂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告诉人类如何拯救灵魂。鲍格米勒派相信，所有肉体方面的愉悦的满足都是人类邪恶一面的表示，因此，他们宣讲一种令人生畏的禁欲主义生活，这种生活要求清贫、独身、戒酒和素食。少数徒步游历的圣徒（Holy Ones）按这样苛刻的戒律行事，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在圣徒和官方的教士之间鲜明的对比。鲍格米勒派同样对社会秩序提出质疑，他们在布道时称：人应该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在那里，财富共享，个人不知道所有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所有的人平等地参加农业劳动。鲍格米勒派没有正式的教士，虽

19

然每个地区有一位老人（dyado）或长者（不夸张地说，是外祖父），不同地区的联系非常松散。

鲍格米勒派满足了农民这一群体在精神方面的渴望。在最近皈依的人们当中，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日益加深的恶劣的境况，这需要有一种解释。官方教会的教师和牧师既不像鲍里斯和西美昂带来的人那样能干也不像他们那样负有使命感，许多人感到被抛弃了，教士关心的是自己发财致富而不是辖区内全体教徒的幸福，教徒们自然地觉得，那些能言行一致，按严格戒律行事的人更值得尊重。因为鲍格米勒派恰恰是对不断加剧的社会压力的反应，所以，在苦难时，鲍格米勒派日益流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情况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相信：世俗的世界完全是魔鬼创造的。

鲍格米勒派一直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中世纪时降临在保加利亚人身上的灾难，都是或者说绝大部分是由它引起的，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鲍格米勒派在宣称所有的制度无可救药的罪恶时，坚决谴责任何改善这些制度的努力，以至长时期处于置身事外的状态，鉴于此，鲍格米勒派本质上是消极的，不会引起任何改良主义运动或压力，它也不会激起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革命，那会质疑源自西方的天主教会。

10 世纪末，保加利亚第一王国迅速衰落，直至走向悲剧性地结束。在北方，与基辅罗斯（Kievan Rus）① 的战争不断，这自然招致与南方的君士坦丁堡再起战火。971 年，随着拜占廷征服东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城普雷斯拉夫陷落。克鲁姆、鲍里斯和西美昂的保加利亚不复存在。保加利亚在定都奥赫里德前，一直在西部几个中心迁移。在保加利亚王国的西部，拜占廷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到 1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保加利亚有所复兴，重新夺回曾失去的多瑙河以南的领土。在萨穆伊尔（Samuil）沙皇（997—1014）的统治下，保加利亚进一步扩张到了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和黑山，但这只是回光返照。保加利亚能取得成功主要是

① 古国名。9 世纪中叶至 12 世纪初在东欧平原上建立的以基辅为首都的早期封建国家。又称古罗斯、罗斯国。

因为君士坦丁堡忙于对付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对拜占廷在小亚细亚的属地构成威胁。1001 年，拜占廷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摆脱了阿拉伯人的牵制，巴西尔二世（Basil II）集中力量对付保加利亚问题。巴西尔二世的努力将为他赢得“保加利亚屠夫”这样可憎的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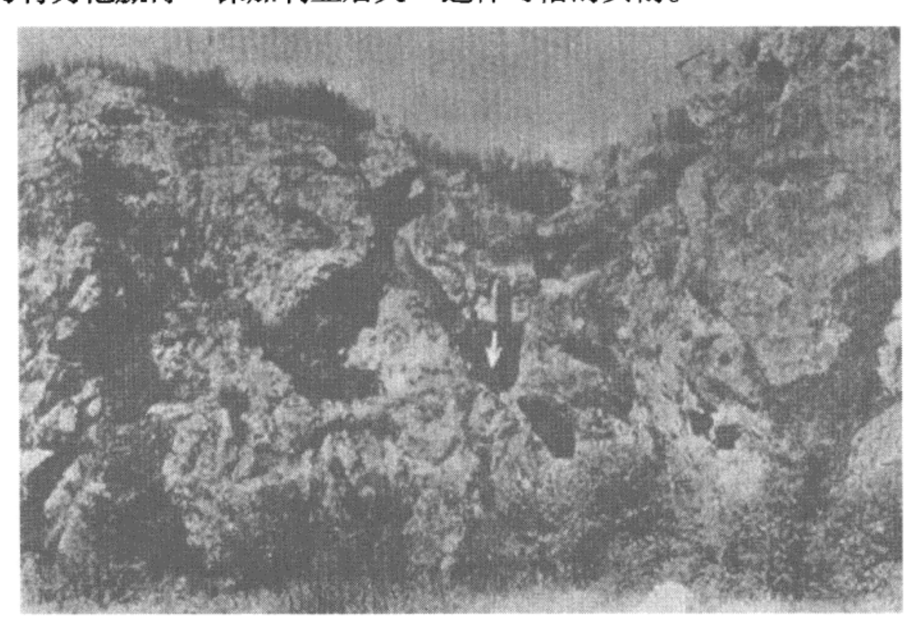


插图 5　隐逸思想在中世纪的保加利亚非常强大，图中的箭号表示到“上帝的幽谷“（Gospodev Dol）修道院教堂的入口，它靠近鲁塞地区伊万诺沃（Ivanovo）的村庄。

1014 年，保加利亚军队和拜占廷帝国的军队在马其顿对垒，保加利亚第一王国结束的时刻来临。在贝拉西查山（Belassitsa）的山坡上，1.5 万名保加利亚士兵成为俘虏，传说，每百人中有 99 人的眼睛被弄瞎，剩下的只留一只眼睛带同伴回到保加利亚，萨穆伊尔看到这些罹难的士兵后，一病不起，三天后去世。几个世纪后，这个故事将点燃民族主义的热情。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有一点是无疑的，战争结束后 4 年，保加利亚王国崩溃，拜占廷帝国吞并了保加利亚。

21

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取得了许多成就。它创造了由原始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融合而成的新民族——保加利亚民族。如同诺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融合成英国人一样，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到 11 世纪初，才有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和一个教会，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是完完全全的保加利亚人。尽管王国在少数几个统治者统治时曾取得过辉煌，王国同样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基督教的引进和随之而来的特权贵族权力的巩固，要求保加利亚经受其价值观和信仰的重塑，去适应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变化。在另一块土地上几个世纪完成的事情，需要保加利亚在几十年里完成，这无疑使社会紧张程度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在社会关系紧张并有裂痕的情况下，鲍格米勒派日益强大，他们对世俗世界的消极态度使他们不可能在国家危险时全身心地投入。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在有些方面的落后是惊人的。它没有建造一支海军，也没有观察到地理位置上的危险。由于保加利亚在巴尔干所处的位置，它在南面、东北面和西北方向都面临威胁。也许“弗朗索瓦一世的华丽妄想”[1] 可以设想能永远控制所有的对手。当时的保加利亚王国统治者是这样考虑，危险能通过在对手之间挑拨离间来防止，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设想，虽然是可以理解的。考虑一下当时王国总是深受拜占廷和拜占廷的习俗影响，这样的“弗朗索瓦一世的华丽妄想”是所有妄想中最虚幻的。保加利亚贵族崇尚南方这位邻居；国家和教会的管理照搬自拜占廷，比如税收政策；王国主要使用拜占廷的货币；甚至管理、商业和公共生活中的许多词汇都来自拜占廷帝国。

五、拜占廷统治下的保加利亚（1018—1185）

在战场上非常凶狠地对待战败的保加利亚的[2]巴西尔，胜利后则相对温和地处理保加利亚，对保加利亚最重要的是：允许保加利亚教会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机构。保加利亚教会由奥赫里德的宗主教负责，教区包括今天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大部。然而，巴西尔的节制并没有终其一生。奥赫里德宗主教的职权逐渐落入希腊人的影响下，保加利亚主教不再被允许从他们之中选举宗主教。税收制度

22

---

① 法国文艺之父“弗朗索瓦一世”为炫耀财势在1519年下令兴建的豪华的狩猎行宫，完全按照着国王的幻想打造。——译者注

② 原文中有战败的保加利亚鲍里斯，从上下文看，疑作者笔误，故删去。——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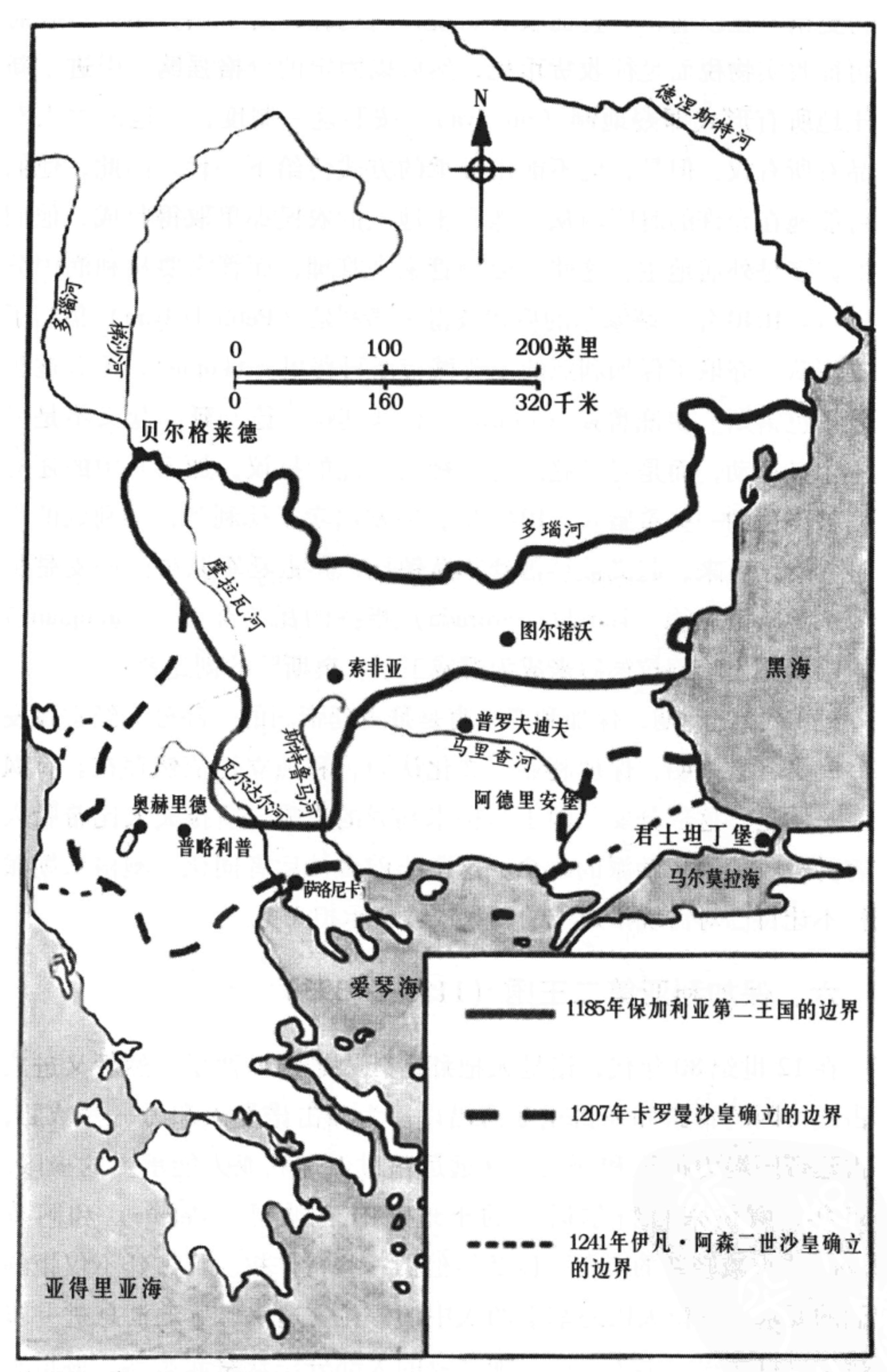
变得更糟。在以前，一直征收实物税，而现在，为了供养军队，政府不再征收实物税而是征收货币税，然后以固定的价格强购。引进了新的土地所有形式即赐地制（proniya）。按照这一制度，土地的主人对产品有所有权，但是，他不能用继承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因此，他们尽可能地在允许的时间内从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那里取得收成，他们中的许多是外居地主，这些人使用管家来管理，而管家要从利润中分得一份。1040 年，萨缪尔的后代彼得·德利延（Petûr Delyan）集结了一支军队，夺取了保加利亚的主要城市斯科普里（Skopje），不久逐步占领了色雷斯、伊庇鲁斯（Epirus）和马其顿。德利延的起义不是一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对日趋恶化的社会状况的抗议，加入其中的还有同样被压迫的一些希腊人。1041 年，盟友出卖了德利延，德利延的眼睛被弄瞎，后来，起义被拜占廷军队镇压，拜占廷军队中的一支是由哈罗德·哈德拉德（Harald Hardrada）指挥的瓦兰吉亚（Varangians）人，哈罗德·哈德拉德后来成为挪威王子，奥斯陆的创建者。

到 12 世纪晚期，保加利亚一直是拜占廷帝国的一部分。经常爆发一些起义，它表明，保加利亚的文化认同感和独立性依然存在。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分要归因于鲍格米勒派的影响。斯拉夫人比希腊人更容易吸收鲍格米勒派的理念，这阻止前者被后者同化。鲍格米勒派同样不让自己对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或教会承担义务。

六、保加利亚第二王国（1185—1393）

在 12 世纪 80 年代，诺曼人把拜占廷人赶出西西里，然后又进攻拜占廷帝国的希腊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为回击诺曼人和另一些威胁，拜占廷帝国竭力征税和征兵。这远远超过保加利亚人能承受的极限。1185 年，两位来自特尔诺沃的土地所有者彼得（Peteûr）和阿森（Asen）要求减轻新的负担，以及给他们一些特许权。拜占廷不仅拒绝他们的要求，一位大臣还掌掴两人中的一位。这一耻辱的消息进一步点燃了反抗之火，不久，东保加利亚的大部分民众拿起武器，彼得和阿森在特尔诺沃宣布自己为沙皇。

24



地图4　第二王国的边界（1185—1393）

保加利亚第二王国定都特尔诺沃，它将延续两个多世纪。像原来的王国一样，它的国土大小变化不定，也很少能免遭外来的威胁或自我削弱的内部分裂。在1197—1207年卡洛扬沙皇（Kaloyan）统治时期，王国方安定下来。卡洛扬沙皇在位时，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在军事方面的第一个成就是将马扎尔人驱逐出保加利亚西北部。1202年，他同君士坦丁堡签定了一份迫切需要的和约。然而，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因素打乱了巴尔干脆弱的力量平衡：十字军东征。1204年，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声称保加利亚人是他们的奴隶。第二年，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今天的埃迪尔内（Edirne）附近的一场激烈的交战中，卡洛扬击碎了这一厚颜无耻的行为。到1207年，卡洛扬重新征服了马其顿的大部分，但是，在围攻萨洛尼卡时，他被出卖并遭到暗杀。

与许多保加利亚统治者不同，卡洛扬用娴熟的外交技巧来增强其军事力量。他能击败十字军，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在1204年与教皇签署协定，从而保证保加利亚西部边界的安全。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保加利亚将承认罗马主教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从头到尾，罗马天主教会并没有实质性地干涉保加利亚教会事务。事实上，保加利亚尽管与君士坦丁堡在政治和领土上无休止地争执，但保加利亚仍是东正教的一部分，而东正教与天主教在1054年因不和最终决裂。

12世纪末，鲍格米勒派在动荡的岁月中兴盛起来，1211年，保加利亚在特尔诺沃召开一次宗教会议，鉴于所了解的鲍格米勒派的情况，会议谴责异端，并发起对异端的迫害。到伊万·阿森二世（1218—1241）时，随着保加利亚再一次处于相对安全和稳定的时候，对异端的迫害才缓和下来。伊万·阿森二世进一步降低了马扎尔人对保加利亚的威胁，不过，他的主要功绩是摧毁了皮尔鲁斯（Epirus）专制君主西奥多·安吉勒斯·康努尼斯（Theodore Angelus Comnenus）的军事力量，西奥多·安吉勒斯·康努尼斯一直试图将十字军驱逐出君士坦丁堡。1230年，在今天哈斯科沃（Haskovo）附近的一场交战中，阿森二世彻底击败西奥多·安吉勒斯，其领土并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从黑海扩张到了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

25

像卡尔曼一样，阿森二世是一位娴熟的外交家。在同希腊缔结针对十字军的条约时，他准备允许希腊分享可能获取的战利品的大部，作为交换，他坚持的唯一条件是：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和希腊承认保加利亚的宗主教。在确保这一条件后，1235 年，伊万·阿森通过与罗马谈判，成功的使保加利亚教会完全恢复独立地位。

伊万·阿森二世在位时，保加利亚第二王国的版图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影响力也达到顶峰。伊万·阿森在建设都城特尔诺沃方面做了很多。第二王国继续创作中世纪巴尔干艺术杰作之一的博亚纳教堂壁画（Boyana church），博亚纳教堂在索非亚附近，始建于 1259 年，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的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列为斯拉夫世界中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政治情况并不反映在艺术世界上。在 14 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暂时被迫接受鞑靼人的保护，马扎尔人再次成为威胁，1261 年，马扎尔人占领了维丁（Vidin），同年，希腊人终于将十字军驱逐出君士坦丁堡。在保加利亚国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朝，到 13 世纪末，第二王国处于分崩离析之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贵族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斗。第二王国同样受到多神教——静修主义（hesychism）的困扰，静修派的追随者呼吁反对所有的社交活动，要求把一生献给赫丝崔娅（Hesychia）[1]，或安静地深思和祈祷。它的追随者认为，这是发觉上帝真正的灵光的唯一条件，也许这是对的，但对反击入侵者毫无帮助。

在 14 世纪，西面塞尔维亚和南面奥斯曼的入侵进一步增加了保加利亚的困境。当沙皇米哈伊尔·希斯曼（Mihail Shishman，1323—1330）暂时控制塞尔维亚的威胁时，保加利亚曾有复兴的一线希望，但是，米哈伊尔·希斯曼在基乌斯坦德（Kiustendil）附近的战役中战死。伊凡·亚历山大（1331—1371）是为保加利亚取得安宁的最后一任君主。他收复了许多失地，同时他的国土在经济上有令人欣喜的恢复，这部分归因于土耳其军队在爱琴海沿岸登陆，将贸易线向北推移到了保加利亚境

26

① 希腊神话中的沉默女神。——译者注

内；部分归因于亚历山大能改善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正是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创作了另一个伟大的斯拉夫艺术珍品：以亚历山大名字命名的四福音，现存不列颠博物馆。1355 年接受委托后，福音连同他们 367 幅小画像是在一年这样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

27



插图 6　基督幼年之画像，索非亚附近博亚纳（Boyana）的壁画，博亚纳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这幅壁画创作于 1259 年，以精致和写实而著称。



插图7 伊凡·亚历山大福音上的沙皇伊凡·亚历山大和他的家庭，现存于不列颠博物馆。沙皇手握代表权位的君主的节杖，身边是他的两个儿子伊凡·希什曼（Ivan Shishman）和伊凡·斯特拉西米尔（Ivan Stratsimir），希什曼在1371年至1395年在位。沙皇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被描述为刚受启蒙的，这是因她从犹太教皈依为基督教。沙皇被说成“所有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君主”。皇后的右边分别是：沙皇的女婿康斯坦丁公爵、沙皇的长女康斯坦丁的妻子凯拉·泰马拉（Kera Thamara）、沙皇的另一个女儿凯拉察（Keratsa）和最小的女儿德西斯拉娃（Desislava）。

然而，伊凡·亚历山大的战争费用是很高的，税收就不得不提高。与此同时，他忙于外部事务意味着沙皇不能阻止政治权力慢慢从中央向土地贵族转移。这一次，主要的牺牲品是农民。

在伊凡·亚历山大去世后，保加利亚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将取决于隐隐出现的两个主要巴尔干强国——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竞争。在14世纪60年代，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阿德里安堡，由此，他们开始向马里查河（Maritsa）流域推进。1389年，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战败，谁是保加利亚的主宰就此决定。此后不久，保加利亚

战败。1391 年 7 月，在长达 3 个月的围攻后，特尔诺沃投降。宗主教被监禁在一个修道院内，王朝遭废黜，大贵族被剥夺，国家毁灭了。在维丁的抵抗持续了 3 年多，1396 年，抵抗最终失败。保加利亚差不多有 500 年不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

第三章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保加利亚

29　维多利亚时代精力充沛并自认为公正善良的基督教徒营造出这样的印象：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与他们同宗的基督教信徒遭受持续不断的长达500年的迫害。事实并非如此，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肯定会有骇人听闻的残暴的恐怖事件，但是在欧洲，这是偶而发生的。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但多数是针对反叛采取的行动，假如这不足以原谅它过分的暴行，那可以寻找其他的解释。有些是自发的、偶然的和局部的，通常是一些特别的个人、政治、社会或经济因素的结合所导致。把奥斯曼帝国想像成逝去的多种文明乐园的形式，那是不明智的；但另一方面，否定在帝国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它确保臣民的稳定、安全和一个合理的繁荣程度，无论你是哪一种宗教，那也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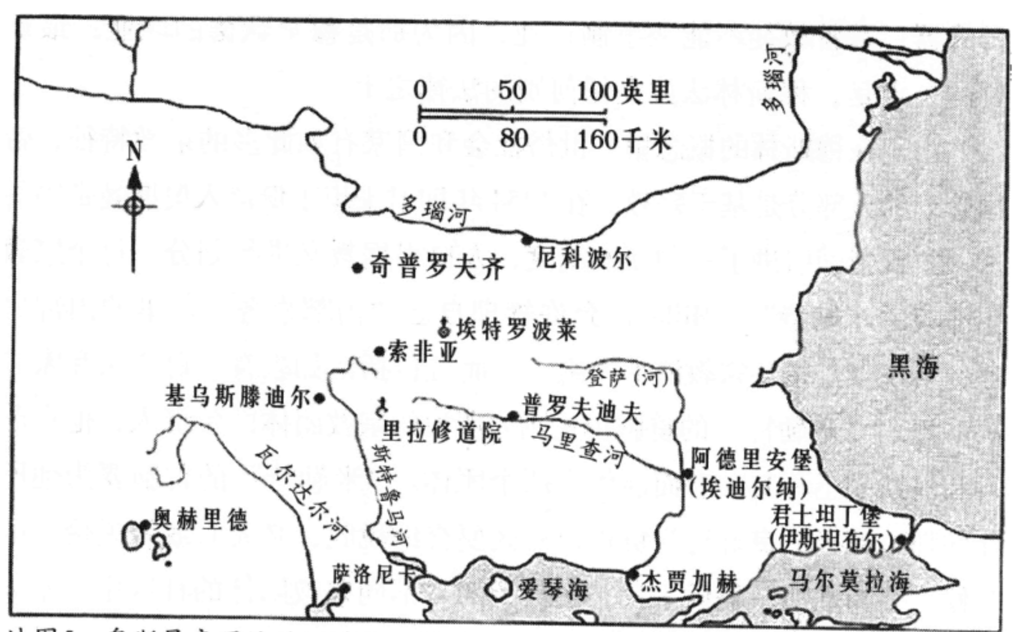
一、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和管理

假如这个时候帝国的基督徒享受和平和相对富裕的赐福，那么，他们从来未得到与穆斯林同等的地位。奥斯曼帝国是神权国家。帝国的首脑苏丹同时也是哈里发，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穆斯林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上帝同时是皇帝。帝国用各种方法歧视非穆斯林：非穆斯林比穆斯林要交纳更高的税；基督教堂不能像清真寺一样高；基督教徒不能穿戴绿颜色的衣服；不得尝试去改变穆斯林教徒的信仰；（30）当一位穆斯林在某一条路上时，基督教徒必须下马；基督教徒不得携

带武器；基督教徒不能从事制革业，因为那是穆罕默德的职业；最重要的一点是，穆斯林法律在任何别的法律之上。

由于在穆斯林的概念里，世俗社会和国家有如此多的宗教特征，帝国管理的大部分是基于宗教。在1454年即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帝国的这一年，帝国引进了一种新的制度，人口根据教义进行划分。每个宗教团体或“米勒特”（Millet）允许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这里的内部事务，不仅仅是指各宗教活动的组织，而且包括诸如教育、财产法和家族法。每个“米勒特”的首脑也是刚才所说的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他在苏丹和奥斯曼土耳其政府面前代表那个团体。“米勒特”的首脑要为他所在的那个社区的良好行为负责，社区要交纳税收，必要时或者说恰当的时候，要为陆海军提供士兵。在较大的有不同宗教团体的社区中，不同的“米勒特”继续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奥斯曼统治接受在同一个领土范围内有各自的管辖权。最初，有4个“米勒特”：穆斯林、天主教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和犹太人，犹太人的“米勒特”在1454年就在发挥作用，但在1839年前不被官方认可。后来增加了另一些“米勒特”，能授予独立的“米勒特”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团体的主要成绩。尽管非穆斯林的“米勒特”享有内部自我管理的权力，但是，他们是从属于穆斯林。任何涉及到与穆斯林的争端必须由穆斯林的法律来裁决。

“米勒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强压基督教团体去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发生过一些非自愿的皈依，但宗教迫害并没有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宗教迫害一直困扰经历宗教改革和反对宗教改革的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国家。至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欧洲的最初几个世纪，官方的决策者没有承认任何族群（ethnicity）的概念。这引起了一些困难，因为管理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据宗教将人群分类的机制并不被其他地区所共有。他们未曾认识到，所有的天主教徒并不都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有自己本民族的教会，有充分发展的教会管理体系以及他们自己鲜明特色的礼拜仪式和宗教艺术。由于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控制了天主教会，非希腊人实际上成为二等“米勒特”中的二等公民。



地图5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保加利亚



插图8 根据德米舍梅制（Devshirme）被带走的基督教儿童，这些儿童将成为土耳其的近卫步兵。出自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古版书。

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其军事力量是基于“提马尔”（Timar）。根据“提马尔”制，土地属于苏丹所有，苏丹把土地分配下去，作为交换，斯帕希（Spahi）或承租人在需要的时候，为帝国提供士兵，士兵的数量根据土地的拥有量而不同。斯帕希还担当各种各样的地方政府的责任。不由“提马尔”掌握的土地一般是在苏丹、苏丹的家族或帝国中少数有地位的人手中，在所谓的“哈斯”（Hass）封地上，承租人无论是基督教徒或穆斯林都免除大部分有时甚至全部的税。另一个更重要的土地类型是瓦可夫（Vakûf）。瓦可夫土地是它的收入通过遗赠的方式分配给一个慈善基金。起初，这主要是为了清真寺或伊斯兰学校的维修，但后来，基督教堂和修道院也能拥有瓦可夫土地。

对于并不生活在享有免税特惠的村庄里的基督教教徒，要交纳的主要税是人头税和以替代兵役名义征收的税。同样还有“德米舍梅”（Devshirme）。德米舍梅在1—7年间隔征收，它要的不是现金，而是年龄在7至14岁之间的基督教徒的男孩。挑选的标准是身体和智力能力，他们被从家庭和村庄中带走，然后皈依伊斯兰教，接受严格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这之后，他们进入近卫军。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近两个世纪里，近卫军禁止结婚，成为奥斯曼帝国军队中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精锐之师。他们同样在帝国的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他们会记起他们的家乡并给予照顾，因此一些村庄有这样的记录，他们主动要求实行“德米舍梅”，以希望在今后能得到这样的恩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到17世纪晚期，这样的“人税”是奥斯曼统治的一个恐怖的特征，在保加利亚土地上最后一次全面的征收是在1683年。

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人口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后的初期，信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大约占据帝国在巴尔干人口总数的1/3，不过准确的数字不可能获得，因为有些基督教徒没有记录，他们生活在有特权的村庄里或在封地上，不纳税。

到16世纪初，信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只占巴尔干总人口的8%，保加利亚人占巴尔干人口比例降低的原因有4个方面：第一，帝国向巴尔干的其他地方扩张，进入匈牙利，因而极大地增加了总人口，其中没有多少保加利亚人，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迫害，特别是在政治反抗或社会动荡之后。第三是疾病和瘟疫。第四是一些信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皈依伊斯兰教。

长期以来，这是一个不断争论的问题。无疑，相对其他巴尔干的基督徒而言，保加利亚的信徒面临的改变信仰的压力要更强一些，因为定居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或穆斯林的人口密度要高于其他地区。此外，保加利亚处在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中心，控制进入中欧的军事要道和贸易线，属于君士坦丁堡本身的防御圈。无疑，一些保加利亚地主接受征服者的信仰是为了重新得到他们的财产。在保加利亚被征服后，大贵族马上遭剥夺，但是，低级的贵族还在，并慢慢融入斯帕希这一等级。一些基督教团体转向伊斯兰教，可能是因为有许多好处，如税负较轻以及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所能获得的特权。信基督教的村民皈依伊斯兰教还有另外的一些情况，如给予他们抢劫和掠夺当地教会或修道院财产的自由。最后，也有强制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在17世纪第三个25年时的罗多彼山脉（Rhodope）就有一系列这样的情况。穆斯林中如此突然的好战性的爆发，其动机尚不清楚。此时，随着苏丹的军队向维也纳推进，伊斯兰教恢复活力，这类强制皈依也许是恢复活力所带来的兴奋所致。还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奥斯曼帝国军事方面的策划者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战争的严重性，不希望通过罗多彼山脉的出口掌握在非穆斯林人的手中。但这似乎是一个冒险的战略，因为强制皈依可能比平静中的基督教徒更不可靠，除此以外，强制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的民众皈依伊斯兰教，将减少纳税人的数量，而这个时候，帝国政府极度缺少税收。

35

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特别是贵族，逐渐融入了穆斯林世界，完全穆斯林化和土耳其化；另一方面，许多改变宗教信仰的村庄仍保持保加利亚的语言、民间传统和服饰。用保加利亚语为母语的

穆斯林以“泊马克”（Pomaks）著称。

大部分保加利亚人包括穆斯林或基督徒生活在村庄里。大部分村庄非常小，只有120—200左右居民。大一点的村庄极少，较有名的是科泰尔（Kotel），在1648年有2 500多居民。村庄由家族中的长者管理，长者从他们中的行政官员如当地村庄的首领中挑选，这样的首领用保加利亚语称作“市长”（kmet）”，有时甚至称“亲王”（knyaz），名字代表征服前行政官员的延续。到19世纪，当地有不少由有名望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中的许多近来已经拥有资产和财富，以源于土耳其的带有贬义的“乔尔巴德日”（chorbadjiya，给汤的人）而知名。奥斯曼帝国的官员很少来到村庄，除非为了收税，当然包括“德米舍梅”。一些团体，所谓特权村庄有免税的权利，并自主安排自己内部的事务，作为交换，他们向苏丹或他的官员提供特别的义务。一些这样的村庄要为军队和商人安全通过当地的山口负责。还有一些任务更不平常。有些要为苏丹的鹰猎训练采办飞鸟，有一个叫杰多夫（Dedovo）的村庄，要求每天为普罗夫迪夫附近的城市提供两桶泉水。几个世纪后，这些村庄在自我管理上获得的经验，在组织学校和另一些机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助于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

在17世纪，50个保加利亚人当中大约只有1个人生活在城市。这部分是因为在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早期和激烈动荡的时候，城市里的保加利亚人逃走了或者被赶走。村庄特别是遥远的山里的村庄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也最有可能继续地过一种信基督的保加利亚人的生活。随着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发展，它的贸易逐渐由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控制，虽然17世纪时的保加利亚商人比较活跃，最远至特兰西瓦尼亚，很多保加利亚商人被说成“希腊人”，甚至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

36



插图9 保加利亚农民。源自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古版书。

37 奥斯曼帝国城市的中心一般由管理部门或军事建筑控制，周围是较小的城市区，称为“马哈拉”（mahalla）。城区居民常常根据种族身份，有时根据职业，偶尔两方面因素都有，因此，在一些大的城市，会有一个基督徒的制鞋工人区和一个穆斯林的制鞋工人区。在“马哈拉”，街道是窄小的，房子面向内对着庭院而不是面向外对着大街。

在城镇经济活动中，行会（esnaf）起主要作用。行会的结构类似西欧，按等级排列，有雇主、熟练工人和学徒，管理的机构从当地的雇主中选出，也像西欧的行会一样，向成员提供福利，但是在奥斯曼帝国，行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员，没有很强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恰恰是西方行会的特点。许多行会（当然不是全部）的成员既有基督徒又有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最初的10年后，行会鼓动建造和维修许多教堂和其他一些宗教机构，如索非亚的圣彼特卡（Sveta Petka）教堂就是由当地的行会重新装饰。保加利亚的纺织品行会是比较突出的，在索非亚，纺织品行会因制作女装和带帽兜的斗篷而著名。

虽然许多保加利亚行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很是兴旺，但是征服对保加利亚民族来说，既是一场政治灾难也是一场文化上的灾难。不仅保加利亚国家不复存在，教会落入君士坦丁堡的掌控，而且保加利亚的语言和文学似乎也将消亡。保加利亚语曾经与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一起列为欧洲文明世界的主要语言，并且，保加利亚已经创作了大量世俗的和宗教方面的作品。但是，在 18 世纪后半期，叶卡捷琳娜大帝编辑 279 种语言和方言的样本，其中包括一些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没有提到保加利亚语，也没有提到“斯拉夫语研究之父”——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ph Dobrovský），多布罗夫斯基通晓保加利亚语，而沙法日克[1]（šafařik）在 1826 年出版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学史》一书中对待保加利亚语也是很粗略并且有缺陷的。

38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保加利亚语仍然存在着，最终，它的文学作品将会再生。语言能够幸免于难，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保加利亚人生活在小小的、孤零零的并且通常同种族的村庄里。在这样的共同体内，没有必要因为每天的经济和商业交易而采用希腊语，在与土耳其官员交涉的时候也不会使用土耳其语。因此村庄保留了保加利亚语，保留了保加利亚的名字、民间故事、家庭组织形式和保加利亚的节日。

三、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教会

保加利亚人的小村庄保留下来的节日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会在保持独立的“保加利亚王国”的情感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在 1394 年，也就是特尔诺沃沦陷的这一年，保加利亚的宗主教辖区被废除，保加利亚教会归属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管辖。然而奥赫里德的宗主教辖区继续被视作保加利亚人的，尽管事实上奥赫里德的大部分高级教士是希腊人，并由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宗主教提名。因此，无论奥赫里德的主教辖区，东西保加利亚的教会都由希腊人控制，特别是较高级的教

---

① 沙法日克（1795—1861）捷克民族复兴领袖，斯拉夫语文学和考古学先驱。——译者注

会。然而，在地方教区，许多保加利亚教士仍获得提名，至少到 18 世纪，礼拜仪式通常仍由保加利亚人主持，只要该地区的全体教徒同意。在许多社区内，教区教士提供生活和精神各个方面的指导，特别是在 17 世纪和随后的时间里，教士常来自于当地民众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分，这是很有意义的。只有他们能担当的起为获得教区提名而需要的一年比一年高的昂贵的贿赂。而要不是教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保加利亚语的生存将更加困难。

在征服后的早期，奥斯曼帝国总的来说遵守他们禁止建造或重建 39 教堂的法律条文。后来有所放宽，但建造或重建基督教教堂的过程是缓慢的，那需要时间、耐心和钱。有充足的财力、精心组织的村庄自治会以及教士能获得必要的许可，因此，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教堂的建造和恢复获得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意义：它成为与占统治地位的非基督教权威的一场竞争，胜利将带来极大的荣誉感和成就感。那同样意味着保加利亚的画家和肖像画画家能继续工作，因而在宗教艺术中保持了保加利亚传统的生命力。

保加利亚的修道院也有助于保持宗教艺术的生命力。在征服后的最初岁月里，修道院的日子非常艰难。到 14 世纪中期，许多修道院被毁或处于令人伤感的衰落状态，但在那以后，缓慢的复苏开始了。许多修道院进行重建，一般都远离奥斯曼帝国军队使用的主要路线，一些幸运的修道院能够将他们的财产转入瓦可夫土地因而能确保他们的收入。来自基乌斯坦德（Kiustendil）附近的三兄弟重新建造并让人重新住入伟大的里拉修道院，在修道院附近，伊凡·里尔斯基曾作为一个隐士渡过他的一生，1469 年，修道院得到极大的提升，伊凡·里尔斯基的遗体从特尔诺沃迁回。在以后的岁月里，重税一再威胁它，但里拉修道院顽强地生存下来，还保存下大量的藏书。在 17 世纪和此后的日子，里拉修道院同样帮助发起在索非亚地区建造宗教绘画学校。

修道院在保持教育的基础方面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特尔诺沃陷落后，阿索斯山（Mount Athos）为许多保加利亚作家和文人提供庇护，当保加利亚的政治环境稳定下来后，人们又能够到这座“圣山”

朝拜。在阿索斯的修道院以及保加利亚的另一些重新获得财产的修道院，派教士去收税，并同这些地产上的居民保持联系。巡游的教士或为人所熟知的“塔克西迪奥特”（taxidiots），在修道院和村庄之间的关系上扮演重要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修道院开始发展“私塾（cell Schools）”①，一小部分年轻人将受到训练，以服务于教会和修道院。在15世纪，来自特尔诺沃的避难者在阿索斯山的佐格拉夫（Zograf）修道院找到一所相当大的斯拉夫语学校，这后来成为整个保加利亚修道院的榜样，村庄一直鼓励巡游的教士去安排建立这样的学校。学校的数量相当少，他们既不产生质问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观念也没有培养类似于知识分子的人物，但他们确实让文化留存下来。他们同样加速了老的保加利亚语和更口头化的语言的融合，这个过程发生在17世纪，语言学家称融合后的语言为“新保加利亚语”。

40

一些教士抄写了老的圣徒传记，其中之一由主教埃夫蒂米（Evtimii）在即将陷落的特尔诺沃编辑，这给予保加利亚的圣徒和殉难者以极高的声誉。然而一个人不应该受诱惑将这一过程理解成现代民族的复兴或民族复兴的先驱：261份现存的确定为17世纪的保加利亚手稿中，仅有46份特别提到保加利亚圣徒。修道院和修道院的写字间（scriptoria）所做的是保存了种族独立的情感，没有这一点，一个民族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四、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反抗

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反抗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例如，1416年就有穆斯林贝德尔丁（Bedreddin）起义。然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主要是基督教。当他们反抗的时候，总是希望基督教的力量将对奥斯曼以沉重打击，这一希望屡遭挫折。16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他们的盟友特兰西瓦尼亚人及瓦兰西亚人（Wallachian）进行了反土耳其的“长期战争”，战争造成这样的信念：

---

① 直译为“小屋学校”。——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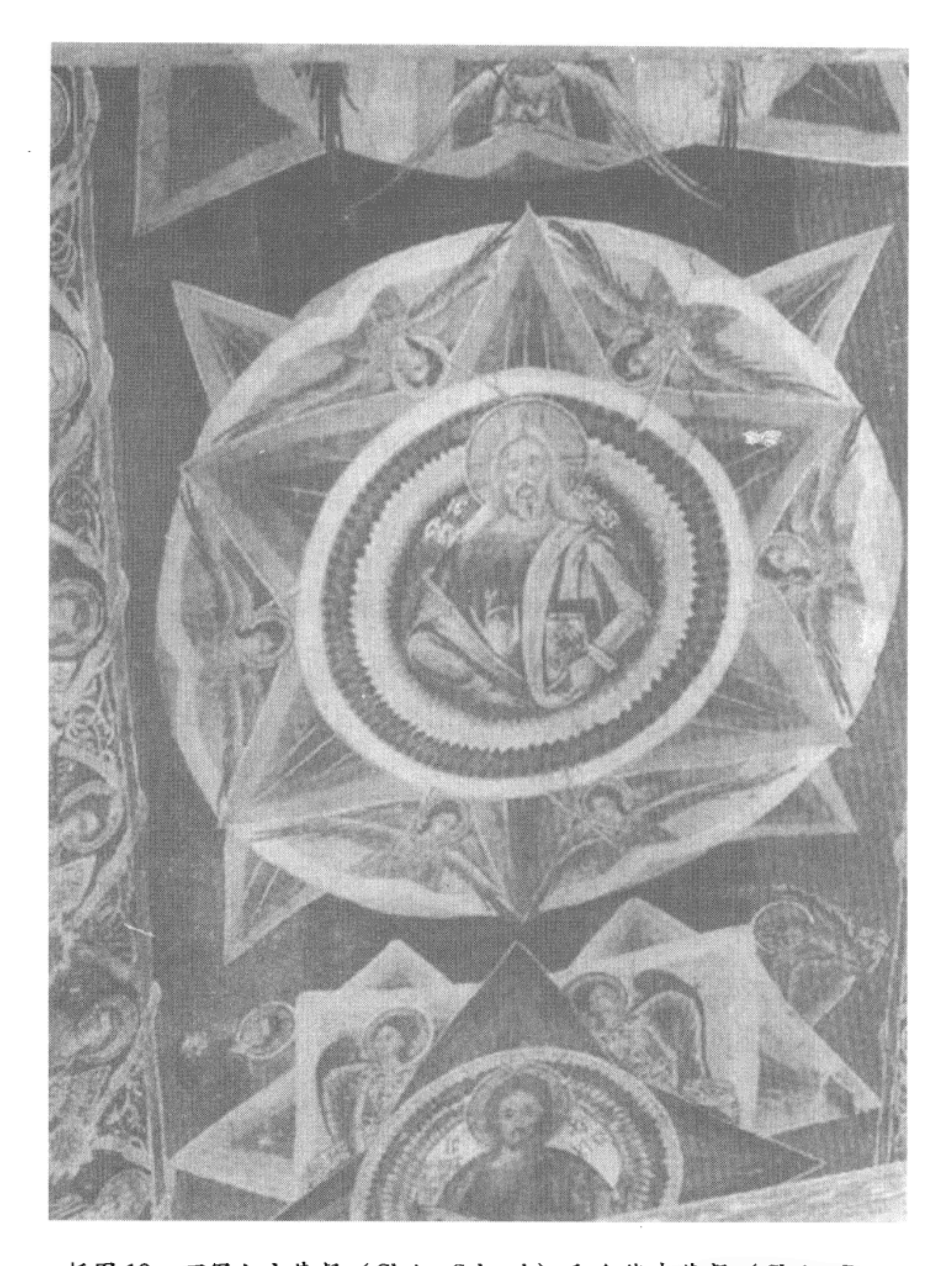


插图 10　万军之主基督（Christ Sabaoth）和全能者基督（Christ Pantocrator）（下），出自斯特鲁马（Struma）地区博博舍沃（Boboshevo）村的圣伊利耶（Sveti Iliye）教堂。完成于 1678 年，用这一领域西方权威研究者的话说，它代表了“自奥斯曼时期以来保加利亚绘画全面保存最为完好也是最完整的作品。”马希尔·基尔（Machiel Kiel）著《土耳其统治时期保加利亚的艺术和社会》，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Van Gorcum），1985 年，第 18 页。

多瑙河以南的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维也纳和罗马的代理人利用在巴尔干极有影响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商人怂恿这样的信念。结果是1598年特尔诺沃地区的一次起义。奥斯曼帝国按惯例残酷地镇压了起义，但进一步往西，在靠近索非亚的山上，残留着一支称为“强盗”（haiduks）的军队，那不会仅仅是打家劫舍的，即使不是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民族英雄。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1686年，在特尔诺沃周围有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爆发是预料俄罗斯将进攻奥斯曼帝国。两年后，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的希普罗夫齐（Chiprovets）周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希普罗夫齐地区是与众不同的。这一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在13世纪时，那里一直由塞尔维亚人进行挖掘，土耳其人到此，改由撒克逊人挖掘。信天主教的塞尔维亚人很快被保加利亚人所同化，而撒克逊人虽然讲保加利亚语，仍信仰天主教。当获悉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从北面靠近时，撒克逊人组织了一场反抗，当以为基督教的军队离本地只相距一天的行军路程时，撒克逊升起了反抗的旗帜。他们试图打通联结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道路，但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并没有给起义以援助，起义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希普罗夫齐镇被毁，有人估计当地三分之二的人口被处死。幸免于难的人们逃往今天罗马尼亚的巴纳特（Banat）和蒂米什瓦拉（Temesvar），他们的后代仍生活在那里，是东欧不太为人所知的少数民族。

42

五、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在17世纪8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向巴尔干推进，而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企图占领维也纳遇挫，到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明显地衰落了。提马尔体制也不再适当地起作用。太多的财产被允许转到瓦可夫阶层，连同指定他们的后代作为遗嘱受益人的居民。这引起了一系列后果。首先，这使庄园的出现更容易了，在庄园里工作纯粹是为了收入而不是为了加强苏丹的军事力量，在新的所有权下，农民遭受更多的剥削。提马尔制的衰落同样意味着几乎没有士兵能从提马尔土地中

征召，因此这迫使政府更多地依赖近卫军作为军队的骨干。但是，近卫军并不再有他们曾经拥有的战斗力。近卫军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不再是最杰出的，也不再是奥斯曼帝国刚进入欧洲时那样纪律严明。很久以前，他们就可以结婚，可以由他们的孩子承继他们的身份，到最后，另一些穆斯林的孩子也可以成为近卫军。

43

提马尔制度衰落的另一个后果是总督（beglerbeg）的消失，总督一直是他所在地区的斯帕希的总指挥，同时受帝国委托管理该地区的行政事务。总督被“瓦里”（Vali）所取代。“瓦里”的主要任务是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征税，而对他达到目的方法没有任何限制。“瓦里”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16世纪和17世纪帝国面临的紧张的财政危机所至。财政负担的沉重主要是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帝国正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随着欧亚贸易线从陆地转向海洋，帝国失去了商品通行税的征收，这样，沉重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承受。帝国也没有从西欧与美洲联系的开辟中获益，相反，它遭受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的严重打击。日益增长的军事费用，没有相应的收入上的增加，这进一步加深了通货膨胀的难题。政府自然地采取它所有的手段尽量去增加收入。在17世纪初，保加利亚的税负大概是家庭平均收入的1/3，到世纪末，税负增加到了3/4以上。

对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而言，并非主要但很有用的收入来源是贿赂，受委任的高级官员将对政府做出捐赠。宗教方面的最高职务是国家任命的，他们为担任这些职务慷慨地付款，其中以东正教教会的首脑——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为最。在17世纪财政危机时，帝国政府随便用一个理由将宗主教免职，然后从他继任者那里获得贿赂。到17世纪末，只有最富裕的希腊家族才能担任高级官员，这些希腊人大部分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Phanar）地区，这里是君士坦丁堡最富裕的地方，与今天刚好形成鲜明对照。法纳尔人（Phanariots）[①] 逐渐控

---

① 指奥斯曼帝国时期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地区担任土耳其重要神职及官职的希腊人。——译者注

制了宗主教这个职位。由于帝国各省教士的任命也需要行贿，这样，富裕的当地人，再一次，通常是希腊人逐渐控制了教会。每一个教士都希望从比他低一级的教士手中拿回他曾付出的费用，这样一个过程层层往下，最后，税负落到普通的村民和城镇居民身上。在 17 世纪，教会的税也是如此繁重，以至于东正教的主教经常使用土耳其军队帮助收税。 44

官员的买卖和随之而来的高级职位集中在有经济实力的人手上，这影响了行政方面的管理。而且，主要是法纳尔的希腊人通过贿赂获取政府高级职位，是希腊人在 18 世纪逐渐控制了奥斯曼的行政管理体系和东正教教会。法纳尔人不可能有能力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衰落。18 世纪，奥斯曼帝国衰落的速度加快，保加利亚民族复兴的种子最后从中出现了。

第四章　民族复兴和解放

45　民族复兴（vûzrazhdane）是保加利亚认为正义并引以自豪的奇迹。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复兴是长期的和复杂的，有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精神上的因素，其中交织着计谋和各种复杂的形式。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一小部分“觉醒者”最先发出了文化复兴的呐喊。但是，尽管他们看到复兴的必要，却对它可能采取什么形式没有具体的设想。文化复兴只有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发生时才有可能，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战胜了奥斯曼帝国。文化复兴被转换成民族复兴的方式，有自己的组织，首先是基督教会的，然后是政治的，这是从经济恢复和文化复兴中出现的积极分子努力的结果。

一、觉醒者

保加利亚民族复兴的先驱是帕伊西（Paiisi），一位生活在阿索斯山希林达尔（Hilendar）修道院的教士。帕伊西·希林达尔斯基（Paiisi Hilendarski）1722 年出生于巴那斯克（Bansko）镇。1754 年，他进入希林达尔修道院。一些年后，他成为巡游教士，并以这样的身份就修道院事务游历保加利亚，他对普通民众的苦难和保加利亚人比希腊

人地位低下留下深深的印象。作为一个博物方面的学者，帕伊西似乎逐渐迷惑于保加利亚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保加利亚文化地位低下之间的对立，通过如饥似渴的阅读历史，他已经非常了解保加利亚的过去。1761 年，帕伊西最远旅行至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齐（Sremski Karlovac），在那里，他查阅了俄罗斯手写本的副本。1762 年，因为疾病和疲惫，他从希林达尔搬到佐格拉夫修道院附近，继续查阅保加利亚的历史。所有这些阅历和知识，他都倾注到伟大的著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史—关于保加利亚人民、沙皇和圣徒以及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历史》一书中。书中使用古时教会用的斯拉夫语，但加上了当代人的表达方式，因而显得较有生气，书中回忆了中世纪保加利亚国家和教会遭受的苦难及伟大的岁月。书中既回顾过去又期盼未来，因为有对过去伟大的呼唤，帕伊西警告保加利亚今后希腊化所引发的危险，他呼吁他同时代的同胞们（co-national）改变他们的态度，坚定地抵制希腊的影响，并且要“紧紧地贴着你的心你的种族和你的保加利亚家园”。他指出为什么要以那片家园为荣：

46

> 对于所有斯拉夫民众而言，最辉煌的是保加利亚人；他们是第一个称自己为沙皇的人，第一个有宗主教，第一个接受基督教，是他们征服了最辽阔的土地。因此，对于所有斯拉夫民众而言，他们是最强壮的，最高贵的，第一批来自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圣徒通过保加利亚语放射出他们的光辉。

因为这光荣的过去，帕伊西认为，保加利亚没有必要感到自己低希腊人一等，而应该是相反，他写道：

> 但是，他们说希腊人更聪明更有文化，而保加利亚人头脑简单、愚蠢，没有优美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融入希腊的原因。但是，有许多民族比希腊人更聪明更有荣耀。……没有一个希腊人会像你们一样愚蠢到放弃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教育和自己的

民族……保加利亚不要欺骗自己，了解你们自己的民族和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进行研究。



地图6　民族复兴时期保加利亚

48

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帕伊西再一次旅行，这次主要是宣传他的手稿。他说，这部手稿是写给“普通的保加利亚人”的，是为“整个保加利亚民族的利益”而作。1765年，帕伊西在科泰尔碰到弗拉察的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Sofronii Vrachanski），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对《历史》一书印象非常深刻，抄写一份后放在他的教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帕伊西的著作有许多副本，到今天至少有50本是完整的，但关于帕伊西本人情况留存的材料则越来越少。1844年，当印刷体的大版本出现在布达佩斯时，它被看作是佚名之作。直到1871年，保加利亚现代第一个专业历史学者马林·德里诺夫（Marin Drinov）确认帕伊西为作者。

在马林·德里诺夫确认帕伊西的身份以前，觉醒者中最有声望的人是于里·维涅林（Yuri Venelin），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斯拉夫语研究的先驱，他做了许多工作重新发现保加利亚语并使保加利亚语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于里·维涅林1802年生于罗塞尼亚

(Ruthenia)[①]，在匈牙利接受神学方面的教育，但为了在莱姆贝格[②](Lemberg 即今天的利沃夫）大学学习过的历史，他放弃了神学。1829 年，他出版了《古代和今天的保加利亚在政治、人种和宗教方面与俄罗斯的关系——历史的批判性探究》一书。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保加利亚人起源于斯拉夫族而不是突厥族。当于里·维涅林大声疾呼将保加利亚语转为俄罗斯语的一支时，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结论。

帕伊西和与他一起的觉醒者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他们作为民族复兴的创立者的角色还不如说在事实上他们为复兴提供了事后的解释。到帕伊西的著作被广泛阅读的时候，不必说重新确认他为《历史》一书的作者，文化的复兴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促进保加利亚人呼吁重视其文化特性的并不全是通过阅读帕伊西或其他觉醒者的著作所获得的历史意识，更多要归因于同巴尔干以外世界的联系，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大革命后，这一联系通过商业、国外教育和点点滴滴渗进巴尔干的现代观念而获得，以及通过加入或了解塞尔维亚和希腊反抗君士坦丁堡统治而获得。如果不是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经历着剧变，几乎没有任何一点发展能够产生。这些剧变延误了觉醒者的思想的传播，但剧变带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观念不可能转变为行动。 51

① 乌克兰西部城市。——译者注
② 乌克兰西部城市。——译者注

插图 11　帕伊西伟大《历史》的一页。在 1989 年革命以后，手稿的原件回到保加利亚，自那以后，神秘围绕着它的所在。



插图 12　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自画像。

二、奥斯曼帝国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变化

随着奥斯曼帝国缔约，它越来越开放与欧洲的贸易。帕萨洛维茨（Passarowitz）条约允许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为商业目的使用多瑙河，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和法国得到了贸易上的特许权。到18世纪的第三个25年时，俄罗斯日益成为巴尔干事务中的重要因素。1774年的7月的库楚克·开纳吉（Kutchuk Kainardji）条约使俄罗斯控制了黑海北部沿岸地区，更重要的是，它允许俄罗斯商船在黑海航行，通过海峡进入地中海。条约同样批准对俄罗斯商人开放多瑙河。

比商业条款更重要的是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中规定，允许俄罗斯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东正教教堂。条约还含糊地给予俄罗斯统治者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保护东正教教徒的权利。困扰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东方问题”已然产生。在这其中，一个新的保加利亚民族出现了，最后，一个新的保加利亚国家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奥斯曼帝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与其内部凝聚力的瓦解是密不可分的。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管理能力不断下降。包税制的扩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近卫军人数越来越多，纪律越来越差。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商业性农业生产，种植诸如棉花一类的经济作物，在这些地区，农民的税赋非常之重。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期，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央政府无法管理“阿扬”（Ayans）。“阿扬”是势力过分强大的臣民。他

52

们原先可能是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官员将他们管辖的地区转变成自己的封地，例如萨洛尼卡的帕夏，在一年里就从他的封地收了总额为36万格罗申（groschen）的税；可能是近卫军，这方面他们做得只会更多；可能是当地有身份的人，他们通过农业、高利贷或贸易积聚起了相当大的财富，然后凭借金钱控制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或者可能是一直有势力的有影响的名门望族。这些人当中最有名的是亚尼娜（Yanina）的阿里帕夏，他统治着阿尔巴尼亚南部和希腊北部，另一位是奥斯曼·巴兹温特沃格鲁（Osman Pasvantoglu），他控制着维丁地区200多个村庄。此外还有许多这样的人如鲁塞（Rusé）的伊斯梅尔·

德雷斯特尼克沃格鲁（Ismail Trestenikioglu）和锡利斯特拉（Silistra）的伊基利克沃格鲁（Ikilikioglu）。“阿扬”的兴起导致巴尔干地区中央集权事实上的崩溃。英国旅行家 E. D. 克拉克描述过 18 世纪 80 年代“阿扬”的兴起对南马其顿弗拉察村庄的影响：

> 由于阿里帕夏的勒索或者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劫掠，村民处在最悲惨的境地。他们告诉我，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不得不付给包税人 80 个钱袋（purses），总数等于 4 万皮阿斯特[1]。从他们住所看，贫穷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可怜的村民到处惨遭领主的压迫。在这里，农民获得的全部都被拿走；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生存的办法。除此以外，还有经常性的疾病、火灾等不幸，而且，“瘟疫和饥荒”也会降临他们的身上。村庄在一年里已经被土匪用火烧了两次……

在 18 世纪 70 年代，能发现“库尔查里伊”（kûrdjaliistvo）[2] 的端倪，18 世纪 90 年代和 19 世纪初，“库尔查里伊”达到顶点。1791 年，苏丹塞利姆三世试图引进一项改革举措，以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是，“阿扬”太强大了，苏丹塞利姆三世的失败加剧了他竭力想制止的进程。1792 年，在 1787—1792 年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时，大批未适当控制的士兵在巴尔干一带成群结队地乱转；1793 年，在罗多彼地区发生了由穆罕默德·斯纳普（Mehmed Sinap）领导的起义。1804 年，当地“阿扬”的举措促使塞尔维亚发生了各个家族和村中长者参加的起义，起义导致该地区的自治，最后塞尔维亚赢得独立。在随后的几年里，巴尔干山脉以北地区的无序和动荡更加显著，1810—1812 年，当大部分普罗夫迪夫地区在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的统治之下时，巴尔干

53

① 土耳其货币单位。——译者注

② 从 18 世纪 70 年代至 1820 年，奥斯曼土耳其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复存在，反叛的地方封建领主、近卫军人以及土匪与中央对抗，在某一地区确立自己的权力，他们被称为“库尔查里伊”。

以北地区的无序和动荡在19世纪初影响了色雷斯大部。甚至晚至1816年，阿德里亚堡地区的大部不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在布尔加斯(Burgas)，唯一有效的权力属于大约有300人的一伙土匪。

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的动荡特别是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巴尔干地区的人口构成，也影响了保加利亚民众的分布。

18世纪，保加利亚城镇人口明显增长。过去，一些学者把这归之于土耳其人健康水平的不断下降，一些旅行者也认为，17世纪穆斯林人中广为流行的习俗——堕胎是土耳其人减少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表明下降的是在城镇的土耳其人口的绝对人数而不是相对人数。因为贸易和扩展生产的需要，许多保加利亚人来到城镇，还有一些是因为在农村的生活渐渐变得不安全。“库尔查里伊”加快了这一进程，但“库尔查里伊”这样做是有选择的。“库尔查里伊”主要影响平原（Plain），平原这个词来源于突厥语，意为原野或旷野，受到威胁的人只好到小山城去避难，在小山城，他们可能不太会受到“阿扬”及其跟随者的令人厌烦的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因为小山城主要是保加利亚人，而在低地居住，更可能屈服于强大的希腊文化的压力之下。因此迁往山城有助于挽救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不仅摆脱了无法无天的穆斯林“阿扬”，而且，还摆脱了18世纪时在许多城镇活动的希腊化势力。与此同时，低地定居者的不安全感增加了小山城经济发展的潜力，例如保加利亚的小山城，因为小山城受动荡的影响还比较少。在19世纪20年代，随着和平和安宁的到来，这些小山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54 然而，有一些保加利亚人逃避到比山城更远的地方。像过去一样，战争的结束带来一波移民潮，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奥斯曼政府很可能要报复对苏丹的敌人表示过同情的地区。在每一次较大的冲突后，大量的保加利亚人向外迁徙，通常是加入开拔的俄罗斯军队。准确的数字不可能获得。但是在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签署后，估计有160 000保加利亚人离乡背井，在1806—1812年战争后，这一数字大约为100 000。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后，巴尔干南部的东

保加利亚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估计人数高达250 000。这似乎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旅行者证实了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

离乡背井的保加利亚人定居在现在的罗马尼亚、乌克兰南部和俄罗斯。这些移民构成的社区在今后保加利亚文化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在罗马尼亚布勒伊拉（Braila）的保加利亚人，其中的第一批移民是1598年特尔诺沃起义失败逃离至此的。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亚人在以后几年里同样变得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成千上万居住在北部更远地区的保加利亚人现在还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独特的一个种族。

在18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20年代之间发生在欧洲的动荡深深困扰着奥斯曼帝国，也中断了保加利亚非常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到18世纪的第三个25年时，贸易比50年或25年前的情况更好。保加利亚人的贸易遍及布达（Buda）[①]、维也纳、威尼斯、里窝那（Livorno）[②]、马赛、莱比锡、布拉索夫（Bra şov）[③]和敖德萨，在上述大部分城市里，有小规模的保加利亚人聚居地。在瓦尔达尔河流域，种植的棉花销往莱比锡、德累斯顿和维也纳这些较远的市场，在许多巴尔干城市，能看到来自这些城市和其他中欧城市的常驻棉商。这些棉花的一部分用船通过地中海运出，但大部分都通过驮马运到中欧或运到像维丁或斯维什托夫（Svishtov）这样一些多瑙河港口。在18世纪，保加利亚向西欧出口蜡和马里扎河谷出产的稻米，但烟草和棉花是保加利亚生产的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驼毛织品是一种市场需求非常有限的商品，在旧扎戈拉（Stara Zagora）、卡洛费尔（Kalofer）、卡尔诺沃（Karlovo）、普罗夫迪夫、斯利文（Sliven）和另一些城市的许多保加利亚行会生产这种粗纹理的（coarse-grained）服装。另一个赚钱的行业是畜牧业。像君士坦丁堡和有许多穆斯林人居住的阿德里亚堡这样的中心，要消费大量的鲜肉，特别

55

① 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附近。——译者注

② 意大利西岸城市。——译者注

③ 罗马尼亚中部城市。——译者注

是羊肉，保加利亚的牧羊人借此致富。巴尔干山区古特的许多居民是这样打发时光的，他们在多布罗加平原养羊，然后将羊群赶往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城市里的市场。从畜牧业获取的利润要超过农业很多，这部分是因为政府在谷物贸易中进行了垄断，政府在国内市场以极低价格购买，并严厉禁止出口。"库尔查里伊"阻碍但没有摧毁保加利亚人建立起来的贸易，一旦秩序恢复，贸易也很快复原。保加利亚文化的复兴是建立在它所创造的财富的基础之上。

"库尔查里伊"对奥斯曼帝国战争机器的效率有很长远的影响，这在 1806—1812 年的对俄作战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战争结束时，土耳其宫廷还没有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军队的改革上，因为它最初不得不处理塞尔维亚的反抗。对塞尔维亚的镇压极大地加强了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到 1814 年，原先的塞尔维亚领导人被击败，在以后的几年里最终达成一项协议，贝尔格莱德周围的一小部分地区完全自治。然而，塞尔维亚威胁的出现，使一手炮制"库尔查里伊"的"阿扬"清醒过来，军队被派到维丁去征服巴兹温特沃格鲁的继任者。保加利亚是第一个从回归秩序和稳定中获益的，因为他们最靠近君士坦丁堡。到 1820 年，在巴尔干，在土耳其宫廷控制之外的军阀只有一个即亚尼娜和斯库达利（Scutari）的阿尔巴尼亚统治者。

56

正当征服"库尔查里伊"残余的行动进行的时候，1821 年，希腊在瓦拉几亚和伯罗奔尼撒发动了起义。起义再一次将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卷入混乱之中，但结果却又一次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即使这种权力只能扩展到一小块地区，甚至在 1830 年希腊小王国诞生前，奥斯曼帝国已经着手推行了一场彻底的改革进程。

"库尔查里伊"存在的一个原因是近卫军的叛乱。在 18 世纪，近卫军一直在扩展，但它的纪律与其数量成反比。到 18 世纪末，近卫军已成为一支庞大的力量，像任何低劣的禁卫军一样，他们成为阴谋和腐败的代名词。他们同样强力反对任何改革政府和军队的尝试，在他们看来，任何旨在恢复中央政府权力和回到类似廉洁政府的努力，必定损害他们的权力和利益。1806—1812 年的战争清楚地表明，近卫军

现在已经完全不适合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并且毫无希望地过时了。1826年6月，苏丹默罕默德二世利用对希腊问题的国际压力暂缓之机，最终解决了近卫军这一棘手的难题。在一次迅速和血腥的行动中，他清除了近卫军。几千人被流放到小亚细亚，有大约500至600人在君士坦丁堡被处死。这是奥斯曼帝国走向急需的激进改革的第一步。

三、保加利亚文化复兴的背景

摧毁近卫军有两个后果，从长远来看，这两个后果都极大地影响了保加利亚。首先，为取代近卫军，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决定创建一支以欧洲为模式的常备军。这样一支军队需要粮食和服装。而保加利亚主要生产和养殖的就是服装和羊，土耳其宫廷从保加利亚找寻到供应源。牧羊人很快变得更富有，驼毛织品和“盖坦”（gaitan）的生产商也一样。“盖坦”是一种装饰花边，主要用来装饰军官的制服。在19世纪晚期，奥斯曼土耳其大量采购驼毛织品和盖坦，1848年，土耳其宫廷和驼毛织品行会签署了商业协定。驼毛织品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以至于奥斯曼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建造了一座工厂，最初工厂座落在斯利文，在随后的十年，一家私人工厂在普罗夫迪夫附近建立。

57

常备军的建立增加了帝国内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土地所有制度的压力，这是消除近卫军的第二个后果。至少在理论上，土地改革是和为苏丹提供军队的需要而出现斯帕希相联系的，由于常备军的建立，这一需要已经不存在了。整个18世纪，斯帕希作为一支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经在下降，而他从拥有的土地上获取的利益却在增长，在军队的建立增加养羊利润时，斯帕希获得的利益增长得更快。因此，从军事上考虑允许斯帕希拥有土地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经济上的刺激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斯帕希最初从他的租户收取什一税，然后提供给苏丹军队，但现在，这一功能已经中止，国家不得不从斯帕希的土地上收租。事实上，斯帕希体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了，在19世纪30年代，斯帕希体制逐渐被废除。帝国制订了新的租佃协议，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总

的来说都试图公正而有效地执行这一任务，但矛盾还是在所难免，特别是在保加利亚的北部和西南部地区，那里的租佃关系非常复杂。在同一时期，曾由斯帕希执行的司法权力转到国家官员手中，残留的斯帕希得到国家给予的一笔年金，然后告老还乡。斯帕希的年金从每个农民交纳的年租金中拨付。这触发了更多的怨恨，修订的租佃协议的采用也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这两者都成为保加利亚民族复兴的另一些社会因素。然而，农民的不安宁，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民的骚动，虽然是正在发生的，但从来不是民族复兴的主要特征，在以后的几年里，由民族主义者制定的政治纲领很少或根本就不会提及农民。

当北部和西南部的农民遇到困难时，许多商人和制造商变得更富有。他们不断建造的漂亮的房子反映了他们拥有新的财富。在古特、普罗夫迪夫、科布里夫什里察（Koprivshtitsa）和另一些城市，现代旅行者能欣赏到富丽堂皇的地方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19世纪第二和第三个25年时经济复兴的产物。

58

不仅个人积聚起了财富。在成功的生产和贸易投机中，经济活动牢牢地掌控在行会手中。到19世纪30年代，行会开始有了自己可以处置的盈余，行会倾向于将这些盈余花在一般所称的“公共工程”上。在奥斯曼帝国初期严格地控制下，信仰基督教的村庄不允许建造给公众使用的教堂，因此，在大多数地区，教堂很小，无关紧要。在19世纪30年代及之后的岁月里，随着政治和社会有一定的自由度，还由于有了必要的资金，行会经常投资于新教堂的建造，通常是较大的、三通道结构的教堂替代老式的单通道的教堂。修道院收入的增加一般来源于土地回报的增长，现在也从行会的慷慨中获益，保加利亚文化复兴的伟大象征之一是里拉修道院在1833年毁灭性火灾后进行重建。除了宗教建筑外，当地的市政设施也从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受益非浅。室内市场代替了露天摊位；安装了人造喷泉；最典型的是在社区中心建造了一座钟楼；它按照基督教而不是穆斯林时间报时，它因此成为文化自信（culture self-asser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近来取得成绩的一个实质性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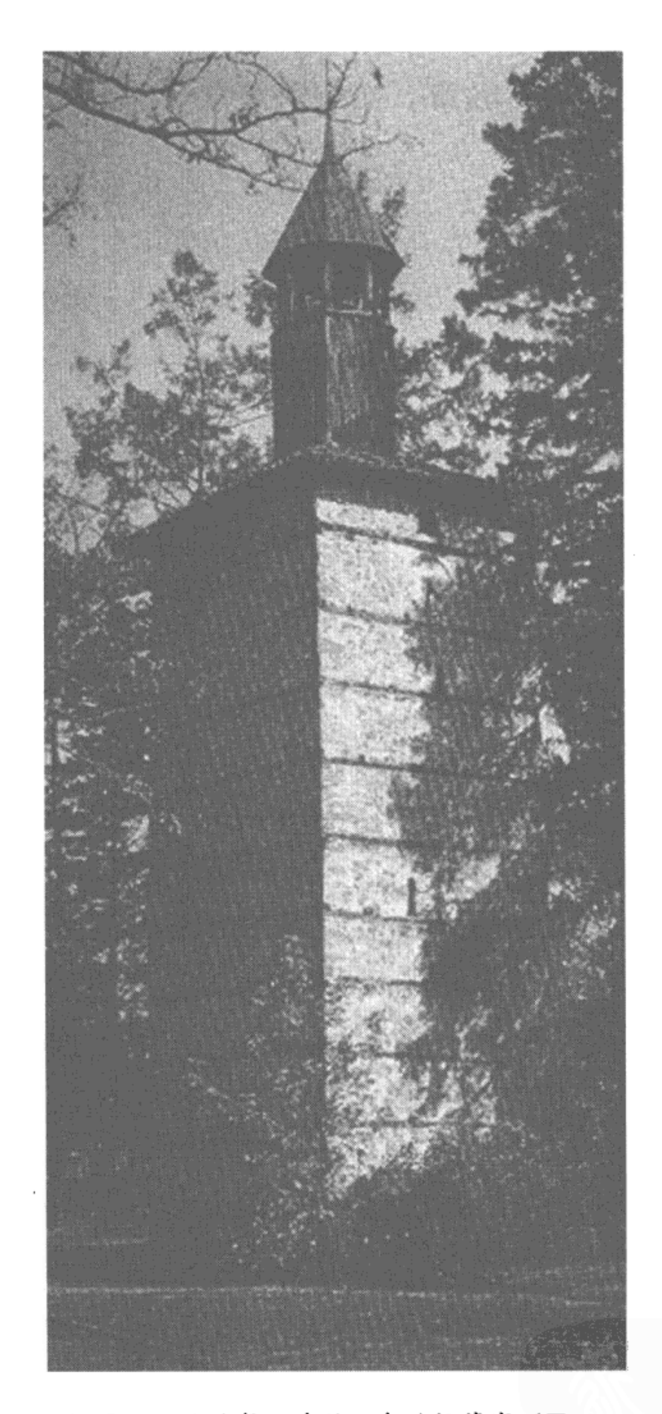


插图 13　民族复兴建筑：在兹拉蒂察（Zlatitsa）的钟塔。商人积聚的财富常常花费在这样一类的建筑上；钟塔具有民族意义，它传送的时间根据基督教而不是穆斯林制时间。

四、文化复兴：教育、文字和文学

慈善投资的另一个大方向是教育，有学校建筑或公共阅览室等形式，配上图书，或者像后来那样，把奖学金奖给有才华的学生，让他们离开家到国外学习，一般是去欧洲；在 1867 年，普罗夫迪夫城资助 5 个学生去巴黎、4 个去维也纳、7 个去俄罗斯、2 个去英国、40 个去君士坦丁堡留学。

60

没有教育运动，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是不可能的。在修道院出现尔后向村庄扩展的“私塾”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到 19 世纪 2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学校已经不适合 19 世纪的社区。各方都意识到教育需要发展，需要重塑。一些保加利亚人已经在国外接受教育，大部分是在俄罗斯，少部分毕业于布拉格和另一些中欧的斯拉夫中心。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世俗教育的观念带入巴尔干。一些革命文学作品传播到了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以及其他地区，法国曾一度占领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和爱奥尼亚岛；爱奥尼亚岛在 1815 年后受英国的托管，托管一直持续到 1864 年。爱冒险的保加利亚人加入到了希腊独立战争，在那里，他们接触了西方的新思想，倘若他们要将新思想向巴尔干民众传播，那就必须依靠公共教育。在希腊取得独立后，一些保加利亚学生去了希腊的中学或大学；这样的经历只是显示出保加利亚需要更多的教育。

1824 年，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以前的学生涅奥菲特·博兹维利（Neofit Bozveli）教士在斯维什托夫神学院采用了一些斯拉夫语进行宗教仪式训练，但是，在许多年轻的保加利亚人看来，现在的希望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的教育既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然而，这一愿望的实现要到 10 年后，1834 年，在加布罗沃建立了第一所用保加利亚语进行教学的学校。加布罗沃学校由瓦西尔·阿普里洛夫（Vasil

Aprilov）创立，用贝尔—兰开斯特制[1]进行教学，在学校里，年长的学生教年纪较小的学生。此后，类似的学校逐渐增长，到1840年已建立13所学校，1840年以后，增长的速度加快，到1850年，大部分保加利亚社区，不论大小，都有一所用本国语教学的学校。1840年在普列文（Pleven）开办了第一所女校，另一些城市也迅速仿效。虽然大部分学校最多只能提供初级教育，但有相当数量的专门学校，有为年龄较大的学生开办。在斯维什托夫有商校，在普里莱普（Prilep）和希提普（Shtip）有教师职业学校，在斯维什托夫和利亚斯科韦茨（Lyaskovets）附近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修道院有神学院。至1878年民族解放时，在保加利亚估计有2 000多所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基本上都得到当地的行会或村理事会或城市类似的团体资助。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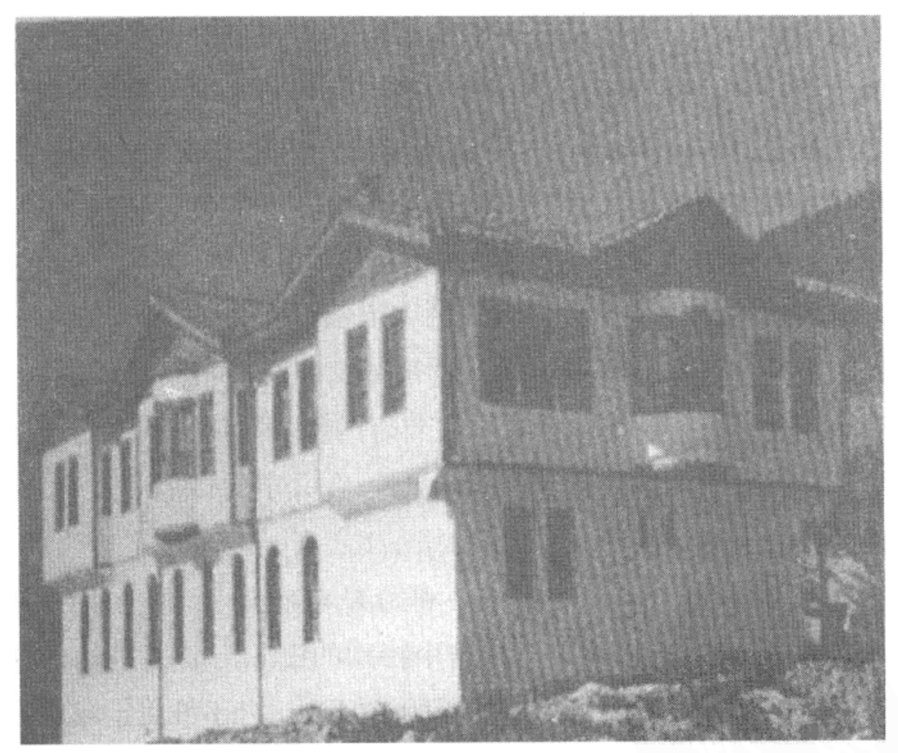


插图14　民族复兴建筑：在卡尔洛沃的学校，始建于1848年，后得到当地社区的进一步资助。照片显示的是修复后的建筑。

---

① 一种流行于19世纪初的教学方法，其方法是教师先教会年长或成绩较好的学生，由他们担任教师的助手，将他们刚学会的知识内容再教给其他学生。——译者注

考虑到教育运动开始以来较低的水平，教师职业的获得是值得注意的。在 19 世纪 20 年代，没有教学材料。1824 年，彼得·贝朗（Petûr Beron）在布拉索夫出版了《鱼版初级读本》（*Riben Bukvar or Fish ABC*）一书，如此称呼是因为书背面的图案。像它所模仿的希腊书一样，《鱼版初级读本》是一本博物和语法训练的概要，它并不非常适合教室里使用。另一些类似的书随之出版，大多数以希腊为样式，但是，标准教学手册的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没有标准的表音法和语法。早期修道院的写作者即使在一个版本内也不是前后一致的，当第一次讨论"正确的"保加利亚语法的特性的时候，在许多问题上有广泛的争论，如口头语中正在消失的格词尾在书面语中是否应该保留，口头语中普遍使用的名词后的（post-substantive）定冠词是否是书面语的特征。维涅林认为名词后冠词应该废除，使保加利亚语更近似于斯拉夫语特别是俄语。他的观点受到后来的教育活动家如伊凡·博戈罗夫（Ivan Bogorov）的激烈反对，伊凡·博戈罗夫甚至对俄罗斯对保加利亚语施加太多的影响保持警惕。1844 年，伊凡·博戈罗夫出版了一本语法书并得到广泛的认可。19 世纪 70 年代，就标准的书面语形式最终达成了一致，标准的书面语基于加布罗沃（Gabrovo）方言，加上一些西保加利亚方言，这是博戈罗夫而不是小维涅林学校的胜利。到这个时候，基本的读写在年轻的保加利亚一代人中传播。

62

除了学校外，阅读之家（Chitalishta）在文字的传播和教育方面也起了辅助作用。这个词英语通常译成阅读之家，但这是不恰当的。德语中的文化俱乐部（kulturheime）和稍显啰嗦的英语"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res）接近于抓住这个特别的巴尔干公共机构的核心。阅读之家提供书和报纸以及相应的场所，但是，它还可用于戏剧表演、聚会以及讲演。在许许多多这样的阅读之家，成年人在读写的基础方面受到教育，在以后的很多年里，阅读之家是秘密聚会最方便的地方。第一个阅读之家建立在塞尔维亚，1856 年在保加利亚的斯维什托夫出现第一个阅读之家。阅读之家发展迅猛，到 1878 年，阅读之家有 186 个。19 世纪保加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伊凡·瓦佐夫（Ivan Vazov）把

阅读之家描述为“保加利亚民族教育部”。

到斯维什托夫的阅读之家建立起来的时候，书、报纸和刊物的出版也迅速发展。不过，这样的发展最初是缓慢的并且是阶段性的。保加利亚出版的第一本书现在一般认为是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的布道集《周日书》，《周日书》1806 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在 1806 年至 1834 年间，平均每年出版不到 1 本书，其中有一年最多出版了 3 本书。然而，随着 19 世纪 20 年代经济的恢复，书籍出版的速度加快，此后 ，在 1821 年至 1830 年间，每年出版 9 本书，1831 年至 1840 年每年出版 42 本书，1841 年至 1850 年每年出版了 143 本书，1851 年至 1860 年每年出版 291 本书，1861 年至 1870 年每年出版 709 本书。

这些书大多是在奥斯曼帝国之外出版的，特别是早期，出版的书以教学手册和教科书为主，随着印刷设备的增加，一些文学作品也大量出版。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保加利亚直到 1840 年才有第一台印刷机，当时是放在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现称伊兹密尔）。这台斯拉夫字体的印刷机为希腊人所拥有，是应英国和国外圣经出版协会的要求从美国进口。在同一年，一家保加利亚出版社在欧洲的土耳其（European Turkey）成立。出版社座落在萨洛尼卡，主要为宗教服务，第一次就大量印刷了保加利亚语的圣经和另一些宗教书籍。士麦那出版社也服务于世俗目的。1844 年，康士坦丁·福蒂诺夫（Konstantin Fotinov）开始印刷的《情词》（*Liuboslovie*），就由士麦那出版社出版。这是保加利亚第一本期刊，尽管维持的时间不到两年，刊物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这些诗的写作用古体的保加利亚语。在保加利亚不单单是昙花一现的第一份报纸是《君士坦丁堡报》（Tsarigradski Vestnik），由博戈罗夫编辑，在帝国首都出版，由君士坦丁堡市保加利亚人社区拥有的印刷机印刷。《君士坦丁堡报》1848 年首次发行，一直经营到 1861 年。这样长的时间是罕见的，在保加利亚独立前，很少有刊物和报纸能长期办下去。在 1844 年至 1878 年间，有过 90 份报刊，其中 33 份坚持了不到 1 年，只有 10 份报刊的生命力超过 4 年以上。这 90 份报刊中，56 份是报纸，34 份是杂志。90 份中的 34 份在奥斯曼

帝国内出版，56 份由保加利亚社区在另一些国家出版。国外出版的报刊有 43 份（77%）在罗马尼亚出版，其中的 41 份在布加勒斯特，13 份在布勒伊拉出版。

在创办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复兴中，一些学会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 1823 年，瓦西尔·涅诺维奇（Vasil Nenovich）在布拉索夫发现，语言学会推动了保加利亚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应用，并促进了保加利亚语书籍的出版。但是，在书面语形式的标准方面没有一致，也没法获得印刷机，瓦西尔·涅诺维奇是注定要失望的。时机更好冒险成功的是在 1856 年成立于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文学学会（Bulgarian Literature Society）；在 1857 年至 1862 年间，这个协会出版了双周刊刊物《保加利亚报》，发行量最高的时候有 600 个订户。不过，最重要最成功的学会是保加利亚文艺学会（Bulgarian Literary Society），它于 1869 年在布勒伊拉成立，保加利亚科学院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64

教育和文化的普及意味着保加利亚社会孕育着新的因素，那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教士和专业团体主要是教师构成，知识分子与农民保持牢固的联系，他们也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坚定的同盟是保加利亚民族在 19 世纪后半期取得成功的基础。

文化的复兴比教育和文字的普及走得更远。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有了创作现代保加利亚文学作品的最初尝试，这特别表现在诗歌方面，多布里·钦图洛夫（Dobri Chintulov）早期的努力暗示着随后岁月里将到来的辉煌。到 19 世纪 70 年代，赫里斯托·波特夫（Hristo Botev）正在创作真正有价值的诗，他不久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生命。在 19 世纪 40 年代，保加利亚艺术开始抛弃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是最近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保加利亚艺术的特点；新的色彩和先前忽视的民俗题材使宗教艺术更有活力，而世俗绘画最终找到了旗帜性人物扎哈里·左格拉夫（Zahari Zograf）。民俗题材同样提升了保加利亚传统的木刻工艺作品的价值。18 世纪 40 年代，保加利亚组建首个音乐团，到 18 世纪末，在教会音乐中已经出

现了明确的保加利亚形式。

在1840年至1860年间，保加利亚几乎所有的文化和艺术活动都进行了变革，它是在努力建立民族教会，各种各样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形式合在一起加速了现代保加利亚民族的形成。

五、各个保加利亚教会的结构

在18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行政管理部门都由希腊法纳尔人控制。这在东正教教会表现得最为明显。希腊人日益增强的权力和影响贯穿整个世纪，这种权力和影响曾让帕伊西苦恼和愤怒。1766年，塞尔维亚佩奇[①]（Peć）的宗主教辖区被取消，几年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保加利亚奥赫里德宗主教辖区身上。教会高级职位的任命一直以来实际上由希腊人垄断，在18世纪后期，甚至有许多讲希腊语的教士被提名为保加利亚的主教。

65

不是说希腊教士或主教的出现必定激起仇恨或紧张，在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憎恨的。希腊主教曾成功地调解保加利亚行会之间的争端，如果说希腊基督教会权威对用保加利亚语进行传教有猜疑，那么，他们也反对用通俗的希腊语进行传教。阿普里洛夫（Aprilov）[②] 本人认为应该用保加利亚语，但不是代替而是应附加希腊人的宗教仪式，他和加布罗沃学校的第一个教师涅奥非特·里尔斯基（Neofit Rilski）都是希腊宗主教忠诚的信徒。

在19世纪前半期，虽然有帕伊西隐秘的预言，有一点是无疑的，许多认为自己有文化有教养的保加利亚人喜欢讲希腊语，他们认为这是文明人的标志。考虑到西欧和美国亲希腊的狂热，这是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惊讶的。希腊语作为广泛的商业中介在巴尔干同样有它的优势，许多行会和相关的贸易继续使用希腊语，甚至用希腊语作记录，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期。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教育和宗教

---

① 今科索沃。——译者注

② 保加利亚社会政治活动家、作家、教育家。1835年在加布罗沃创办保加利亚第一所世俗学校，强调用本族语教学。

问题上不断加深的分歧迫使强有力的普罗夫迪夫驼毛织品制造行会分成希腊和保加利亚两部分。

希腊和保加利亚主要分歧点是在教会。起初是因为希腊人掌控的教会普遍腐败。在“库尔查里伊”时期结束时，卖官的惯例和随之而来的腐败的层层渗透是再明显不过了。在19世纪20年代，保加利亚村庄付给教会的税是国家要他们交纳的税收的两倍。早在1784年，一位名叫格拉希姆·泽里克（Gerasim Zelić）的塞尔维亚人认为，需要斯拉夫教士而不是希腊教士，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在这方面采取行动。1820年，弗拉察的居民拒绝交纳教会税，理由是当地的主教梅托迪（Metodi）无可救药的腐败。几乎没有人讨论过这一争论，既不是土耳其宫廷也不是宗主教能宽容这样的反抗，弗拉察抗议的策划人，他们大都是当地的商人被奥斯曼帝国当局判处长期流放。1825年，针对斯科普里希腊主教的类似的抗议同样没有成功。

66

19世纪30年代，这些早期抗议的性质开始变化。在俄罗斯接受教育的保加利亚教士逐渐增多，与生活在巴尔干东正教神学院希腊语世界里的教士相比，他们的斯拉夫意识更强。1835年，当特尔诺沃主教职位空缺时，人们一致行动争取让讲保加利亚语的主教获得提名。但行动还是失败了。虽然土耳其宫廷也给予支持，但宗主教反对。1839年，土耳其宫廷发布了豪特—谢里夫（Hatt-i-Sherif）宣言，意在承诺穆斯林和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平等；许多保加利亚人乐于将其解释为他们和希腊人之间的平等可望到来。在19世纪40年代，保加利亚的抗议变得相当清晰，不再抗议腐败的希腊主教，因为他们是腐败的；保加利亚抗议的是希腊主教，因为他们是希腊人。1841年，主要在保加利亚西北的尼什（Nish）发生了社会动荡；反叛者提出的要求之一是有“至少能够理解我们语言的主教”。到40年代末，针对希腊主教的抗议遍及鲁塞、奥赫里德、塞雷斯（Seres）、洛维奇、索非亚、萨莫科夫、维丁、特尔诺沃、利亚斯科韦茨、斯维什托夫、弗拉察、特里亚夫纳（Tryavna）和普罗夫迪夫等地。

宗主教拒绝接受任何一个要求，一再受挫于教会统治者的冷酷无情，这迫使保加利亚社区要求管理自己教会和任命自己的教士的权利。这场运动由涅奥菲特·博兹维利和伊拉利昂·马卡里奥波尔斯基（Ilarion Makariopolski）领导，首先在特尔诺沃，后来到君士坦丁堡。最初，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两个领导人被监禁，涅奥非特最后死于狱中，但到 1849 年，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到来了，当时，土耳其宫廷同意让保加利亚人在奥斯曼帝国都城建立教堂，土地由当地一个富裕的保加利亚人斯特凡·波格里迪（Stefan Bogoridi）捐赠，斯特凡·波格里迪是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的私生子，在奥斯曼行政部门身居要职。1850 年，圣斯蒂芬（St Stephen）教堂落成，它成为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保加利亚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1890 年，原先的教堂被另一幢建筑所代替，这幢建筑今天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巴拉特区还能看到，而宗主教和保加利亚教会之间断断续续争吵的起因仍然存在。

67

1849 年[1]建立的教会在教义和教士管理方面隶属于宗主教，它仍然是东正教“米勒特”的一部分，“米勒特”的首脑宗主教在处理与奥斯曼帝国当局的关系时仍代表东正教社区。然而，这个教会是保加利亚人的财富，将指导保加利亚人的宗教仪式，它由 20 强（twenty-strong）管理委员会管理，能够为教会任命教士。管理委员会是第一个新的特别的保加利亚管理机构，自 1393 年以来得到奥斯曼帝国官方的承认。

没有多少民族意识的保加利亚人并不认为下一步应该争取成立完全的保加利亚教会，直到 1850 年，因为来自英国强有力的外交支持，新教徒（Protestant）被授予拥有自己的“米勒特”的权利，保加利亚人才有了这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 1850 年，宗主教最终被迫承认希腊王国内的东正教教会为独立机构。1851 年，保加利亚在布加勒斯特的侨民在一封给保加利亚社区的通告中用这样一句话结尾“没有民族教会，就没有灵魂的得救”，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感。

---

[1] 原文为 1948 年，但从上文看应为 1849 年。

新教“米勒特”的设立和希腊教会的独立得到承认显示出变革的希望并非不真实的，而斯帕希体制的瓦解使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普遍的重建，这进一步鼓励了保加利亚人的希望。作68为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政府希望宗主教开始实行变革，特别是增加东正教内部世俗人员的影响。在保加利亚人占优势的地区，世俗人员影响的增加就是意味着保加利亚人影响的增加。然而，面对改革派的压力，宗主教并不倾向于做出让步，他也从未考虑过东正教群体的分裂，在控制希腊教会的斗争失败后，宗主教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

假如他们要对教会的独立做出推动的话，看起来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保加利亚需要外来的促进，如同英国已经给予新教的帮助那样。对许多保加利亚人，特别是在俄罗斯受教育的人来说，沙皇就是能提供这类支持的明显的人选，这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一直支持由保加利亚教区任命保加利亚主教的呼吁。俄罗斯自1774年以来拥有传说中的保护其信徒的权利，这种权利使俄罗斯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有正当的理由，但俄罗斯像宗主教一样，并不希望东正教分裂。许多保加利亚人困惑于俄罗斯的立场。直到俄罗斯在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他们对俄罗斯的困惑才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克里米亚战争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和影响，保加利亚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自己奋力向前，要么寻找另一个依靠。前一个选择是一个较为通行的战略。在停战时豪特—谢里夫发布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帝国行政管理进一步改革的宣言，保加利亚从中受到鼓励。

1856年，保加利亚教会独立活动的积极分子决定单独行动，他们向苏丹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成立独立的教会，请愿书声称代表650万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人。同一年，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共同委员会（communal council）向所有较大的保加利亚社区发了一封信，请他们派一名选举产生的代表到君士坦丁堡一起要求建立独立的教会。代表们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建立了现代保加利亚历史上第一个间接的代议机构，他们中有许多是1878年解放前后在保加利

亚民族运动中取得卓越贡献的人。　　69

1857 年，奥斯曼帝国政府责令宗主教区制定一个改革方案。1858 年，宗主教同意召开有 3 名保加利亚人参加的宗教会议。这是 1858 年至 1872 年间 7 次宗教会议中的第一次，所有这些会议都没有什么结果。保加利亚人碰到了许多不利条件。第一，尽管争取教会独立在保加利亚世俗民众中已普遍认可，但是，在保加利亚教士中少数影响较大势力不准备分裂东正教。他们当中包括里拉修道院的院长，不久前由宗主教提名的 4 名保加利亚主教中的 2 个。第二，由宗主教创立的任何一个官方机构都是希腊人占据绝对多数，因此，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改革是一个幻想。第三，对现实的承认加强了少数派的力量，少数派一直主张第二种战略即寻求新的国外力量的支持。

1860 年，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这时，欧洲、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都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统一的意大利出现了，多瑙河流域的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省合并成罗马尼亚，大国干涉使反叛奥斯曼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两省获得自治。1860 年复活节，君士坦丁堡的圣斯蒂芬教堂见证了保加利亚教会事实上的教会独立宣言。按照预定的计划，当牧师伊拉里昂·马卡里奥波尔斯基主教在宗教仪式上将要为宗主教祈祷的那一刻，全体教徒打断他的祈祷。宗主教的名字被删除，伊拉里昂直接为苏丹的幸福祈祷；这样直接的祈祷含蓄地反对法律上仍是所有东正教教徒在帝国统治者面前的代表的宗主教。在晚礼拜时，没有获得惯常的宗主教的允许，用 12 种语言宣读福音，其中没有希腊语。

伊拉里昂的勇敢行动在保加利亚社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33 个城镇祈求苏丹支持伊拉里昂，700 多名商人也向苏丹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这些商人为了一年一度的集市聚集在乌宗卓沃（Uzundjovo）。一些主教马上与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教会结盟，其中包括索非亚的　　71
吉迪恩（Gideon），吉迪恩尽管是希腊人，但不敢冒犯他的教徒的感情。1860 年复活节的事件无疑鼓舞了保加利亚人。维雷斯（Veles）从宗主教管辖区脱离，同时，洛维奇、萨莫科夫、舒门、普雷斯拉

夫和维丁都反对由宗主教提名的主教，即使这些主教是保加利亚人，在以后的几年里，许多保加利亚社区拒绝向宗主教交税，到 1870 年，在色雷斯、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主教管区差不多全都投入了不服从宗主教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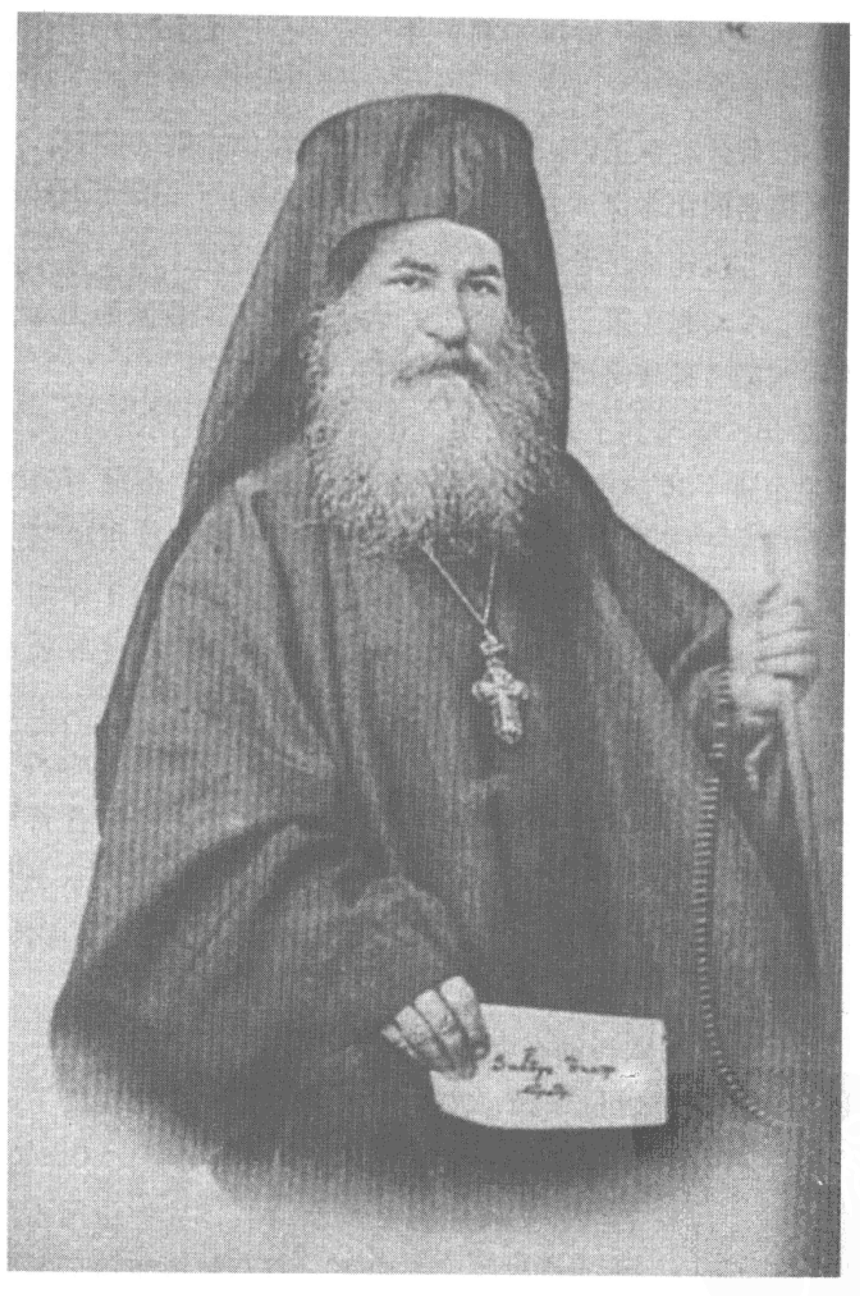


插图 15　伊拉里昂·马卡里奥波尔斯基

1860 年的复活节宣言尽管迅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它未能带来对各个保加利亚教会的官方承认。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希望匆忙让争论有个了结，因为这将造成国内主要群体的分裂。俄罗斯仍然不希望看到宗主教管辖区的分割。宗主教本人对此始终坚决反对，因为这不仅会使他失去很多信徒，也会使他失去收入的一个来源。更重要的是，承认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将对另一些非希腊人的东正教社区产生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体制使文化认同作为宗教信仰的一个结果，而保加利亚的要求是将宗教信仰作为民族忠诚的结果。如果接受这样思想，那么，将使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会碎片化，因为罗马尼亚、瓦拉几亚（Vlachs）、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也会提出类似的要求。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在看起来无休止的宗教会议上和在东正教教会高层进行的另一些争论中，保加利亚教会的地位现在成为中心议题。

在保加利亚人当中，有人主张内部行动，他们至今一直希望像伊拉里昂那样勇敢行动，以斩钉截铁的手段解决问题，迫使圣彼得堡打开围拦，让保加利亚教会脱离宗主教管辖区。俄罗斯如果仍不支持保加利亚教会独立的请求，那么，保加利亚有些人原本就认为最好寻找俄罗斯以外的支持者，现在，这样的信念肯定会得到加强。他们心目中的支持者是罗马天主教会，站在罗马天主教会一边的是哈布斯堡王朝，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法国拿破仑三世并没有因入侵墨西哥惨败而失去对国外冒险的兴趣。与罗马的合作通过加入东仪天主教（Uniate church）[1] 而获得，东仪天主教允许以前的天主教社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礼拜，其仪式与天主教会的完全相同，作为回报，这个社区将承认教皇为教会的领袖。

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东仪天主教的宣传迅速增长，部分是因为受到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兰流亡者的鼓励，部分是因为法国和撒丁岛人在

72

[1] 坚守各种东方礼仪和典制的天主教徒和教会，他们承认罗马主教的教宗地位，但继续坚守原有的礼仪和典制。——译者注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胜利，同样还因为受到德拉甘·灿可夫（Dragan Tsankov）的支持，德拉甘·灿可夫是一位任职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有影响的保加利亚社会活动家。在1860年12月，一批在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人签署了与罗马联合的法案，并提名一位未受过教育的耋耄老人约瑟夫·索科尔斯基（Josef Sokolski）作为他们的领导人，索科尔斯基此后不久将由罗马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授予新的职位。但这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几个月内，索科尔斯基就抛弃了他的信徒，回归天主教，在深夜乘船去了敖德萨。到1861年6月，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保加利亚东仪天主教的仪式，这种情况一直未能改变，直到35岁的拉斐尔·波波夫（Raphael Popov）受任这个空缺。

在以后十几年里，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一些社区信奉东仪天主教，但在1861年后的君士坦丁堡，信奉东仪天主教已是不可能了（non possumus）。索科尔斯基惨败迫使先前东仪天主教的赞成者回归到这一结论：他们没有在保加利亚和宗主教管辖区之间找到妥协。在毫无希望的数年争执后，1867年，宗主教格列高利六世（GregoryVI）提出在宗主教辖区内成立一个自治的教会，这时才有所突破。保加利亚教会将由一位督主教（Exarch）为首，这位督主教在教会的地位在宗主教和大主教之间，宗主教第一次承认保加利亚有自己教会的权利。这一解决方法受到教会的青睐，但是有区域方面的先决条件。1867年的方案将保加利亚督主教辖区（exarchate）限于巴尔干的北部地区，方案也没有提到督主教所在的总部放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假如督主教限于巴尔干以北地区，那么，督主教和他的教会对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保加利亚人将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保加利亚人反对这个方案。一切似乎又回到原来开始的地方。

73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外部局势的发展使奥斯曼帝国政府惊恐万分。在18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保加利亚政治运动出现了新的迹象即为达到目标准备诉诸武力。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已经造成了局势的动荡，这种动荡非常容易漫延到巴尔干，

塞尔维亚大公米哈伊·奥布廉诺维奇（Michael Obrenović）正忙着试图组建巴尔干联盟以防万一。一旦战争漫延开来，有领土扩张野心的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将很容易找到共同点，建立拟议中的联盟，当然，他们要实现各自的愿望肯定以奥斯曼帝国为代价。然而，更重要的是1866年发生在格雷特（Grete）的暴动。暴动激起了希腊的领土野心并马上导致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这些因素比任何一切都更有利于推动奥斯曼帝国政府倾向保加利亚，而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也不情愿地采取同样的立场，原因是它自己在雅典的糟糕的地位，此外，俄罗斯也担心如果总是让保加利亚处于不满的状态，那么，保加利亚可能又会转向东仪天主教。1870年2月，苏丹发布了承认由一位督主教为首的保加利亚教会独立的诏书。

新的保加利亚教会的权利及督主教辖区不是没有限制的。保加利亚教会的宗教仪式仍必须提及宗主教，在教义方面要听从宗主教的意见，保加利亚教会必须尊重宗主教获得圣油的权利。教区划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1869年，任职于奥斯曼帝国政府行政部门的加夫里尔·克鲁斯特维奇（Gavril Krûstevich）就两个教区之间的辖区划分呈交了一份方案，加夫里尔·克鲁斯特维奇是君士坦丁堡一位知名的保加利亚人。按照加夫里尔·克鲁斯特维奇的方案，保加利亚督主教辖区将获得全部教区的25个，其余的属于宗主教辖区。保加利亚的督主教辖区总的来说要大于宗主教派的辖区，几乎包括马其顿的全部。虽然克鲁斯特维奇的方案成为1870年诏书中教区划分的基础，但是，保加利亚获得的教区已降为15个，即鲁塞、锡利斯特拉、舒门、特尔诺沃、索非亚、弗拉察、洛维奇、尼什、瓦罗特（Pirot）、基乌斯坦德、萨莫科夫、维雷斯、瓦尔纳（Varna）和普罗夫迪夫，不过后两个城市（普罗夫迪夫的圣母玛利亚区除外）将保留在宗主教辖区。剩下的59个区中，51个将保留在宗主教辖区，8个将进行划分。1870年的解决方案规定，允许主教（diocese）教区转为督主教区（exarchate），只要教区人口的2/3同意即可。但方案没有提到督主教将驻于何处，那儿

74

是他的总部。保加利亚不可能为这一关键方案中关于地区的条款感到高兴，这在保加利亚现代史上不是最后一次。

1870年宣言遭到宗主教的反对。双方出现僵局，这一直持续到1872年。在这一年，宗主教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会议谴责了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的反应是开始选择一位督主教，他们选中的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维丁的安蒂姆（Antim）主教。1872年5月23日，安蒂姆主教在圣斯蒂芬教堂举行礼拜仪式，然而宣读了长长的保加利亚教会独立宣言。9月，宗主教宣布教会分立，他谴责督主教区犯教会种族主义（phyletism）之罪，教会种族主义认为基督教会的管辖区取决于种族而不是地区；问题的核心是督主教辖区的地位，因为教会法含有这样的原则即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大主教（prelate）。

在建立保加利亚独立教会的斗争中，现代保加利亚民族逐渐形成了。与帕伊西大量不为人知的指令相一致，当保加利亚开始了解自己的民族并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研究时，民族形成的过程开始了。从那时开始，他们发展了全民族范围的教育体系，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希腊掌控的教会进行斗争。督主教辖区现在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力走廊里能够代表保加利亚民族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能捍卫保加利亚的正教，对抗宗主教辖区以及马其顿的东仪天主教，支持和鼓励在混合教区和仍在宗主教辖区的保加利亚教会和学校。

随着文化复兴运动在1870年走向高潮，出现了一小部分保加利亚社会活动家，他们认为政治斗争是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说，目的不单单是一个保加利亚文化民族的创立，不单单是在教会里有代表。他们的野心是创立政治民族，在自己的政治国境内，由自己的政治机构代表。

75

六、为政治独立的斗争和1878年的解放

当宗主教格历高利六世在1867年提议建立自治的保加利亚教会时，他写道："我亲手建造了保加利亚通向独立的桥梁。"这是

未卜先知的评论，这一评论让与他同时代的人深感迷惑，其中包括保加利亚人，因为保加利亚民族运动中的政治方面是相对滞后的。

过去有一些保加利亚人发起过政治运动。在1804年至1814年间，一些保加利亚自愿者和塞尔维亚人一起作战；在19世纪20年代更是参加了希腊独立战争。1835年5月，在特尔诺沃有一场小规模的针对奥斯曼政府的反叛，但这一所谓的“维尔乔夫起义”（Velchov Rising）马上被镇压了，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保加利亚的北部和西南部爆发了一些社会动荡，1841年，在尼什有严重的冲突，10年后，在维丁周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都被控制住了。

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可以看到第一次真正一致的政治行动。1862年，塞尔维亚使用武力驱赶驻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批奥斯曼帝国的卫戍部队。由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Georgi Rakovski）领导的一小股保加利亚军团（Bulgarian Legion）参加了这次行动。拉科夫斯基1821年生于科泰尔，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较高的教育前，他在当地的“私塾”上学。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他试图组建秘密团体，首先在雅典，后来在布勒伊拉。因为在布勒伊拉的行动，他被罗马尼亚判处死刑，但他逃脱了。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他试图建立一支保加利亚武装力量去援助俄罗斯，但没有成功，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写作并出版著作，他很快成为多产作家。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拉科夫斯基漫游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南部，然后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一段时间。在贝尔格莱德，他继续写作，特别是为《多瑙河天鹅》（*Danubian Swan*）杂志写稿，他计划让巴尔干基督教教徒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的设想是建立巴尔干基督教联盟。同时，他组建巴尔干军团，然而，在1862年驱赶奥斯曼帝国的卫戍部队后，塞尔维亚解散了巴尔干军团。

76

拉科夫斯基尔后前往布加勒斯特。在那里，他继续他的新闻写作，同时开始组建一支小规模的献身革命的军队即“支队”（che-

ti)。他始终认为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只有靠基督教臣民的武装起义才能摧毁。“支队”同时将困扰奥斯曼帝国政府，并唤起巴尔干民众的民族意识。1867 年，拉科夫斯基还建立了第二支巴尔干军团，但是，它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尤其是拉科夫斯基在那年去世，他死于结核病。

持续时间稍长，类似拉科夫斯基式的组织为成立于 1866 年的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Bulgarian Secret Central Committee 简称 BRCC）。BSCC 作了第一次组建和装备“支队”的不懈努力，1867 年初，两支小分队在帕纳约托·希托夫（Panaiot Hitov）和菲利普·托提乌（Filip Totiu）指挥下渡过多瑙河。1868 年，更多的人追随而来，这次由哈吉·德米特尔·阿萨诺夫（Hadji Dimitûr Asenov）和斯特凡·卡拉贾（Stefan Karadja）指挥。但不久他们就被击溃。同时，BSCC 将军事行动和政治压力结合在一起。1867 年，它向苏丹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建议保加利亚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妥协以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匈牙利部分刚刚达成的和解为样式。正是军事方面的尝试和政治复杂化相交织使奥斯曼帝国政府感到惊恐，使它急于就保加利亚教会问题缔结协议。

拉科夫斯基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为政治目的进行密谋的做法，而不在文化或教会目标方面。他留下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追随者，初生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最后交给了其中的 3 位，他们分别是：柳宾·卡拉维洛夫（Liuben Karavelov）、瓦西尔·列夫斯基（Vasil Levski）和赫里斯托·波特夫（Hristo Botev）。

柳宾·卡拉维洛夫在 1869 年到达布加勒斯特。他 1834 年生于科普里夫什蒂察，在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在科普里夫什蒂察和普罗夫迪夫接受教育，在莫斯科他听了一些历史方面的讲座。1866 年，因同民粹派的联系使他遭到俄罗斯的驱逐。1868 年，他与哈布斯堡王朝发生冲突，结果以涉嫌谋杀亲奥地利的塞尔维亚大公米哈伊·奥布廉诺维奇被拘留。到这个时候，卡拉维洛夫已经有了保加利亚第一流作家的声誉，他发表了一系列短文和随笔，还有许多小说。像拉科夫斯基一样，

77

他梦想建立巴尔干共和国，在如何对待奥斯曼帝国政府方面，他也与拉科夫斯基一致，认为只有靠巴尔干基督教徒的革命才能消灭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不过，与拉科夫斯基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支队”是革命的手段，能带来革命。在观察一些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后，他认为要有成功的革命，必须先教育人民，只有少数经过训练并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apostles）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瓦西尔·列夫斯基不仅持有同样的见解，而且还根据这一看法采取行动。列夫斯基1837年出生，属卡尔诺沃本地人，卡尔诺沃位于巴尔干山脉的丘陵地带。最初他在家乡上学，后来去了旧扎戈拉接受宗教方面的训练，准备成为一名教士，1858年，他进入了一家修道院。他在那里呆了不到两年，在过了一段短暂的教师生涯后，他去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加入了巴尔干军团并参加了1862年的行动。军团解散后，他回到修道院，不过时间很短，之后他重操教鞭，然后又回到革命活动中并在希托夫的“支队”中成为领导人。在19世纪年代末，他已成为保加利亚政治革命小团体中最有经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系统地阐述他的思想。他跟随卡拉维洛夫极力主张需要“革命家”，为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去训练民众。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是，他始终认为依靠国外力量的支持和援助是没有希望的，保加利亚的解放只有依靠保加利亚人自己。当保加利亚秘密中央委员会在1870年4月成立时，列夫斯基成为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主要在保加利亚忙于建立秘密组织网络。1872年，他和他的一个同志一起被逮捕。被逮捕的同志变节，极力证明他是一个政治犯，招供了他和列夫斯基所涉及的秘密活动细节。1873年2月，列夫斯基在索非亚被处以绞刑。他曾写道“假如我成功了，我的成功是为整个民族：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将独自一人走向死亡”，这句话现在用大字刻在索非亚民族文化中心（National Cultural Centre）（NDK）外的纪念碑上，民族文化中心建于20世纪80年代。

78

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年出生于卡洛费尔，是一位教师的儿

子。他在家接受了基本的教育，后赢得奖学金前往敖德萨学习。他与卡拉维洛夫一样，受民粹派的影响并和民粹派来往。1867 年，在一次与沙皇的警察发生冲突后回到卡洛费尔。他在许多学校担任过教师，巴黎公社深深地影响了他。1872 年，他在布加勒斯特并卷入了布加勒斯特革命。他在组织中从未得到像卡拉维洛夫或列夫斯基那样的声望，但他很快就因为他的作品特别是诗歌广为人知并受人们的赞美。他在 1876 年的解放斗争中牺牲。拉科夫斯基 3 位最著名的传人只有卡拉维洛夫在有生之年看到保加利亚的独立，他于 1878 年下半年去世。

列夫斯基的牺牲对发生在布加勒斯特的革命是一个毁灭性打击。卡拉维洛夫和左倾的波特夫无法合作，当秘密中央委员会（BRCC）在 1875 年重建时，波特夫并不是其中一员。组织内的新的有影响的人物是格奥尔基·本科夫斯基（Georgi Benkovski）。本科夫斯基在 19 世纪 40 年代出生于科普里夫什蒂察，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组织者。现在，保加利亚被分成 4 个革命区，它们分别以特尔诺沃、弗拉察、斯利文和普罗夫迪夫为中心。

1875 年，波斯尼亚因税收体制的变化问题爆发起义，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陷入困境。在随后的几年里，动荡漫延，不久导致奥斯曼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爆发战争。对于保加利亚革命的秘密活动家来说，看起来这么好的机会不容错过。1876 年 4 月，第四革命分区的领导人在帕纳吉尤里希特和科普里夫什蒂察之间的奥博里什泰（Oborishte）的一片林子里举行会议。经过 3 天的争论，一致同意在所有 4 个分区同时发动起义；时间开始于 5 月。然而，奥斯曼帝国政府获悉这一准备，派出一支军队到了科普里夫什蒂察。革命者在奥博里什泰曾决定，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事先知道情况，那么，起义就提前，4 月 19 日，起义爆发。四月起义开始。起义者只有少量武器，没有任何重武器，尽管有一些用樱桃树制作的原始的大炮。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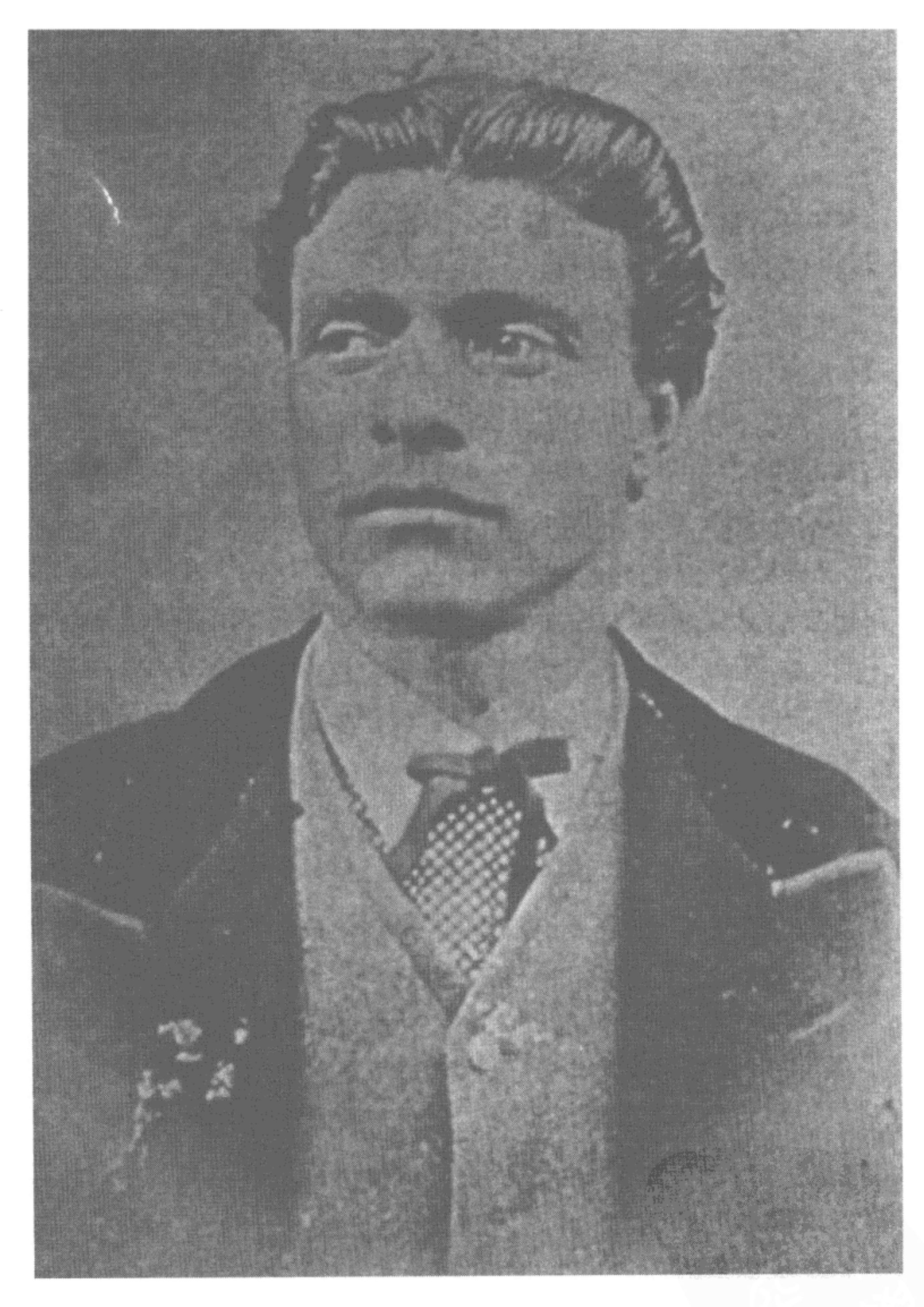


插图 16　瓦西耳·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伟大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和烈士，他 1837 年生于卡尔诺沃。这幅照片据说摄于 1870 年即他在索非亚被处死刑前 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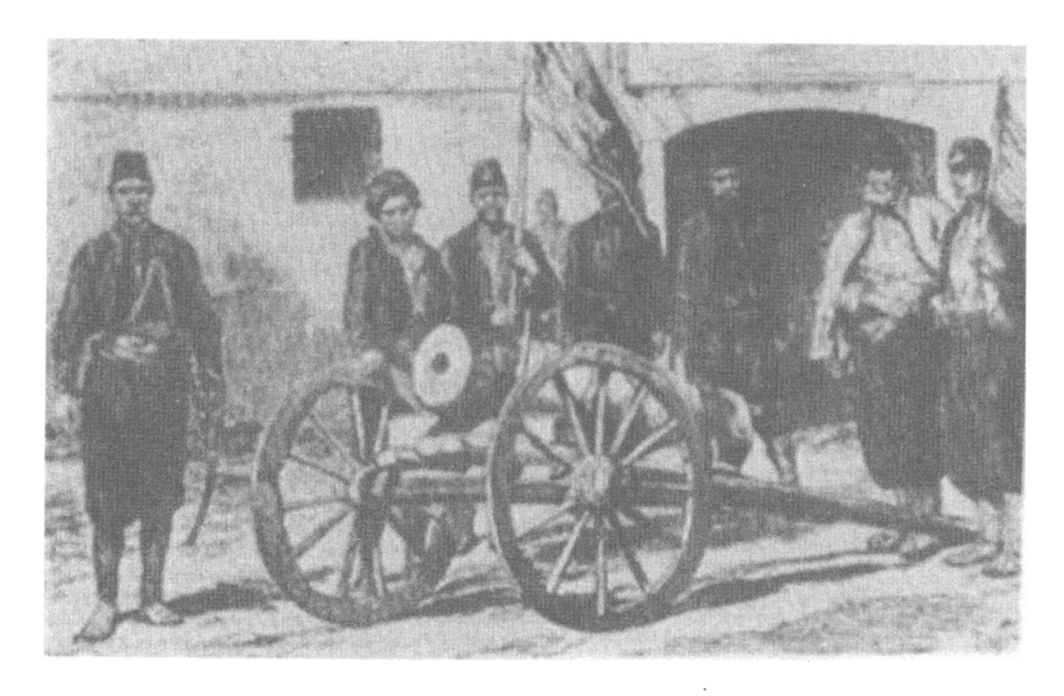


插图 17 土耳其从保加利亚起义者手中缴获的木制大炮，1877 年 1 月。

从起义所取得的成绩来看，四月起义只能说是灾难性地一团糟。在斯利文革命区，不到 60 人响应革命者的号召集合在一起；在特尔诺沃，除了少数几个修道院，几乎没有做出反应。在弗拉察革命区，几乎没有一个人参加起义。主要的行动是波特夫在多瑙河抢了一艘奥地利轮船后，带领他的民兵小分队登陆，然后向南前进了 20 英里。不久，这支部队被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巴希巴佐克”（bashibazouks）所包围，并惨遭屠杀。“巴希巴佐克”中的许多人是保加利亚穆斯林，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正规军主力布防对付塞尔维亚，奥斯曼大量使用这支非正规军。

如果说斯利文、特尔诺沃和弗拉察的起义可以视作是滑稽性的悲剧，那么，普罗夫迪夫的起义则是完完全全的悲剧。在这个地方，本科夫斯基和他的别动队一直比较活跃，也已经说服了一些村民把他们的命运和革命者连结在一起。但是，本科夫斯基和他的人马无法与当地“巴希巴佐克”相抗衡。“巴希巴佐克”对加入起义的村民特别是在布勒契果夫（Bratsigovo）和佩鲁希提察（Perushtitsa）的村民进行

残酷的报复，这其中以巴塔克（Batak）最为悲惨，据说有 5 000 名保加利亚基督教徒，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被杀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群地被赶入当地的教堂，惨遭活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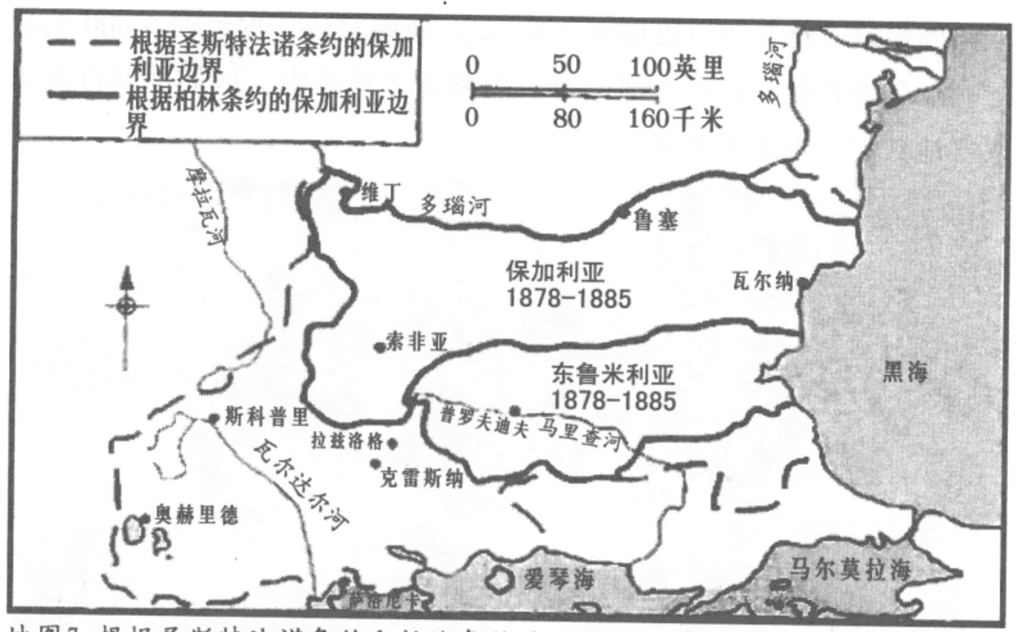
81



插图 18　巴希巴佐克屠杀保加利亚村民。

四月起义结束了。它没能撼动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但它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统治的本质。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先前一直在较低的层面，现在已经提高了许多；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道义力量原本就不怎么样，现在已经被摧毁了。进一步可以说，保加利亚问题的实质已经改变。欧洲报纸详细报道了大屠杀的真相，这激起了人们对奥斯曼帝国的义愤。在俄罗斯、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要求采取行动防止进一步的暴行的呼声不断高涨。保加利亚问题成为欧洲的问题。

1876 年 12 月，欧洲大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开会讨论将被奥斯曼帝国采用的改革方案。就改革方案的内容达成一致并不困难，问题在于要说服苏丹同意由欧洲对改革的实施进行监督那证明是不可能的。1877 年，俄罗斯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地图7 根据圣斯特法诺条约和柏林条约确立的保加利亚边界

大多数观察家都预料俄罗斯会轻松取得胜利，但结果并非如此。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巴尔干山脉以南的普列文挖壕固守达5个月之久。俄罗斯的先遣部队在古尔科（Gurko）将军的指挥下，设法占领了特尔诺沃，然后夺取穿越巴尔干山脉的道路，但在旧扎戈拉被大批刚从与塞尔维亚作战前线返回的奥斯曼军队击退。俄罗斯军队回到希普卡（Shipka）隘口，在这里，俄军受到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俄军指挥官得到新近成立的保加利亚民兵（opûlchenie）的帮助。当普列文守军最后投降时，俄罗斯军队能轻松地前进。1878年1月，俄军占领索非亚，2月，双方在阿德里安堡签署停战协定。3月，在圣斯特法诺签署了初步的和约。

83

圣斯特法诺和约设想了一个新的大保加利亚国，北面从多瑙河延伸到南面的罗多彼山脉，东面从黑海到西面的摩拉瓦河流域和瓦拉达尔河流域。根据圣斯特法诺和约，保加利亚还包括爱琴海沿岸的一部分，虽然没有萨洛尼卡，但有斯科普里、奥赫里德、比托拉（Bitola）、塞雷斯等内陆城市。就领土条款而言，这是任何一位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希望得到甚至梦想得到的极致了。

然而，这恰恰是英国和奥匈的政界人士所担心的。他们视新保加利亚为俄罗斯今后影响巴尔干的一个巨大楔子，他们要求重新划界。1878 年 7 月的柏林条约满足了英国和奥匈的要求。圣斯特法诺和约中的保加利亚被肢解。保加利亚公国将限于在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之间一块较小的地区；在巴尔干山脉和罗多彼山脉之间的地区即南保加利亚将成立一个新的归属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区，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东鲁米利亚。马其顿将归还给奥斯曼帝国，条件是其行政管理将进行改革。西北部的摩拉瓦河流域包括皮罗特（Pirot）和弗拉涅（Vranya）等重要城市归属塞尔维亚。

相比圣斯特法诺和约，柏林条约中的保加利亚只有原来的 37.5%。然而，对每个保加利亚人来说，真正的保加利亚留存于圣斯特法诺条约中。新的保加利亚国家将带着现成的领土扩张方案，带着强烈的受到列强不公正对待的情感进入国际社会。

84

圣斯特法诺和约与柏林条约就新国家的内部结构的条款没有太多的差异。保加利亚将是一个公国，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这位君主由保加利亚人选举，须经列强同意。保加利亚大公还不是统治欧洲的主要王朝中的一员。保加利亚还属于苏丹的附庸，承认苏丹对它拥有宗主权。公国允许拥有民兵但不能建造要塞；奥斯曼帝国先前在外国债务支付、铁路建设、关税以及通过“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对外国公民的保护方面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新公国要完全接受。大公选举产生前在特尔诺沃召开议会，为公国设计新的宪法。

东鲁米利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由苏丹直接控制，但苏丹不得在东鲁米利亚驻扎“巴希巴佐克”，也不能在居民家中安置过路的奥斯曼帝国正规军。东鲁米利亚宪兵队负责维持秩序，其种族的构成与当地的人口相关联，指挥官由苏丹任命。东鲁米利亚的高级官员是总督，他同样由苏丹任命并须经各签字国确认，任期为 5 年。

尽管从保加利亚的角度看，柏林条约存在有许多缺点，但是，随着柏林条约的签署，现代保加利亚国家诞生了。与保加利亚教会不同，保加利亚国家更多是外部力量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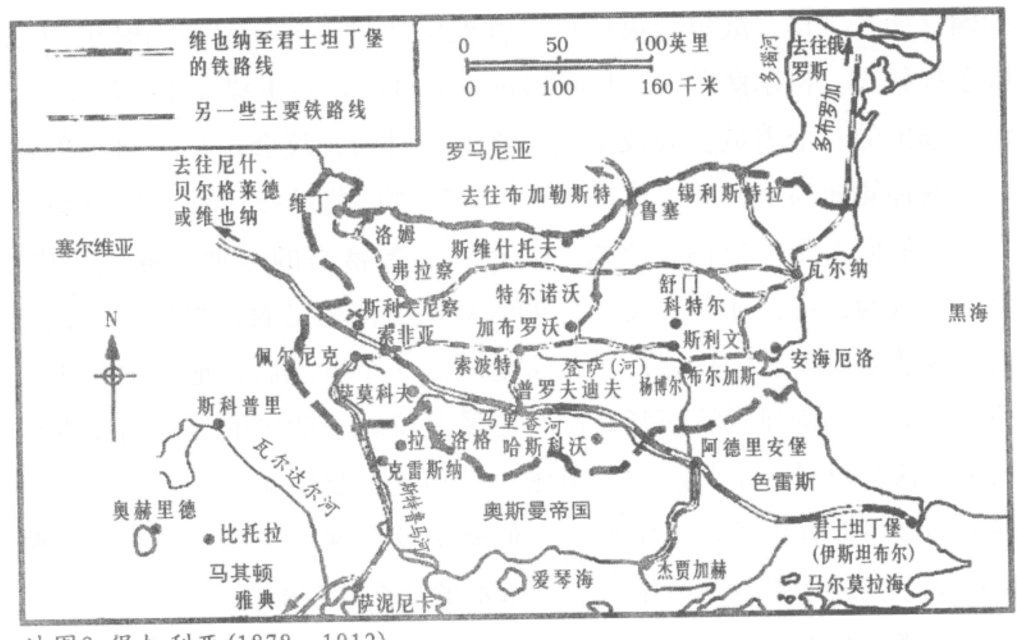
第五章　保加利亚国家的巩固（1878—1896）

一、立宪会议和特尔诺沃宪法

85　1879 年 2 月末，设计保加利亚政治体制的议会在特尔诺沃举行会议。议会代表有选举产生的，也有任命的，任命的包括土耳其、希腊和犹太少数民族。

议会代表中还有来自新公国之外的保加利亚人。这表明对国界的热情没有消退。的确，一直有人试图重新燃起在马其顿的斗争。保加利亚的激进分子在马其顿东部克鲁斯纳—拉兹洛格地区发动起义，由于相互配合不理想，起义很快被镇压。然而，当代表们在中世纪的古都相聚时，领土问题仍是最受关注的，其中的“召唤派”（vocal faction）极力主张解散议会，他们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统一比之于处在自由和奴役之间的民族的分裂要好一些。另一些人支持这一观点并建议，保加利亚应该寻求类似于 1867 年匈牙利获得的妥协。较温和的看法是特尔诺沃议会推迟会议而不是解散，这样有考虑的时间去起草一份请愿书，然后派代表团去欧洲各国的首都。俄罗斯为这一切所困扰。87　他们担心议会的推迟可能会导致国际局势的复杂化，由于俄罗斯战后地位的虚弱，这不是他们所能担当的。保加利亚被告知，

与列强政府直接联系不是议会的权力，尽管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私人电文不能传送给列强在特尔诺沃的领事。



地图8 保加利亚(1878—1912)

在立宪会议争论了民族统一的问题之后，这样的电文送了出去。那场争论发生在议会审议的第一周，焦点集中在研究民族问题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上，该委员会由议会委任。报告支持温和派的观点，温和派认为，解散议会激怒列强，使事情更糟。一周的争论是紧张的，但最后同意报告的意见。会议的高潮是督主教安蒂姆的演讲，他引用了耶利米（Jeremiah）① 第 31 章第 16 和第 17 行：

> 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作之工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
> 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索非亚已经被选作新公国的首都。索非亚虽然小一些，但有两个优点：它位于经过巴尔干的东北到西南和西南

① 《圣经》中人物，公元前 7 和前 6 世纪时希伯来先知。

到东南的交汇点；它与保加利亚觊觎的马其顿和摩拉瓦河流域比较近。

随着3月初领土问题做出决定，立宪会议开始就新公国政治体制的确立展开工作。战争结束后负责管理保加利亚的俄罗斯临时机构首脑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Dondukov-Korsakov）亲王提交了宪法草案。议会选出的一个委员会修改他的草案，四月初，议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两种倾向马上明显地出现了。后一种倾向集结在“保守”的旗号之下，他们主张的体制是将权力掌握在少数富裕的保加利亚人手中。保守派认为，占保加利亚人口的90%甚至更多的是农民群体，农民还太不成熟不能委之以权力；在奥斯曼统治5个世纪后，他们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会像对待原来的国家那样对待新的国家。这是对另一个集团“自由派”的诅咒。自由派认为农民和村民理事会是民族政治智慧的宝库；他们坚决反对保守的家长式统治，强调在整个民族中平等地分配权力是基本的社会和谐的结果。

88

在就保加利亚议会体制的实质进行争论期间，两种相反的态度完全展开了。保守派要求设立上议院以加强少数富人的权力；他们声称，上院将会阻止下院的狂热。自由派则认为没有必要设立上议院。在他们看来，设立上院是毫无必要的分裂，是对自然的、健康的农民民主的危险的削弱。

虽然230名左右的代表中为自由派所喜欢的来自农村的只有12位，但自由派的观点得到了议会大多数的支持。设立上院的提议被否决。然而一院制议会（Sûbranie）有两个不同的设想。复制塞尔维亚的宪法模式，将是一个常任议会（ordinary assembly）和一个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常任议会在每年夏收之后的10月举行会议，将持续两个月，议员任期3年。大国民议会（GNA）有两倍于议会的经选举产生的代表，还有宗教、司法和当地政府的知名人士。大国民议会有权选举总督，选择国家元首，批准国家边界的改变，或者修改宪法，修改宪法需要2/3的多数同意。

所有健康的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有权为两院投票，所有30岁以上有文化的男性有被选举权。每个公民负有遵守法律、纳税、送5岁以上孩子入学和所有健康的成年男子服兵役两年的义务。

行政权力属于大公，但要通过部长理事会或从议会产生的内阁施政。大公可以任命部长，也可解除部长职务；他提名部长理事会主席或总理，他可以让议会休会。 89

宪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教会。东正教的传统是“一个教会，一个国家”，但是，假如现在实行的话，督主教将不得不离开君士坦丁堡，定居在保加利亚公国。如果督主教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将会与马其顿、色雷斯、摩拉瓦河流域甚至东鲁米利亚的各个督主教辖区失去联系。这将是对保加利亚民族的一个巨大的打击，等同于圣斯特法诺条约撕裂保加利亚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因为在 1878 年，从数量上讲，生活在公国领土之外的督主教区超过生活在公国内的。特尔诺沃宪法因此决定，在公国内的教会将是保加利亚督主教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加利亚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圣议会（holy synod）在索非亚将有一席之地。督主教则留在君士坦丁堡。

宪法还规定，大公必须信仰东正教，唯有第一任大公可以例外。议会选定的第一个大公是亚历山大·巴滕贝格（Alexande of Battenberg），所有大国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候选人。1879 年 7 月初，亚历山大抵达保加利亚。

二、宪法冲突（1879—1883）

亚历山大在许多方面为保加利亚所接受。他年轻优雅，最重要的是他在 1877—1878 年的战争中服役于沙皇的军队。不幸的是，对专制的偏好使他几乎不可能与掌握保加利亚政治的自由派进行合作，此时自由派已发展为自由党。自由党已经赢得了 1879 年 9 月举行的第一次选举，1880 年初，在亚历山大解散第一届议会后的第二次选举中自由党再度获胜。在新国家产生后的前 5 年，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争执所引发的宪法争端将成为保加利亚政治中的主题。

在第二次选举后，亚历山大别无选择，只有任命德拉甘·灿可夫为首相，这位首相先前曾是东仪天主教的拥护者，现在则是一位强烈的仇俄派——自由派的领导人。大公和首相之间要有充分的休战，使 90

后者能够开始新国家及其国家机构的重建。灿可夫以列弗[1]（意为狮子）为基础建立了国家货币，他管理国家司法体系，他还采取措施控制自解放以来一直骚扰山区的土匪。但不久，他和大公之间就宪法问题产生分歧。亚历山大坚持使用他的头衔作为保加利亚的一个词，而自由党表示异议，大公解散了索非亚的市议会，这大大激怒了多数党；自由党宣称即使奥斯曼帝国都不会做这样的事。另一方面，自由党担心亚历山大提出公民民兵（Citizens' militia）计划，这一组织即使不代替军队也将与军队有竞争。

1880年11月，灿可夫辞职，取代他的是柳宾的弟弟佩特科·卡拉维洛夫（Petko Karavelov）。大公的兴趣是宪法的改变而不是首相的更换，但对于修改宪法，俄罗斯并不同意，担心由此可能引起西方国家介入保加利亚事务。然而，1881年3月，当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时，俄罗斯撤回了否决。亚历山大二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更加反动。亚历山大三世对在保加利亚与他同名的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表示赞同，亚历山大解散了卡拉维洛夫政府，宣布他将在第二年在斯维什托夫召开大国民议会，讨论修改宪法。自由党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们相信有全民族和他们站在一起，大选结果就会证明这一点，他们也能够轻松地掌控大国民议会。直到亚历山大公布宪法修改的建议时，自由党才感到焦虑，因为亚历山大的宪法修正案与在特尔诺沃表达过的保守主义理念非常相似。随着俄罗斯对亚历山大宪法修正案的支持，自由党的焦虑进一步加深了。在7月份举行的选举中，俄罗斯同样支持亚历山大。俄罗斯的士兵在投票点很方便地“帮助不识字的”选举人（help illiterates）并维持秩序，不过，士兵们不会对支持巴滕贝格的恶棍（thugs）给予任何限制，这些人绕着投票点进行庆贺。自由党仅仅在两个选区获得了胜利，而且，并不是所有这些议员都能到议会去。不过即使他们都去，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7月13日，大国民议会在斯维什托夫召开，从思想观念看，保守派占了绝对优势，不到

[1] 列弗为保加利亚货币单位。——译者注

两个小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大公的所有提议：建立国家政务委员会（state council），选举权变更为间接，议会的规模将缩小，公民的自由将受到限制。亚历山大大公事实上进行了一场政变。 91



插图 19　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巴滕贝格（1879—1886 年）

在政变后，许多自由党人离开保加利亚前往东鲁米利亚，不过灿可夫仍希望从公国内部影响亚历山大的专制统治。事实上，这种专制统治从一开始就比较虚弱并且不稳定。保加利亚基本的政治现实仍然没有变化：民族当中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人们和知识界支持自由党，不会与保守主义或大公合作。大公不久将面对另一个困难，因为到1882年秋议会选举的时候，议会中的保守派多数——自由党抵制选举——显露出令人惊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将显示出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

1882年春天，大公全力寻找大体上能被各方接受的部长，他引入了两名俄罗斯将军即索博列夫（Sobolev）和考尔巴斯（Kaulbars），两人将承担内政部的主要职责。当俄罗斯在保加利亚民众中特别是自由党中仍广受尊重和欢迎的时候，这样的安排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行动。然而，这样的政策是有危险的。亚历山大本人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不明确的，主要的分歧点是在影响军队的事务上。亚历山大决定加强他自己在陆军部（ministry of war）和军官团（Officer corp）的影响，然而按惯例，部长由俄罗斯人担任，在保加利亚军队中所有上尉以上军官都是俄罗斯人。任命考尔巴斯为陆军部部长一点也不能改善这一局面。

当大公与俄罗斯争夺在军中的影响时，俄罗斯与保守派在铁路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自1879年以来，俄罗斯一直要求保加利亚政府允许俄方建造从东北部的多瑙河到索非亚的铁路。这条铁路对今后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这个建议让保加利亚非常为难。柏林条约责成保加利亚完成从维也纳到君士坦丁堡经过其领土部分的铁路干线。这是一个昂贵的义务，远远超出保加利亚为铁路建设所筹措的资金。然而，俄罗斯强烈主张将柏林条约的义务置于多瑙河至索非亚线路之下；同时，保加利亚决定建立国家银行，俄罗斯则极力想获得对国家银行的控制。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因为如果俄罗斯控制了银行，那么它就能获得俄罗斯铁路建设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国家政务委员会和议会抵制俄罗斯的压力，1883年4

月，在大公的全力支持下，议会批准建造铁路干线。

俄罗斯勃然大怒，但是又无可奈何，尤其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温和的自由派持有和保守派同样的看法。自由派认为俄罗斯作为解放者有权控制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有一位自由派人士甚至认为保加利亚不需要外交部长，因为保加利亚的外交事务应该由俄罗斯来处理。但是自由派并不希望俄罗斯干预保加利亚的内部事务。在 1883 年就铁路干线的建造做出决定后，保守派、温和自由派和大公联合起来抵制俄罗斯的压力。9 月，索博列夫和考尔巴斯离开保加利亚而灿可夫建立了一个联合政府。

保加利亚内部达成的妥协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自由派接受 1883 年 4 月的铁路协定；保守派同意回到特尔诺沃宪法，还确认今后任何修正仅仅只有通过宪法手段才能实行。1883 年 12 月，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再次引入了 1881 年体制的许多方面。随后，保守派离开联合政府，他们认为他们的宪法修正目标已经达到。然而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 1883 年修正案是用非常可疑的手段通过的，在随后的一年即修正案生效前，它被废除。

三、民族问题和与鲁米利亚的统一（1884—1885）

1883 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使自由党深感窘迫。他们的队伍已经分裂，主要分为 1881 年留在保加利亚的和流亡的，在外流亡的以佩特科·卡拉维洛夫为首。1884 年，当灿可夫宣布政府将购买英国拥有的鲁塞—瓦尔纳铁路时，这一分裂进一步加深。对这条铁路线的购买是保加利亚在柏林条约中承担的另一项义务，没有一个人能对政府的决定提出反对。然而，他们反对的是购买的价格。自由党中的卡拉维洛夫派致力于处理这件事。当 1884 年 6 月举行选举时，不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竞争而是自由党中的卡拉维洛夫派和灿可夫派之间的竞争。

94

卡拉维洛夫派胜利了，他们的领导人组建了下一届新政府。他的第一行动是废除 1883 年 12 月议会的立法，之后，他继续采用了两个

重要法案。第一是置新的保加利亚国家银行（BNB）在国家控制之下。第二是将铁路国有化。在保加利亚，所有目前已建造的和今后的铁路都是保加利亚国家铁路部门（BDZh）的资产；同时制定计划确定未来保加利亚铁路网的格局。至此，自由党两派的分裂已成定局。卡拉维洛夫派组建了新的民主党，灿可夫派保留自由党的称号。

到1884年末，大部分在1879提出的宪法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大公的政治影响在1881年迅速上升后现在受到削弱。保守派在政治平衡中已变得无足轻重；卡拉维洛夫在银行和铁路方面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立法使俄罗斯受到挫折。宪法问题的告一段落意味着注意力可以再一次集中到宪法争执前最关注的焦点即民族的统一。

从1878年以来，有相当多的马其顿人出现在保加利亚。一些马其顿人是经济移民，他们中的许多参加了解放后引发的索非亚和另一些城市的重建工作。然而另一些人是逃亡者或者是难民。这一时期在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即使不是全部但大多数从种族上把自己看作是保加利亚人，因此，难民是一个相当大的有潜力的政治力量（lobby）。在专制统治结束后，他们变得更加活跃，到1884年，已发展形成有效的组织。塞尔维亚在马其顿有力宣传的最初行动鼓励了这一方向的发展。在马其顿，保加利亚督主教的目标已经不得不面对来自希腊方面宗主教的强力竞争。1885年，两支“支队”从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其中之一装备有来自军队弹药库的武器，这明显得到地方官员的默许。两队人马不久被奥斯曼军队围歼或击溃，但令人警觉的信号已清楚地发出，特别是在俄罗斯。这引起了卡拉维洛夫的注意。卡拉维洛夫基本保持自由党原先的亲俄态度，仍然认为保加利亚在外交上不能做任何引起俄罗斯愤怒或疏远圣彼得堡的事。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外交重点集中在中亚；俄罗斯非常清楚地告诉索非亚，它不喜欢巴尔干局势复杂化，因为那将使俄罗斯实现亚洲的目标更加困难。卡拉维洛夫因此迅速行动。1885年，一些知名的马其顿活动家从西部边界搬走，迁往中部或东部保加利亚。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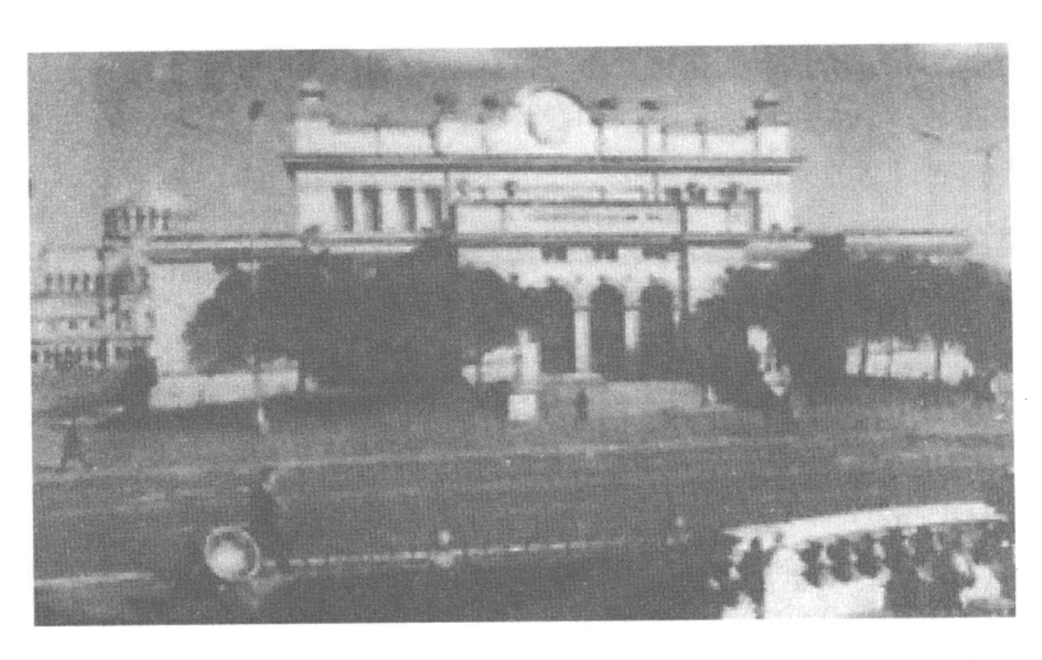


插图20　索非亚的保加利亚议会大厦。上面的题词意为“团结就是力量”。大厦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以取代1883年毁于大火的原建筑。在大厦左边的背景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er Nevski）大教堂，它主要由俄罗斯出资建造，以纪念1877—1878年的战争，教堂到20世纪20年代最后完工。

卡拉维洛夫在马其顿的强硬立场集中在东鲁米利亚。根据柏林条约，东鲁米利亚的内政管理由一位总督负责，但是，他须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进行统治，而议会的常设委员会（permanent council）将以内阁的形式发挥作用。柏林会议上列强的设想是常设委员会将含有东鲁米利亚的土耳其和希腊少数民族的代表，当地区议会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常设委员会委员时，有一套精心设计的复杂的比例代表制。一位保加利亚议员让这一制度名存实亡，这位议员来自布拉格，数学博士。他通过向他的同僚讲解、训练和排练，当进行投票的时候，保加利亚人获得了常设委员会中最多的席位。尽管少数民族的权利在东鲁米利亚得到保障，保加利亚人占绝对优势当选常设委员会委员意味着该省的政治机构完全掌握在保加利亚人手中。

96

强调该省保加利亚的特性有可以理解的愿望。为了这一目的，

保加利亚国旗和国歌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被使用，该省全部行政机构在每一个方面都模仿公国的式样，因此，东鲁米利亚的学校体制与边界以北的相同，文字是一样的，军事训练也直接以保加利亚为样本。

然而，从宪法争论中产生出来的保加利亚政党制度并没有出现在东鲁米利亚，在这里，占优势的政治力量是保守的寡头政治集团，主要由富裕的商人和前奥斯曼行政人员构成。1881 年保加利亚政变后，许多自由派到东鲁米利亚避难，这使东鲁米利亚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新闻有了活力，不过，那场政变对东鲁米利亚与保加利亚的联系起了阻碍的作用。鲁米利亚的经济发达程度要高于保加利亚，它的商人不想要保加利亚那样的动荡，保加利亚在两年里有 7 届内阁两次大选。更重要的是，严重的动荡或政治变动可能会招致援引柏林条约中的条款。柏林条约规定，假如鲁米利亚内部的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假如柏林条约的签字国事先得到通知，奥斯曼帝国可以重新进入鲁米利亚。在保加利亚公国回到有秩序的符合宪法的政治生活以前，鲁米利亚不可能考虑统一问题。

97

保加利亚与鲁米利亚统一的另一个障碍是西方大国和中欧大国的态度。最初，他们把保加利亚看作是俄罗斯的附庸，因此担心保加利亚的任何扩张就是意味着俄罗斯影响的扩张。到 1844 年，这个观点发生变化。亲王与俄罗斯在军队方面的不一致特别是铁路和银行方面的决定向欧洲表明，保加利亚不是俄罗斯的辖区。

就像 1885 年对民兵小分队的反应所显示的那样，卡尔维洛夫不愿意激怒俄罗斯，但阴谋在进行中，它没有这方面的制约。早在 1885 年，一个保加利亚秘密中央革命委员会（BSCRC）已经建立。它主张采用极端的方式，有最高纲领派的（maximalist）目标。它希望在外国统治下的所有保加利亚人进行大起义，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单一国家，事实上是去重新创建圣斯特法诺条约中的保加利亚。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没有任何实现的希望，卡尔维洛夫对 1885 年民兵小分队的反应显示出最高纲领派的道路将走向死胡同。由于马其顿拒绝他们，

秘密中央革命委员会的积极分子注意力转移到看起来最容易的目标即鲁米利亚，那里的内政管理机构是由保加利亚人控制的。秘密中央革命委员会成为统一委员会；它放弃了集体起义的号召，决定由保加利亚人控制的当地民兵采取行动。要在国际外交联合起来维护现状前迅速而有效地完成目标。

1885 年 9 月 18 日，行动按时执行，不过，原定的时间要稍稍晚一点。巴尔干南北部的保加利亚都热情地欢迎这一行动。卡尔维洛夫和大公亚历山大不太有把握。卡尔维洛夫陷入两难之中，犹豫不决，他既非常希望看到统一又不愿意做任何引起俄罗斯愤怒的事情。

亚历山大同样关心俄罗斯的反应。他也被告知关于这次行动的时间和策划。但是，在过去几年里，类似的谣传是不计其数，亚历山大对此消息跟以前一样没有认真对待。8 月，他甚至向俄罗斯外交大臣保证，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没有理由去预料巴尔干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最初，亚历山大也同样犹豫不决，是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Stefan Stambolov）鼓舞了他。斯塔姆博洛夫 1854 年生于特尔诺沃附近，后获得去俄罗斯神学院学习的奖学金。然而在俄罗斯，他卷入民粹派的活动，结果遭驱逐。他积极参加了 1876 年起义和 1876 年试图占领克里斯纳—拉兹洛格暴动。在解放后，虽然从法律上讲，他达不到合法年龄，但他仍当选为议员。他还成为议会的主席和发言人，在这个位置他确立了自己强硬而又有效率的声誉。1885 年他再一次显示了这一特性。斯塔姆博洛夫告诉亚历山大，假如他不去普罗夫迪夫并接受统一，那么，他将完全丧失名誉，还可能回到德国去。亚历山大去了普罗夫迪夫。同时他命令保加利亚军队向南面移动，警戒与奥斯曼帝国接壤的边界，以防苏丹试图将军队开往东鲁米利亚。

98

99



插图 21　1885 年，被当代的解说描述为学生自愿者支队的一个小组；左边第二个人明显不是学生，可能是一名教师。这样的支队帮助保加利亚在 1885 年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四、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和亚历山大·巴滕贝格的废黜(1885—1886)

1885 年的统一引发了一场较大的外交危机。俄罗斯狂怒，鉴于亚历山大刚刚作过的保证，俄罗斯认为亚历山大的行为是欺骗。作为报复，沙皇命令所有的俄罗斯官员和军事顾问撤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军队处于没有上尉以上军官的状态。这对保加利亚的危险是明显的，由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反应，这样的危险变得更大。希腊和塞尔维亚提出，假如保加利亚打算增加领土的话，希望能在领土方面对他们作一定的补偿。希腊的压力被顶住了，但塞尔维亚不肯罢休。11 月 13 日，米兰（Milan）国王向保加利亚宣战，塞尔维亚军队通过保加利亚未设防的西北部边界。保加利亚军队现在被迫要从其领土的一端冲向另一端；他们没有高级军官组织，没有铁路线

运送，甚至没有有组织的军需供给为他们提供粮食或为军马提供草料。不管这些，军队的运送主要靠士兵的双脚和马背，保加利亚军队和鲁米利亚民兵在行军途中靠当地居民提供食物。11 月中旬，在通向索非亚的斯利夫尼察（Slivnitsa），保加利亚军队与塞尔维亚军相遇，经过两天的战斗，保加利亚军队击溃了塞尔维亚军队。塞尔维亚军队完败，仓皇溃逃，要不是奥匈在外交上介入，保加利亚军队将进入贝尔格莱德。

斯利夫尼察之战所取得的成绩对于被剥夺了高级军官又未经考验的保加利亚军队来说是非凡的。它同样是整个民族的成就，值得回味的是，获得英勇奖章最多的是穆斯林部队。当然最重要的是斯利夫尼察之战将巴尔干山脉以南和以北的保加利亚人联结成一个民族。

外交解决统一危机是通过 1886 年 4 月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实现的。保加利亚人对布加勒斯特条约深感失望。条约声明，鲁米利亚的总督从今以后将是保加利亚的大公，但它承认的只是两个政府的共主邦联[①]，鲁米利亚的总督仍然需要每 5 年寻求苏丹和列强的批准；在文本中也没有提到大公亚历山大。俄罗斯为废黜亚历山大留了后门。

100

亚历山大没有做任何有助于自己的事业的事。索非亚的官员对东鲁米利亚的处理反应迟钝，对此，亚历山大没有给予任何检查。这自然引起了愤恨，特别是普罗夫迪夫，这个城市即使在 1885 年也比索非亚更大更复杂。更糟糕的是，亚历山大浪费了战争给予他的军队的支持。大批俄罗斯训练的军官总是猜疑亚历山大的德国血缘，而亚历山大试图让军队学习德国的训练和组织方法，但绝大多数都是徒劳的。1885 年后，亚历山大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只提升了他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而这意味着对最近战争中的一些英雄是不公平的。

---

① 共主邦联，是指两个或以上被国际公认为主权国家，共同拥戴同一位国家元首所组成的特殊国与国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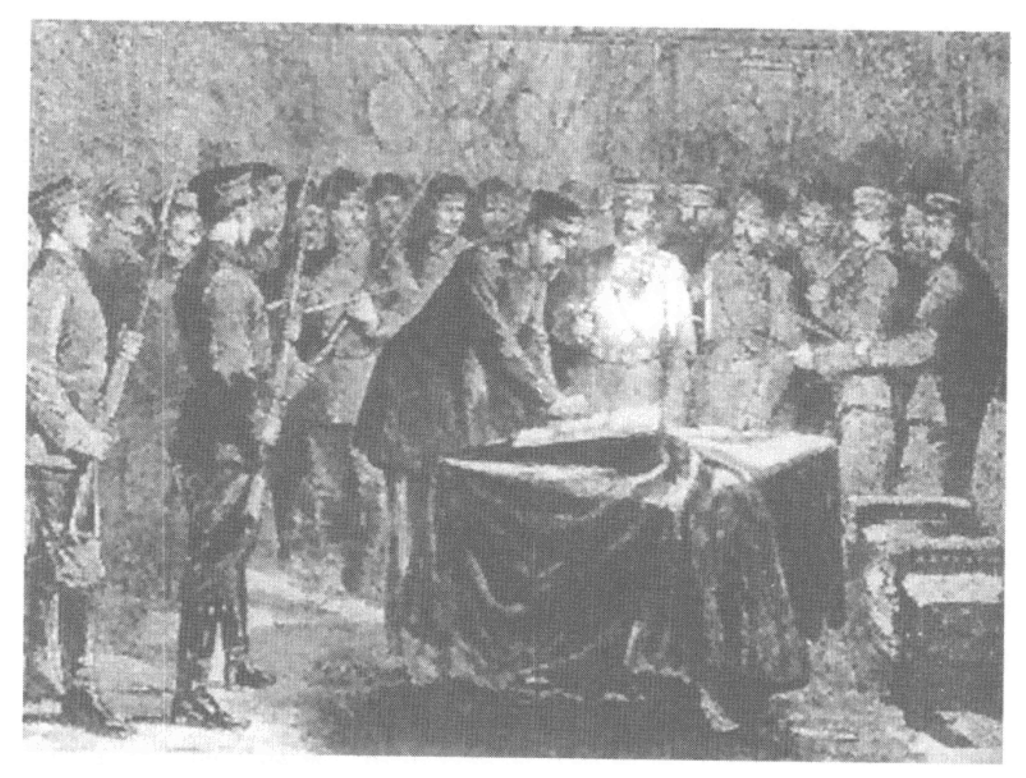


插图 22　一幅当代的木刻表现 1886 年大公亚历山大的被迫退位。

大公无法担当得起疏远如此强有力的集团。1886 年春，因为布加勒斯特和约所给予的回报微不足道，因为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亚历山大在政府会议上受到批评。5 月，新议会选举产生，议会中批评的声音更有力。更重要的是，在新议会里，鲁塞—瓦尔纳铁路的问题又提了出来。最近的动荡使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担搁下来，在此期间，英国股东已经报出了要价。当卡尔维洛夫首相宣布，他现在愿意支付一笔远高于他在 1884 年曾斥责为要求过高的费用时，议会里一片吵闹。

101

俄罗斯人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它的代理人几个月来已经俄罗斯表明了立场，不反对废黜亲王。1886 年 8 月，一群军官采取行动，废黜了逃过多瑙河的亚历山大。然而，斯塔姆博洛夫不打算宽容军方和他们的靠山俄罗斯如此干涉。他召集了地方警卫部队，占领索非亚，劝亚历山大回到保加利亚。亚历山大逗留的时间不长。他不愿意在俄罗斯仇视的目光下任职，他因此致电圣彼得堡，要求亚历山大三世批

准他返回保加利亚。沙皇拒绝了这一要求。亚历山大三世不会放弃在巴滕贝格本人的建议下去掉巴滕贝格的机会。大公本人作了牺牲。1886 年 9 月 7 日，他最后一次离开保加利亚。1893 年，亚历山大去世，年仅 36 岁，他安葬在索非亚。

五、摄政和斐迪南大公当选（1886—1887）

在亚历山大离开保加利亚后，保加利亚由卡尔维洛夫、斯塔姆博洛夫和斯塔姆博洛夫的内弟（brother-in-law）穆特库罗夫（Mutkurov）三位摄政统治，其中的穆特库罗夫于 8 月份在联合地方部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新政府在瓦西尔·腊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领导下形成，瓦西尔·腊多斯拉沃夫是一位年轻的自由党人，没有什么亲俄倾向。斯塔姆博洛夫是保加利亚最强的一方。

斯塔姆博洛夫优先考虑的是寻找一位新大公。走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召开一次大国民议会。同俄罗斯的问题马上出现了。沙皇决定派一位特别顾问到保加利亚，沙皇任命前陆军部长的兄弟尼古拉·考尔巴斯（Nikolai Kaulbars）将军担任这一职务。考尔巴斯要求释放在 8 月政变中被囚禁的人员，解除斯塔姆博洛夫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取消大国民议会的选举。考尔巴斯坚持认为，大国民议会的选举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是摄政要召开大国民议会，而摄政本身没有经过正当的宪法途经。考尔巴斯在保加利亚各处宣讲他的意见，以一种相当凌乱的方式试图使斯塔姆博洛夫和其他摄政丧失信誉。还有更凶险的威胁。10 月，考尔巴斯谈论到俄罗斯战舰将派往瓦尔纳去保护俄罗斯人，这被广泛视为打开了军事政变的通道，而军事政变将免除斯塔姆博洛夫的职务，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斯塔姆博洛夫作了一系列让步，释放了被关押的大多数人，解除国家紧急状态，但是他在定于 9 月份举行的大国民议会选举问题上没有屈服。

102

大国民议会的召开并没有带来什么直接的改善。对于考尔巴斯来说，议会召开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俄罗斯严重的漠视，11 月，他借口普罗夫迪夫的俄罗斯领事馆官员据说受到攻击离开保加利亚，保

加利亚与解放他们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一直没有恢复达10年之久。

如果说大国民议会的召集对考尔巴斯是失败的话，那么，它对斯塔姆博洛夫而言也难说胜利，因为对于另一个亲王的选举没有任何推进。事实上，假如可以选择亚历山大·巴滕贝格，大部分代表还会重新任命他。事情更糟的是，一直不断有俄罗斯或俄罗斯的支持者进行颠覆的威胁。1887年，一个名叫纳巴科夫（Nabokov）的俄罗斯冒险家，第二次进入保加利亚，试图引起叛乱；像第一次一样，他没有成功，不久他被俘获，由于俄罗斯人享有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他被释放。1887年末，他第三次回到保加利亚，但这一次，保加利亚安全部队确定，他不是被俘虏而是被击毙。

同年3月，发现了对保加利亚稳定更严重的威胁。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占领了锡利斯特拉和瓦尔纳两处要塞，不久，鲁塞也加入他们的队伍；叛乱还获得了位于舒门的保加利亚最大军事基地的支持。这一阴谋被极其地残酷镇压。领导人中的8位被击毙，在不忠于政府的团一级部队中，从支持叛乱的每20人中随意选出一个由他们的同伴执行死刑。锡利斯特拉事件的另一个牺牲品是卡尔维洛夫，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卷入阴谋，但他还是被关进监狱。

103

斯塔姆博洛夫的无情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他需要吸引一位大公到保加利亚，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除非能向那位亲王显示出他能保证国内的秩序和安全。大国民议会已经提名一个3人代表团去欧洲游历，寻找一位新的大公，国内任何不稳定的迹象都将使这一任务更中困难。斯塔姆博洛夫或代表团也没有从这一事实得到帮助：就在代表团被任命前，斯塔姆博洛夫让摄政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克服危机，只有接受俄罗斯提出的任何条件。

直到1887年仲夏，斯塔姆博洛夫或代表团有理由庆贺了。萨克斯—科堡—哥达（Sax-Coburg-Gotha）的斐迪南（Fredinand）正考虑登上保加利亚的王位，此事已逐渐为人所知。他主要关注的是俄罗斯的

态度。因为这方面的考虑，要给予他一定的保证。7 月，又召开了另一次大国民议会去选举斐迪南为新大公。8 月 26 日，斐迪南到达保加利亚。然而，沙皇拒绝承认斐迪南为经合法选举产生的大公，另一些强国不希望为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小国而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也采取了和俄罗斯一样的态度。

六、斯塔姆博洛夫时代①（1884—1894）

斐迪南在保加利亚呆了 31 年。他在头 3 年能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带他来到保加利亚的人即斯塔姆博洛夫。斐迪南马上委任斯塔姆博洛夫（Stambolovastina）为首相，斯塔姆博洛夫在这个时候组建了他自己的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他以此在议会赢得支持。但是，尽管保加利亚对斐迪南作了保证，俄罗斯仍反对斐迪南，保加利亚有一种强烈的担忧，特别是在纳巴科夫第三次也是决定他命 104 运的一次侵犯失败后，他们担心俄罗斯的代理人可能通过保加利亚的流亡政治家进行阴谋策划。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是灿可夫，他在前往贝尔格莱德之前，一直在君士坦丁堡和俄罗斯避难。他能前往塞尔维亚也是因为当地政局的变化，塞尔维亚亲俄罗斯的君主上台，这也给 105 了俄罗斯在巴尔干一个可靠的基地，这在多年来是第一次。灿可夫从贝尔格莱德能够较容易对其祖国展开阴谋活动。

① 在保加利亚，词尾“-shtina”附在人称代词后意为与这个人相连的时代、看法、环境和事件。



插图23　在1876—1878年，斯塔姆博洛夫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成为议会的议长。在废黜亚历山大·巴滕贝格后，他成为保加利亚的强人，他反对俄罗斯的阴谋，使斐迪南大公登上保加利亚王位。

斯塔姆博洛夫和斐迪南对此能做的很少。他们扩展了陆军，差不多是原来的两倍，希望这样能给他们更多的保护，通过提高升迁的前景来缓解军官团中的不满。斐迪南还做了空洞的甚至相当愚蠢的自夸，假如奥斯曼帝国不按照柏林条约第23条进行行政管理改革，将在马其

顿招募士兵到最后一人。第一个带给斐迪南和首相些许安慰的是英国，1888 年，英国同意贷给保加利亚 4 670 万法郎。这笔贷款将使保加利亚能够购买鲁塞—瓦尔纳铁路，它不能给保加利亚带来真正的经济利益，但是，在打破了金融方面的坚冰后，保加利亚从德国和奥地利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在同意贷款的同时，英国开始与保加利亚就关税进行谈判，1889 年 1 月，双方签署了协定。在几个月内，保加利亚与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签署了同样的协定。对索非亚来说，这些协定没有什么内在的经济价值，但是，这么多欧洲国家与保加利亚交涉，使保加利亚看起来像一个完全独立的得到承认的国家。

1890 年，斐迪南和斯塔姆博洛夫的转折点来了。这一年开局很糟。1889 年，另一个军事阴谋在策划，这次围绕的中心人物是帕尼察（Kosta Panitsa）少校，帕尼察是一个天才的但又有点浮夸的年轻军官，马其顿血统，1885 年战争中的英雄。帕尼察对斯塔姆博洛夫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作为一名崇拜巴滕贝格大公的人，他对斐迪南也不会有丝毫喜爱。然而，更重要的是，帕尼察到 1889 年得出结论，只要保加利亚仍然疏远俄罗斯，那么，保加利亚便没有指望在马其顿实现它的目标。他因此决心暗杀亲王。行动安排在 1890 年 2 月 2 日的宫廷舞会上。帕尼察的性格太过轻率，远远不足以做一个成功的阴谋家。警察很快得知秘密计划，很多情报来自帕尼察自己的仆人。舞会前一天，全部参与此事的人都被逮捕。残忍的惩罚再一次重演。在适当的调查和法律程序后，帕尼察被捆在树上，让来自马其顿他自己的团的行刑队执行死刑。然而政府的胜利笼罩着焦虑，因为，对秘密计划的调查表明，密谋要比斯塔姆博洛夫和他的亲信原来想像的范围还要广，还要更受欢迎。 106

尽管如此，斯塔姆博洛夫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阴谋事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集中注意力在马其顿方面，那是阴谋的起源和力量所在。假如他能做一些事情推进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事业，那么，他将极大地削弱对手，相应地增强他自己和斐迪南的地位。因此，他在君士坦

丁堡坚持，斐迪南处于新的阴谋的危险之中，阴谋家可能利用马其顿问题作为招募的主要理由。这些阴谋如果有一个成功的话，那么，阴谋的策划者必须通过要求马其顿方面的让步来回报支持者。这只会使巴尔干陷于混乱并削弱奥斯曼帝国。斯塔姆博洛夫说，假如奥斯曼帝国政府能主动在马其顿对保加利亚做出让步，事情就会好许多，这将增强斐迪南在国内的地位，降低反奥斯曼派别在索非亚夺取权力的危险。斯塔姆博洛夫的说法起了作用。1890 年夏，奥斯曼帝国政府宣布，它将发布法令，允诺给督主教辖区 3 个较大的马其顿的主教辖区，即斯科普里、奥赫里德和比托拉。督主教辖区同样被允许在奥斯曼首都出版报纸，并与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的保加利亚社区建立直接联系。

这是自 1872 年以来接到的最重要的让步，他们极大地提高了斯塔姆博洛夫和斐迪南的声望。自 1885 年和与鲁米利亚统一以来，奥斯曼帝国政府倾向于以督主教辖区为代价，支持希腊和塞尔维亚在马其顿的教会，结果是许多原先投票赞成加入保加利亚教会的主教管区，现在仍然在宗主教的控制之下，他们许多教区中没有教士。由于保加利亚教会和政府之间的不和，事情变得更糟，这导致保加利亚政府暂停了它原先给予督主教辖区的津贴。

107 斯塔姆博洛夫与高级教士的关系一向不和睦，高级教士对他的激进主义心存疑虑。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 1886 年，他阻止圣议会（holy synod）的召开并降低教士的薪水。至斐迪南到达索非亚的时候，事态进一步恶化。斐迪南几乎一点也不想掩饰他的天主教身份，对他影响很深与他一起来的母亲在这方面则做得更少。保加利亚教士拒绝在礼拜仪式中为他祈祷，因为这个，斯塔姆博洛夫暂停了保加利亚政府每年给予督主教辖区的款项。1889 年 1 月，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降到最低点，斯塔姆博洛夫关闭了圣议会，因为圣议会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大公的报怨。政府用宪兵将主教送回他们自己的教区。

1890 年奥斯曼在马其顿的让步改变了这一状况。教会同意在保加

利亚的礼拜仪式上为斐迪南祈祷，而且在1890年11月的宗教会议上，几乎全部解决了教会与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斐迪南甚至觉得可以邀请4位最主要的主教到他的宫中，而令人吃惊的是，4位主教接受了邀请。同时，政府同意每年提供300万列弗给马其顿督主教区的学校。

斯塔姆博洛夫的胜利在1890年末举行的大选中进一步巩固。在投票中，有一定的权力在其中运作，但即使没有这一点，斯塔姆博洛夫也将取得胜利。甚至表面看来势不两立的灿可夫派（tsankovists）现在也认为必须接受新政府；此后，他们的批评不再指向政府的合法性而是政府的管理方法。

批评不可避免地是严厉的，但是，斯塔姆博洛夫的政敌不断采取的暴力行动击碎了政府政策会宽松的任何希望。1891年3月，财政部长被误认为是斯塔姆博洛夫而遇害，一年后不久，保加利亚驻君士坦丁堡代表被谋杀。虽然在帕尼察事件后，秘密警察系统大规模扩展，但仍然不能阻止这样一类严重的行为。

斯塔姆博洛夫认为，假如斐迪南结婚的话，大公将会安全一些并会有下一代，这样一来，即使暗杀能去掉大公，俄罗斯也无法提名大公的继承人。波旁·帕尔马王朝的路易丝·玛丽（Marie-Louise of Bourbon Parma）公主被认为是一位合适的新娘，然而，公主提出只有婚后的孩子作为天主教徒培养，她才同意与斐迪南结婚。这将与宪法条文相抵触，宪法规定除了第一任亲王外，所有亲王必须是东正教教徒，这一条款按照评论家的看法已被斯塔姆博洛夫打开了缺口。1893年2月，斯塔姆博洛夫召开大国民议会，获得了宪法上必要的修正以满足路易丝·玛丽公主的条件，尽管这样做付出了与教会高层重新发生严重分歧的代价。

108

斯塔姆博洛夫有理由相信，公众对婚礼的热情将会超过宪法修正带来的不愉快，在王室婚礼9个月后，随着王子鲍里斯（Boris）出生带来的欢庆，斯塔姆博洛夫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插图 24　1895 年，斯塔姆博洛夫在索非亚街头受到残忍的攻击，几天后去世。袭击者切下他的手。

到现在，斯塔姆博洛夫自己的地位受到削弱。实际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将斐迪南带给保加利亚，帮助他巩固了王位。尽管有这些成功，斯塔姆博洛夫不可能再继续前进取得亲王现在渴望得到的国际社会的承认。随着帕尼察的失败和1890年马其顿主教职位的授予，而俄罗斯的立场一点没有变化，这使斐迪南确信，斯塔姆博洛夫永远不可能让他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因为如此，需要有人取代斯塔姆博洛夫。到1893年，亲王与他的首相走向公开的冲突。在那一年，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一些保守主义者和来自南保加利亚的联合派（unionist）组建了一个新的反对派集团，不久以民族党而知名。他们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滕贝格的前任秘书康斯坦丁·斯托伊洛夫（Konstantin Stoilov）。新反对派利用了因世界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引起社会动荡的时机，这种动荡是斯塔姆博洛夫政府觉得难以掌握和控制的；教育法强迫除穆斯林之外所有基督教徒的孩子在保加利亚接受初等教育，这触怒了希腊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是1894年斐迪南获得了任命他自己提名的候选人出任陆军部长的权利。那位被提名的候选人还是总参谋长，通过这一任命，斐迪南获得了比先前任何人享有的都更强的对保加利亚军队的控制力。

此后不久，斯塔姆博洛夫被指控与一名内阁同僚的妻子关系暧昧，斯塔姆博洛夫对此事断然否认。但这没有任何作用。5月，斯塔姆博洛夫陷入不得不辞职的地步。一年后，他在索非亚街头被残忍地暗杀。 110

七、认识斐迪南大公

新首相是斯托伊洛夫。斯托伊洛夫通过解除斯塔姆博洛夫实行的许多严格的限制，开始了他的执政时期。从这一政策获利的人当中有在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马其顿人现在又能够为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行动训练人马了，这让俄罗斯更不高兴。斯托伊洛夫无法担当俄罗斯的不快。即使获得俄罗斯的承认不是斯托伊洛夫马上能实现的目标，他也必须在这方面有所进展；他必须在斯塔姆博洛夫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两个外部事件让这方面取得进展变得容易了：第一，在亚洲，土

耳其在亚美尼亚的连续大屠杀使人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已经是垂死挣扎。第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94年去世。他的继承人尼古拉二世较为温和，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政治家都意识到，假如两国要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中获得最大的回报，他们之间必须合作。1895年，俄罗斯态度显露出和缓的第一个迹象，当时，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被允许访问俄罗斯，并向亚历山大三世敬献花圈。通过这次访问，事情已变得清楚，俄罗斯提出了承认斐迪南的一个主要条件，那就是王子鲍里斯接受东正教的信仰。

这使保加利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王子改信东正教在绝大多数保加利亚民众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如同与解放他们的俄罗斯和解一样。俄罗斯的开价是保加利亚民众渴望支付的，俄罗斯的要求是民众希望获得的，保加利亚政府又如何能拒绝呢？并且，有人提出，罗马尼亚国王最近已经同意他的儿子改变信仰。区别在于罗马尼亚国王是一位新教徒。他不需要教皇回复，他也没有坚定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他没必要与自己与他的妻子进行竞争。斯托伊洛夫明智地让斐迪南自己做出决定。斐迪南并不是一个内心经常受到困扰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到真正的困境，他被他对母亲妻子的感情拉往一个方向，其中无疑还有他自己的永生的灵魂；但是，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可以得到明显的政治优势，这又使他转往另一个方向。他决定选择后一个方向。他知道，得到俄罗斯的承认以及与俄罗斯和解将带来超乎寻常的内部力量的凝聚。他也非常清楚，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处境不断恶化，马其顿问题将肯定变得更尖锐。假如马其顿问题成为紧要，他的行动自由是受限制的，因为他没有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争得俄罗斯的支持。他将使选择他的民族感到失望，个人将处于遭废黜或更糟的危险当中。1896年2月3日，保加利亚宣布，王子鲍里斯将在2月14日接受东正教洗礼，沙皇尼古拉二世尽管不亲自出席，但将做王子的教父。两周后，在圣斯特法诺条约签署的周年纪念日，因为有俄罗斯的支持，苏丹承认斐迪南为保加利亚亲王和东鲁米利亚的总督。在几天之内，所有列强包括俄罗斯都做了同样的表示。

111

八、解放后的种族和社会变化

在四月起义爆发前，占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人口三分之一的是土耳其族，其中几乎全部是穆斯林。1876 年的暴行自然使保加利亚基督徒有进行报复的强烈要求。在 1877—1878 年战争期间和之后，这种报复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许多穆斯林在冲突期间逃走，有一些穆斯林的建筑和文化中心被毁；1877 年当特尔诺沃的一个清真寺被烧毁时，一个藏有旧土耳其书籍的大图书馆被毁坏，索非亚曾被一位俄罗斯士兵描述为“伊斯兰寺院的塔林”，结果大部分清真寺已不复存在，其中的 7 座在 1878 年 12 月的一个晚上被毁，雷暴雨遮蔽了由俄罗斯工兵安排的爆炸声。在农村，许多土耳其村庄被烧毁，有许多土耳其人被赶走，土地被当地保加利亚人试图占有。　112

这样的事件是巴尔干和其他地方的战争中令人沮丧的部分，但在和平时期的保加利亚，这样的事件没有重复。柏林条约坚持信仰自由和废除宗教歧视。条约同样保证穆斯林的财产权，穆斯林可以居住在保加利亚公国之外而同时拥有在公国内的土地。

1878 年之后，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遵守国际法的条款。但是再多的立法也不能阻止穆斯林迁移出这两个地区。穆斯林承受一些文化上的压力。例如，俄罗斯临时管理机构的一条法令宣布马里查河流域的水田危害健康，原因是水田成为繁殖带有疟疾的蚊子的场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穆斯林却难免这样想，这个法令是试图让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增长更困难。

更重要的是管理土地使用权和税收的法律。法规倾向于如果土地 3 年未耕作，一段时间后将被没收，这意味着不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的财产将被剥夺。而东鲁米利亚在 1882 年根据拥有的土地而不是根据土地上的产品征税再次打击了穆斯林土地拥有者；他们习惯于让土地的一部分休耕，假如仅仅根据产出征税，就不会有经济上的处罚，而根据所有权征税就确实明显地增加了需要支付的税收，同时在收入方面又没有补偿性的增加。许多穆斯林简单地选择离开，因为他们在

心理上不适应生活在基督教国家和社会里。他们不理解女性不戴面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方式，或甚至于混入社会比如在男男女女一起的宴会、夸张的远足、打球或野餐。许多穆斯林对清真寺的大量减少极为愤恨。这些清真寺中，一些成为基督教礼拜的场所，另一些交托给世俗使用；一些成为仓库，其中一个变成印刷厂，还有一个甚至成为监狱。让许多穆斯林家庭更厌恶的是因征兵进入信仰基督教的军队。穆斯林士兵不必在制服上戴十字形的记号，但他们必须服从基督徒军官，113 庆祝基督教的节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要吃基督教食品。在以后的几年里，穆斯林能比较容易免除到军队服兵役，但在 1878 年后的第一个 10 年，征兵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也是土耳其和穆斯林人最迷惑和最没有方向的时候。这使得穆斯林在 1885 年战争期间的忠诚和勇敢更使人记忆深刻。

然而，许多穆斯林在那场战争爆发前就离开了保加利亚。一直不断有穆斯林居民迁出，到 1900 年，如果以母语作为标准，土耳其人已从 1875 年占总人口的 33% 降到现在的 14%。从绝对值来看，1880 及 1884 年的土耳其人口是 728 000 人（数字来源于 1880 年的保加利亚公国和 1884 年的鲁米利亚）。到 1900 年，土耳其人口只有 540 000 人。同一年，希腊人口从 53 000 人增加到 71 000 人。

解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以及种族方面的变化，这影响了各个社区。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对许多村庄来说，穆斯林的离去和禁止耕种村庄公共土地或森林的法律变得宽松甚至可以不遵守，意味着在保加利亚土地不再短缺，不断增长的人口能够被吸纳，但在农业产量上没有有意义的增加。这使解放前大部分保加利亚土地所具有的小农自给自足经济长期存在下去。

保加利亚农庄继续供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但解放毕竟让他们靠近欧洲市场和欧洲的生活方式。在 19 世纪 80 年代，大部分索非亚居民在附近的草地仍然有一个或两个牧场，由大部分在城区雇佣的牧民照料，他们到世纪末几乎都消失了。在解放时，新首都唯一的清洁方式是成群在城里闲逛的野狗，1882 年，野狗咬死了 3 个人。1884 年，

野狗被清除，到世纪末，索非亚有了现代化的舒适环境，如市政交通和从附近山里用管道输送的大量新鲜的水。

另一些城市并没有过得这么好。沿着巴尔干山脉丘陵地带的传统的纺织工业中心失去了往日的生气，他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1883 年在索波特（Sopot），妇女烧毁了成捆的衣服，攻击进口商的家庭。传统的生产者基于作坊，组织成老式的保护主义的行会，已无法生存下去。1880 年，在加布罗沃及附近有 70 家织饰带的作坊；1900 年，只剩 23 家。在解放后的旋风中，加布罗沃已经算是比大多数地区生存得好一些的地区。 114

从欧洲进口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是传统制造业衰落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传统买主如奥斯曼帝国的丧失；萨莫科夫曾为两个军团提供服装，一直有兴旺的金属加工业，但到 1900 年，它已经从巴尔干的主要城市沦落为一个小小的萧条的地方城市。一些传统的工业受到削弱，因为新的政治边界把它们与原料产地或确立的市场分割开来。维丁的衰落是因为它在保加利亚国土的西北部分的天然腹地，按照柏林条约给了塞尔维亚。科泰尔曾经因养羊致富，他们在多布罗加养绵羊和山羊，然后将它们赶往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场。然而现在他们发现其牧场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新边界分割开了，其市场在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奥斯曼边界之外。

社会习俗的变化也同样削弱了传统的工业。许多新的习惯是征兵的结果，征兵使许多年轻一代的农民有了第一次城市生活的经历。保加利亚人在这方面的变化要比土耳其人或“泊马克”社区更明显。斯利文和哈斯科沃的皮革加工作坊能完好地生存下来，就是因为这一地区有大量的土耳其人，他们还穿的传统的鞋和宽大的皮腰带，而保加利亚人认为这些已经过时不再穿了。腰带的丢弃损害了刀具制造业。这一行业已经在遭受苦难，因为它面临着来自奥地利和德国小巧的廉价产品的竞争，因为它已被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的新关税所排斥，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是它原先固定的市场；还因为 19 世纪 80 年代对土匪的镇压减少了携带匕首自我保护的需要。现在，西式腰带的采 115

用意味着任何人如果想佩带老式的较大的刀具，那他很难能够让他的裤子保持在社会认可的位置。以前金属加工主要依靠当地富裕的土耳其人的消费；随着富裕土耳其人的离去，这一行业毁了。同样的命运落在拖鞋制作工身上。信基督的保加利亚人不可能用穆斯林教徒的鞋。西方的瓷器开始流行，因为价格便宜的优势，不久取代了大部分保加利亚人先前使用的铜制餐具，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床也变得更时髦了，价格远高于手工艺商店，这些商店世代制作地毯和垫子，保加利亚人在此以前睡觉一直习惯于用地毯和垫子。

有一些制造商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一些在服装和家具产品上模仿西式风格，而另一些转向工厂生产，为此进口德国或英国设备；在1888 年至 1893 年间，7 家新的纺织厂和 10 家新的皮革厂在加布罗沃开业，其中 3 家组成股份公司。吸引萧条地区的另一个方向是开始生产迎合新口味的产品。在 1885 年期间，当一个德国人重访他在 1878 年曾到过的保加利亚时，他欣喜地发现现在有啤酒可以喝了；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保加利亚有 29 个啤酒厂，商业蒸馏（commercial distilling）也正在发展当中。

在保加利亚这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由党早期执政时，一直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尽管很少有成功的，诸如让公务员穿由当地布料制作的服装。另外，政府制订了发展铁路建设的战略计划，不过，发展比较缓慢。1888 年冬，斯塔姆博洛夫认为，从特尔诺沃到普罗夫迪夫最快的方法是乘船从瓦尔纳到君士坦丁堡。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保加利亚完成了铁路干线的建设，杨博尔（Yambol）与布尔加斯相连，佩尔尼克（Pernik）的矿山与索非亚连接起来，但是，仍然没有通过巴尔干山脉的交通线，道路仍然处于可悲的状态。任何一种交通方式的改变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保加利亚国内缺乏资本，也没有金融基础，在有限的几个城市中心，找不到多少富裕的商行。假如农民挣了钱，他一般不可能进行生产性投资，往往是让自己成为放债人，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只要保加利亚被国际社会所排斥，那么，外部的信贷资源将非常稀少。

116

第六章　斐迪南的个人统治（1896—1918）

一、斯托伊洛夫的现代化方案

由于早期的自由党政府忙于宪法方面的问题，斯塔姆博洛夫首先关注的又总是国内安全问题，因此直至斯托伊洛夫上台执政，全面发展保加利亚经济的尝试才付诸实践。斯托伊洛夫曾经声称他希望能使保加利亚成为“巴尔干的比利时”，现在，他渴望完成这项工作。1894 年，斯托伊洛夫政府通过了促进工业发展的法案，属于确定的 9 个种类之一的行业，有 25 000 列弗的资金、雇佣至少 20 名工人，将会受到政府的资助，主要受益的是矿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建筑业。政府促进工业发展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无偿提供建造工厂的土地、对建造相应的公路或铁路线给予财政上的资助、国家铁路部门对于其生产的产品运输实行优惠的价格、免费使用国家或当地政府管辖的矿场和水资源、税收优惠、与国家签订合同时享有优先，即使国内产品的价格远高于进口产品，以及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支持某些项目的垄断经营。1905 年和 1906 年，政府的法令不但进一步扩大了适合于工业促进计划的范围，同时还降低了接受国家资助所必须的标准。 117

然而，如果要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就有必要保护其免受西方进

118 口的廉价商品的冲击。保加利亚关税体制进行大的变动是不可能的，而斐迪南本人没有认识到这点。1896 年，斯托伊洛夫将进口关税从 8% 提高到 14%，1906 年几乎提高到 25%。也有很多例外，特别是如果进口的商品有助于国内工业的增长，不过，唯一允许零关税的产品是一些生产丝织品的设备、焦炭生火的俄式茶炊（coke-fired samovar）和一些有点神秘感的东西，如教堂的钟。

斯托伊洛夫同样也采取一些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1894 年政府开始致力于开发瓦尔纳和布尔加斯的港口，它们分别在 1903 年和 1906 年竣工。1893 年斯塔姆博洛夫已经放宽了阻碍当地银行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接下来的一年斯托伊洛夫希望通过建立商会进一步激发当地商业的活力。1897 年编纂了《商业法》。

斯托伊洛夫对保加利亚经济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894 年，在得到政府鼓励的工业中有 72 家工厂，工人 3 027 名；1911 年则有 345 家工厂，雇佣工人 15 886 名，在 1904 年到 1911 年间，这类企业的生产效益增加了 3 倍。在另一方面，每家工厂工人数量的变化不大，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家工厂工人的数量开始超过 1894 年；这显示了小单位生产的稳定性。当然工业结构也没有任何大的变化。食物、酒、纺织业在保加利亚的工业生产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国家也都是这种情况，这意味着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还只是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的。铁路建设也取得了成绩，铁路线从 1880 年的 220 千米增加到 1900 年的 1 566千米和 1912 年的 2 109 千米。到这个时候，1884 年卡拉维洛夫法案所设想的主要铁路网已经建成。贸易继续增长，到 1911 年，总贸易额达 384 000 000 列弗，比 19 世纪 90 年代初的贸易额增加 60% 以上。同时政府支出从 1884 年的 20 000 000 列弗上升到 1911 年的 181 000 000 列弗，增加了 9 倍，国内的收入无法满足政府这样的开支，差
119 额部分以外国贷款填补，1900 年后的 10 年内贷款总额增加了 70%，但保加利亚每人的负债是 149.25 列弗，远远低于它的任何一个邻国。

二、斐迪南个人统治的建立

1896 年斐迪南亲王获得欧洲列强的承认，这在保加利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最初几年议会争执的国家地位和欧洲列强不承认引起的不安，现在可以搁置一边了。看起来保加利亚好像是已经实现了秩序和安定，现在完全可以致力于恢复经济、努力寻求外交目标的实现。但是 19 世纪 90 年代末的稳定局面很明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而是以相当大的代价获取的。

1879—1884 年间，政府和议会一直在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1881 年政变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权力，但政府未能利用这一优势。亚历山大·巴滕贝格并没有充分地使用他所获得的权利，尤其是因为对俄国反对的担心束缚了他。1883 年和 1884 年，立法机关似乎再一次获得了比较高的权力，在卡拉维洛夫组建的内阁中，自由党人明显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自由党在过去 5 年的斗争中受到重创，它们的弱点在胜利的时候随着卡拉维洛夫和灿科夫的分裂而开始出现。

在以后的几年里，政府迅速重新获得了他们曾失去的权力。1886 年事件充分地显示出如果要使军队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不再是主导性因素，那它就应该受到控制。而政府比议会更容易控制军队。

亚历山大·巴滕贝格下台后，只有顽固不化的亲俄分子反对政府扩充权力。斯塔姆博洛夫没有另起炉灶而是精心打造现存的警察和间谍体系，他曾经吹嘘说，一只蜜蜂穿过瓦尔纳海岸，他都知道。

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叶，保加利亚确立了由新政府自己的支持者全部占据政府部长职位的惯例。政府机构中的非法交易，在保加利亚以“党派活动”（partisanstvo）而著称，当然这绝不仅仅限于保加利亚。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叶，第一次，适合担任行政方面工作的年轻人超过了能提供给他们的岗位。失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支持反对党，因为反对党承诺如果执政会给他们工作。因此，党逐渐不再是致力于追寻政治道义的组织，而是成为贪求公职的机构。

120

121



插图 25　萨克斯—科堡—哥达的斐迪南，1887—1908 年为保加利亚大公，1908—1918 年为保加利亚国王。

这种党派活动也促使了政党的分裂：如果有 10 个而不是 3 个反对党，那就有 10 个而不是 3 个派别提供高级职位的前景。因此，19 世纪 80 年代，自由党在宪法纷争后分裂；斯塔姆博洛夫于 1886 年成立了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以区别于亲俄罗斯的自由派，在以后的几年里，所有政党往往由于一些琐碎的事情或者是个人品性

而发生分裂。而且，政党越多，政府越容易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政府已掌握了操纵选举的艺术，这种选举自独立以来一直在推行。在保加利亚，投票的人一般很少，因此在投票点或统计票数时，控制选举是一件很容易的事。19 世纪末，很少利用选举来了解公众的想法或根据选举改变政府的组成，选举更多的只是使新任命的内阁在议会有可靠的多数。1900 年，斐迪南亲王决定，当政府的组成发生变化时，将举行选举。

1893 年，斐迪南控制了陆军部，因他坚持要监督外交政策的执行情况，他同时控制了外交部。当他考虑改组政府时，他只需让一个或两个可以信赖的部长辞职，这样责任内阁就会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然后，被迫下台。

1881 年亚历山大策划了一场政变，得到了他未曾使用的权力。斐迪南只是利用了现存体系，建立了他自己的统治。但是他的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

三、社会危机和农民运动的出现（1895—1908）

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在 1885 年合并后，东鲁米利亚的铁路仍由东方铁路公司控制而没有并入保加利亚国家铁路公司，主要涉及的线路是君士坦丁堡—维也纳铁路干线的东鲁米利亚部分。因为东方铁路公司的收费是保加利亚国家铁路公司的 2 倍，这逐步成为一个令人厌烦的事情，尤其是当国际农业价格急剧下滑时，高昂的运费对保加利亚南部的出口商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当促进工业发展的法案通过时，保加利亚要求国家铁路公司为促进工业发展提供优惠的收费，而东方铁路公司对此予以拒绝；保加利亚南部的实业家与他们北部同行相比受到了歧视。斯托伊洛夫依赖于保加利亚南部联合派代表的投票获得议会多数，因此他必须得有所行动。 122

可是他不能把东方铁路公司国有化，这在外交策略上是很危险的。他也不能收购。东方铁路公司的主要股东是德意志银行，考虑到德国在柏林至巴格达铁路项目中的收益不断增长，这段铁路根本没有出售

的可能性。斯托伊洛夫只能避过东方铁路公司另辟一段相平行的铁路线。

这段平行铁路给保加利亚带来了灾难。施工后不久，问题就出现了，没有足够的资金完成它。购买东鲁米利亚境内东方铁路公司经营权的尝试受挫于德国和德意志银行，至1899年，索非亚政府被迫签署了一个耻辱性的条约，承诺在保加利亚南部不建造任何与东方铁路公司竞争的铁路线。东方铁路公司同时还接管了扬博尔至布尔加斯（Yambol-Burgas）的铁路线，这与1884年12月7日的铁路法明显是相互抵触的，该法案声称保加利亚公国内所有的铁路属于国有。东方铁路公司夺取扬博尔—布加斯铁路显示出公司并没有把保加利亚南部当作公国的一部分；它使保加利亚不愉快地回忆起1886年《布加勒斯特条约》的遗憾之处和条约批准共主邦联的不恰当。作为交换，东方铁路公司承诺会遵从工业促进法给予优惠的收费。

平行铁路所引起的难堪比除马其顿以外的任何问题更能激起公众的愤怒。部分怒气是由于政府被迫从国外借了大笔资金投资一项无用的工程。并且贷款必须得还，尽管事实上政府财政已经处于进退维艰的境地。国内的税收不得不增加。最近，工业和商业被划分为是国家税收的受惠者而不再是国家税收的缴纳者，因此税收的重担要压到农民身上。1899年11月，政府宣布1900—1904年的土地税用实物缴纳什一税取代，农业税的引入在1894年曾是斯托伊洛夫现代化方案的一部分。

123

这项改革激怒了农民。改革后他们所负担的税收是1887年到1897年的2倍，而花费大部分税收的城市，负担并没有增加得这么重。征税在现金和实物两种形式之间来回波动。农民有理由怀疑这种形式的税收将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收入；就当国际小麦价格有所回升的时候，农民几乎没有什么谷物可卖。而且农民急需现金，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不能偿付用来购买穆斯林的土地所贷的高利贷，而落入放高利贷的人手中。保加利亚的东北部是谷物生产的集中地，同时也是因征收实物税受到的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因此这里也是抵制新的税收制度最激烈的地区。

这个地区兴起了一批新组织，许多当地的积极分子于 1899 年 12 月在普列文召开了一次会议。从这次会议中产生的团体后来发展为保加利亚农民联盟（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 简称 BANU），这是独立后保加利亚出现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团体。它的理论阐述还不是很清晰，当时其领导人也认为农民联盟只是一个压力集团而已；该联盟的领导人说它不是政治性的党派，除了提升农民的文化和道德水准、在各个领域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外，没有自己的目标。但它绝不可能只是一个政治现象，随后几个月内，斯托伊洛夫承认农民联盟是保加利亚东北部真正的农民代表，一股最有力的政治力量。

这么一个强大的团体注定会同已建立的秩序发生冲突。1900 年春，在多布罗加的的达兰·库拉（Daran Kulak）村和特勒斯泰尼克（Trûstenik）村，农民的支持者和警察爆发了多起冲突，许多农民被杀。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夏季激烈动荡，当这个新组织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 12 月召开时，它的活动有更明显的政治优势。 124

斯托伊洛夫的信誉因平行铁路的灾难和农民运动彻底被毁，他于 1900 年 12 月辞职。1901 年 2 月出现了保加利亚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公开选举。在这届新议会中有 28 名议员是农民，原有的政党仍旧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民主党领导人卡拉维洛夫担任首相，外交部长是进步自由党（灿科夫派 tsankovists）领导人斯托扬·达内夫（Stoyan Danev），进步自由党是本届联合政府的另一个主要政党。新政府上台后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实物税。

1901 年选举的 21 名农民代表很快就有 16 个加入了原有的党派。在联盟内部，这增强了要求农民联盟更明确地参与政治活动的压力。在 1901 年 10 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农民联盟有了自己的方向；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名称现在被采用。1908 年，保加利亚农民联盟获得 10 多万张选票，23 个席位。第二大非执政党获得 4.6 万张选票，5 个席位。农民党支持率的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地方层面上，是农民运动逐步联合了知识分子，主要是教师、牧师和农业顾问，同时也与蓬勃发展的合作化运动相结合，合作化运动因挽救农民免于遭受

高利贷者的剥削而在乡村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其次是1906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Aleksandûr Stamboliiski）被任命为农民联盟党党报《农民旗帜报》（*Zemedelsko Zname*）的编辑。不久他就成为该党的主要领导人。

斯塔姆博利斯基在党刊上第一次系统化了农民党的理念。运动的目标是在没有种种极端和种种过分行为的社会中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这特别适用于土地财产方面，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应给予那些无地或少地的人一部分土地。他认为人性有两个方面：个人和社会，前者需要私有财产，后者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而发展。这个观点不赞成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关系简单化，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反对，斯塔姆博利斯基认为人类社会不是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划分为阶级，而是土地或占有土地的类型，最重要的是农民。农民党的思想意识中有一些是反城市化的，特别是轻视甚至敌视那些不事生产的劳动者，如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教会统治集团、王室和军队。斯塔姆博利斯基不是公开的共和主义者，那将招致权威部门太多的干预，他的共和主义是很含蓄的。在外交事务中，他对领土纠纷不感兴趣而期望通过建立巴尔干农民联邦来解决巴尔干民族主义问题。

125

激进的观点并不仅限于农民运动。1892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成立且在1894年的全国性选举中获得4个席位。1897年，它获得6个席位；1901年增加到8个，虽然其中5个马上被取消资格。1903年社会民主党分裂，以“紧密派社会主义者”著称的激进主义者拒绝与原有的政党合作，呼吁将工会置于党的要求之下，并要求没收所有的私有财产包括农民的财产。温和派或“广泛派社会主义者”派主张在议会中与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对私人财产持宽容态度，对所有人开放工会成员资格，不论其政治立场。社会民主党又在工会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导致分裂，极大地削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年代里社会党人的力量。

社会党人内部的分裂意味着他们不能充分利用市民在20世纪初因生活费用的提高所带来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以大量的罢工表现出来，

包括1905年印刷厂工人和煤矿工人罢工，1905—1907年铁路工人罢工，但是这些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大街上有学生游行，学生以骚动来支持1905年俄国革命，1907年1月，当斐迪南在索非亚为新的国家剧院揭幕时，学生参加了铁路工人的罢工并用雪球投掷斐迪南国王。大学被关闭，所有大学教师被解雇。

然而，20世纪发生的最严重的动荡不是社会方面的而是在种族上。1906年，新任命的瓦尔纳主教宗主教的亲信尼奥菲图斯（Neophytus）到达保加利亚，这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希腊骚乱。其中最激烈的是在昂恰洛（Anhialo）（波莫里埃 Pomorie）。大多数的不满指向希腊，根源就在于马其顿事件。 126

四、马其顿危机和独立宣言（1900—1908）

马其顿问题极其复杂。到1900年，马其顿问题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形势。1897年，在又一次克里特危机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希腊发生了战争，几周内希腊军队就在塞萨利（Thessaly）平原被土耳其军队击垮。这场战争对马其顿来说有两个关键后果：第一，这场战争改变了自1894年亚美尼亚大屠杀后所形成的一种共识：奥斯曼土耳其将会瓦解，巴尔干危机终究并不是一定不能避免的。俄国人宽慰地舒了口气并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和远东，并与奥匈帝国达成一致，巴尔干问题应该“暂时搁置”。第二，奥斯曼帝国政府现在觉得没有必要担心来自希腊的威胁，它使用分化潜在对手的传统方式，开始以督主教和塞尔维亚为代价支持马其顿宗主教的目标。

马其顿问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两个敌对的马其顿组织的出现。一个于1893年在马其顿成立，历史上，这个组织以它后来的名称即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而为人们所熟知。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奋斗目标是通过群众起义使马其顿获得自治；组织内部的一些小集团希望解放后的马其顿成为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的成员。另一组织是成立于1894年的最高委员会。它也主张马其顿自治，但这只是将马其顿并入保加利亚的前奏，就像1885年自治的鲁米利亚并入保加利亚那

127 样。最高委员会成员对发动群众起义没有信心，而是计划使用民兵小分队制造动乱，可能会在大国干涉后，如同 1876 年后所发生的那样，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意马其顿自治；1895 年，一队最高委员会成员占领了梅尔尼克城，控制了该城市两天。

最高委员会的行动得到斐迪南和他的官员们默许，但它威胁要打破巴尔干半岛表面上的平静，因而激怒了俄国。在 1900—1902 年间，保加利亚就财政援助与圣彼得堡进行谈判。达内夫（Danev）在 1902 年 1 月就任首相，2 月就出访圣彼得堡，但被告知，保加利亚只有接受一些苛刻的条件，才能得到这样的援助。保加利亚将停止进入马其顿的活动，并同意任命一位塞尔维亚人为斯科普里教区的重要行政官员。保加利亚除了接受外别无选择，虽然这样会沉重打击保加利亚在马其顿北部的目标。达内夫回到索非亚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打击马其顿的激进主义分子。但这些措施并不奏效，1902 年 10 月是希普卡山口胜利 25 周年，许多俄国政要出席了庆典，一队最高委员会成员进入马其顿，企图在上朱马亚（Gorna Djumaya）即今天的布拉戈耶夫格勒（Blagoevgrad）发动起义。

俄国和奥匈帝国开始展开外交行动。两国起草了关于马其顿的改革方案，俄国外交大臣兰姆斯多夫（Lamsdorff）伯爵出现在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再次要求结束对马其顿的入侵。这一次保加利亚只能勉为其难。1903 年 2 月，达内夫在国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解散所有的马其顿组织并逮捕他们的领袖。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这个议案最终通过。不久，达内夫辞职，民族自由党即斯塔姆博洛夫派组成新政府，不过，首相不是民族自由党领袖迪米特尔·佩特科夫（Dimitûr Petkov）而是国王斐迪南的亲信无党派人士拉乔·佩特罗夫（Racho Petrov）将军。

随着在保加利亚境内的马其顿组织被解散，马其顿问题的焦点完全在马其顿本身。1903 年 1 月，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萨128 洛尼卡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作了一个重大决定：1903 年夏发动筹备已久的民众起义。中央委员会仓促地通过了这个决定。最高委员会派

还存在，中央委员会担心他们这一伙进一步侵入马其顿会惊动奥斯曼军队，使其提前进入戒备状态；中央委员会也担心，俄国和奥匈帝国主导的改革方案得到实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马其顿现状，以至于到那时发动群众起义得不到响应。4 月，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爆炸事件，奥斯曼军队加强了警戒。5 月，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受到致命的打击，其最能干的领导人哥策·德耳切夫（Gotse Delchev）在与一支土耳其军队的遭遇战中牺牲。

尽管有些挫折，还是按原计划于 8 月 15 日发动起义，这一天是圣以利亚日（St Elijah's Day），斯拉夫语称为伊林登（Ilinden）。几天后的基督变容节[①]（保加利亚语称为 Preobrazhenie），在阿德里安堡省发动了另一次起义。伊林登—变容节（Ilinden-Preobrazhenie）起义与以前在奥斯曼土耳其欧洲部分基督徒中所作的鼓动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支持。随后，马其顿的克鲁舍沃（Krushevo）、色雷斯东部的斯特兰迪亚都成立了政府。但是起义若没有国外的支持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援助仅可能来自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都认为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本质上是亲保加利亚的。但保加利亚也不敢单独行动。这样做不仅会使其他巴尔干国家感到恐慌，也会激怒俄国及奥匈帝国，此外 1897 年战争后没有哪个巴尔干国家愿意单独面对奥斯曼帝国军队。因而起义不可避免地趋向一个不祥的结局，新建立的克鲁舍沃和斯特兰迪亚政府被镇压，起义的支持者遭到野蛮的报复。许多东正教乡村被毁，庄稼被破坏，牲畜被掠夺，小亚细亚的教师、牧师被驱逐，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逃亡到保加利亚，他们中的一些人想从那里去新世界，一些仍留在马其顿的人仅仅能从东正教或塞尔维亚人组织寻求庇护，以维持生存。起义的失败对马其顿是一大打击，督主教在马其顿的事业从来没有完全恢复。

斯塔姆博洛夫派政府充分利用了这种凄惨的局面，以传统的斯塔姆博洛夫方式控制了国内的马其顿人，同时对外寻求奥斯曼帝国政府 129

---

① 儒略历为 8 月 6 日，格雷果里历为 8 月 19 日。——译者注

的让步。1904年3月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保加利亚承诺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控制马其顿组织，而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意赦免起义后被俘的大部分人员，同时条约允许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一些重要城镇任命商业代理。

也是在3月，佩特罗夫内阁同样与塞尔维亚达成一项协议。协议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协定，旨在对付任何干涉马其顿的外部势力。这个协议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基本问题不是外部干涉而是马其顿国内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的支持者之间相互倾轧。这部分是因为俄奥的改革方案要求重新划分马其顿政区的边界线，以形成比较大的种族聚居区。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各方将此解释为以种族清洗获得势力范围的许可。

希腊人的挑衅激怒并在很大程度上点燃了1906年保加利亚的反希腊暴动，但是另一个方面，马其顿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消退。许多人厌烦了这种永无休止的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马其顿组织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他们继续对剩余的人以及日趋贫困的东正教社团征税，而流亡的领导人时常陷入激烈的冲突中；1906、1907年在索非亚发动了一连串惊人的暗杀活动，对提升马其顿组织的形象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斯塔姆博洛夫派政府认为解决马其顿事件要通过外交手段，如果失败的话方可采取武装行动。但必须是现代国家的军事行动而不是相互有矛盾的游击队。正因为如此，最适合的策略就是耐心等待时机且坚持组建一支战斗力强的现代化军队。

1908年1月，斯塔姆博洛夫派等待的时机到了。1907年的学生暴乱激怒了斐迪南，他撤换了佩特罗夫将军并由斯塔姆博洛夫集团的领导人佩特科夫组阁，但后者于3月被暗杀。他的继任者佩特尔·古德夫（Petûr Gudev）除了中饱私囊外没有任何作为。1908年1月，斐迪南以典型的个人统治方式，免去他的职务。斯塔姆博洛夫派内阁倒台，代之由亚历山大·马里诺夫（Aleksandûr Malinov）上台执政。1903年，马里诺夫在卡拉维洛夫去世后担任民主党领导人。新政府组成后，他操纵了全国性的选举并在议会中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多数，而在刚刚

130

结束的上一届议会中，民主党只有 2 个席位。

与其他政党相比，马里诺夫的民主党在推行政策方面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执政期间最突出的立法成就之一就是逐步转为比例代表制，这种制度很难有固定的选举结果。不过，马里诺夫政府大部分时间关注的是外部事务，特别是 1908 年 10 月保加利亚的完全独立及其所产生的后果。

保加利亚的独立声明由一些意外事件引起。6 月，青年土耳其党在君士坦丁堡掌权，声明他们打算合并所有的奥斯曼领土，推进其现代化过程；据他们的说法，领土囊括了东鲁米利亚行省、保加利亚南部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cegovina），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 1878 年后由奥匈帝国统治。出现风波的第一个征兆是保加利亚驻君士坦丁堡公使未被当外国政府的代表而是作为奥斯曼帝国行省的长官来对待。更严重的是君士坦丁堡的东方铁路公司工人罢工，并迅速波及到保加利亚南部公司的运输线。保加利亚人对此极为恼怒，因为在国际局势紧张之时，一次由外国所引发的罢工竟导致全国一半的铁路系统处于瘫痪状态。9 月 19 日即 1885 年保加利亚与东鲁米利亚联合纪念日①，保加利亚将其境内东方铁路公司的资产国有化，10 月 5 日斐迪南宣布保加利亚完全独立。在最近几年，奥斯曼帝国放松了对其附属国的限制，但保加利亚对此还是满腹怨恨。10 月 6 日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31

独立宣言并没有收到普遍的欢迎。马其顿院外游说集团就表示了极大的愤恨，认为在同丧失的领土合并前发布这样的声明是不正确的。也有人认为斐迪南与这些举措连在一起有很大的危险。这种情感最突出的表现在 1911 年，当时最高国民议会在特尔诺沃举行会议，正式提

① 根据儒略历，1885 年保加利亚与东鲁米利亚合并发生在 9 月 6 日，儒略历在大部分东正教国家广泛运用。在 19 世纪，儒略历比格雷果里历晚 12 天，格雷果里历在西方和中欧地区广泛适使用。在 20 世纪，儒略历比格雷果里历晚 13 天。因此，9 月 6 日周年纪念在西方体系中是 19 日而不是 18 日。斯托伊洛夫的现代化方案中试图将格雷果里历运用于国家事务中，但遭到一些保守的、宗教虔诚势力的反对。这种尝试最终在 1916 年完成。

出因宣言而必须做出的宪法修正。在斐迪南召开最高国民议会时，斯塔姆博利斯基带着50多名农民议员走出会堂以示抗议，但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并没有影响最高国民议会的最终目标，最高国民议会的真正任务是宣布斐迪南为“保加利亚国王”，并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赋予国王和内阁与外国签署条约的权利。

斐迪南的个人统治进一步强化，秘密外交成为可能。不久之后就产生了戏剧性的后果。

五、巴尔干外交及巴尔干战争（1908—1913）

特尔诺沃的最高国民议会召开后不久，一个在伊凡·盖溯夫（Ivan Geshov）领导下的新政府成立了，盖溯夫是继斯托伊洛夫之后又一位民族党（nationalist party）领导人。斐迪南极端厌恶盖溯夫，主要是因为民族党对国王的个人统治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也就是说如果国王在国内事务上对民族党如此不信任，那么，民族党进入内阁意味着国王认可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盖溯夫在这方面的第一个优势就是与俄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此时俄国要求建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同盟，人们普遍认为，盖溯夫被委以重任将带来这一同盟的建立。

两个巴尔干国家有足够的理由改善他们的关系。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不能给巴尔干半岛带来和平，特别是激怒了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一直是苏丹最虔诚的仆从国，但苏丹现在以税收、征兵及试图解散他们武装的方式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阿尔巴尼亚从1909年到1912年每年夏天都发动起义。这种日益增加的混乱状态给周边的巴尔干国家带来两大威胁。第一是列强势力可能会介入并强制他们进行改革，改革将会进行并受到列强的监督。第二是一个或多个列强可能会占领部分巴尔干半岛，1911年意大利因为北非的领土纠纷向土耳其宣战，这一威胁更是成为某种预兆。无论哪种情况巴尔干各国扩张的大门都将关闭。但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巴尔干国家能结成同盟，那么外部势力将很难介入这一地区。同时俄国担心的是奥匈帝国

132

而不是意大利的侵犯，俄国将巴尔干同盟视为抵制奥匈帝国扩张的屏障。

当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开始谈判的时候，俄国外交处在这样一个幻觉中，这两个国家将建立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同盟。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完全清楚同盟只能是进攻性的，他们打算在列强干涉或改革之前，占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谈判过程进行得很艰难。保加利亚显然希望马其顿成为另一个东鲁米利亚，强调马其顿的自治；塞尔维亚坚持肢解。最终保加利亚做出让步，但是要划分出最终分界线证明是不可能的，斯科普里附近的中心地带被宣布为“有争议的地区”，此地区的最终归属如果有必要交由俄国沙皇仲裁。

1912 年双方就分界线签署了条约。在这一年春天，马其顿趋势进一步恶化，希腊匆忙与保加利亚缔结了一份条约，由于时间上的匆忙，以至于条约并没有具体的条款涉及如何划分任何征服的领土。同时希腊也与塞尔维亚签订了条约。门的哥内罗也没有被置于一边，它与其他 3 个国家达成一项口头协议。

1912 年夏，马其顿的局势处于混乱当中。阿尔巴尼亚叛乱席卷整个瓦尔达尔河流域，最远到斯科普里，这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下台。保加利亚在国内面临不断上升的压力，民众要求采取行动保护马其顿的督主教。9 月 5 日索非亚面临的压力达到顶点，支持战争的人们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会。2 天之后国王和内阁决定开战并开始和盟国一起着手战前部署工作。10 月 8 日，门的哥内罗向奥斯曼帝国宣战；10 天后其他盟国相继宣战。

133

保加利亚的主要任务是击退色雷斯东部平原的奥斯曼军队，并加速向斯特鲁马河（Struma）挺进，希望在希腊之前抵达萨洛尼卡，只有一小部分军队被派往加入在马其顿作战的塞尔维亚部队。在主要战场上，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绩，11 月的第一周奥斯曼军队就被赶到了其首都附近的查塔尔贾（Tchataldja）防线。

国王和大多数政界人士都主张向前推进，试图占领君士坦丁堡。据说斐迪南为这次行动定购了奢华的军服。总参谋部的积极性则不

高；军队已经筋疲力尽，有一些部队中霍乱突然蔓延。文官占据优势但军方的谨慎证明是有道理的，11 月 17 日，保加利亚军队停止进攻。几天内签署了停战协定，所有交战国同意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召开会议，以决定和平协议的具体条款。同时列强也清楚地表明了态度，在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残余中必须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

当伦敦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1913 年 2 月 3 日，战争又一次在色雷斯爆发。保加利亚对阿德里安堡再次发动进攻，阿德里安堡是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堡垒之一。战争一直持续到 3 月 26 日奥斯曼帝国守卫部队投降为止；围攻期间保加利亚飞机在欧洲历史上首次执行空中轰炸任务。尽管取得了阿德里安堡的胜利，但保加利亚在外交上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罗马尼亚政府要求从邻邦的获利中得到领土补偿，据说是为酬谢其在战争期间的友好中立。这样的领土补偿只能来自保加利亚，圣彼得堡大使级会议之后，保加利亚被迫让出从锡利斯特拉到巴尔奇克（Balchik）一线的南多布罗加。

随着 1913 年 5 月 30 日伦敦条约的签署，战争的总解决方案最终落实。条约规定建立阿尔巴尼亚国家，由国际委员会确定其边界线；奥斯曼帝国先前拥有的剩余部分，从埃内兹—米迪亚一线以北由盟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划分。各盟国之间要就此达成协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失去南多布罗加更坚定了保加利亚捍卫在马其顿全部所得的战利品的决心。索非亚要求“相称”，认为保加利亚在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应得到最大的利益。希腊和塞尔维亚援引“平衡”的观念，强调如果战胜国在实力上基本上是平衡的，将有助于今后巴尔干半岛的和平。问题的核心是有争议的地区。保加利亚提议这个问题交由俄国裁决时，塞尔维亚拒绝并坚持直接谈判，希腊也必须参加。这次谈判如同保加利亚所担心的那样是徒劳的。在谈判破裂时，盖溯夫放弃努力并辞职，随后继任总理的是达内夫。



插图 26　1912 年 11 月，保加利亚向君士坦丁堡周边防线攻击受挫后，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代表开会讨论停战协定的签署。注意背景中的东方铁路公司车厢。

当时在索非亚形成的强大的战争游说集团使盖溯夫深感沮丧，院外游说集团很大程度上以塞尔维亚—希腊结盟作为战争的根据。在主战派中，大部分的马其顿团体、非社会主义党和非农民联盟的反对党、总参谋部、国王和最后终于被说服的达内夫发现，从俄罗斯的仲裁中不能指望得到任何收获——利益——东西。6 月 29 日，保加利亚军队向他以前的盟友希腊—塞尔维亚同盟发动进攻。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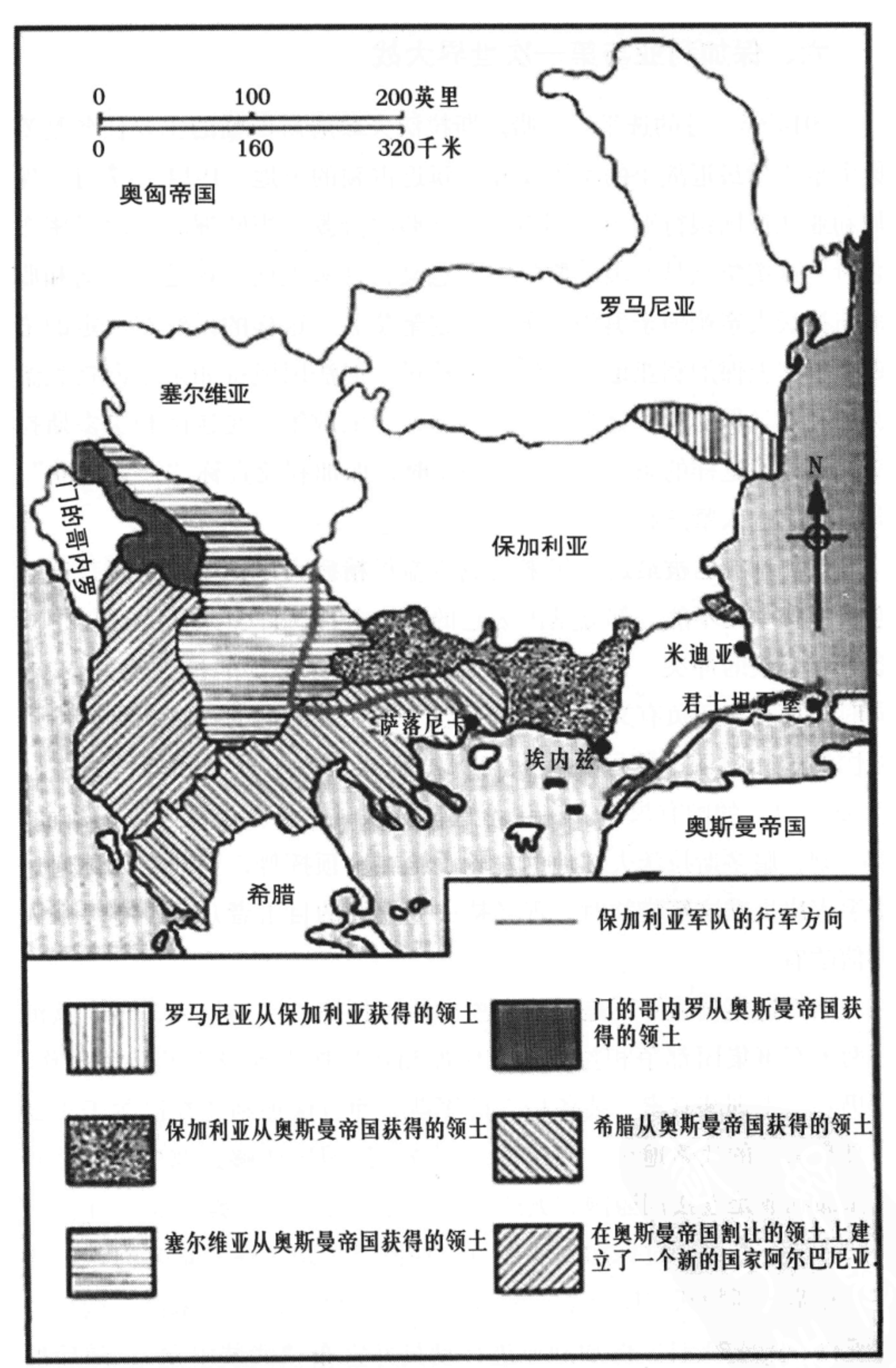
起初保加利亚军队进展的很顺利，但战斗进行了两周后，罗马尼亚正在动员的消息传来。之后不久，奥斯曼军队越过南部边境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北部边境是不设防的，那意味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罗马尼亚军队进入索非亚，保加利亚因此求和。在布加勒斯特条约（8 月 10 日）和君士坦丁堡条约（10 月 13 日）中，保加利亚失去了许多新近获得的土地。仅保留皮林马其顿（Pirin Macedonia）至斯特鲁马河流域的一小部分以及色雷斯的一狭长地带，包括爱琴海的泽泽阿加赫

(Dedeagach）港。

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伤亡较之第一次更为惨重；有证据表明战争的另一方对平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且，又一次瓜分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中的保加利亚。无论从那方面来看，它对保加利亚都是一大灾难。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保加利亚割让南多布罗加给罗马尼亚，剥夺了保加利亚大部分发达的农业区和主要的谷物出口地。相比之下保加利亚所得的都是一些贫瘠的、欠发达的地区，甚至杰贾加赫也因为进出的铁路经过奥斯曼帝国，而没有价值。假如爱琴海沿岸获得的新领土要得到完全开发的话，那就必须建造新的铁路线并在波尔图拉戈斯（Porto Lagos）港建造一些港口设施。再说马其顿的新主人不是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的“米勒特”允许督主教辖区的文化自治，而是这些有侵略性的非常自信的民族国家，他们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马其顿。

在灾难性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达内夫于7月17日辞职。继任的是自由党联盟的瓦西里·腊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11月腊多斯拉沃夫进行了全国性的选举，根据马里诺夫政府所留下的遗产，被迫按照比例代表制进行选举。腊多斯拉沃夫没有获得可靠的多数，1914年3月保加利亚进行第二次选举。这次腊多斯拉沃夫允许新占领的地区参加选举，但不允许反对党参加这些地区的竞选。这些新并入保加利亚的地区几乎没有多少政治经验，很容易被腊多斯拉沃夫的竞选班子所操纵。腊多斯拉沃夫获得了他想要的多数。

137



地图9　巴尔干战争后的领土变化

六、保加利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3月的选举后，腊多斯拉沃夫政府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筹集资金支付最近战争的费用及开发新近占领的土地。1914年7月，保加利亚从德国银行财团得到500亿列弗的贷款。当欧洲战争阴云密布之时，这笔贷款具有很重要的国际意义，许多人认为正是裴迪南和腊多斯拉沃夫亲德国亲奥匈帝国才有这笔贷款。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保加利亚也曾与法国接洽过，但法国坚持如果他们贷款给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就必须实行跟随西方的政策，斐迪南和腊多斯拉沃夫拒绝了这样的条件，当一战爆发时，保加利亚宣称“严守中立”，同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保加利亚已被最近几年来的战争拖得精疲力尽，中立受到普遍欢迎，但贷款则不然。部分是因为它的先决条件，许多人认为这与中立政策有直接的冲突。德国指定保加利亚用国家每年的税收偿付贷款；同时保加利亚还负有义务将建造至波尔图拉戈斯港的铁路线合同给予德国的国际财团，德国还将获得保加利亚在佩尔尼克和博博夫多尔（Bobovdol）的国有煤矿。在讨论这笔贷款时，议会出现吵闹的场面。有一刻，腊多斯拉沃夫把他的左轮手枪在头顶挥舞，当政府声称通过举手表决批准这笔贷款时，现场持中立立场的目击者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政府。

然而这笔贷款并不是斐迪南投向德国怀抱的主要原因，那时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都争相拉拢他。保加利亚虽然受到极大的战争创伤，但仍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过保加利亚，同盟国能够到塞尔维亚，并且保加利亚是连接同盟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重要环节，奥斯曼帝国于10月加入同盟国；通过保加利亚还可以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地基海峡。斐迪南和腊多斯拉沃夫听着双方的游说，但直到1915年夏末没有做出任何承诺，9月21日，保加利亚进行动员并宣布“武装中立”，随后加入同盟国一方，向塞尔维亚发动新的进攻。

保加利亚最后决定加入同盟国有两个原因。同盟国给保加利亚开出的价码更高，而且在 1915 年夏，看起来同盟国可能会赢。德国向保加利亚允诺马其顿的全部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保加利亚，他们甚至说服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允许保加利亚控制通往泽泽阿加赫的铁路线。另一方面，协约国仅谈及色雷斯到埃内兹—米迪亚线。对协约国来说，保加利亚在马其顿所能获取的有赖于塞尔维亚所作的让步。而塞尔维亚领导人尼古拉·帕希茨表示他决不让出一寸领土，俄国支持塞尔维亚。1915 年初，军事上的成功促使俄国及其盟国在马其顿问题上丝毫不让。俄国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普热梅希尔（Przemys'l）要塞，协约国在加利波利（Gallipoli）立足，从这里可以抵达君士坦丁堡，而且在 5 月份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2 个月后形势发生逆转。意大利的参战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相反由于担心意大利在达尔马提亚的图谋，塞尔维亚在马其顿的立场更加坚决，协约国军队在防守严密的加利波利海岸受到牵制，而俄国丧失了普热梅希尔及俄国波兰部分的大片土地，包括这些土地上的重要工业。此外，同盟国的外交更容易被保加利亚接受，协约国倾向于支持反对党，而德国更多关注的是斐迪南和他的亲密顾问。鉴于斐迪南独裁统治的特性，他对外交事务的控制以及国家所处的紧急状态限制了反对党自由活动的空间，同盟国将赌注压在较强的一方。

反对党不支持动员。他们都宣布自己为“坚定的和平党人”，除“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外，他们组成联合集团（United Bloc）要求允许议会开会讨论并决定战或和的问题。腊多斯拉沃夫拒绝讨论。可是斐迪南却同意接见反对党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然而会议在国王和斯塔姆博利斯基的激烈争论中结束，当后者公开了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后，他被捕入狱。直至 12 月战争爆发，国会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当反对党为了民族事业联合起来时，再一次，他们所有的人，除了“紧密派社会主义者”以外，都投票支持战争预算。

139



插图2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士兵在贝拉西查山，距离他们的祖先被拜占廷帝国统治者“保加尔屠夫”巴西尔打败已整整一千年。

从保加利亚的力量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绝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1915—1916年，保加利亚占领了塞尔维亚统治下的马其顿，并逼近希腊国土，最远至鲁佩尔要塞。1916年底，随着希腊的一次进攻，希腊占领了兹拉马、塞雷斯及卡瓦拉。同一年，在卡伊马克哈兰山（Kaimakchalan）的一次激烈战斗后比托拉失守。也是在1916年，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这使罗马尼亚遭受惨败。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军队一起占领了南多布罗加，尔后穿过多瑙河向罗马尼亚本土进军。此后，一直到1918年夏末，军事战线特别是南部、西南部战线的态势大致保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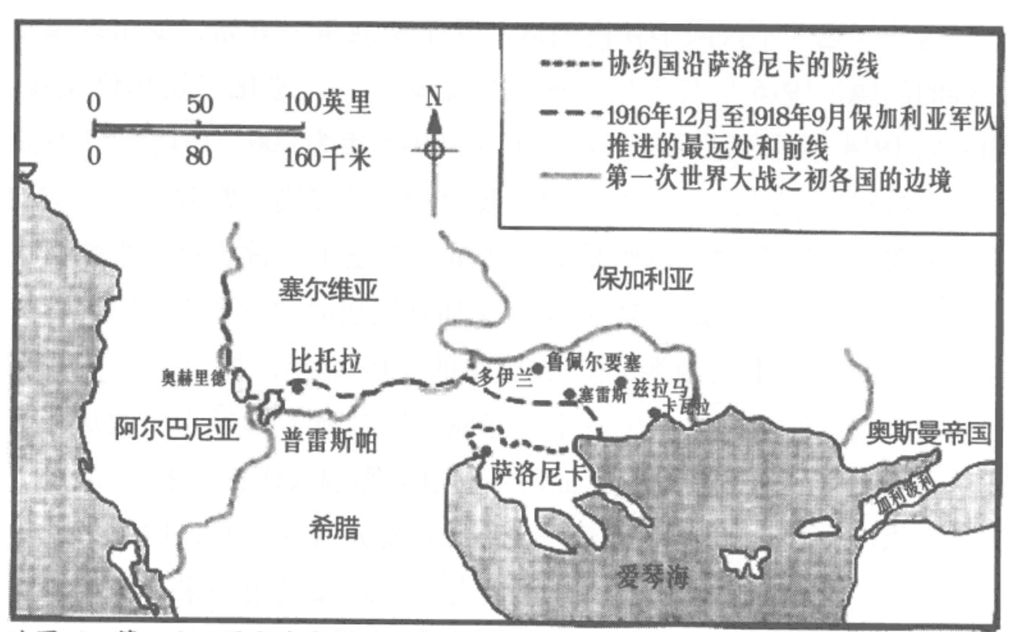
虽然人们很高兴马其顿重新归属保加利亚，但不久后方开始出问题。在马其顿，军队变得越来越关心行政管理事务。在新占领区，许多海盗和无能之辈进入政府机关。到1916年8月，军队对此非常关注，唯恐因为管理不善招致离前线不远的这一地区出现动荡，他们还试图控制马其顿政府机关。军队未能达到目标，此后问题变得更严重。

140

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新占领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供给困难的问题。1916 年甚至出现面包的短缺。供应恶化引发物价飞涨。如果以 1914 年的生活花费基点为 100，1916 年为 200，1918 年 7 月是 847。这还是官方数字不包括黑市，黑市的指数更高，常常会是供应的唯一来源。1918 年夏，困难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民众和军队的士气，这是 1918 年 9 月保加利亚崩溃的一个主要因素。

供给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不断变化的。1915 年，如果不是征收粮食，动员就已经对配给产生一定的影响，军队所需远远大于收成。当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征兵和征用牛马也会影响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为了把供应物资运到驻马其顿的部队，需要大量的牛马，因为那儿地处山区，公路是简易的，铁路几乎没有。军队和民用的采办机构也会有竞争。腐败这样的恶行无所不在，征用机构日益为人们所不齿，因为他们的办事人员在黑市高价贩售他们私自拿的必需品，如盐和糖，他们根本没有权力这样做。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在保加利亚的存在使这一情况更加严重。德国和奥匈军队的待遇比保加利亚好得多，他们将大量食物运回国内，常常超过官方所允许的限额。这一切还因以下情形得到助长：德国控制了保加利亚的铁路和电话系统，1915 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货币在保加利亚合法通行。德国政府和奥匈的官方征用机构同样是贪得无厌的，根本不会考虑当地的需要或来年的种子和饲料。据报道，1917 年多布罗加适于耕种的地区有四分之三的肥沃土地没有开垦，是因为前一年的收成都被拿走而没有种子。政府职责的变化也无助于军队和民用需求供给问题的解决。1915 年 3 月，公共福利法授予政府有权控制战时紧缺物品的价格。1916 年，形势进一步恶化，政府建立经济和社会福利中央委员会，它几乎没有时间进行组织。1917 年 4 月，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转交给了一个新成立的由军队控制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理事会。与行政部门相比，军队也没有成功多少。

142



地图1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巴尔干南部战线

这不可能没有反应，特别是占领区，那里的剥夺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摩拉瓦流域发生了多起反抗保加利亚占领的暴乱，虽然一些村庄里是血统纯正的保加利亚人。俄国发生的事件鼓舞了抗议活动。1917年3月，斯塔姆博利斯基在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写的一封信中断言，俄国沙皇的倒台可能会迫使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那样的话同盟国注定会失败。1917年夏，保加利亚在罗马尼亚前线与俄国交战的士兵组成“苏维埃”，这500名士兵中的多数是农民联盟的支持者，因为政治煽动被投进监狱。俄国革命号召“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1917年3月，保加利亚激进民主党领导人查诺夫（Tsanov）对此做出回应，查诺夫公开对保加利亚军队有权占领罗马尼亚部分领土提出质疑，在那块土地上没有保加利亚人。至年底，压力进一步加大，紧密派社会党领导人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Dimitûr Blagoev）在索非亚召集了数万人的聚会要求结束战争并结束使保加利亚投入战争的政治体制。1918年初，社会动荡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加布罗沃抗议、斯塔马尼卡（Stanimaka）和萨莫科夫的叛乱，而在5月，斯利文的一位妇女被杀，因为她参加了由后来逐渐为整个国家熟知的“妇女反抗”组

织召集的一次会议。

伴随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腊多斯拉沃夫在外交上也陷入意想不到的困境。1918 年 5 月，布加勒斯特条约对多布罗加北部作了调整，保加利亚一直深信，这一地区将由他们负责，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一地区由德国、希腊、保加利亚共同管理。腊多斯拉沃夫表示保加利亚更多的是被作为一个战败国的敌人而不是战胜国的盟友对待，1918 年 6 月 20 日，腊多斯拉沃夫辞职。 143

民主党领导人马里诺夫组成新一届政府，他希望斯塔姆博利斯基能参加这届政府，但后者表示只有结束战争，他才会上任，斐迪南是绝不会同意这一要求的。另外马里诺夫全力从盟国争取独占北多布罗加，但这是虚假的胜利。保加利亚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已经耗尽；套用演讲中一句过于文绉绉的话，保加利亚已没有战争胃口了。

保加利亚民众特别是城镇居民处在饥饿的边缘，据报道，在马其顿的奥赫里德和其他城市，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了生命。前线的士兵遭受食物、衣服的短缺、营养不良等问题，他们休假回家或帮助收割，发现家人生活的并不好甚至比以前更糟。他们的精神崩溃了，当英法军队在 9 月 15 日发起进攻时，他们放弃了抵抗。一周内英法军队进入保加利亚，政府请求和平并于 1918 年 9 月 29 日在萨洛尼卡签订停战协定。

协约国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的当天，斯塔姆博利斯基被释放。保加利亚政府希望他阻止以索非亚和前进的协约国军队之间的拉多米尔（Radomir）为中心的军事叛乱。这样做已经没有必要了。签订停战协定后，士兵实现了他们的基本要求——和平，原以为成功的反叛失败了。可以这样说，斐迪南半个多世纪的个人统治再次将这个国家拖入羞辱的战败国境地，他于 1918 年 10 月 3 日退位，然后离开了这个国家。继任沙皇的是他的儿子鲍里斯三世。

第七章　保加利亚的 1918—1944

一、1919 年和平协议

144

协约国对保加利亚的和平协议于 1919 年 11 月 27 日在塞纳河畔纳伊（Neuilly-sur-Seine）签订。协议要求保加利亚归还其在近期的冲突中所占领的土地，同时也包括其西部边境上的 3 块小区域，条约无视这三个区域绝大多数当地居民是保加利亚人的事实。保加利亚同时还失去了其在巴尔干战争中所获得的在色雷斯地区的土地。尽管纳伊和约第 48 款对保加利亚在爱琴海的“经济通道”提供担保，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保加利亚损失的一种补偿。但事实上和约并没有具体指出这条经济通道应如何实现。在和平时期它从来不存在。纳伊和约规定保加利亚陆军人数限制在两万人以内，且其成员都必须是志愿者。保加利亚以实物和现金两种方式对协约国进行赔偿。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府强迫保加利亚交付煤炭、家畜和铁路设备。与此同时，协约国要求保加利亚在未来 37 年内向其交付 22.5 亿金法郎的赔款。这样一个赔偿数额是荒谬的，不久协约国也承认了这点。1923 年赔款被减至 5.5 亿金法郎，需在未来 60 年内还清。到了 1932 年，赔款则被完全取消。

同匈牙利、德国和奥地利相比，和约在领土部分的规定对保加利

亚而言并不是那么苛刻。和约使保加利亚丧失了不到九千平方千米的土地，九万多保加利亚人发现自己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居住在国外的保加利亚人总数约为一百万，约占保加利亚人口总数的 16%。和平协定的间接影响也损害了保加利亚。和约将马其顿地区重新划给塞尔维亚和希腊的规定造成了另一波的难民潮。其中许多难民生活在保加利亚西南边境上，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保加利亚为维持这些人的生活给国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45

二、农民联盟执政时期（1919—1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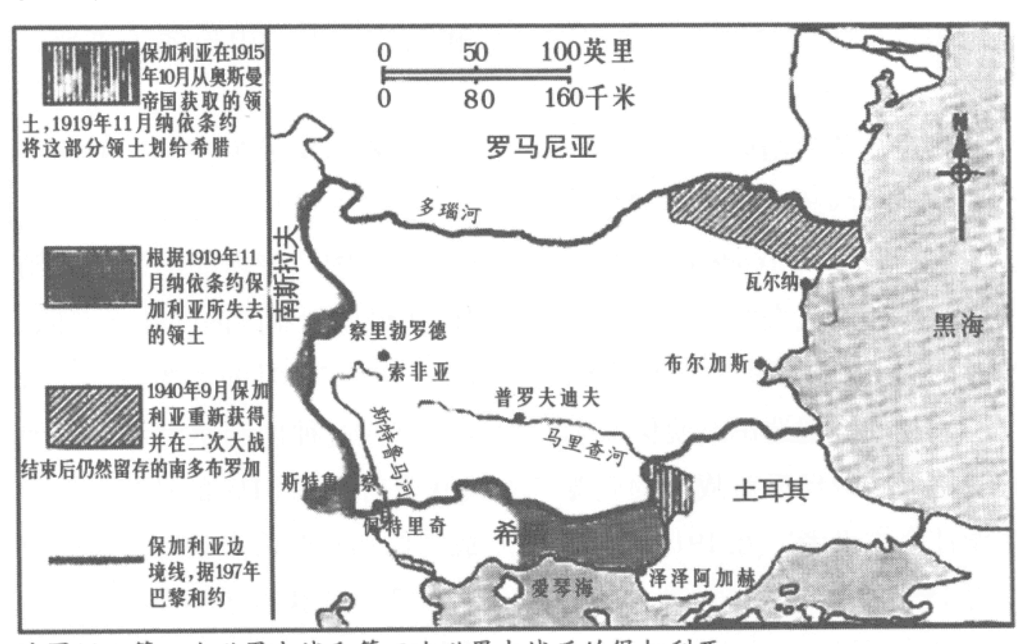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国内势力包括了农民联盟（Agrarian）、共产主义者、议会旧党（the old sûbranie parties）、马其顿组织、军队以及国王，他们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随着战争的结束，农民联盟和共产主义者迅速成为保加利亚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战争结束时，由人民自由党的特奥德尔·托多罗夫（Teodor Teodorov）组织了一个临时内阁。该内阁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协约国代表的监视。此时协约国已在保加利亚国内驻扎了军队。临时内阁主要职责是保持国内的稳定直至 1919 年 8 月的大选。

大量的登记选民对使保加利亚卷入战争的这种体制感到愤怒，他们支持那些曾经反对战争的政党。农民联盟得到了 31% 的选票。"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在 1919 年 5 月改组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 18% 的选票。作为最大的左翼旧党，民主党获得了 10% 的选票。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与民主党人组成了联合政府，但他起初是想和共产主义者一起合作，而对方却对此嗤之以鼻。保共不打算和任何其他人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他们想要并且相信他们可以独自掌权。农民联盟拥有和保共一样的雄心壮志和自信。

保共和农民联盟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为了填补旧的党派崩溃后所造成的真空。两者对抗的公开化是在 1919—1920 的新年之交。保共对自己充满信心。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保共的支持率持

续上升，尤其得到工会组织的支持。保共于 12 月 24 日与社会民主党即先前的“广泛派社会主义者”一起在索菲亚举行一天的抗议活动。147 这是自 1903 年这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分裂以来首次合作，两派在运输和邮电工人罢工时期继续开展合作。两天后，进行了一场总罢工。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罢工领袖被当局逮捕，他们家人的定量供应卡（ration cards）被收回，其中一些罢工领袖的家人还被驱除出家门。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动用军队、协约国的驻军、警察以及橙衫军（Orange Guard）用以加强其措施。橙衫军携带棍棒，由农民联盟最近组建，用以对抗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建立的半武装组织。1920 年 1 月 5 日，大罢工结束。但在佩尔尼克，运输工人和矿工将斗争又持续进行了 6 个星期。



地图11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保加利亚

在镇压了共产主义者的街头运动之后，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于 1920 年 3 月 28 日在全国举行大选，他想借此证明民众对其胜利的支持。然而选举结果并非如其所料。农民联盟获得了 1/3 的选票，保共获得了 1/5 的选票。农民联盟在议会中获得了 110 个席，保共则获得了 51 个席位。斯塔姆博利伊斯基还需要 9 个席位才能成为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派，因此他宣布 13 位反对党的代表当选无效，在这其中有 9 个席位是共产党的，他们的席位被农民联盟的代表取代。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利用议会旧党所惯用的方法来获取他在议会中多数的地位，而这种方法却是他以往极其鄙视的。

农民联盟现在有条件将其思想付诸实现，用英国记者、保加利亚的好朋友詹姆斯·布歇尔（James Bourchier）的话说就是："将其城镇中的政治同伙、官场上谋求一席之地的人以及宫廷中寄生虫们的权力移交给勤劳、诚恳的保加利亚农民。"农民联盟的计划是想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足够而非过多的土地，整洁的现代化农庄将在这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其设想的农庄拥有硬质路面的街道、纯净的自来水、完善的医疗体系、优良的学校以及数量充足的图书馆和电影院。自耕农将得到合作社的帮助，合作社向他们提供贷款、储存粮食和寻找市场。合作社将会引导农民的所有权融入他们不适应的商业化、资本化的农业之中。这一计划在 1918 年的时候还尚未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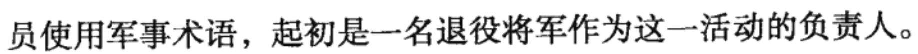
148

尽管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但其行动还是受到了限制。赔款事宜将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财政收入将不得不用来偿付对协约国的赔款，政府还必须征收耕畜作为赔偿交付邻国。这损害了生产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与此同时，协约国对这样一个激进的政府还是心存疑虑。1921 年 9 月，协约国进行了干涉，坚持解散一家保加利亚政府的粮食采购集团，它限制了商人们的经营范围，那就更不用说要限制他们的利润了。

这家粮食集团一直打算限制这样的利润，这是农民联盟打击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寄生虫的一部分。律师是首先打击的对象。他们被剥夺了进入国家议会或地方议会的权利，并禁止在重要的公共部门工作。农民联盟同时也新建了一些低级法庭用以处理一些诸如地界争端事宜的案件。在这些法庭中，农民需在法官被平民百姓选出之前提交自己的案件。农民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国王的委任权，并且要求银行对信用社提供资金上的帮助。然而，农民联盟的最主要目标是重新分配土地。

1920年6月，一项关于成立国家土地基金的议案获得议会通过。通过国家土地基金可以购得超过法定限量的地产。所有的保加利亚公民都允许拥有4公顷不可转让的土地，在外业主（absentee owners）的土地拥有者将失去这一数量之上的土地。那些在自己土地上劳作的人可以在适合耕种的地区获得最多30公顷的土地以及在林区更多些的土地。除此之外，还有5公顷土地留给第5个和未来的家庭成员。对于那些失去土地的人，政府则以公债的形式予以补偿。但公债的支付价格按比例相应增减，当土地数量增加时，每公顷的单价就会下降。1921年4月，第二个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该法案对腐败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因为腐败使一些土地的拥有者不受前一个法案的制约。1921年的法案同时规定修道院的土地受该法案约束，这使得小土地所有者（dwarf-holders）和少数没有土地的农民能够更容易地购置较多的土地。农民联盟曾希望重新分配超过25万公顷的土地，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重新分配土地的过程十分缓慢，且腐败现象依旧公开存在，150 最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地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公共机构控制的土地（institutional owners）则更加难以对付。至1923年6月，仅有82 000公顷土地易手。1926年，国家拥有的土地仅有1%是因重新分配而获得。另一方面，在农民联盟政府垮台之后，几乎所有农民联盟执政时期通过的土地立法都依然有效，包括最多持有土地的原则在内。但关于最高财产限制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城市地区，此外，法律规定：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两间屋子和一间厨房，较大些的家庭可以拥有额外的屋子。这一法规因限制了办公场所而被废除。

农民联盟下台后延续下来的另一个主要法案是1920年6月提出的强制劳动法。法案要求所有20至40岁之间的男性服满为期8个月的劳役。与此同时，16至30岁的未婚女性则要服满为期4个月的劳役。这些劳动通常是些公共工作，譬如修公路或者建学校。在1921年10月之前，人们还不能通过赎买的方式来免除自己的劳役。强制劳动的举措无疑使国家受益，但同时，此举也引起了以协约国为主的一些其他国家的怀疑。尤其是因为保加利亚沿着军事线路组织劳动，行政人



员使用军事术语，起初是一名退役将军作为这一活动的负责人。

插图 28　保加利亚的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和他的父亲。

农民联盟政府采取了许多其他的改革措施。提出累进所得税法案。在通过国家土地基金购置更多土地之前，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必须将分散的小块土地合在一起。中等教育实行义务制，职业培训的内容相应增加，并且大规模的教学楼建设计划将产生 1 100 多所新学校。与此同时，教育界也开始清除共产主义者。

在外交方面，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继续执行其战前的政策，对领土扩张缺乏兴趣。这一政策是协约国乐意看到的，因为事实上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确实与列宁的革命政权保持距离。1920 年，在斯塔姆博利伊斯基访问欧洲各国首都之后，保加利亚成为第一个进入国际联盟的战败国。

151

同样使协约国对保加利亚感到高兴的是农民联盟的领袖希望改善和西方邻国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由马其顿组织制造出来的。这些组织已经分裂，但其中的一支，从 1923 年 10 月起由伊万·米哈伊洛夫（Ivan Mihailov）担任领导，已经在佩特里奇（Petrich）地区靠近保加利亚、希腊和南斯拉夫边境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米哈伊洛夫主义分子以该地区为基地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地区进行抢掠。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对这种不妥协的想法无能为力，但他确实试图清洗同情马其顿人的边界警察。1922 年 11 月，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终于被邀请访问贝尔格莱德，他在贝尔格莱德强烈谴责了马其顿极端主义者。1923 年 3 月，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签署了尼什协议。根据该协议，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同意在打击上述极端主义者的问题上采取合作。同年 4 月，保加利亚政府取缔了所有被怀疑有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关闭了他们的报纸并将他们的领导人关进了拘留营。

马其顿人对此自然十分愤怒。但他们并不是唯一对农民联盟统治感到不满的人。整个国家都深受腐败之害，腐败虽然是保加利亚人生活中的一个特色，但在农民联盟统治下，腐败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特别是由农民联盟委任的管理乡村的不太重要的低级官员。不过，主要是在城市，能最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痛恨。

1923年，列弗的价值仅为1919年时的1/7。工人阶级无法逃避通货膨胀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再加上1919—1920年间政府对罢工运动所采取的强硬措施和其他一些限制共产主义活动的举措使工人对政府的怨恨增加。在城镇里，限制个人和商业用房的法律法规使较为富裕的城镇居民大为不满。在专业人员中，律师的不满有明确的理由，但并不单单是他们怀有怨恨或心存恐惧。农民联盟要强迫很多医生去偏远的农村工作的讲话使医生们惶恐不安。教师们对在他们这一阶层内所采取的针对共产主义的行动感到不满，更愤恨于所有教师要进行定期改选这样的规定。大学对政府干涉大学自治是如此不满，以致于在1922年举行总罢课。甚至连科学院都对政府也感到不满，尤其是因为教育部长的固执，最后没有实现革新字母表的愿望。教会的情况也是这样，怨声四起。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将宗教内容削减，教会的财产也受到土地重组法案的影响。圣议会也被迁至里拉，其在索菲亚的总部转成农学院。职业公务员队伍与此同时也因农民联盟政府的喜好而被搅乱，政府绕过正式的、国家的渠道，通过农民联盟的组织来进行工作。而这些组织则逐渐成为腐败的同义词。拿橙衫军来说，他们取代了警察的一些职能。是农民联盟的地方组织农民之友（the druzhbi）而不是地方政府被告知起草土地改革方案的细节。与农村和城镇议会相比，农民之友在教师定期改选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152

在城镇中，对执政者极为不满的是那些因为纳伊协约而退伍的军官。他们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地位、职业和生计。他们理解，要修改和约，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可以操作的空间很小，几乎做不了什么，他们感到不满的是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对军人职业那种显而易见的轻蔑态度。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甚至不愿将陆军维持在协约限定的20 000人的水平上。他们更不喜欢橙衫军在国家事务中日益增加的作用，而不是限于纯粹的党内事务。1922年，一群对政府不满的军官成立了军事联盟（Military League）。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时候，保加利亚还有另一支武装力量。30 000多名难民因俄国内战而在弗兰格尔将军（General Wrangel）的带领下进入保加利亚，他们携有一定数量的重武器。1922

年5月，斯塔姆博利伊斯基解散了这一组织。此举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欢迎，但与此同时，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又制造了另一个对其不满的群体。

一些旧的政治党派同样对执政者感到恐惧和不满。他们成立了一个选举联盟：宪政同盟（the Constitutional Bloc）。其中一些政党领袖成立了一个更小、联系更为紧密的组织：国家联盟（the National Alliance）。他们担心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打算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共和国。1922年末，国家联盟计划举行一系列的示威游行活动，向索菲亚进军则会将这一活动推向高潮，但这一计划被政府强行取消了。政府的这一行动使那些旧党派的担忧有了充分的理由。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取消了议会议员的比例限制，并在1923年4月再次举行大选，在此次选举中，农民联盟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议会中的212个席位，保共仅获16席，宪政同盟则为15席。这进一步增加了旧党派的担忧。

153

此次选举之后，来自佩特里奇的一些米哈伊洛夫主义分子与国家联盟、军事联盟甚至一些社会民主党分子一起达成了一项密谋。这些密谋者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国王，并且他们正确地估计到共产党人不会采取行动。1923年6月9日凌晨，政变者开始行动。短短几小时内，农民联盟的政权就被推翻。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则在6月14日被发现，并被抓捕他的马其顿组织残忍地折磨致死。以经济学家亚历山大·灿可夫为总理的新政府宣告成立。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1923年6月的政变中保持中立，他们的这一行为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批评，并要求他们采取措施以挽回声誉。而这又导致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1923年9月发动了一场以失败告终的起义。灿可夫政府镇压了这场起义，并以此为借口对个人权利和政治自由做了更多的限制。

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农民联盟和保共这两个保政坛昔日最主要的党派便陷于瘫痪。事实上，这使得左翼在表面看来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三、民主联盟执政时期（1923—1931）

在夺取政权之后，为确保在议会中得到可靠的支持，灿可夫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民主联盟其实是国家联盟、军事联盟、米哈伊洛夫主义分子和混杂了民主党、民族党中的一些派系而形成的一个同盟。

起初灿可夫的统治还很牢固，各方试图达成共识。1923 年 11 月，一项关于国土防卫的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一法案再次禁止恐怖活动，并赋予政府很多权利，这些权利足以对该月举行的大选产生影响。根据该法案，保共也于 1924 年 4 月被政府取缔。保共的财产被没收，其所属的工会也被解散。1925 年 3 月，8 名在 1923 年 11 月议会选举中当选的保共议员也根据该法案被剥夺了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与此同时，新政府对农民联盟执政时制定的法律法规绝大部分予以保留，并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执政时期便已通过的土改计划继续下去。 154

和解的所有假象在 1925 年结束。4 月 16 日，国王和当局官员都参与的一场国葬[①]在索菲亚圣内德里娅（Sveta Nedelya）大教堂举行，共产主义者安置在教堂顶部的炸弹爆炸，220 人在这次灾难中死亡，奇怪的是其中没有知名人物。爆炸事件引起了当局的强烈反应。政府颁布了戒严令，数千名左翼分子被拘留。很多被拘留者神秘失踪，有传闻说他们被扔进了索菲亚警察总部的火炉之中。其他被拘留者的命运则较为明了：他们被当局公开处以死刑。

并非只有保共和政府会使用暴力手段。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出现进一步的分裂，其中的一个小派别主张与共产主义者展开合作。这导致了长期的争斗，随后在索菲亚和其他地区发生暗杀事件。与此同时，米哈伊洛夫主义分子仍旧占据着佩特里奇这块飞地，并继续对塞尔维亚和希腊进行游击战。1925 年 10 月，米哈

① 葬礼是为“军事联盟”的创始人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夫将军举行，他于 1925 年 4 月 15 日被保共暗杀。——译者注

伊洛夫分子对希腊进行了一次突袭之后，希腊军队进入到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后希腊军队撤出了该地区，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这是国联取得的一次显著地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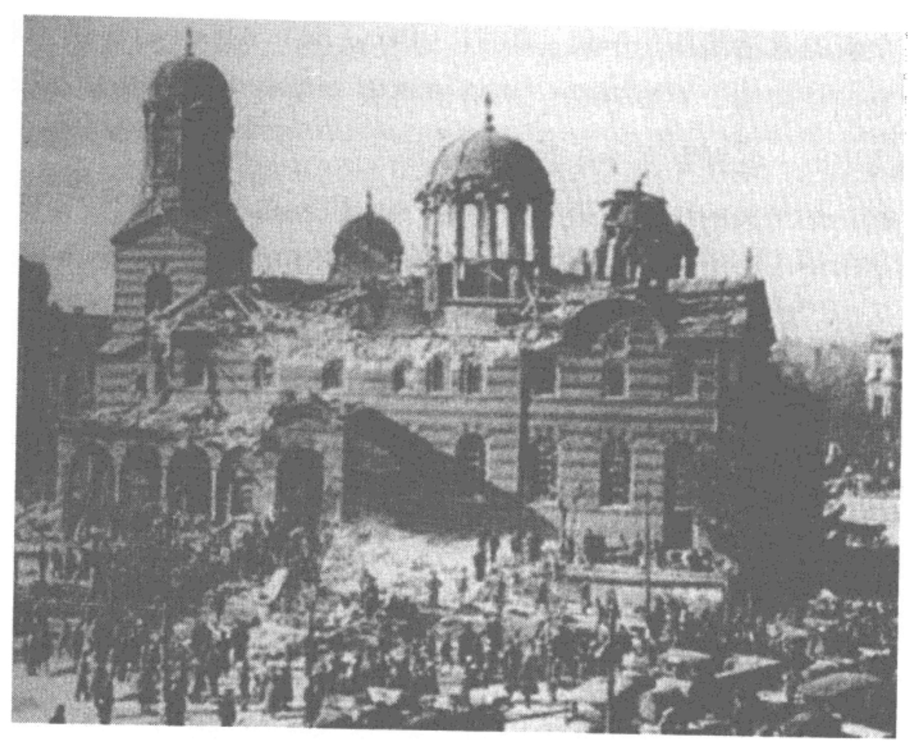


插图29　1925年4月16日，共产主义者引爆炸弹后的索非亚圣内德里娅大教堂。

尽管从国联获得帮助，但灿可夫任其发生的国内过度的暴行，使保加利亚逐步沦为遭国际社会遗弃的国家。国王向军队最主要的军官建议，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但此时国王的政治地位还很脆弱，他的话无关轻重。国际银行家反倒更有影响力。到1925年，保加利亚迫切地需要国外贷款。他们提出了一个精明的提议，呼吁国际社会对一项社会福利计划予以帮助，这一计划针对那些成千上万的马其顿难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生活极其贫困。保加利亚政府认为，这些难民的存在，使共产主义者和马其顿极端主义者能招募到大量的新人。给予这些难民社会福利保障，尤其是给予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则是阻止这一现象继续发生的最佳选择。国联也被说动，而在伦敦，筹集了大量资金但

有疑虑。形势变得明了起来，灿可夫政府将永远不会得到这样的贷款。1926 年 1 月，灿可夫辞职。民主党领袖、马其顿人安德列·利亚普切夫（Andrei Lyapchev）从其手中接过首相一职。这一变动使得保加利亚获得了贷款，650 多个村社（village commune）利用从这笔贷款中获得的资金向马其顿难民提供土地。 155

利亚普切夫放宽了灿可夫强制施行的许多限制令。工会被允许重新运作，1927 年保共进行了改组，更名为保加利亚工人党（BWP），不久又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和一些青年组织。马其顿人则被允许继续他们的破坏活动。

到 1926 年，灿可夫主义的恐怖告一段落，保加利亚左翼势力被消灭。除一些米哈伊洛夫主义分子外，保右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稳健的中间派因此而掌权。但他们的表现却无法令人满意。利亚普切夫政府没有推出什么重大的立法项目，他们找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这适用于几乎整个保加利亚政治舞台。农民联盟丧失了政权和支配他们的领袖，整个政党变得支离破碎，按照后人的说法，农民联盟不是分裂成左右翼而是分裂成羽毛。甚至连以团结和守纪律而闻名的共产主义者们也出现了分裂的痕迹。保共的一个右翼派别以《光辉》(*Ray*）杂志为阵地，主张和其他党派进行合作，这一建议遭到了“左翼联盟”（left sectarians）的强烈反对。左翼联盟在 1929 年获得了工人党的领导权。议会旧党派的分裂似乎更为严重。1926 年，在议会中就有 19 个相对独立的旧党派系，到了 1934 年，这一数目扩大到 29 个。为阻止这一倾向的继续蔓延，利亚普切夫采取了一些措施。他引进了一种意大利式的奖励机制，根据这一机制，在选举中得到多数选票的派别将自动获得议会中多数党的地位。这一机制被用于 1927 年的选举之中，民主联盟取得了这次选举的胜利，但其在议会拥有的多数有所减少。 156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的几年里，要求进行激进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环节联盟（Zveno，意为环节）便是持此主张的组织之一。该组织成立于 1930 年，成员较少，与环节联盟那个名称的报

纸关系密切。该组织的成员均为知识分子或自称为精英的人士。他们同样也是国家社会主义者，鼓吹中央集权和合理化管理。与此同时，他们是极权主义者，认为政党是国家诸多弊病的罪魁祸首，并且认为现在的这一体制使政治家们将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外交上，他们主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因而对马其顿组织怀有敌意。并且他们得到一批具有共和思想的军官们和军事联盟的支持。

但环节联盟的时刻尚未到来。当1931年6月举行大选时，选民一心想着因世界经济危机而加剧的保加利亚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一次公开的选举，比例代表制（PR）被重新引入。人民集团（People's Bloc）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他们获得了47%的选票和150个议会席位。与之相比，民主联盟仅获得了31%的选票和议会中的78席。民主联盟失去了政权，并因此而分崩离析。灿可夫脱离该组织，创建了自称为法西斯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人民集团是由民族党（Nationalist）、激进派（Radical）、民族解放党（National Liberal Parties）的一些派系，连同农民联盟的一个派系组成。这是自1923年农民联盟下台以来首个旗下派别重返政府。新政府的首相是民主党的领袖亚历山大·马林诺夫（Aleksandûr Malinov）。但同年10月，由于身体原因，马林诺夫不得不将权利交给其本党同僚尼古拉·穆沙诺夫（Nikola Mushanov）。

157

尽管进入内阁的只是农民联盟的一支派系，但农民还是怀有改善他们境遇的希望，然而不久这一希望便宣告破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保政府必须克服大危机中最严重的部分。在1929年至1934年的这5年中，农民的收入下降了50%。城市失业率上升，即便是那些有工作的幸运者，他们的实际工资也比以前下降了将近1/3。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次危机。债务被削减了40%，偿还时间被延长。创建于1930年的食品出口公司（Hranoiznos）为政府的食品采购机构，鼓励农民种植多种作物，特别是像水果和蔬菜这样的出口价格较高的作物。但除了这些努力之外，人民集团的部长们并没有赢得公众的好感。当农民遭遇

前所未有困难时，部长们忙于用各种怪诞的方式让自己发财，伴随着的是最不体面的关于官职分肥的争吵，农民联盟和其他人也基本一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1 年 11 月的地方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并在 1932 年 2 月控制了索菲亚的市议会。政府等了一年后解散了这届议会。另一个因经济危机而受益的是灿可夫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此时期，该组织的支持者日益增加，特别是在城镇里的年轻人中。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还需面对诸多外交难题。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所召开的一系列巴尔干会议在半岛联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这是因为保加利亚拒绝承认现有的边界是永久的，而这是其他国家坚持的一个先决条件，假如保加利亚要成为任何协定的一方。因此，1934 年 2 月，当巴尔干公约（Balkan entente）在雅典签署时，保加利亚没有加入这一组织。该组织包括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不祥地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的敌对同盟相似。保加利亚的对外关系则因为米哈伊洛夫分子更为极端的言论而变得更为复杂。1933 年 6 月，米哈伊洛夫本人号召向索菲亚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发动进攻，并称其为“毒蛇的老巢”。同年 7 月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侵略国家的定义包括支持或不能镇压在其境内从事对它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团体。基于这样一种描述，保加利亚被贴上了侵略性国家的标签。而且由于孤立，保加利亚处于极为脆弱的位置之上。　158

到了 1934 年的春季，国外和国际社会的紧张气氛上升。灿可夫呼吁人民在 5 月 21 号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他非常有信心地预计将有 5 万多人参加。集会在时间上恰好与赫尔曼·戈林对保加利亚进行的私人访问相合。似乎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限制马其顿组织或者法西斯分子。残留下来的农民联盟四分五裂，共产党被镇压，旧党势力衰弱，环节联盟则是说的多而做的少，只剩下了军队和国王。

1934 年 5 月 19 日，军队开始干涉政治。他们利用部长们对谁应该拥有内阁办公室的争论，让与军事联盟关系密切的亲环节联盟官员掌握权力。达米扬·维尔切夫（Damyan Velchev）上校精心策划了这

次政变，但他却没有选择去当总理，其共谋者基蒙·格奥尔基耶夫（Kimon Georgiev）上校成为新的总理。

四、秘密军人同盟执政时期（1934.5—1935.1）

"秘密军人同盟"①（devetnaiseti）就像维尔切夫集团那样逐渐为人们所了解，虽说统治的时间极短，但该组织却富有活力，并与环节联盟的思想相一致。

他们终止了公民权，并且成立了一个主管社会重建的理事会。这一机构对出版社、其他公共机构、艺术界和青年组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机构的宗旨是："使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走向统一和重建。"其在促进文化统一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方法是将土耳其语的地名改为保加利亚语，在这一时期地名的变化比战前其他时期要多出很多。党的政治分野将不复存在，政党本身已被解散。很多工会组织的命运也是如此，此外，保留下来的所有行政官员由中央政府批准。当局还打算成立一个大的工会组织——保加利亚工人联盟，而其继任政权则制定这一计划并组建了这一组织。尽管保加利亚工人联盟在理论上是个自愿的组织，但到 1936 年，该组织已拥有全国 14.5 万工人中的 12 万。该组织的成员以社会阶层而非职业种类划分。"秘密军人同盟"仿照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做法，将社会分为 7 个阶层：工人、农民、工匠、商人、知识分子、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社会阶层的划分同样为新的议会成员中 3/4 的选举提供基础，现议会则已被解散。

环节联盟是合理化和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这些主张同时也是"秘密军人同盟"计划中的特色。中央政府中部长的数量被削减，公务员的数量也被削减。有 1/3 的公务员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中许多人的职位被政治上更为可靠的人所取代。经过一系列的改革，

159

① 1933 年，一些抱有亲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和技术主义观点的保加利亚青年军官决定成立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叫做"秘密军人同盟"，以取代已经官僚化、腐败化的旧军官同盟。

银行也走向合理化和集中化，19 家商业银行也因此并入保加利亚信贷银行。改革的目的是将地方银行置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度得到空前的加强，这是自 1878 年保加利亚独立以来所没有的。原有的 16 个省被缩减为 7 个，2 600 个原有的村社被合并至 837 个。那些经选举而上台的市长被中央政府指定的人所取代，这些人必须经过合法的训练，或者拥有与军队中相应军衔对应的公务员级别。新的地方议会一半是指定的，另一半则是选举出来的，而有资格参加选举的则仅限于那 7 个社会阶层。

自从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倒台之后，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便倾向于将意大利视为乐于向诸如保加利亚这样的小国提供帮助的大国。“秘密军人同盟”则希望摆脱这一联系。1934 年 7 月，他们承认苏联，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与南斯拉夫达成和解。这样可以缓解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可因此改善与英、法的关系。改善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关系的最大障碍自然是佩特里奇地区米哈伊洛夫分子所掌握的那块飞地。“秘密军人同盟”对此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动用了军队。事实证明这一行动令人吃惊地轻松，并非常受欢迎，该地区的米哈伊洛夫分子被驱散。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不像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以来那样，成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此外，马其顿组织各派别的争斗也因此大大减少。这样的争斗在 1934 年以前夺走了 800 多人的生命。

160

“秘密军人同盟”被证明是有效率的阴谋家和精力充沛的统治者，但他们却不是专业的政治家。在建立一个大的政党组织借以维持政权的问题上，环节联盟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一派担心此举将会使政党体系起死回生。更为重要的是，在有关国王的问题上，环节联盟和军事联盟没有达成共识，这一问题造成了环节联盟与军事联盟的分裂。维尔切夫是公认的共和派，当时有传闻说他要颁布新的宪法，那将大大削减国王的权力。

当时维尔切夫和格奥尔基耶夫正忙于政府的全盘改革计划，并

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政治安全。他们因此相对容易地成为阴谋的牺牲品，1935年1月，他们的对手保皇派用策略将他们赶下台，潘仇·兹拉特夫（Pencho Zlatev）将军成为新的总理。同年4月，保皇派将兹拉特夫免职，并将文官安德列·托舍夫（Andrei Toshev）扶上总理的宝座。

五、鲍里斯国王亲政时期（1934—1941）

国王对军队在1934年介入政治领域十分愤怒，并且他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不再让军队领导这个国家。但如果国王想确立自己的最高权威，那他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搭建起和国家联系的桥梁，并且国王还必须确保自己能安全地面对军队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在1935年4月任命托舍夫为总理时，鲍里斯发布了一则声明，他在声明中向人民承诺：将使国家重回“秩序和平静的生活”之中。他又提到，国家不会走回头路，虽然主管社会重建的理事会被取消，但1934年5月以来所实施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却保留了下来。托舍夫现在的任务是控制军队、颁布一部新宪法和发起一场新的受欢迎的运动。但他在这3个方面均毫无成果。同年11月，托舍夫辞去总理职务。随后，当局发现维尔切夫已悄然潜回国内，可以设想，他有阴谋推翻国王的意图。托舍夫的继任者是格奥尔基·基奥塞瓦诺夫（Georgi Kioseivanov），他是一位外交官，对国王惟命是从。

维尔切夫的阴谋使国王对军队的控制相对容易了些。维尔切夫本人受审，1936年2月被当局判处死刑，但随后他的死刑便被国王的特权所赦免，而这一特权正是其在执政时想要废除的。同年3月，鲍里斯利用审判维尔切夫时所透露的一些事实来为其解散军事联盟的行为辩护。此后不久，鲍里斯视察了国内那些最为重要的警卫部队，他想借此来树立其在军官团中的威望。

161 在1935年鲍里斯的声明中，他承诺在新宪法下恢复立宪政体。新宪法将与“现在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和时代的要求”相适应。这一复杂局面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左翼政党的潜在威胁。共产党在1931年和

1932 年的地方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对他们起到了激励作用。在 1933 年，他们在国外流亡的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成为戈林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中的一个受害者，在莱比锡受到审判。1935 年，共产国际改变了对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战略，要求共产党做好和其他党派合作的准备。1936 年，共产党在国际劳动节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并夸口他们在全国的每处军营中都有自己的基层组织。来自普罗夫迪夫的军官们公然支持一直进行罢工的与共产党有传统联系的烟草工人，使得这一惊人的声明变得可信。与此同时，在 1936 年 1 月希腊举行的选举中，一个小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雅典议会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右翼的担忧也没有完全消失。灿可夫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被列为政党，因此它得以以这样的身份逃脱禁令生存下来。在 1936 年该组织的代表大会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更改了其章程，使其更像一个法西斯组织，民众对该组织的支持也因为希特勒在德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新的胜利而不断增长。和绝大多数保加利亚人一样，纳粹党也想修改 1919 年的和约。

162

旧党派虽然也被当局取缔，他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36 年 5 月，旧党派中的一些人组建了“五人团”（Petorka），要求回到图尔诺沃宪法。不久，这一组织又更名为人民宪法集团（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Bloc），这一组织还包括了一些民主党人，农民联盟的一个激进派别和一些共产主义者。

1936 年初，鲍里斯感觉到了一些潜在的威胁，因此他并不急于进行宪法改革。鲍里斯不想让保加利亚的政治体制再回到过去那一模式，并且他认为他将很难与那些老一代的政治家相处。国王决定保加利亚将向“一个整齐的、守纪律的并且充满社会团结的民主”缓慢前进，宪法将会逐步地进行修订，而且任何改变必须在召开新议会之前首先在地方选举上进行试验，新议会定于 1937 年召开。在一些改革措施颁布之后，地方选举在 1937 年 1 月举行。在投票之前，所有的选民都必须签署一份声明，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分子。投票在 3 个星期天里举行，当局派遣警察进入每一个村落，他们认为这是极其必要的措



插图30 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1918—1943），玛利亚·路易丝公主，西美昂王太子和乔安娜（Giovanna）王后。

施。已婚妇女和寡妇如果愿意可以进行投票，这是她们第一次获得这种权利。男性则必须去投票。在农村地区，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才有

资格投票。而在城市地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有资格投票。对于地方选举政府并不满意，这一情况持续到 1938 年 3 月的全国大选。在那以前，进一步的改革将议会的席位削减至 160 个，并且为了建立单一选区制度而取消了代表比例制。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人民宪法集团还是设法获得了 60 多个席位，虽然 5 名共产党和 6 名农民联盟被驱逐出了议会。然而即便如此议会对政府也并非完全地顺服。1939 年年末，基奥塞瓦诺夫解散了议会，并于 1939 年 12 月和 1940 年 1 月进行了新的选举。在选举之前，政府将更多的约束措施强加于反对党身上，164 特别是他们在选举期间举办活动的自由予以限制。由于这些措施，政府所获得的选票大幅上升。尽管赢得了议会中的多数，但基奥塞瓦诺夫还是被解职，伯格丹·菲洛夫（Bogdan Filov）接替了他的职务。

菲洛夫是公开承认自己是亲德的，他的任命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保加利亚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是外交事务而不是内部事务。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下台后，保加利亚企图经国联通过“和平修正”来修改纳伊条约，而意大利则是保加利亚在国联的保护人。保加利亚的首个目标便是实施纳伊条约的第 48 条款：给予保加利亚在爱琴海的经济出口。1930 年意大利公主嫁给鲍里斯象征着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友好关系，但在其他领域，依靠意大利并没给保加利亚带来什么好处。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意大利开始逐渐抛弃保加利亚。与此同时，国联的作用日益下降，纳粹在德国上台后这一情况尤为明显。在那一时期，保加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们寄希望于南斯拉夫，他们想避免被孤立。然而由于马其顿组织依旧活动于佩特里奇的那一块飞地，这一想法也难以取得多少成效。佩特里奇飞地问题被“秘密军人同盟”解决了，鲍里斯和他的顾问们迫切希望继续保持和其西部邻国之间日益友好的关系。1936 年，基奥塞瓦诺夫禁止了一切以要求解除纳伊条约为口号的示威游行，其想借此向贝尔格莱德表达善意。1937 年 1 月，保加利亚的善意得到了南斯拉夫的回应，两国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这一条约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但这却使得保加利亚获得了南斯拉

夫在外交上的支持。1938 年 7 月，萨洛尼卡协定允许希腊重新武装色雷斯地区，保加利亚则不顾纳伊条约中有关军队限制的条款规定进行扩军，其实保政府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

到了 1938 年，欧洲国家的外交都围绕着德国的重新崛起而进行。1938 年 9 月的慕尼黑协定和同年 11 月的维也纳仲裁在事实上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安全方面所依靠的小协约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现在对保加利亚变得更为友好。但慕尼黑协定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响。在维也纳仲裁后，保加利亚成了自 1918 年战败后唯一一个没有收复失地的国家。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经常为此叫嚣，尤其是那些主张在外交政策上亲德的人。

165

鲍里斯害怕德国可能会将欧洲再次推进战争的泥潭之中，因此他并不听从那些亲德派的意见。鲍里斯认为维护保加利亚利益最好的办法是和平，然而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保加利亚则应保持中立。他曾经绝望地说道“我的军队亲德，我的夫人是意大利人，我的人民亲俄。只有我是热爱保加利亚的”。

随着 1939 年 9 月战争的到来，鲍里斯迅速宣布保加利亚保持中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也不为各方的诱惑所动。1939 年 10 月，苏联人建议鲍里斯签订一个苏—保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将支持保加利亚在多布罗加问题上的主张，然而鲍里斯却回绝了苏联人的建议。1940 年 2 月，巴尔干公约国邀请保加利亚加入该组织，鲍里斯同样予以回绝。他认为加入该组织会使保加利亚向盟国的一边倾斜。

与此同时，亲轴心派的压力也不断上升。特别是因为 1939 年 8 月苏、德两国签署的苏—德条约表明和德国亲善并不意味着会触怒苏联，这使得大部分农民感到困惑，他们对 1877—1878 年解放他们的大国仍旧很尊重。1940 年初，保加利亚与苏联签订了一个商贸协议，该协议允许苏联的图书、报纸和电影进入保加利亚市场。同年 8 月，苏联足球队多年来首次访问保加利亚，这在保加利亚国内引起公众普遍的欢迎。

1940 年 9 月，苏联和德国的合作给保加利亚带来了首次领土方面

的修正。在纳粹德国攻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法国后，斯大林要求在东部给予苏联补偿。罗马尼亚成了这一交易的牺牲品，罗马尼亚将北部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匈牙利，1940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克拉约瓦条约（the treaty of Craiova）则强迫罗马尼亚将南部多布罗加割让给保加利亚。

在获得这些利益的同时，国内的许多变化使保加利亚与德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保加利亚在制造业产品尤其是军工产品上已经严重依赖德 166 国。一个为灌输纪律和爱国思想的青年组织——保卫者成立。彼得·加布罗夫斯基（Petûr Gabrovski）是极少数公开宣布自己反犹的人之一，他在 1940 年 2 月担任了内政大臣。同年夏天，保加利亚共济会被关闭，而保加利亚的多数政治家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同年 10 月，国防法加强了这方面的举措以及另一些针对共产党的行动。早些年前生效的反犹法案被延长。与此同时，保加利亚采取一些措施来积极备战。1940 年 5 月，义务劳动制置于军队的掌控中。一个负责动员民众的指挥部被建立起来，这个部门有权在战时对生产进行管制。同时，如果爆发战争，农业部将在征集粮食和控制价格方面取得更大的权力。

保加利亚处于强有力的战争体制中，但它不知道一旦投入战争，它将站在哪一边。在法国沦陷，克拉约瓦条约签订之后，保加利亚面对着来自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远比西方的大得多。1940 年 10 月，墨索里尼向鲍里斯提出，如果保加利亚和意大利一起进攻希腊，那么保加利亚将获得至爱琴海的一个出口，但鲍里斯拒绝了这一提议。次月，苏联又向保加利亚提出缔结一份互助友好条约的建议。这一次交易实际是将色雷斯划给保加利亚，而苏联则取得达达尼尔海峡，同时获得保加利亚在黑海的海军基地的使用权。鲍里斯知道苏联在柏林阐述这一观点时采取了不同的措辞，将保加利亚视为“苏联的安全地带”。在波罗的海各国被并入斯大林帝国之前的几个月，苏联人也使用了这样的语言。

这一情况在 1940 年 12 月发生了些变化，希特勒首次迫切地需要得到保加利亚直接的帮助。墨索里尼对希腊的进攻并不成功，而希特

勒则害怕盟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因此他决定由德国直接占领希腊。由此德国还可以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供给线进行袭扰。1940 年 12 月 8 日，大约 40 名德军参谋人员抵达索菲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保加利亚进行秘密谈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进入保加利亚，他们均为男性，短发，锃亮的长筒靴，并且这也不是适合旅游的季节。美国人对保加利亚做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劝告保加利亚人，从长远来看，英国有美国在道义和物资上的双重支持，因此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然而这是徒劳的。1941 年 2 月，保加利亚同意在多瑙河上修建浮桥。同年 3 月 2 号，保加利亚同意德国军队经过其领土进入希腊。前一天，菲洛夫前往维也纳签订保加利亚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的条约。

167

此时的保加利亚已经成为了德国的盟国，因此英国公使离开了索菲亚。直至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保加利亚才象征性地对美、英宣战。在议会批准这一声明后不久，鲍里斯便失去了踪影。几小时后他被找到，当时他在索菲亚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一个偏僻、黑暗的角落里做虔诚的祈祷。

六、保加利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4）

1941 年 4 月，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到该月月底，巴尔干地区便被轴心国瓜分。在西部，保加利亚重获其在 1918 年失去的西部土地即西部色雷斯地区，这其中包括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和索斯岛（Thassos），此外还有塞尔维亚马其顿地区，但其西部不明确的地区由意大利人控制。德国人保留对萨洛尼卡的控制，而且德国人并没有将保加利亚新获得的领土的所有权完全交给保加利亚，以免保加利亚将这些地区的财富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脱离轴心国。保加利亚人将这视为国家的再次统一，因此即使对德国人的好感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当英国人试图煽动保加利亚人反对德国人时，保加利亚未做出任何反应。

在色雷斯地区，保加利亚的占领制造了很多惨剧。1941 年 9 月，

当地的希腊人发动起义，并对保加利亚人施暴。保加利亚人为此对当地希腊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人们认为，保加利亚人试图把当地的希腊人统统赶出去。诸如此类的对抗事件在马其顿没有发生。在马其顿，起初保加利亚人受到了马其顿人热情的欢迎，他们被当做解放者来对待，当地人认为保加利亚人把他们从南斯拉夫政府的集权化和塞尔维亚化中解救出来。1941年复活节，一名保加利亚的修道院院长在斯科普里大教堂主持礼拜，保加利亚各地的民族主义者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统一的保加利亚”又再次实现了。保加利亚开始建造学校，并在斯科普里开办了马其顿的第一个高等学府——鲍里斯国王大学（King Boris University）。保加利亚教会尽其所能地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恢复或重建他们的组织，他们鼓励以前的牧师不要退休从而能继续在这些地区工作。索菲亚的东正教领袖们认为现在的民族的统一可以为所有保加利亚教会选举出一位宗主教。所有保加利亚的社区，通过各自教会的安排，都可以参与到此次宗主教的选举，无论政治上和领土上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宗主教仍旧被视为民族统一的象征。而鲍里斯国王却怕这次选举所选出的宗主教有可能成为其日后潜在的威胁，因此他和菲洛夫对此处处阻碍，圣议会未得到进行此次选举的许可，马其顿和色雷斯教区主教的选举也未得到允许。这使得那些新近加入保加利亚的地区受到打击，他们同样对传言中索菲亚任命的行政官员的冷漠感到怨恨。到了1944年，有证据表明保加利亚当局的过分集权化使得这种怨恨不断增长。

168

在保加利亚占领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后，对保加利亚的领导人们，尤其对国王鲍里斯而言，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保加利亚统治这些新领土的实质，而是保加利亚维持其行动自由的程度。这既适用于国外也适用于国内事务。

在对外事务上，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德国人在军事领域对保加利亚的要求。鲍里斯担心他的军队会被部署在巴尔干以外的地区，1941年6月德国人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后更是加剧了这一担心。鲍里斯对德国人解释道，他的军队还不够现代化，不足以打一场闪电战，并且应征

入伍的农民不愿远离家乡作战，尤其是和他们所爱的俄国人开战。他认为让保加利亚的军队留在巴尔干可以防止土耳其的进攻或者防止苏联袭击黑海沿岸。德国人对此并不反对，并同意向保加利亚提供现代化装备，保加利亚认为这些装备是为完成其有限的任务所必需的。

1941 年年底，德国人并没有拿下莫斯科，在南斯拉夫占领区开始出现一些游击战，这些使局面产生了变化。德国国防军不得不从巴尔干抽调部队来加强东线，这就使德国对保加利亚施加压力，希望保加利亚帮助德国守卫其在南斯拉夫的占领区。鲍里斯答应了德国的这一要求，并组建了一支由 3 个师组成的新军团，该军团由德国人指挥。该军团负责保卫铁路线、矿山、军火库和其他战略设施，之后该军团又被用来对付日益增长的游击战。保加利亚军队没有被部署在巴尔干之外的地区，但被用于保加利亚控制之外的地区，支持非保加利亚的政权。这是保加利亚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的质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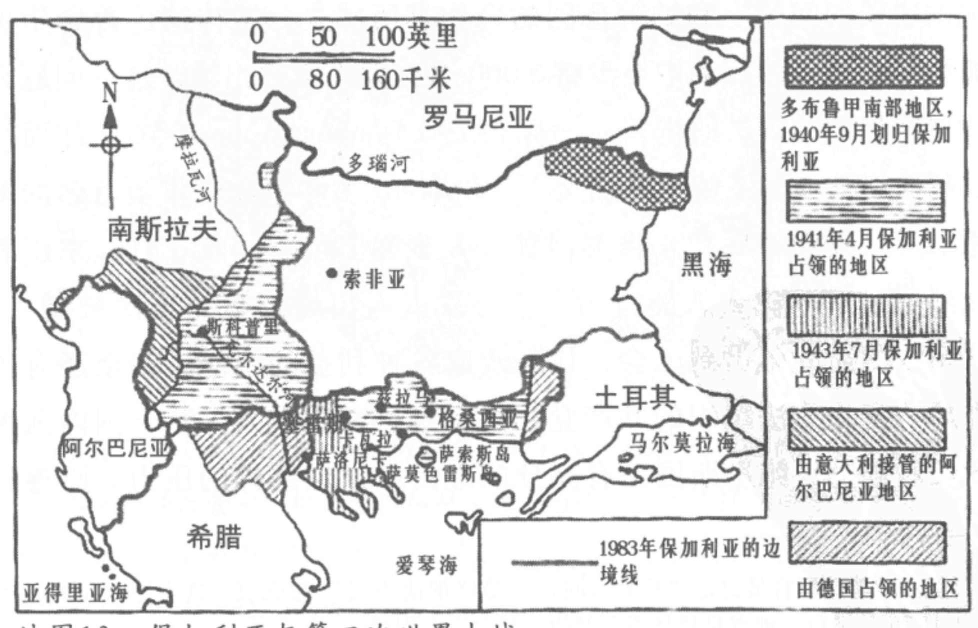
德国继续向保加利亚施压，要求其承担更多的义务。1943 年 5 月，希特勒要求保加利亚接管塞尔维亚东北部的一个区域，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德国部队投入东线。希特勒还要求保加利亚接管大部分希腊马其顿地区（Greek Macedonia）。鲍里斯对此谢绝，理由是如果保加利亚接受上述要求，那其接管萨洛尼卡的举动将会刺激到土耳其和意大利，但鲍里斯答应帮助德国人守卫塞尔维亚，因为这样可以将更多的德国军队投入东线，从而防止苏联人在保加利亚登陆，这也是鲍里斯和菲洛夫最为担心的事情即保加利亚全面卷入苏德战争。作为 5 月会谈的一个结果，保加利亚军队被部署在贝尔格莱德至萨洛尼卡的铁道线上，并将塞尔维亚北部地区和色雷斯爱琴海沿海地区的德军替换下来。同年 8 月，希特勒要求保加利亚再派出两个师守卫塞尔维亚北部地区，鲍里斯答应了希特勒的这一要求。

因为对纳粹掌控的“冬赈”（Winterhilfe）基金的自愿捐赠和提供了一辆红十字列车，鲍里斯成功地使保加利亚避开了承担任何在东线的义务。他拒绝再次征兵，不允许保加利亚的的志愿军团在东线承担义务。当德国人想要起用 15 名在德国受训的保加利亚飞行员

时，鲍里斯也只是同意让他们在北非服役，但不久鲍里斯便收回成命，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鲍里斯深信，保加利亚军队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做好与苏联作战的准备。然而这样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鲍里斯害怕到时或许会有一位凯旋而归的保加利亚将领，在德国人的默许之下将其罢黜。得到德国官员支持的右翼团体在 1942 年春季在索非亚极为活跃。到了 5 月份，鲍里斯说他从柏林得到消息，盖世太保打算成立一个以卢科夫（Lukov）将军为首的政府。因为他们认为鲍里斯国王是反德的，现在的政府是由那些庇护犹太人的共济会控制。同年 9 月，鲍里斯拒绝了卢科夫将军访问德国的请求。

171

鲍里斯对左翼恐惧如同对右翼的担心一样大。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使得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行动起来，那些被放逐的同志也重返保加利亚试图帮助国内的同志。保加利亚政府为此加大力度，在随后的 3 年里，有 1.1 万多人因被怀疑是共产党人而遭当局逮捕，他们中有 6 千多人被送往拘留营，其他人则被送往劳改营。1942 年 4 月 5 日，共产党人在保加利亚陆军第 1 团和第 6 团的密谋被破获。保加利亚迅速采取了对应的举措，他们于次日决定关闭苏联在瓦尔纳的商业代表处。



地图12　保加利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抑制共产主义威胁方面，保加利亚和德国并无分歧。但双方在保加利亚国内的犹太人问题上，无论是在观点还是在司法上都有较大的分歧。1941 年 10 月，德国驻保公使贝克勒（Beckerle）向保方施压，要求其采取更多限制保国内犹太人的措施。一些举措在 1942 年初被引入保加利亚，这其中包括向犹太人征收 20% 的财产税，保国内的犹太人必须佩带黄色星章，强制出售犹太人的商店而收益存放在受限制的银行账户中，并且解散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组织。这些举措在保国内不得人心，因而媒体被禁止马上将这些举措报道出来，而是将这些信息逐步地公开。在贝克勒不断施压之后，保加利亚议会于 1942 年 8 月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在保加利亚的占领区内剥夺犹太人的自由；这一法案使得许多犹太人失去了生命。

在万湖（Wannsee）会议[①]后，最终解决方案开始实施，来自纳粹的压力更为巨大。艾希曼（Eichmann）[②] 的代表作为德国使馆的政治助理来到索菲亚，他带来了实施下一步最终解决方案的纲要。为履行去年夏天的协议，保加利亚没有阻止 1943 年 3 月在其占领区域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保加利亚在对待其本土犹太居民的问题上和纳粹德国的合作有所减少，纳粹德国曾希望保加利亚在第一波行动中至少将 6 000 名犹太人驱逐出境。这一问题因基乌斯坦德的议员迪米特尔·佩舍夫（Dimitûr Peshev）的关注而得以解决，他向国王鲍里斯提交了一份有 40 多名执政党议员署名的请愿书。鲍里斯随后禁止将本国犹太人驱逐出境。同年 5 月，东正教强烈反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驱逐犹太人出境的行为再次被制止。从亲法西斯的议员到工会，代表政府各种利益的组织，甚至还有被当局认定为非法组织的共产党，都反对迫害犹太人。鉴于国内强大的反对势力，鲍里斯国王有充分的理由来顶住纳粹的压力。驱逐犹

172

① 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在 1942 年 1 月 20 日举行，地点是柏林西南部的万湖的一个别墅。

② 艾希曼（1906.3—1962.6），是专门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

太人的事件没有再发生过，保加利亚的 5 万多名犹太人得以在二战中幸存下来。

1943 年 8 月，德国驻保加利亚公使意识到，纳粹德国在驱除犹太人问题上不可能说服保加利亚。该月月底，犹太问题即使对像献身纳粹的贝克勒来说，其重要性已经消退。8 月 15 日，鲍里斯筋疲力尽地从柏林回来，他对访问希特勒感到非常沮丧。接近过鲍里斯的人曾指出，当希特勒要求保加利亚在东线承担义务时，鲍里斯和希特勒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但人们并没有从德国的档案中找到关于这一要求的文件。不管什么原因使鲍里斯情绪低落，他想通过攀爬保加利亚最高峰——慕萨拉峰（Musala）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的忧愁。他回到索菲亚时身体状况愈来愈差，1943 年 8 月 28 日，鲍里斯逝世，享年 49 岁。直到现在，围绕他的死因，还有很多传说。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是有预谋的。

173



插图 31　1943—1944 年被拘留在保加利亚的犹太人；他们被监禁在各省的劳改营中，但由于保加利亚政府的介入，才使得这些劳改营没有成为死亡之营。

在鲍里斯逝世的前一天，德国驻索菲亚使团的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高级官员注意到，“在保加利亚老百姓的眼里，鲍里斯更像一位领袖而非君王。他是保加利亚民族统一的象征，他的消失可以……导致保加利亚国内的危机和外部的变动”。



插图 32　鲍里斯国王的葬礼，索菲亚，1943 年 9 月。

鲍里斯的继任者，国王西美昂二世（King Simeon Ⅱ）当时还未成年。于是便成立了一个摄政委员会，虽然严格从宪法上讲这一机构并未得到大国民议会的确认。该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是菲洛夫，其他两人是鲍里斯的弟弟基里尔亲王（Prince Kiril）和米霍夫（Mihov）将军。菲洛夫将较为温顺的多布里·勃日洛夫（Dobri Bozhilov）扶上总理宝座。

174

1943 年夏，就像对其他交战国一样，战争对保加利亚而言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西线，意大利接近崩溃的边缘，不久之后便宣告投降。与此同时，在东线，德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压力有所放松，这使得土耳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并使其更倾向于加入同盟国。1943 年年底，保加利亚成为盟国轰炸的目标。索菲亚遭到一些轻微的空袭，其他城镇在此之前也开始遭受盟军的空袭。但 1943 年 11 月，首都索菲

亚首次遭受盟军空袭的重创。1944 年 1 月 9 日，索菲亚遭受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空袭。同年 3 月，索菲亚遭受了一系列的燃烧弹空袭，3 月 30 日，空袭规模到了顶峰。盟军的空袭希望造成社会混乱，并迫使保加利亚更倾向于同盟国一方。轰炸保加利亚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1 月的空袭造成了很多索菲亚人逃离首都，政府不得不命令行政人员重返自己的岗位。

此时保加利亚城市居民所面临的物质匮乏和一战时他们承受的境况很是相像，虽然程度没有增强，并且原因也都是相同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通货膨胀，并造成了黑市的繁荣。1944 年初，黑市的价格是战前的 9 倍。造成物资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德国人的过度征用和德国士兵将超出限定的东西运回国内，也由于农民们拒绝向官方的采购机构上缴农产品，因为他们知道这在黑市上可以获得更高的价格，还包括不断扩张的腐败以及分配体制上全面的混乱。

各城市不断增长的困境和人们对战争的普遍厌倦使反对派受到鼓舞。反对派分为两股，一股是合法的反对派，包括一些较为温和的组织和旧党派中的右翼分子；另一股则是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祖国阵线成立于 1941 年，但因很多党派不愿与要求控制该组织的共产党进行合作，因此此后该组织并未取得多大的发展。1942 年夏，第二个祖国阵线浮出水面，这其中包括共产党人、环节联盟成员、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派别和农民联盟的左翼，农民联盟的左翼由 1907 年被暗杀的前总理的儿子尼古拉·佩特柯夫（Nikola Petkov）负责。新的祖国阵线在苏联控制下的赫里斯托·波特夫（Hristo Botev）广播站向保加利亚进行定时的广播宣传。如同在广播中说得那样，祖国阵线的主张是保加利亚绝对的中立，撤回对抗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保加利亚军队，军队摆脱王室的控制，禁止对德国出口粮食，保证保加利亚人民能过上像样的生活，完全恢复公民的自由，并取缔所有的法西斯组织。1943 年，一个中央委员会成立，这其中包括佩特柯夫、蒙·格奥尔基耶夫（Kimon Georgiev）、一名共产党人和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对此王

175

室表示反对，因为此时王室还没做好和祖国阵线合作的准备。民主党人拒绝和共产党人合作，农民联盟的非佩特柯夫派则拒绝和格奥尔基耶夫以及他的同事合作，因为他们曾参加了1923年的政变。尽管祖国阵线拥有自己的宣传机构，但它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是它的另一个薄弱的地方。保加利亚国内的游击战直至1944年夏季时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鲍里斯去世前，保加利亚政界便已经感觉到德国人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保加利亚应该和西方盟国进行联系，而且这样的看法已经流传开来。鲍里斯本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鲍里斯去世后，1943年10月，保加利亚与美国进行了接触，但保加利亚认为美国的条件过于苛刻：无条件投降，撤离所有占领区，并由盟军占领。盟军对索菲亚的空袭使保加利亚更为急迫的想摆脱战争。1944年2、3月份，保加利亚和盟国进行了进一步的接触，但盟国的条件并没有改变。菲洛夫和勃日洛夫仍然认为保加利亚不能容忍失去马其顿和色雷斯，只要德国军队还在保加利亚国内，那么无条件投降就没有可能实现。勃日洛夫说道，当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时保加利亚将加入到盟国一方。但当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而非巴尔干登陆时，这一想法便烟消云散。

此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拒绝了保加利亚希望苏联代为向盟军请求暂停空袭的要求，并在外交上向保加利亚发起攻击。1944年3月1日、4月17日、4月26日、5月18日，莫斯科连续向索菲亚方面发出通牒，要求保加利亚不得利用其领土进行反苏活动。保加利亚准备在瓦尔纳的海军舰只的建造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们同时决定拒绝德国人关于利用保加利亚铁路系统将德军撤回西线的要求。同年4月，保加利亚向苏联做出了进一步的让步，保加利亚原则上同意苏联在布尔加斯和鲁塞设立领事馆。而这两个领事馆则成为苏联下一通牒的主题，菲洛夫说道，5月18日，莫斯科威胁保加利亚说，如果这两个领事馆还不能够开放的话那苏联将与保加利亚中断外交联系。

176

由于红军正在乌克兰快速突破，来自苏联的压力不断增大，这使保加利亚当局必须应对最为恐惧的事情：卷入苏德战争。苏联的压力等于告诉保加利亚，如果保加利亚不同德国划清界限，那它则将会被苏联占领。而如果保加利亚答应苏联的要求与德国划清界限，那它将会被德国占领。1944 年 3 月匈牙利的教训使得保加利亚左右为难。

面对这样的困难，勃日洛夫于 1944 年 6 月 1 日辞去总理一职，伊万・巴格里扬诺夫（Ivan Bagryanov）接替了他的职务。巴格里扬诺夫曾在德国接受教育，并在一战时在德军中服役，但其总体而言被认为是亲西方的。巴格里扬诺夫上台后迫切希望与英、美停战，并希望安抚苏联以防止对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不能冒与德国断绝关系的风险。贝克勒于 6 月 18 日接到保方通知，保加利亚将完全履行三国条约的义务，但为了避免与苏联的冲突，德国人应将其在瓦尔纳的军队撤出。保加利亚认为，德国不希望苏联在巴尔干开辟新战场，也不想和正在向土耳其色雷斯（Turkish Thrace）不断输入军事力量的土耳其开战。这一看法很有见地，7 月 13 日，德国人表示，为使保加利亚容易实现其“与苏和平、友好、忠诚的政策”，德国人愿意将其在瓦尔纳地区的轮船和水上飞机撤走。

根据其对盟国友好的方针，巴格里扬诺夫于 8 月 17 日宣布保加利亚将严格中立，并同意大赦所有在押的政治犯，放弃前任的政策，并废除所有反犹法案。但这却为时已晚。8 月 20 日，红军进入罗马尼亚境内，3 天后，米哈伊国王（King Michael）将独裁者安东尼斯库（Marshal Antonescu）软禁在一个安全的皇家邮票收藏室内，并转向盟国一方。苏联红军很快到了多瑙河下游，并越过保加利亚的北部边界。

177

现在，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无法阻挡，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对其屈服。8 月 25 日，保方要求德国军队撤离保加利亚。次日，保政府命令保加利亚军队解除来自多布罗加的德国军队的武装。保军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到了 9 月 7 日，有超过 14 000 名德国人员被拘禁在保加利亚。而这却并没有缓解与苏联的关系。8 月 30 日，克里姆林宫宣布，

苏联将不再承认保加利亚的中立。巴格里扬诺夫的希望落空，他辞去总理一职，农民联盟的康斯坦丁·穆拉维约夫（Konstantin Muraviev）接替了他的职务。

穆拉维约夫明白，他必须向莫斯科做最后的妥协。9月5日，尽管此时保加利亚境内的德国军队正被解除武装，保加利亚内阁决定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在陆军大臣的争取之下，这一决定推迟72小时公布，因为他要将占领区的保军撤回保国内。9月7日下午3时左右，最后一辆德国汽车驶离保边境，3小时后，保加利亚宣布自9月8日下午6时起，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但那时苏联已经宣布与保加利亚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在这个混乱的几小时内，保加利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日本外所有的交战国都处于战争状态。

同样在9月8日这一天，苏联红军穿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境内，红军受到热烈的欢迎。红军的到来大大鼓舞了祖国阵线，它的游击队在这个混乱的夏天中迅速成长壮大，祖国阵线取得了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9月4日，一系列向穆拉维约夫施压的罢工活动开展起来，人们要求与德国断绝关系，当次日穆拉维约夫断绝与德关系后，部队里大量士兵开小差并加入游击队。但是，和1944年后共产党学校所教授的历史相反的是，这次导致祖国阵线在

178 9月9日掌权的行动并不是游击队干的，而是军队中那些忠于陆军大臣马林诺夫（Marinov）的部队干的。马林诺夫和政变老手格奥尔基耶夫、维尔切夫一起策划了这次政变，他们将战争部的大门打开，这样政变者便能轻而易举地占领这一索菲亚的战略要地。几小时后，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穆拉维约夫政府宣告垮台。一个由祖国阵线

179 构成的新政权成立。蒙·格奥尔基耶夫成为新内阁的领导，该内阁包括5名环节集团的成员，4名农民联盟盟员，3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和4名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掌控了内政和司法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插图33　1944年9月，索菲亚市民欢迎红军的到来；上图中的标语写道，“永远光荣的红军”。

1944年10月，当铁托元帅取消禁止保加利亚军队进入南斯拉夫的禁令后，保加利亚继续战斗，不过这次是站在盟国一方。保加利亚军队被编入托尔布欣（Tolbukhin）元帅的第3乌克兰集团军，并随之进入匈牙利和奥地利。32 000保加利亚人在这一战役中牺牲。

第八章　共产党治下的保加利亚（1944—1989）

一、共产党夺取政权（1944—1947）

180

虽然从一开始共产党在祖国阵线政府中就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直到 1947 年底，僵化的一党制并没有强加于保加利亚。

在逐渐掌握权力的过程中，共产党仍以保加利亚工人党（BWP）的名义进行活动，并受到了很多社会群体的帮助。起初，他们至少是非常受欢迎的，特别是在受其影响的城市知识分子中。一年间，他们的成员从 1944 年 10 月的 15 000 人发展到 1945 年的 25 万人，新党员加入不能完全归结于为追逐名利和机会主义。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对他们同样是有利的。在赶走德国人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大多数保加利亚人心中传统的俄罗斯情结进一步加强，在那些日子里，纳粹在欧洲的恐怖统治逐渐为世人所知。在 1944 年 9 月之后，战争又持续了 8 个月，这也有助于共产党，因为西方无暇顾及保加利亚；苏联是联盟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ACC）的常任主席国，监督保加利亚国内的事务，直到和平协议的缔结，并且到那时红军将驻扎在保加利亚，也使其他因素不能妨碍到共产党。

共产党对政治权力有着敏锐的嗅觉。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把政治

委员和行政人员安排在与托尔布欣一起作战的军队中。一些官员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其中800人包括42名将军被免职。1944年12月，曾在苏联红军中服役多年的保加利亚人伊凡·金诺夫（Ivan kinov）上校担任参谋总长。同时，大部分在编的受过训练的军队投入到与敌人的战斗中，以前的游击队成为一支新军——人民卫队（People's Guard）的骨干，保留在保加利亚国内。这都完全由共产党控制。

政府控制着广播电台和报纸的出版发行，同时，联盟管制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苏联有权批准外国影片和出版物的进口，这样，祖国阵线就直接紧紧地掌控住了媒体，而且如果需要预先防止的话，在印刷和发行部门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总是能够让反对党的报纸闭嘴。

祖国阵线的地方委员会同样也处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9月9日之后，他们发展迅速；到10月份的时候，已有7 000多人。他们发起了激烈的斗争，主要针对当地旧秩序的代理人，警察、教师和神父是其中的重点。这些人当中有些被草率地处死，另外一些被押往新成立的人民法庭，或被判处死刑或在劳动营中长期关押。一些地方委员会实施这一斗争是如此凶狠，以至于在索非亚的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出面对他们进行限制。在每个行业中都建立工会是保加利亚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特征，同样，这些工会也完全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会有权审查公司账户并将之上报祖国阵线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一直在处理德国、意大利或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

在中央政府，共产党控制了内务部，这使他们建立了一支全新的警察力量——民兵（the peoplep's militia）以及秘密政治警察，在秘密政治警察中苏联安排了顾问，就如他们向所有中央部门做得那样。同时，人民法院由司法部控制，而司法部同样在共产党手中。新法院受命惩罚"通敌者和战犯"，但是保加利亚没有被外国占领，也没有参加在东线的作战，只有极少数人属于这两类。然而，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与东欧的其他国家相比，有更多的保加利亚人被指控犯有上述罪行。就共产党而言，问题是地方知识分子和行政机关没有被盖世太保或他们在地方上相应的组织所摧毁，因而保加利

182

亚潜在的反对派要比其他政权要多。现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和政治阶层要为他们相对轻松的战争付出代价。

警察逮捕了前国王、皇室顾问、上一届议会的所有成员，以及1941年以后供职于政府的所有人员。1945年2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控犯有罪行，并且检控官要求其中的50位判处死刑。在宣布判决的当天晚上，两倍于这一数量的人员被带走，20人一批被处决。这样，保加利亚政治中原先的核心和右派被清除了。

但是，左派还是一股正在活跃的力量。虽然农民联盟依然分裂但仍是强有力的。加入祖国阵线中的一个派别由盖·梅·迪米托洛夫（G. M. Dimitrov）领导，他以“盖梅托”著名，以区别于共产党的领导人季米托洛夫，但是，迪米托洛夫没有参加政府，很快，他就被认为是英国的间谍而受到攻击，但事实是他只是战争期间英国人的一个顾问。为了避免被抓捕，他飞离了保加利亚。他的位置由内阁成员尼古拉·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继任。佩特科夫坚定反对与德国密切合作，他有着完美的战时履历、高超的演说技巧和议会政治的才能。到1945年的时候，他对祖国阵线地方委员会的做法感到非常焦虑，因此，他想从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独立出来以获得完全的政治自由。

农民联盟是共产党通往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保加利亚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5，他们对保加利亚农民联盟（BANU）保持着忠诚，尽管农民联盟分裂以及在1931年至1934年间他们的部长有不值得信任的行为。1944年9月9日之后，随着对共产党的反感日益增加，以及对共产党土地集体所有制计划的猜疑，他们对农民联盟的忠诚不断上升。这样，共产党就被推到了一个困难的境地。共产党不能像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东德那样，把贵族的土地和流亡者的土地分给农民就可以获得农民的支持。保加利亚没有贵族和流亡者，大部分的农民都享有足够的土地。共产党所能够做的只有对农民联盟的机构和个人进行正面攻击。

183

1945年5月，共产党的阴谋使农民联盟又一次分裂。司法部适时

宣布农民党派的所有财产，包括他们的报纸和银行账户，属于反佩特科夫亲共产党的党派。佩特科夫在8月2日从内阁辞职。他的集团改名为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尼古拉·佩特科夫（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Nikola Petkov，简称BANU-NP）。共产党还在社会民主党中科斯塔·卢尔切夫（Kosta Lulchev）领导的反共派别中制造了一次类似的分裂。

在分裂了农民联盟之后，共产党要求举行一场大选，但又要求祖国阵线内的所有党派只在一张名单上。佩特科夫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宣布这是反民主的。佩特科夫成功地把选举延期到11月18日，当无法在单一名单问题上达到他的要求时，他让他的支持者联合抵制这次选举。他认为共产党在国内会失去支持，确实是这样，西方国家也对苏联施加了更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但是，就短期而言，对佩特科夫来说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情；美国拒绝承认保加利亚工人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领导的新政府的合法性，季米特洛夫是在11月7日回到保加利亚的；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西方使克里姆林宫同意保加利亚内阁应增加两名反对党代表。但是事情至此却没什么进展，因为佩特科夫和路耳切坚持共产党必须放弃对内务部和司法部的控制权，解散议会，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拒绝了上述3个要求。

1946年，保加利亚的政治斗争在面上扩大了。对一个新闻记者编造的审讯被说成是又瓦解了一次军事阴谋。其结果是首先在军队里进行了清洗，有2 000多名现役军官被免职；第二个结果是颁布一项法令，把原来由国防部长掌握的军队指挥权全部转交给内阁。国防部长维尔切夫的离任，明显地希望削弱原本已经衰弱的“环节联盟”的影响。随后，共产党宣布了两次选举：一是在9月举行关于君主政体的公民投票；二是在10月举行大国民议会的选举。

184



插图34 审讯中的尼古拉·佩特科夫，1947年8月。

185 两次投票意味着向巴黎和会发出信号，巴黎和会将在8月讨论

对保加利亚的和约问题。关于君主政体的公民投票导致了共和国宣布成立，这个给和平缔造者的简单的甚至过分简单的消息意思应该是，保加利亚已经摆脱了两度把自己推入战争并且都与德国为伍的王朝。大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希望向在巴黎的谈判者表示，保加利亚愿意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它可以被信赖，将会采取理智、合作的态度。这些姿态对基本上是反保加利亚的盟国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保加利亚虽然在 1944 年 9 月以后的匈牙利和奥地利战场上做出了牺牲，但并没有被当作是共同作战的盟国，战争期间被占领的全部领土已不可能收回，和约已经确定了这一点。但是，南多布罗加得到了保留。

在巴黎的争论表明西方国家对保加利亚的兴趣已经下降，因此，反对党联合起来准备在 10 月 27 日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中就单一的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反对党获得 101 个席位，而祖国阵线获得 364 个席位，其中，共产党占据了 277 席。

现在，在国内和国外的战斗已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在国内，共产党明显失利。圣议会反对祖国阵线提出的教会民主化计划，甚至一些 9 月 9 日保加利亚起义前的原左派民主党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一定的活力。这主要是因为残留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渐渐被遗忘了。从 1944 年 9 月开始，所谓的合伙人、战犯、投机分子的利益受到了限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关于限制居住空间的规定，考虑到轰炸后房屋的短缺，起初人们能勉强地接受，但这一规定限制了家庭的人口规模，而且降低了原本已经很低的生活质量。例如，一些知识分子被强迫拆掉了个人藏书室。1946 年的新税法要求从 1942 年开始所有的欠款在短期内还清，但是更沉重的打击随着 1947 年 3 月开始的货币和银行改革到来了。新货币以不利于有储蓄的人的估价发行，此外，一定标准以上的个人账户被冻结，并且，对所有储蓄一次性地强行征税。这些都发生在有史以来欧洲最寒冷的冬季。

186

甚至连城镇的工人都表现出了不满的迹象。失业者人数众多，而

冬季的到来又给他们增添了困难。因为在城镇，食物和燃料是特别短缺的。经常有罢工发生，许多工人离开城镇去耕种他们自己在农村的或亲戚的小块土地。共产党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在事情变得更严重前采取相应措施。

从国外传来同样的信息。1947 年 2 月，和约正式签订，在和约最后批准后的 90 天之内红军将撤离保加利亚。3 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宣称要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同时，在大国民议会中，佩特科夫严厉批评共产党，他要求恢复特尔诺沃宪法并归还民众所有的自由。6 月，佩特科夫在议会被捕，8 月，他遭受了审判，在这样的审判中，被告没有法定代理权，没有提交证据的权利。这些被认为是“没有用或不重要的”。佩特科夫被判处死刑后执行绞刑，甚至还被剥夺了他的临终祈祷和基督徒葬礼的权利，全然不顾佩特科夫是保加利亚少数几个虔诚信教的公众人物。

佩特科夫的死打击了反对党。10 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其成立大会上，指示所有欧洲共产党政府加快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保加利亚工人党不需要鼓励。它迅速肃清了剩下的政治上的反对党，并在 1947 年 12 月推动大国民议会通过在苏联起草的“季米特洛夫宪法”。

“季米特洛夫宪法”宣布保加利亚是“人民共和国”。这是一种典型的苏联式体制，它承诺了所有自由，但实际上，权力不在正式的国家机构内，而是在共产党手中。生产资料将逐渐变成公有制，而司法的高层将听从议会的控制。实际上，这是由共产党控制，因为地方党组织的行动都要通过祖国阵线的地方委员会，他们必须批准所有的议会候选人。几个月内，祖国阵线里的所有党派都先后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不典型之处是，并不是把阵线中所有的党派都融合为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政党，保加利亚统治联盟中存在着两个独立的党派。因为尊重农民是农民联盟的传统，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中曾经与共产党合作过的派别仍然是独立的

187

政党，它将加入联合政府。这种合作者的身份一直保持到 1990 年。但是，它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因为它们仅仅作为国家的代表而不是共产党组织的代表。

1948 年的 12 月，在保加利亚工人党的第五次议会期间，保加利亚工人党把名字改回为保加利亚共产党（BCP）。与东欧的其他执政党一样，保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指导和组织原则。实际上，这意味着统治链是垂直型的即自上而下。不存在平行的联系，因为中央不能容忍地方有反对它的可能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代表大会，通常每 5 年举行一次。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不定期地召开全体会议，并制定重要的政策决议。但是，这些决议通常由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贯彻，政治局 12 个左右的成员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

党的控制权由一系列的国家机器实行。在所有工厂以及其他工作场所，在各级政府部门，当地党的基层组织即“党的主要组织”在企业或政府机关中起重要作用。每一个主要党组织都有两份名单。一份是高层党政干部名单（nomenklatura），内含地区责任人的职务，这份名单非常重要，只能由值得信任的人掌握。第二份是干部名单，包括那些值得信任的人的名字。所有这些个人信息由每个主要党组织招募的密探保持更新。这种党政干部制确保每个想得到体面工作的人保持敏锐的政治头脑；这是党的社会权力的基础。那些党内小心翼翼服从命令的人将得到获取一份满意工作的承诺和一些特权，如出入高级商店、度假胜地、医院、学校以及其他一些便利。 188

1947 年以后不久，工会、青年组织、苏联友好团体、专业团体、妇女团体都处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这一控制由祖国阵线来执行。

一党制确立后，保加利亚共产党急于建立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工业国有化既快速又简单地完成了，对外贸易不久由政府垄断，保加利亚还迅速加入了斯大林在东欧正在构建的政

治经济同盟和条约体系。1947 年，一个应急的两年经济计划被采用，1949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目的是把保加利亚的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到重工业部门上来。然而，在土地集体化的计划中，遭到了农民的反抗。历史学家并不了解这一反抗的全部，似乎是保加利亚的西北部最为坚决，人们知道那里发生了武装冲突，但抗议绝不限于那一地区，整个国家的农民都采取了对抗的行动如焚烧庄稼、宰杀牲畜，而不是把它们送进集体农庄。然而到 1948 年的 2 月，抵抗受到严重削弱，当时农场机器不得不移交给了新的拖拉机站（machine tractor stations）。到 1951 年，抵抗实际上已经结束。

东正教教会是许多被要求与党保持一致的组织之一。斯特凡督主189 教（Exarch Stefan）被赶到一个修道院里，他的牧师必须在参加保加利亚神职人员新联盟或被送入劳改营之间做出选择。1949 年 2 月，一部关于教会组织的新法令规定教会受制于国家。1951 年，政府把督主教的职位升格为宗主教（patriarchate），更加削弱了保加利亚教会和伊斯坦布尔教会原本就已薄弱的联系。非东正教的教会命运更为困难。因为它们仍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保持着联系，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恰恰是冷战期间政府最为顾虑的。1949 年，索非亚政府拒绝教皇新任命的代表到保加利亚担任教职。同年，15 名新教牧师被送上法庭，法庭宣判他们有罪，判处长期监禁。

在早期，遭受最严厉清洗的组织之一是共产党自己。1949 年 3 月，一位受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特莱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被撤消了在政府中的职位，去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2 月，科斯托夫被告上法庭并判处极刑。处决科斯托夫是清洗的前奏，在这场清洗中，至少有 10 万名党员被开除，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进劳改营。同时，行政机构、军队以及所有社会部门中有大量的人被清洗。大清洗是东欧的普遍现象，是由斯大林的偏执所引起的。苏联领导人以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national communism）的危险作为清洗的依据，例如铁托，他于 1948 年夏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但大清洗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化和工业化造成了社会的大变动，这不可避免地会引

起一些不满，同样，人们会不可避免地寻找表达自己的政治途径。在东欧，所有的政治途经都已经被封闭。清洗意味着警告共产党自己，不要与任何社会不满有牵连，而这些不满是共产党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在科斯托夫的案子中，也有一些保加利亚的特殊因素。部分是由于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的继承问题涉及其中。季米特洛夫于1949年7月逝世，他所指定的继任者瓦西尔·科拉罗夫（Vasil Kolarov）则处于病患之中。这样，科斯托夫就是当然的继承人，然而苏联对他是否亲苏不信任，因为他曾批评战后苏联的经济政策。

190

在保加利亚，大清洗中的南斯拉夫因素也特别重要。战争结束后不久，保加利亚工人党同意只要巴尔干联邦一建立，就立即把保加利亚境内的皮林马其顿让给南斯拉夫马其顿。同时，引入教师到皮林教当地居民如何用新的马其顿语言阅读和写作，新的马其顿语言是南斯拉夫马其顿学者确定的。在保加利亚，这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政策，一旦铁托和他的南斯拉夫遭到排斥，这一政策也被抛弃。科斯托夫严格说来不是亲苏派，因此他被指控为亲南斯拉夫派。这样，保加利亚共产党试图把皮林政策的耻辱归之于科斯托夫。另外，对科斯托夫的审判恰恰与“季米特洛夫宪法”下的第一次选举同时进行。号召服从党的路线恰逢其时。

在审判科斯托夫之后，继承季米特洛夫任党的领导人和政府总理的伏尔科·契尔文科夫（Vûlko Chenverkov）就高枕无忧了。保加利亚的“小斯大林”可以以苏联为榜样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国家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苏联模式的复制，比如教育、文化、经济、建筑、军事。为了使保加利亚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有许多的苏联顾问被安排在政府的各个关键部门。

为忠实于斯大林主义，大清洗仍然继续着。在美国使馆工作的一个保加利亚翻译被指控为美国间谍，这成为发动新一轮镇压的借口，这一次的对象是与非社会主义国家有联系特别是与美国有联系的那些人。美国断绝了与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这次清洗的受害人之一是内

夫罗科普（Nevrokop）[1]，罗马天主教的一名主教，他和另外27位教士和12名非宗教人士一起受到审判。另一方面，契尔文科夫允许几乎所有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犹太人移民，尽管苏联正进入极端的反犹时期。契尔文科夫同样允许土耳其人移民。事实上，1950年1月，他发表声明允许25万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这让安卡拉感到恐惧。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土耳其允许在1952年边境关闭前让16.2万人入境。大多数移民来自多布罗加，这是保加利亚最肥沃最适合耕种的地方，也是契尔文科夫想最快实现集体化的地区。事实上，土耳其人被迫流亡他乡不是由于军事原因而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

191

二、非斯大林化与日夫科夫的上台（1953—1965）

契尔文科夫在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的水面上航行，直到1953年3月3日斯大林逝世。东欧出现了一波工人骚动，保加利亚是经历这种状况的第一个国家，当时普罗夫迪夫的烟草工人爆发了罢工。在几个月之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继任者号召在东欧实行“新道路”（new course）。

索菲亚政权迅速作了调整以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苏联态度。保加利亚的“新道路”可以从改善与希腊关系，讨论修复与美国的不和，重新恢复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中看出。在国内，政府宣布将会有更多的投资分配到消费行业和农业部门中。更引人注目的是，政治的恐怖性有所缓和。警察的活动减少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出来。另外，新道路还表现在苏联影响的减弱。大多数苏联顾问返回苏联，曾让苏联在保加利亚某些经济部门有重大影响的股份公司被解散了。1954年3月，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契尔文科夫宣布不再担任政府总理和党内总书记之职，最后决定辞去总书记一职。他的继任者是年轻有为谦逊有礼的共产党官员，名叫托

---

① 戈采代尔切夫的旧称。——译者注

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新道路的采用只是一系列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将使苏联和东欧在 1953 年至 1956 年间发生剧烈动荡。1955 年，赫鲁晓夫开始恢复与铁托的关系，并且认为契尔文科夫的当政是击败科斯托夫的结果，而击败科斯托夫的理由是铁托主义者，这就大大削弱了契尔文科夫的合法性。1956 年 2 月，当赫鲁晓夫对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发表讲话，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他还搬出了契尔文科夫施政纲领中的要点。在 4 月份保共中央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契尔文科夫的个人崇拜受到了公开批评。契尔文科夫辞职，新的政府首脑是安东・于哥夫（Anton Yugov）。

191

在 1956 年动荡期间，日夫科夫始终坚定地忠诚于赫鲁晓夫，这场动荡随着匈牙利反苏革命而结束。1956 年的宽松给保加利亚带来了著名的文化上的解冻，但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随着 1957 年对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清洗，事情又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事件即是莫斯科事件的复制也是让苏联同志确信，保加利亚党完全能掌控事件。1957 年的镇压提高了于哥夫的地位。他被视为党的强人，1944 年至 1949 年担任内务部长时他就已经赢得了这一声誉。科斯托夫被审讯之后，他因失宠而被解职，但又回来重掌权力担任副总理，处理 1953 年的普罗夫迪夫的罢工。到 1957 年，他和日夫科夫已是明摆着的竞争者，不仅争夺党的最高权力，而且也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经济政策占据主导地位。1958 年，保加利亚宣布它是继苏联之后第一个完成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同年，对集体农庄进行了激烈的改革，把它的数量从 3 450 个减少到了 932 个。同年的另一个改革是要求所有官员无论是党的还是政府的，都要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数天，以确保与无产阶级保持联系。1960 年，日夫科夫为经济扩张制定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或者说梦幻般的计划。计划中的数字是荒谬的，1961 年，数字不得不减少，1963 年正式宣布放弃。但它对经济特别是对农业已经造成了巨大伤害。1960 年的“日夫科夫命题”（Zhivkov Theses）有时被称作是保加利亚的“大跃进”，但他是从赫鲁晓夫那儿而不是从毛泽东那里复制来的。

于哥夫和契尔文科夫两人都指责了日夫科夫的做法。但是契尔文科夫最终在1961年失去声誉。当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发动了第二次并且是更猛烈的攻击。契尔文科夫被指责没有从1956年吸取教训，四月中央全会后，他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契尔文科夫的离去增强了日夫科夫和于哥夫之间的争斗。日夫科夫的优势在于获得了莫斯科的青睐，他的地位在1962年5月又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当时，他的庇护人赫鲁晓夫在保加利亚进行了一周的访问，赫鲁晓夫以苏联老将军的身份与他的被保护人参观了农村。日夫科夫的弱点在于迅速恶化的农业形势，那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短缺，以至于不得不从北美进口粮食。于哥夫抓住了这点，他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如对赫鲁晓夫不恰当地处理中苏关系以及在古巴灾难性的冒险。

最后的战斗取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八大本来被安排在1962年8月召开，但由于农业危机延迟到了11月。在保共八大前夕，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中途，日夫科夫飞往莫斯科访问。当他几天后回国时，日夫科夫宣布把于哥夫开除出政治局，并解除他的总理职务。于哥夫退隐并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在1984年他作为一位老人接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

日夫科夫的胜利显然是克里姆林宫操纵和确认的。从此，日夫科夫便成了莫斯科路线卑躬屈膝的代名词。但是他不仅仅依靠苏联，于哥夫撤职不久，他就把亲信安插在政府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关键位置。1964年，他已经非常强势，当他在莫斯科的庇护人倒台后，他能够继续掌权。1965年，他挫败了一起军事阴谋，这起阴谋的目的是减少对苏联的依从。事实上，日夫科夫在整整20年里未受到挑战。

三、日夫科夫当政时期（1965—1981）

1965年，保加利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将引入较大的经济责任制，在这种“自下而上的计划”（planning from below）的新体制下，要求地方企业及其管理人员承担起较大的责任。然而，3

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动荡使得改革计划停滞并陷入僵局。由此，保加利亚共产党不仅在经济上返回正统，而且政治控制也加强了。“祖国阵线”考虑取消它的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组织，比如“禁酒协会和斯拉夫人委员会”，并且发出号召，确保所有城市居民委员会和那些解决供水、食品及其他必需品的委员会牢牢地掌控在党的手里。而在党的内部则是“铁的纪律”。

中央集权的重新加强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反映在 1971 年的两个重要革新上：一是新的宪法；另一个是新的党章。

1971 年宪法宣布保加利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共产党作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团体，其领导地位被确立。建立了一个新机构即国务委员会，它拥有立法和行政权力，其主席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日夫科夫。国务委员会也对行政机关行使一定的监督职能，而这些职能在大多数其他东欧国家则是由党的机构负责。新的党章宣称，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指导原则仍旧是 1956 年制定的“四月路线”（April Line）。但是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在“一个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来指导党和国家。从长期来看，这个过程涉及到保加利亚的均衡化（homogenisation）。这个阶段要强调的是，城市和乡村的生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融合，而对于那些选择利用“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思想的人们而言，融合也具有种族的内涵。这种朝着发达的社会主义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革命来促进，科技革命可以带来生产率上所需要的增长，进而增加社会财富。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 1971 年的党章作了较大的修改，但 1971 年宪法在共产党统治崩溃之前仍然有效。

195

1971 年的变化没有多大程度改变日夫科夫政权。其主要特征依旧是对苏联全然的服从，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在 1973 年 9 月，日夫科夫曾声称，保加利亚和苏联将“像一个行为体一样去行动，它们同呼吸，同命运”。在许多问题上，如越南战争、第三世界、中东和拉

美地区，索菲亚和莫斯科的态度没有丝毫不同。我们现在知道的日夫科夫对苏联的忠诚走得最远的是，他曾两次提议将保加利亚并入苏联。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赫鲁晓夫认为日夫科夫只是看到加入联盟能轻易地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勃列日涅夫拒绝日夫科夫的提议是由于其认为这在外交层面上是不切实际的。

虽然日夫科夫在对外事务方面总是与苏联保持一致，然而他也同西方发展了更多的联系。1966 年 10 月，当日夫科夫收到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反美的长处足以弥补其保守主义的缺点）来自巴黎的邀请时，他首次出访了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国家。1973 年 12 月，保加利亚同联邦德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双方已经发展起相当规模的经贸联系。1975 年 6 月，日夫科夫访问了梵蒂冈，并受到教皇保罗六世的接见。在这一年年末，保加利亚政府批准了东仪天主教[①]对其保加利亚主教的任命，允许一个保加利亚天主教派别到罗马去朝拜。到 1979 年，保加利亚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天主教主教。

保加利亚同第三世界也建立了更多的联系。自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起，非洲学生一直在保加利亚接受大学教育，尽管如同 1965 年 4 月的示威活动所证明的那样，保加利亚的生活并不总是适合非洲学生的口味。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整个 70 年代，许多受过培训的保加利亚人则到非洲去当医生、教师、工程师等等，至 1981 年，有超过 2 千的保加利亚医生在利比亚进行工作。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一些衣着考究的、挣美元的保加利亚人呆在家里享受生活是保加利亚社会些许奢侈生活的一个特征。

在保加利亚国内，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安于生活的，或者是对生活持冷漠态度的。尽管偶而会有不满的声音，但持异议不可能有达到波兰那样规模的前景；保加利亚没有独立的教会来担当可选择的忠诚的对象。当遇到他不喜欢的政治体制时，保加利亚人倾向于用冷漠和后

196

① 坚守各种东方礼仪和典制的天主教徒和教会，他们承认罗马主教的教宗地位，但继续坚守原有的礼仪和典制。

退做出回应而不是选择面对和反抗；鲍古米尔派的遗产持续的时间太长。在1977年之前，日夫科夫在公共场合从不说“持不同政见”（dissidence）这个词语，而且在许多年后，当他在一份文学期刊上读到一首题为《打倒托多尔·日夫科夫》的打油诗时，他一笑置之，并宣称：政权不会被一群诗人打趴在地。

再者，保加利亚政权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相对稳定的更重要原因是，民众的生活在这期间逐渐的好转。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的政治统治让位于一个警察系统，它针对少数敢说话的或使政府难堪的人。1972年12月，中央委员会全会允诺：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将会更关注于提供消费品和诸如教育和住房这样一些社会服务设施。这些方面的进步总是比较缓慢，还伴有周期性的衰退，但是任何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访问过保加利亚，并于70年代后期再次回到这个国家的人，不会怀疑保加利亚总体上来说条件已经改善。

生活逐步改善的一个原因是，保加利亚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为经济专业化而设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规划。根据1965年同苏联的协议，保加利亚将组装苏联生产的小汽车和卡车；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也开始专业制造船舶，生产铁路车辆和叉车。至1975年，保加利亚1/3的工业产值是在运输部门。到那时，保加利亚开始为东欧市场生产磁盘以及其他电脑部件。这些协定将保加利亚同东欧的消费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苏联的联系则更紧密，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为保加利亚的低端制造业产品提供了宽松的市场准入，同时它们也允许保加利亚从苏联进口低价位的石油。之后的一些年份里，大量的这种石油在开放的市场里出售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为保加利亚换取硬通货。

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农业部门的再次重大改组刺激了食物生产。1969年，弗拉察地区雇佣4万多工人、用覆盖土地面积达38 700公顷的7个集体农场，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或者称之为“农工综合体”（AIC）。1970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支持了这项实验，并在全国推广。“农工综合体”（AICs）至少雇佣6 000工人，就 197

面积而言，则是在2万至3万公顷之间。它们打算利用当地的土壤和气候的优越条件，集中于二三种作物和一二种牲畜。在这些农工综合体的早些时期，它们被给予鼓励性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保加利亚人感觉他们没有理由抱怨其命运的另一个原因。

198



插图35　1980年在索菲亚召开的公共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托多尔·日夫科夫与孩子们在一起。

国内政治状况的平稳并不意味着日夫科夫对于潜在的反对力量熟视无睹。一位名叫格奥尔基·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的文人就由此付出了代价——在滑铁卢大桥上被一颗从一把雨伞下射出的有毒子弹击中，事情发生在1977年9月的伦敦。这是由于马尔科夫透露了太多保加利亚政治精英生活作风的细节。两个星期之后，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在巴黎遭遇了针对其生命的类似的暗杀，但是这次没有成功，他的罪名是因为他揭露了保加利亚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和涉及的范围，而且，保加利亚的许多权力机构从属于苏联。

日夫科夫也不能容忍任何来自保加利亚社会党上层的、对其领导权潜在的挑战。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日夫科夫采用一种“抢椅子的游戏”，把似乎正在逐步建立过于强大的权力基础的部长和党内高级官员调到一边去。诸如此类的变动极少涉及职务的丧失，但是偶尔会采取更强硬的行动。1977年5月，鲍里斯·维尔切夫被清理出政治局，省一级党组织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变动。同时对党员身份进行了一次考核，这是执行清洗的标准方法；在这次清洗行动中，大约38 500党员被驱逐出党组织。这是日夫科夫掌权时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清洗”，虽然在后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发生了对领导人的进一步清理。

像其他巴尔干地区的共产党政体一样，保加利亚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色彩。民族主义是有用的，因为党主张的作为一种让人献身的意识形态已经衰落，而共产党在国内需要更大的合法性，特别是在1968年之后加强控制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后期，好像有两种便利的途径可以提高党的合法性：物质至上主义和一个更强烈的国家认同的主张。不过，保加利亚的经济未能充分发展以供给消费至上的需求，而另一条道路也有问题。因为保加利亚的政策是如此紧密地同苏联联结在一起，民族的主张在外交事务上是很困难的。因此，问题的答案就是保加利亚国内自我主张更多的“民族的”。1968年除了供土耳其人阅读的一份报纸和一份杂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都没有了；吉普赛人的教科书自此以后只能用保加利亚语出版；索菲亚罗马剧场在第二

199

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成了过去的事情。

在1971年党章号召创建一元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对罗马和其他少数族裔进行同化的压力增强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已经土耳其化的保加利亚穆斯林被要求采用斯拉夫人的名字；而那些不这么做的人要受到惩罚；1974年，臭名昭著的贝勒尼劳动营里，1 300名囚犯中的500名是保加利亚穆斯林，原因是由于这些人顶住压力不愿更改姓名。土耳其人没有处在这种压力之下，然而却被鼓励移民。1968年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署了一份协议，允许由于50年代早期大批移民出国而被迫分离的土耳其家庭重新团聚。在这份协议保持有效的十年间，大约13万土耳其人离开了保加利亚。

马其顿人问题同样是一个拨动民族主义者心弦的地方。在1948年同铁托的关系中断后，关于马其顿同一性的表述变得越来越困难。到60年代早期，任何在公共场合试图谈及这一问题的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使1963版的《保加利亚简明百科全书》还收了一篇关于马其顿语言的条目，是1965年的人口普查根据母语来划分种族，这是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最后一次承认马其顿人属于一个种族范畴。在保加利亚国内，任何针对马其顿人问题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或者是被其所影响。如果苏联同南斯拉夫交恶，那么保加利亚就会毫不犹豫地在马其顿问题上进行攻击。例如在196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其党员内部流通的一本小册子中披露，南斯拉夫马其顿人中的2/3是保加利亚人种，当然，针对这一主张斯科普里自然表示极大的反感。另外一些争端，大多数只是学术性质的，它们是周期性地爆发，但是日夫科夫从没有让其失控，在他的统治之下，马其顿人问题没有任何会引发真正的国际关系复杂化的可能。

200

在20世纪70年代，最有趣和最不同寻常的情况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日夫科夫，还不如说是他的女儿柳德米拉·日夫科娃。出生于1942年的柳德米拉·日夫科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不过是在最具特权的圈子里。那种特权使她可以在牛津大学就读一个学年，并在1971年获得文化和艺术委员会副主

席的职位。1975 年，她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接管广播、电视和出版的职责。1980 年，她负责政治局科学、文化和艺术委员会。通过体制内学者的帮助，她出版了许多著作；在私下里，她开始显露出对神秘主义有日益增长的和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在索非亚知识界的小圈子里，这样的个人兴趣很快就成为一种公众的知识。



插图 36 批评柳德米拉·日夫科娃作为艺术的庇护人的漫画。排队的大多是漫画化的保加利亚最主要的学者和作家。

知识界对非唯物主义思想的讨论着了迷，但他们不得不满足于日夫科娃所作的强调，把重点放在保加利亚长期的文化传统以及这些文化传统的特性和差异上，1981 年，她为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建立 1 300 周年特地安排了一场庆典活动。这无疑是一场夸张的、极其破费的事情，但它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保加利亚的历史和文化是独特的，因而保加利亚在文化上与其他民族是有差异的。当然，在私下里这立即被解释为意味着他们同俄国人也是不一样的。1981 年的庆典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保加利亚人有组织的国家历史比俄国人要长。之后，保加利亚人明确表示其改信基督教也早于俄国人。但是，这个时候柳德米拉·日夫科娃去世了。她死于 1981 年 7 月，年仅 39 岁。有谣传说是俄国人谋杀了她，但是对

于官方公布的死亡原因——脑出血，没有证据值得怀疑，也许可能是几年前一次严重的摩托车事故引起的。柳德米拉·日夫科娃的民族主义是文化的，而非种族的，这种民族主义号召人们颂扬保加利亚人的成就，而不是歧视本土的少数族裔。即使她过着一种特权的、极其放纵的生活，但日夫科娃可能是在鲍里斯国王之后，比任何公众人物得到人们更多哀悼的一个人。

四、日夫科夫政权的衰落和垮台（1981—1989）

201 柳德米拉·日夫科娃的死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自此，不管国家政策和社会组织怎样强力扭转，在保加利亚统治精英之中，希望好像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绝望。

首先，日夫科娃文化上自鸣得意的光彩被一系列国际上的丑闻所玷污。一开始是 1977 年“马尔科夫和科斯托夫事件”，而且没有要结束的迹象。保加利亚被指控涉嫌生产假冒的威士忌，而国家贸易机构金特克斯（Kintex）卷入了一桩复杂的交易中，即通过走私毒品到西方，之后用所得的钱运送武器给其他国家从事颠覆活动的危险分子，比如土耳其，1981 年保加利亚秘密警察的特工被指控涉嫌图谋在罗马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82 年 7 月美国将保加利亚贴上从事“政府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一标签。自从其国内的共产党垮台之后，保加利亚承认了在“马尔科夫事件”中的罪过，但继续极力地否认与暗杀教皇生命的阴谋有任何牵连。

202 至 1981 年，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保加利亚变得明显起来。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并不像计划的那样容易那样迅速。而被寄予厚望的科学技术革命却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尤其是经济计划跟不上计算机科学和光导纤维日新月异的变化。原先所依赖的从西方引进技术变得更加困难，部分原因是里根总统强加的贸易限制；但是更多的是因为 70 年代中期由于石油价格的高涨所导致的西方商品变得非常昂贵。同时，扩大对中西欧贸

易的努力注定是要受到挫折的，因为保加利亚所能提供的高质量的出口产品，只有农产品，而对这一类产品，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取消进口。保加利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美和远东发现了可替代的市场，但由于要偿还外债的义务而变得更加困难；困难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数据所表明的程度。到1981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在放慢，期望也变得相当的理智；这一年实施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其预期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是20%，而相比起来，1976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则要求45%的增长。

政府的回答是1979年3月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勾勒出“新经济机制”，并决定到1982年将其应用到整个经济上面。新经济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率，提升保加利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而确保所需要出口，消除存在的贸易赤字和外汇债务。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新经济机制要提供“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一种新的管理经济的途径”。这一途径基于以下5项原则。第一，去集权化，这意味着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现在，它们从中央计划部门接到的是总的指导而不是详细的生产配额。第二，民主化，在一个“自下而上动员”的新体制下，民主可以通过选举团队领导和另一些官员来实施。第三，竞争要扩大，由竞争来决定投资额度以及工资水准。第四，经济领域中引入市场机制，企业自己去寻找资源和产品的市场。第五，所有工厂一律自负盈亏，不要机械地指望政府的补贴。

203

这些只是一些宏伟的方案，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产品质量没有提高的迹象。1983年，日夫科夫做了一个报告，该报告通过收音机和电视现场直播，报告里他猛烈地抨击保加利亚产品的质量，甚至断言，由于糟糕的生产车间和松散的劳动纪律，有许可证进行组装的外国产品也“保加利亚化”了。1984年3月，一次党内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产生了更多的主张和工业重组的建议，但再次没有一点成效。

新经济机制试图提高产品质量，努力增加国内市场的消费品供给，但面临一系列障碍。首先，如果要确保今后技术的引进和获得出口市

场，处理外债要优先其他需求。这意味着外汇要先用来偿还债务，而不是进口外国消费品或者是在国内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机器。同时，它也意味着大多国内生产的最好的产品不得不安排到出口贸易中。齐奥塞斯库为了处理外债而做出的不理智决定损害了罗马尼亚，并使罗马尼亚遭受贫困，保加利亚人并不一定要承受类似的苦难，而且保加利亚的消费者否认国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产品，尤其是酒。它使得保加利亚的生活灰暗而单调，就在这个时候，出国旅行变得比较方便，能欣赏到更多的西方影片、电视节目和音响制品，这使意识到生活灰暗的保加利亚人更多了。

能源是保加利亚经济面对的另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本土缺少矿物燃料，因而被迫主要依赖进口。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自身面临经济难题，迫使其调高能源价格，且在 80 年代的后半期将其调整到世界价格的同一水平。保加利亚已经在多瑙河附近的科兹洛杜伊（Kozlodui）发展了自己的核能发电，并且在沿着多瑙河离科兹洛杜伊较远的贝勒尼（Belene）修建它的第二个核电站。但是，后者的建设工程和前者的维修均无法在预定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完成，科兹洛杜伊生产 30% 左右的国家电力，没有使它得到完全利用是一个额外的经济问题。1984 年和 1985 年的严重干旱降低了水力发电生产能力也是如此。

204

然而，经济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障碍是，保加利亚管理干部不是在一个要求依靠自己、负责任和从纯经济的立场做决定这样的体系里培养出来的。如果能够获得类似的苏联设备，经理们不敢购买西方的设备，因为害怕被怀疑在政治上对党不忠诚；工厂的经理们数十年里一直例行公事般地按照中央组织的要求来解决生产问题，常常不知道怎么去寻找他们自己所需的原料和市场。习惯于牺牲其他任何东西来完成其计划总量的生产者，对提高产品质量的呼吁充耳不闻，特别是如果这样意味着要降低产品的数量。到 80 年代中期，新经济机制看起来没有起到作用。20 年来第一次，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可以察觉到的提高，甚至连一点期望也没有。这是一个平静的，但却是公众态度方面深远且重要的转变。

从 1985 年开始，经济困难同其他两个层面合在一起削弱了日夫科夫政权。这两个问题是：试图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同化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

对土耳其人强行同化的决定开始于要求其采用保加利亚人或者是斯拉夫人的名字，这是在 1984 年后期由党的最高上层做出的，在 40 年代，当南多布罗加被再次并入保加利亚时，地名已经被变更，不过，改人名被认为太过严厉。从 70 年代对保加利亚穆斯林的经验看来，更严厉的步骤是可行的。但此后不久，很明显的是落实起来并不容易。1985 年，保加利亚土耳其人被告知从一张斯拉夫人的名单上选择他们希望采用的名字；如果他们耽搁或者拒绝，将替他们做出选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进行抵制，军队被迫召集起来，甚至有坦克，以及最精锐的戴红色贝雷帽的伞兵部队也被部署。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保加利亚军队承担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新政策不限于要土耳其人变更他们的名字，土耳其人的报纸被关闭，土耳其语无线电广播被暂停；甚至宣称在公共场合说土耳其语是非法的。政府官方的说辞是说土耳其语的人事实上不是土耳其人，而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迫皈依伊斯兰教和土耳其化了的保加利亚人的后代。这一新的“再生进程”（regenerative process）要求这些迷失的保加利亚人回归他们祖国母亲的怀抱。

205

攻击不仅仅是针对土耳其人的。采用穆斯林名字是一位穆斯林成熟的组成部分，对使用穆斯林名字的新禁令是多年以前就开始的针对伊斯兰教本身的无声攻击（quiet assault）的继续。对死者进行洗礼被认为威胁公众健康而禁止；割礼已被视为非法；许多年来，到麦加或其他神圣的地方进行朝圣已经是不可能了，此外在保加利亚国内许多伊斯兰建筑的珍品被摧毁。

“再生进程”引起世界范围内抗议的浪潮。保加利亚受到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欧洲正义法庭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谴责。外部的反对是如此之重，而国内取得的成效如此微不足道，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会采纳这样一种政策。一直有人提这样的看法：伊斯兰教就本质上而言是保守的，它无法与科学技术革命所要求的现代

精神共存。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攻击伊斯兰教的时候还要攻击土耳其语呢？

也可能是日夫科夫政权对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渐明显的长期民主化趋势感到恐惧。到这个时候，土耳其人已经在总人口中占大约10%的比例，但出生率的差异意味着这个比例会增长的很快。这就会很容易在军队征兵或者是任何一个地区的土耳其人要求自治时造成困难。这可能是东鲁米利亚要回到过去的前奏，如果认为这种想法是想入非非的话，担心此事发生的人会举出北塞浦路斯的例子。如果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差别被消除的话，这些危险就会减少。而1985年12月进行的一次普查结果加强了这一论调。

206

还有一种更有可能的解释很简单，那就是该政权认为，鼓吹民族主义的论调可能增加普遍的支持，或者至少能掩盖一些正在遭遇的经济困难。经济方面没有什么进步以及保加利亚在国外的糟糕形象，一定程度上使其民众深感沮丧。后来被称之为“公民社会”的力量，是以战争艺术俱乐部、野生动物保护团体的形式扩展开来，它们在地方政府官员控制之外甚至常常超出法律进行活动。更加凶险的是恐怖主义再次出现。1984年的一天，普罗夫迪夫的火车站和瓦尔纳的机场发生炸弹爆炸事件，那一天日夫科夫正打算到这两个城市视察；并且在炸弹爆炸后不久，街道上流传许多传单，宣称：“40年，40个炸弹！”

如果“再生进程”意味着企图使保加利亚政治达到稳定，那么它无疑是很惨痛地失败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保加利亚在国际上的地位，甚至在莫斯科也一样。此外，1985年莫斯科发生了第二次巨变。当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而此时的托多尔·日夫科夫已经74岁了，且是东欧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1981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平均年龄是57.5岁，50岁之下的成员只占20%。对比一下克里姆林宫的新头领和紧紧黏住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腐败和经济不景气的日夫科夫，差别是巨大的。当日夫科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次出访莫斯科时，他一直等待，直到第二天才见到苏联的领导人，真是一次难以预料的冷落。让日夫科夫很难

料想的是，长期以来作为他权力根本的堡垒——克里姆林宫，在随后的岁月里对其命运不闻不问；戈尔巴乔夫甘于离开任何一个东欧共产党政权，只处理他自己的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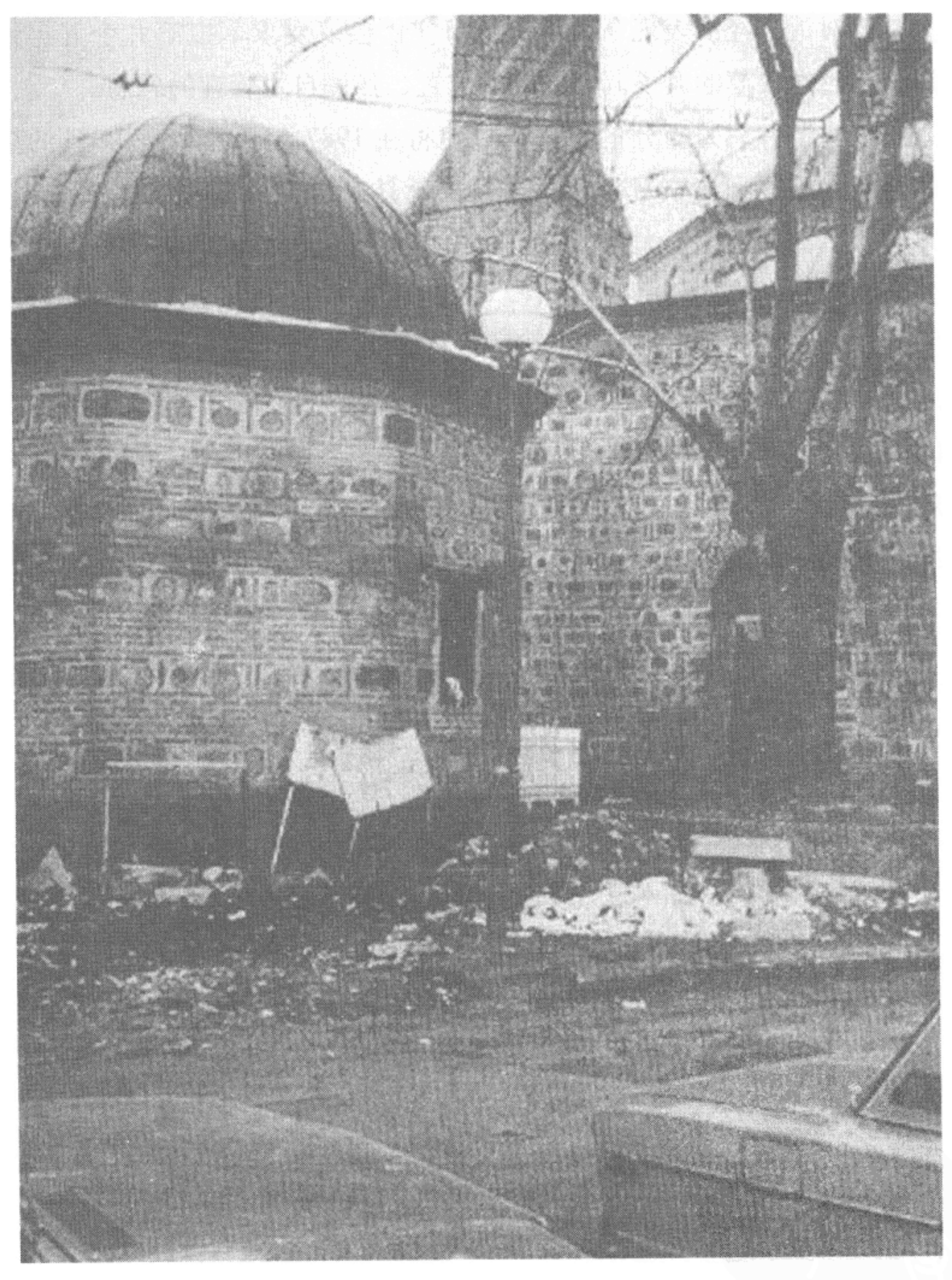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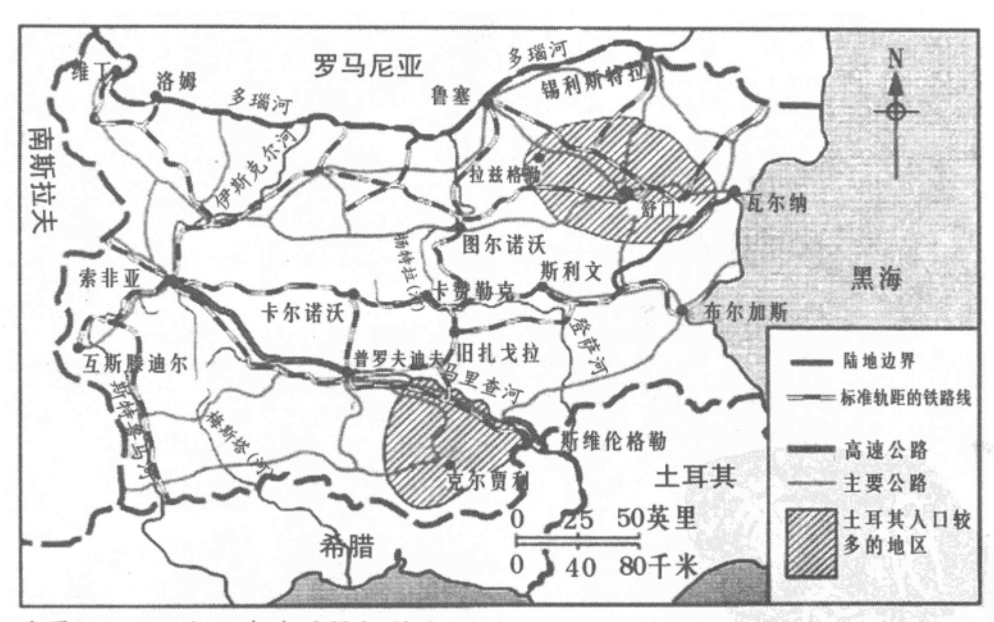


插图37 普罗夫迪夫的伊玛里特清真寺，也被称为赛哈布丁帕萨清真寺，建于1444年；在“再生进程”中，其底部变成了垃圾场，该图片摄于1987年。

1985 年，在保加利亚，党主要的当务之急是抓经济。1985 年 2 月和 1986 年 1 月，党的全体会议宣布了更多的变革。宣传部称，变动正 207 在做出，从官僚系统到经济计划。在 1986 年 12 月的另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对近来经济表现令人不满的事实，会议要求草拟第九个五年计划，同时把改革的调子调到更高的位置，强调自主管理的思想。

这些事件只是重建的序幕，重建将在 1987 年 7 月 28—29 日的全 209 体会议上被提到议事日程。日夫科夫承认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失误，并对中层官员进行了大量的抨击；中层干部现在实行自我管理，要为公众的情感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党的优先秩序作了比较大的调整，“七月新思维”（July concept）取代了 1956 年的“四月路线”作为党的指导原则。1987 年 8 月，议会通过了诸多改革措施，这意味着 7 月的中央全会所表达的想法有了合法性。许多部门被取消，地方政府大规模进行改革，建立了考虑修正宪法的委员会。从经济上的角度，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的起起落落除了大规模地打乱经济管理机构外没有带来任何发展，但是日夫科夫试图利用改革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地图13　20世纪80年代的保加利亚

在 7 月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这位保加利亚领导人承认，党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说，要记得列夫斯基说过的话，“或

者我们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或者我们被它毁灭”。日夫科夫自身所面对的一个危险是，自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莫斯科——这个先前保加利亚领导人的一切智慧的源泉，已经变成了危险的、颠覆性思想的中心。通过保加利亚一个定期播放苏联节目的电视台，这些破坏性的思想到处可见。日夫科夫辩称，苏联“公开性”的目的暴露了其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但是，由于保加利亚已经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所以不需要公开性。

而这在党外，甚至党内都难以让人相信。这种不信任和不满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土耳其民族依旧对“再生进程”感到愤怒，但是他们没有组建自己的知识分子阵营来鼓吹他们的运动。然而，保加利亚人知识界变得更为活跃。它发现可以通过一种途径与保加利亚大众形成良性联系，那就是：环境恶化。1986 年 4 月“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有关受污染的食物被投放到公众使用的开放市场里，而党的精英则享用以高价从未被污染的区域进口的安全产品，这样的谣言四起。政府打算承认的一个问题是，在鲁塞地区，来自流经罗马利亚境内这段多瑙河的一个化工厂的有毒产品，已经导致毁灭性后果。在一次展览中，一份坦率的公示表明，地方性肺病的发病率从 1975 年的每百万人 969 例，上升到 1985 年的 117 386 例。对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持续不断的鼓动贯穿了整个 1988 年，尽管警方对沉默的诗人和哲学家做了笨拙的努力，反对派甚至开始形成组织。至 1989 年春天，包括：支持“体制改革”和“公开性”的研讨俱乐部、保加利亚人权独立联合会、环保组织（Ecoglasnost）和一个独立的工会——“支持”（Podkrepa），以及维护宗教权利委员会。 210

日夫科夫政权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而延续下来的“再生进程”的遗产，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在 1989 年关键的春天和夏天主导了保加利亚国家的命运。至晚春之时，受压迫的土耳其少数族裔在保加利亚知识界找到了他们代表。5 月下旬，在巴黎欧安会召开前不久，一些领头的土耳其人开始绝食抗议。在那些天，双方对峙。日夫科夫于 5 月 28 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天是星期天，很清楚，保

加利亚领导人对此事非常关注。他们确实有理由关注。土耳其人居住的东北部地区处于严重骚乱的状态。日夫科夫对此的反应是，通过电视声明：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更想要土耳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日夫科夫好像认为这样可以使土耳其人悬崖勒马，可能只会有少数人迁出。他错了。到8月为止，当沮丧的土耳其当局自己关闭其边界时，已经有34.4万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无疑给土耳其共和国制造了诸多困难。布什总统允诺要重返安卡拉，但是，莫斯科方面则告知索非亚，它不愿卷入保加利亚的民族问题。日夫科夫在国际上被孤立了。

在国内，他实际上也陷入被孤立的境地。在党内领导层里，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长彼得·姆拉德诺夫比其他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再生进程”对保加利亚国际形象的损害。他带领其追随者反对日夫科夫。211 10月结束的时候，两人处在残酷的斗争之中，10月26日，在外国记者眼皮底下，警察粗暴地对待环保抗议活动的示威者，这增强了姆拉德诺夫的实力。姆拉德诺夫不久后前往中国，最佳的时机来了。在返程期间，姆拉德诺夫在莫斯科停留，并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谈。在他回到国内后，其亲信立即开始行动，11月10日，也就是柏林墙被拆除后的那天，日夫科夫下台。

第九章　后极权主义的保加利亚

一、去除极权主义的政治组织（1989.11—1990.12）

共产党集团的斗争导致了日夫科夫的下台。这不是革命而是一次宫廷政变，保加利亚的“大众权力”更多的是结果而不是导致领导阶层改变的原因。 212

11 月 10 日后，很快便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组织。在旧政权的最后岁月中，这些组织中的一部分是不公开的、不完全合法的和不完整的，如今则可以被确认为是完整的和公开的。有一些是完全新创立的。另一些则是历史上的政党以新的形式的再现，这些组织中有社会民主党人、农民联盟，而农民联盟为使他们与 1947 年后的合作者身份相区别，重又更名为佩特科夫派的农民联盟：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尼古拉·佩特科夫。11 月 14 日，非共产主义的 14 个政治组织组成了一个联盟，他们把这一联盟称为民主力量联盟（简称 UDF）[①]。热柳·热列夫被推举为联盟领导人，他是一个曾让旧政权恼怒的学院派哲学家。

同时，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新领导人姆拉得诺夫计划从 12 月 11 日

① 下文简称民盟。——译者注

至13日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他表达了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悔
213 悟，并保证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党派民主，而且将会是一个真正的议会政治而不是自1947年开始，只是中央控制下的形式而已。

然而到如今，反对派的力量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执政党的悔悟或者做出改变的承诺了：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变革。12月14日，民盟在索非亚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废除宪法中保证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款，至此，他们的要求已非常清楚。随着周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保加利亚的同志不可能对这样的呼声再装聋作哑了，游行示威显示出民盟能够更多地掌控大量的公众支持。基于此，保共同意以波兰和匈牙利为模式创立一个保加利亚的“圆桌会议”，开始和反对派进行对话。

在圆桌会议召开之前，索非亚出现了更多大规模的抗议游行。甚至在12月中旬的保共全体会议之前，姆拉得诺夫为“再生进程”致歉并予以放弃，随后“再生进程”于12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被正式废除。这激起了强烈的反应。1月7日，来自保加利亚全国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抗议者聚集在索非亚，这显然得到了当地政党官员的纵容，因为只有他们能批准使用如此之多的配给汽油。很显然，大众权力可以站在改革的一边也可以站在保守的一边。一个星期之后，进行了各个支持法令的反对抗议的游行。这些游行，连同越过罗马尼亚边境进行故意的破坏行为，显示了进行圆桌会议的必要，并促使保共和民盟双方采取了曾认同的建设性的态度，这将在对话中得到合适的体现。

几乎每个人都认同必须摧毁极权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是圆桌会议的职责，且由它决定如何来实现这一点。它必须来决定如何撤销宪法条款中的第一条，并确保政党从它在政治和社会上所占的支配性地位上退出，还要把党从社会和政治团体中分离出来，过去党曾渗透和压制了社会和政治团体长达40年之久。结果，最终达成了对宪法条款中的第一条进行实质性的修改，但圆桌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一如它所正
214 主导的事情一样多。许多部门采取行动，废除了工作场所中的主要党

组织。1 月底，记者联盟禁止在他们当中有这些组织，1 月 24 日，共产党政治局解散了军队和工厂中的政治组织。随之而来的变化更快。在 2 月，老的工会中央委员会被废除了，工会完全从所有政治组织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保加利亚独立工会联盟（简称 CITUB）。几天之后，当共产主义青年团自行解散后，另一个保加利亚的共产主义的突出标记也随之消失了。3 月底，祖国阵线经历改组，改组之后称为祖国联盟。

1 月底，保共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做出了关于党的重大改组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时被更大的、更对党员负有责任的政治机构所取代。正如姆拉得诺夫所说，旧政权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之上，进行独裁，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宣布日夫科夫将以贪污、滥用职权以及煽动种族仇恨的罪名予以逮捕。姆拉得诺夫同时宣布经济将在私有化、分散化和自由化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将引入多党民主并且将党和国家完全分离开来，为与此相符，他放弃了党主席的职务，保留国家元首的职务，而党主席由亚历山大·利洛夫（Aleksandûr Lilov）接替。与此同时，新政府以安德烈·卢卡诺夫为总理组建起来。农民联盟由于过去他们尴尬的名声，并没有加入新政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极权主义的崩溃致使保加利亚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纯共产主义的政府。不过仅仅名称上是共产主义的，甚至只是个名称也没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在 4 月初，保共便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简称 BSP）。

把党从国家和社会分离出来的尝试需要进一步地扩大个人自由以及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最重大的扩大个人自由的举措就是废除了内政部的第六局即原来的秘密警察。在 2 月和 4 月间，私有农业合法化，撤销了限制雇佣劳动力的法令，并允许自由经营零售业、服务行业和旅游业。3 月 6 日，罢工合法化，不过前提是在经强制仲裁和调解失败之后，但在军队、警察、港口、医疗服务和动力工业当中罢工还是禁止的。对少数种族也同样作了进一步的让步，3 月 5 日，议会接受了一项允许所有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姓名的议案。

215

保共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以及关于诸如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延误了宪法全面修改的进程。在保共和民盟进行的圆桌会议中也同样有很多的分歧，当3月底双方同意召开一个大国民会议来重新设计保加利亚政治体制的时候，这些分歧得到了解决。在最终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之前，即大国民会议的400名代表中的一半将以比例代表制的形式选出，另一半则由简单多数制选出，双方都不得不做出让步。

选举于6月10日和17日举行，选举结果为保加利亚社会党获得211个席位，民盟144席，其他主要的还有“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简称MRF）23席，农民联盟16席。卢卡诺夫仍担任总理。

按理说大国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宪政建设时期的开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特尔诺沃正式召开的会议伴随着喧闹的示威游行，由于“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出席而被激怒的反对土耳其人的人们组织了这次游行，而当会议挪到索非亚召开的时候，学生和一些其他的人举行了抗议，人们纷纷抗议没有对所谓的选举不公正进行调查。在7月早些时候，抗议者披露了一盒录像带，他们说，这盒录像带表明姆拉得诺夫曾在1989年12月极力主张用坦克对付示威游行者。姆拉得诺夫随后辞职，热列夫继而成为总统，而改由彼得·贝隆（Petûr Beron)，一个动物学家担任民盟领袖。但姆拉得诺夫的下台并没有停止抗议的声浪。几个月来，对终止共产党在媒体和国民生活其他方面的控制的呼吁持续不断，并在8月底导致了纵火焚烧在索非亚中心地区的共产党总部的一部门。

这场大火引发了更加审慎的情绪，变革要取得真正的进展目前仍是不可能的。必须出台一揽子的经济改革，但卢卡诺夫希望能够由一个联合政府通过这些经济改革，因为这样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全国都支持这些改革。但民盟拒绝加入联合政府。到11月，政治僵局和越来越糟糕的经济形势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自1989年之后，示威游行就一直是保加利亚政治生活的一个特征，现如今街头上再一次聚满了抗议者，其中很多是学生。眼看快要月底的时候，保加利亚独立工会联盟与和它竞争的工会联盟组织——“支持”工会都宣布了罢工，11月

216

29 日卢卡诺夫辞职，他的退职更多的是因为那些街头公众的抗议，而不是正当的议会程序所致。12 月 20 日，新政府执政，无党派律师，迪米特尔·波波夫（Dimitûr Popov）任总理。



插图 38　1990 年 8 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原共产党）总部的大火。

二、构建民主机构（1990. 12—1991. 10）

从 1989 年 11 月到 1990 年 12 月，大部分原党政机构已经被撤除，并且在对外关系方面，保加利亚也向世界展现出了新的一面。原先与苏联紧密的联系已不复存在，而与以色列、智利和南非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即使极权主义的机制已经消除，那些民主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部分是因为大国民会议，也许是整个国家还没有达成有效的共识。

217

波波夫政府的一项任务就是去达成那种共识。政府自称为是“一个保证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的政府”，并且作为这届政府执政的一个条件，它强调主要的党派必须同意一项和平有序的过渡。在共识达成后，波波夫政府才能够着手从街头政治中挽救政治进程，并使其回归到宪法轨道上来。而也只有在共识基础上，大国民会议才能够重新设

计宪法轨道。同时，政府还必须起草和实施经济改革。

起初倒是后者先有了起色。政府本不认为这将会是项很轻松的任务，但得益于工会和经理（雇主）与政府在1991年1月8日签订了关于维护社会安宁的三方协议。工会同意暂停罢工200天，作为回报，政府和经理人员们答应在处理经济过渡问题上尽可能的予以关注。当时，波波夫政府实质上引入波兰“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即开始放松对许多商品价格的管制，这项措施导致了很多社会的悲剧，而且社会安定也很快就受到了考验。

除了经济改革产生的混乱的结果外，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是一个方面。2月，教育部长宣布，在土耳其人聚居区，如果当地人愿意，每个教学周将有4个小时以土耳其语授课。这很快就激起了反应。在受影响的地方，特别是拉兹格勒（Razgrad）、克尔扎里（Kûrdjali）和舒门地区的教师持续地罢工，同时保加利亚孩子的父母进行了示威游行，并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民盟的人称这些反对改革的人就是20世纪80年代那些曾搞“再生进程”的，但不管情况是不是这样，政府认为应谨慎地推迟这项计划直到9月新学期的开始才再引入。

在大国民会议不再讨论经济或种族议题的时候，它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大国民会议对宪法讨论的关注。当对警察档案和大国民会议议员与前政治警察的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时，场面十分激烈。贝隆是这次冲突的一个受害者，在承认到国外访学时曾充当了一个不重要的情报人员的角色后，他辞职了。在他之后的民盟领导人是菲利普·迪米托洛夫（Filip Dimitrov）。当宪法辩论最后终于开始的时候，仍然还有一些干扰。一些民盟代表认为，由共产党控制的议会所起草的宪法是不可信的，在6月，他们中的39人就此进行了绝食抗议。当决定就关于未来保加利亚国家的性质举行全民公决的时候，也有些延误，有人委婉地提到是否该恢复君主政体。当这一问题占了差不多大国民会议两个星期的时间后，全民公决被取消了。

然而，最终大国民会议确实转向了政治结构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要把宪法明确下来，7月12日新宪法被批准。宪法规定保加利亚是一个法治

218

的民主国家，实行充分的分权制。总统作为国家的领袖由直选选出，任期为5年，并且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在保加利亚居住满5年，这是为了防止西美昂国王把自己列为总统候选人。将设立宪法法院，立法机关是由一个240名经比例代表制选出的成员组成的议会，还附有一个条件，全国投给各党派使其获得在大会中出席资格的票数，不得低于总票数的4%。

“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参与竞选的权利受到了质疑，反对者的理由是它违反了1990年颁布的一部法律，该法律规定不得建立任何以种族或者宗教联系为形式的政党，在质疑无效后，新制度下的第一次选举于1991年10月13日举行。38个党派最终参与角逐，但只有3个党派最后通过了4%的门槛，并且最终的票数结果令人烦恼地接近。民盟获得最多投票，但他们得到的票数仅仅只比保加利亚社会党多那么1%。民盟获得110席，保加利亚社会党得到106席，而“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则取得举足轻重的24席。农民联盟，一如过去因为内部分裂而造成了自我伤害。共有超过1/5的票投给了没有达到4%的下限的党派。

三、民主力量联盟政府（1991.10—1992.10）

在选举之后，由民盟的领导人菲利普·迪米托洛夫组成新政府。他的内阁主要由民盟的人员构成，民盟依靠“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获得了议会的多数，但“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谢绝加入联合政府，唯恐此举将会使新政府与公众舆论相疏远。而且，在内阁之外“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将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219

利洛夫在1991年年底辞去了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的职务，由年仅32岁的让·维德诺夫（Zhan Videnov）接替。在1992年初的总统竞选中，热列夫令人吃惊地经过了两轮投票，再次当选为国家元首。

迪米托洛夫的政府执政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这届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也十分有限。它花了大量的精力，试图强制性地重新分配原先被没收的土地，并且专注于清算或惩罚旧政权的官员，但成效甚微。保加利亚自1934年以来的第一位文职国防部长迪米特尔·路德耶夫

(Dimitûr Ludjev)，让750名官员包括10位将军退休领养老金。随着日夫科夫被判入狱7年，清算的迹象在9月也很明显了。日夫科夫是第一位被审问和判定有罪的东欧前领导人，但允许他以被软禁在家的方式而不是蹲监狱的方式服刑。对前共产党的强硬态度也反映在帕内夫（Panev）法律的内容上，该法律禁止任何曾在旧政权中有党务公职的人在大学或者高等专科院校任职。

清算进程的影响对于保加利亚利东正教来说是戏剧性的，其结果看似一场悲剧但又像是一场闹剧。1992年3月9日，马克西姆（Maxim）宗主教被解职。之后由议会宗教信仰委员会出具的一份报告说，他在1971年的当选是不正当的，并且有流言说他曾是一个“合作者”。5月，他的反对者推举皮蒙大主教（Metropolitan Pimen）为圣议会的代理主教。然而，6月，宪法法院宣布对马克西姆的免职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是政府对教会事务的非法干涉。皮蒙的支持者拒绝接受判决，并拒绝离开圣议会大楼，而作为民族的缔造者，东正教已处于这样有失体面的悲惨境地，其牧师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ûr Nevski）大教堂的台阶上斗殴。甚至到访的伊斯坦布尔普世宗主教（Oecumenical Patriarch）也不能消弭这种破裂。在许多人看来，马克西姆被免职是适当的，但处理的方式却非常不得当，这件事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正当的目的。很多人，甚至包括总统也认为迪米托洛夫政府应对这次悲剧负责。

迪米托洛夫政府屈指可数的相对成功的功绩主要在于外交事务。其中之一就是保加利亚于1992年5月加入欧洲理事会，还有与土耳其的官方关系的重大改善。这部分是因为两个国家在如何应对及控制由南斯拉夫的解体所引起的危机的问题上持有相似的观点。但也有其他的原因。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保加利亚认为有必要寻求新的针对邻国的防御形式，其中最大并最具实力的就是土耳其。对加入北约的提议，在1990年时还很少有人赞同，只是建议他们寻求与安卡拉的和解。保加利亚没有多少选择，只得听从这一建议并于1992年5月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



插图 39　格奥尔基·乔叟夫（Georgi Chaushov）针对保加利亚东正教的无能所做的卡通画，这幅卡通画见于 1992 年 12 月，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教会灾难性地分裂了。

马其顿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远离保加利亚政治的外交议题。1989 年 10 月 10 日后不久，那些自认为是在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曾试图在保加利亚建立马其顿政党，称为“伊林登”，但是遭拒绝。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斯科普里政府宣布独立，给索非亚出了相当大的难题，但是，1992 年 1 月 16 日保加利亚却成为第一个承认马其顿国家的国家。这一决议是一项临时决定，甚至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之前都没有得到事先通知。同时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这极大地激怒了希腊，希腊拒绝承认任何带有“马其顿”字样的国家。保加利亚无法承受与希腊关系不和的代价，因为希腊既是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国内投资的来源，并且希腊也能够在欧洲共同体复杂的权力走廊中，成为保加利亚利益的拥护者。为平息希腊的情绪，缓和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舆论以及相当一部分仍认为马其顿人是保加利亚民族一部分的民众，保加利亚政府承认了马其顿国

家，但拒绝承认一个独立的马其顿民族的存在。此举并没有平息希腊人的情绪，也几乎没有安抚保加利亚国内被冒犯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并且导致了在保加利亚人与马其顿人关系方面，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复杂化局面，尤其是因为保加利亚人拒绝承认马其顿语作为独立的语言，而马其顿坚持在正式协议及两国交流中必须使用马其顿语。这一僵局持续8年始终未予以解决。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之间的和解尽管还有缺陷，但在日益动荡和无序的东欧地区中则成了稳定有序的因素，特别是当这一地区的其他党派认真地考虑强行分裂国家的时候。

热列夫总统在承认马其顿问题上走在前头，尽管政府对此担忧，223 但最终并没有予以阻挠。但总统和政府的关系并不好。期间在类似对于情报机构的控制的问题上有过些断断续续的小冲突，但在1992年夏季晚些时候，总统对政府进行了直接的抨击。热列夫说，因为政府方面的无端侵犯，它已不仅仅造成了社会剥夺，而且使其疏远了工会、新闻界、非议会党派，甚至是教会。民盟也同样强有力地进行了回击，但它现在需要额外考虑一个因素，因为“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艾哈迈德·多甘（Ahmed Dogan）这时站在总统一边，而政府依赖“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议会中形成多数。

“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自身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政府的经济改革对土耳其地区造成的冲击甚至大于国内其他地区，因此许多土耳其人认为土地私有化措施带有对他们的歧视性。对此他们以移民国外作为回应。如果这第二波的移民浪潮继续下去，那么土耳其人口的流失会致使“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失去要在议会中拥有席位所必须的全国4%的选票。9月时，“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为证明其实力，迫使议会的议长下了台。

10月，据说总理的一位顾问卷入涉嫌非法向马其顿出售武器，迪米托洛夫和热列夫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迪米托洛夫公开指责这是情报机构与总统的亲密顾问合伙散播的谣言。接着是又一轮对情报机构控制的争论，终于使迪米托洛夫内阁政府寿终正寝。10月28日，在议会通过了对迪米托洛夫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之后，他宣布辞职。



插图 40　热柳·热列夫

迪米托洛夫政府的执政和下台都是通过正当的宪法途径的。但它辜负了很多支持者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迪米托洛夫政府在议会中缺少可靠多数的结果，但也有更源于内部的错误。1990 年热列夫当选为总统，这使得民盟抛弃了其最为强有力的稳健的成分，并且此后，坚定的反对派理论家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因此，热列夫和迪米托洛夫内阁成员之间突出的分歧，凸显了保加利亚宪法改革这一主要的未解决的问题即总统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

224

民盟的力量因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到加强，这些危机给大多数保加利亚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度的困难，并且迫使联盟中的主要党派进入一种更为对抗的态度。迪米托洛夫及其内阁不敢得罪这些集团。因此，政府不是在寻求和维持共识，而是屈服于它的更极端的支持者的压力之下。结果，政府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对诸如日夫科夫和马克西姆大主教这样的个人清算问题上，花在了类似农业私有化问题的准备不充分的立法问题上，而在需深思熟虑，有效的经济改革上，尤其是在关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政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少之又少。5 年后，政府的这种做法以戏剧性的方式得到报应。

四、贝罗夫政府（1992.12—1994.9）

保加利亚社会党无法填补因迪米托洛夫政府的倒台而留下的真空。因为它无法得到议会中足够的支持，并且其新领导人目前即没有在党内，也没有在公众眼里充分地树立起形象。只有总统和“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仍作为有效的力量，但是后者并不能组阁政府。然而，它确实同意支持一个由大部分无党派的技术专家组成的政府。新总理是著名的经济史教授，并曾担任总统的经济顾问的柳宾·贝罗夫（Liuben Berov）。

在贝罗夫政府组阁前不久，欧盟宣布它将与保加利亚签署一项临时的贸易协定。如果这对保加利亚来说营造了一个新未来的希望，那么这样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直到 1993 年的 12 月，欧盟内部的争论

一直阻碍了协定的执行。这被描绘为是对贝罗夫政府的失望的象征。

贝罗夫政府统治时期的保加利亚浪费了很多精力。贝罗夫试图给经济改革进程以新的活力的尝试失败了，并且他也激怒了很多人，他们认为贝罗夫不光是在白费力气，甚至是有所倒退。反对替换政府的媒体当中也有许多抱怨，最猛烈的批评直指1993年10月的司法法案，该法案意味着司法界的最高职位将只限于那些曾在共产党政权下担当此职的人员。该法案被递交给了宪法法院。这一司法法案是贝罗夫政府少数几个稍显决心的事件之一。

对内阁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它在议会中缺少明确的支持。到1993年夏季末，政府在议会中所依赖的“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凝聚力已经减弱，同时民盟和保加利亚社会党也遭遇了党员脱党的问题。这增强了各种各样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到1993年夏季末，这样的政治活动似乎已取代了政府。这一情况在1994年也没有多大改善，部分是因为在那年春天，贝罗夫自己也无能为力，他因身体原因必须接受心脏手术。

既始终无法颁布适当的经济改革又不能遏止不断上升的犯罪浪潮，这使得保加利亚政府的软弱更加惹人注目。上述两个问题又因对南斯拉夫实施的制裁而加深。

贝罗夫政府因民众对于经济停滞和犯罪率上升问题的失望而遭削弱，最终在1994年9月倒台，随后任命雷内塔·因卓娃（Reneta Indjova）——保加利亚第一位女总理组建看守政府。在12月举行的选举中，保加利亚社会党赢得了彻底的胜利。上一届政府无力处理经济不平稳和犯罪问题是这次胜利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先前的5年被认为是由民盟主导的时代，尽管民盟在那5年中只当政了1年，但认为其意识形态主导了那一时期。民盟实际上对没有进行一项适当的经济改革、对从极权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间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上升的犯罪和腐败、影响了全国的道德的普遍缺失负有责任。

五、经济改革的失败（1989—1994）

在姆拉得诺夫1989年12月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他

226 曾承认了保加利亚的外债不是只有如日夫科夫先前说的 30 亿美元，而是有 120 个亿。这仅仅是保加利亚经济坠入困境的许多标志中的第一个，而且，尽管保加利亚过渡时期的情况如此，经济改革总是似乎让位于政治重建和党派斗争。例如，1990 年的圆桌会议很少关注经济问题。

保加利亚面临着许多前苏联集团的其他成员所未曾经历的特别的经济困境。第一，保加利亚的经济与“经互会”的联系比所有的东欧国家要远远紧密得多，因此“经互会”的崩溃意味着保加利亚不得不构建贸易的新模式，其首要目标就是要与欧盟和美元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贸易关系。但一系列的因素使这一目标变得甚为复杂。首先保加利亚生产的货物质量太差，因此只能出口到受管制的市场，例如“经互会”提供的那些市场，而这些货物西欧和美国人是不会买的。其次初级产品同样很难销往国外，主要是因为保加利亚能提供的最好的是诸如水果和葡萄酒一类的产品，这些产品欧盟已经过剩了。不久，保加利亚国内的生产水平也出了问题。第二，是保加利亚独有的问题，当经互会崩溃的时候，它认为与前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即利比亚和伊拉克减少贸易量是明智的。为了在西方建立和保持一个良好形象的需要，索非亚严格的遵守了联合国安理会对那两个国家的制裁。但这么做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伊拉克是保加利亚最大的债务国，两国前不久才达成协议，其中规定伊拉克的债务将用石油来偿还，并且 60 万吨的石油应于 1990 年交货。第三，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在 3 月的时候，卢卡诺夫总理暂时终止了用资金支付保加利亚的外债，并且在 6 月他对支付利息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使获得硬通货贷款难上加难。

尽管保加利亚往后退了一步，西方尤其是美国仍准备援助，并且美国顾问帮助卢卡诺夫起草了应急改革计划，他们认为如果保加227 利亚想要恢复经济稳定，这些措施是必须的。但当民盟拒绝与他联盟的时候，他遭遇了政治上的困境，民盟强调既然是社会党单方面在过去把情况弄得一团糟，那么就必须由他们独自承担政治后果，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可想而知，情况仍旧糟糕。1989 年的收成是惨

淡的，尤其因为土耳其人的大批离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是在农田上干活，就是参与流通过程，9 月食物配给从其他省份扩大到了索非亚。1990 年的头 7 个月，生产较 1989 年的较低水平时期还要低了 10%，通货膨胀仅在 5 月和 6 月就高达 108%，并且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当卢卡诺夫 11 月下野的时候，他已经对挽救局势无能为力了。

波波夫政府在 1991 年 2 月 1 日试图推行保加利亚式的“休克疗法”来挽回局势。议会在 2 月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政府终于占据优势，在不懈努力下，成功地通过了为最终农业集体化解体和小企业私有化铺平道路的法律。在夏季，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进一步地放宽价格管制，这一轮改革也使得保加利亚国家银行开始向议会而不是政府负责。

两阶段的系列改革都是痛苦的，但它们确实证实了保加利亚的改革愿望，并且也打消了西方政治家和银行家的疑虑。3 月早些时候，保加利亚是由欧共体出资的东欧重建援助受益国之一；8 月，世界银行批准了一笔 2.5 亿美元的主要贷款。

迪米托洛夫政府接续了这样的进展。1992 年 2 月，保加利亚公司的外国所有权和利润的汇出合法化。更多的银行改革付之实施，私有化法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搁置后于 4 月份通过。在同一个月，尽管保加利亚社会党声称反对，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其内容是把 1947 年至 1962 年被政府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其前所有者。在前一个月，土地私有化法案规定，所有的农村公社于 1992 年 11 月 1 日之前必须解散。这是一项核心法案，但是先前并没有悉心准备，导致出现了大量关于限定个人的要求，以及在许多冲突的事件中，如何在冲突双方做出裁定的问题。此外，在既得不到政府的帮助，也失去了从前合作体系的依靠的情况下，许多新个体经营者衰退到自给性农业的地步，这给国内和出口市场的食物供给带来了严重后果。

228

迪米托洛夫政府对实行政治报复的兴趣要大于对经济重建的兴趣，在农业集体化解体的立法上缺乏远见就是诸多表象之一。政府确实继

续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已不再享有由波波夫营造的社会一致那样良好的环境，三方协议于1992年4月瓦解。到夏季中旬，社会和工业的动荡局面随着公务员的罢工蔓延开来，尽管有1990年的法律规定，但索非亚的运输网、港口和医疗服务系统还是进行了罢工。政府被迫同意将国家职工的工资提高26%，此举削弱了政府控制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努力，并且几乎没有打动任何国际金融组织（IFIs）。

柳本·贝罗夫在执政后不久提出了一个经济方面的“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并没有什么成效。国内投资极其令人失望，而私有化方面，尤其是土地私有化远远落后于预定计划。贝罗夫的计划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当前的经济衰退能够由更多的政府投资来补救。通货膨胀曾被证明将刺激增长。这不仅仅使民盟感到惊恐，而且使得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贝罗夫计划允许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提出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就对保加利亚缺乏经济改革表示关注。与此同时，外债问题变得更棘手了。3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会议中，持大部分债权的伦敦俱乐部的银行家们提供了减免总债务中的38%的优惠措施，但贝罗夫予以拒绝，他提出减免50%总债务的要求。最终保加利亚取得了成功，不过在债务款项数目方面达成的协议也意味着不得不尽快开始还款了。而这将因另一项经济衰退而变得更加困难：列弗的贬值。保加利亚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进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经济成果之一就是稳定了本国的货币，汇率在3年内平稳地保持在25到30列弗兑换1美元。而到1994年夏季，汇率开始下滑，尽管币值由保加利亚国家银行的干预而得到支撑，但这样的干预却不可避免地刺激了通货膨胀。贝罗夫政府开始增收的增值税并没有使得财政收入如预期地多增加40%，相反，政府赤字和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却成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为了政治上的原因，保加利亚1992年同意遵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的制裁，并且又于1993年春天极度地加紧了制裁，这使得保加利亚的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保加利亚坚定地站在了联合国的立场上，但是一如对伊拉克的制裁一样，制裁造成的代价是惨重的。穿越前南斯

拉夫的铁路和公路干线是保加利亚贸易的主要动脉路线之一，尤其是出口鲜活农产品的动脉路线，虽然仍有经罗马尼亚或者经海上的唯一可行的取代路线，但是这条线路既慢又堵。罗马尼亚路线甚至一度因1993年8月的铁路工人罢工而停运。到9月，因制裁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了27.1亿美元，有人把所有因制裁造成的损失做了一个估计，如那些对伊拉克、利比亚还有南斯拉夫的制裁，损失加在一起达到了130亿或者相当于保加利亚总的外债数额。在1993年末，联合国批准了一项保加利亚货物的运输协议，但是范围有限并且充斥着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所以可以说这项协议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日夫科夫下台后的5年里，保加利亚经济显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重建。使人最彻底失望的是私有化进程。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明朗了，整个经济和经济改革受到了新邪恶力量的支配。

六、维德诺夫政府与1996年的大灾难

因为1994年12月的选举，保加利亚社会党成为自1989年以来在议会中享有压倒性多数的第一个政党。它赢得了52.08%的选票以及125个席位，民盟获28.65%的选票和69席，“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获得选票的6.25%和15席。拥有议会代表的还有人民联盟（简称PU），获7.5%的选票和18席，保加利亚商业集团（简称BBB）得到5.42%的选票和13席。人民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主党和保加利亚农民国家联盟—尼古拉·佩特科夫，两者都在9月脱离了民盟。保加利亚商业集团正如它的政党名称所表明的，代表着商业利益，并且它的选举形象因它的异国领导人格奥尔基·甘彻夫（Georgia Ganchev），一个在伊顿公学任教的前击剑明星而得到增强。 230

议会中重又出现一个占绝对多数的党，这在保加利亚燃起了希望，甚至在许多非保加利亚社会党员的心目中也是这样认为的，最终强有力的政府和有效的重建将是可能的，最终政府将取代保加利亚后极权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起初维德诺夫并没有辜负这样的期望。他任命了一个内阁，其中成员包括一些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人和环境

压力集团"环保组织"中的一个代表。在他自己的党内，他与从前的支持者，保守派的利洛夫决裂了，并且他周围都是些前共青团里的同事，他们既年轻并且给人以具有效率和现代化气息的印象。维德诺夫在其总理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他的目标就是要扭转经济的下滑，进一步使保加利亚融入欧洲组织，并且打击犯罪，他的演说使人坚定了这个新近燃起的希望。在 1995 年 5 月，他提出了一项行动方案，其中他重申了那些承诺并且表明了他对于"社会市场经济"好处的信念。维德诺夫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将要修复并改善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关系。

维德诺夫不单单在他主要声明的全部 4 个目标上失败了，而且他使得国家濒临饥饿，并使得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新政权的最初几月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灾难即将降临的迹象。与俄罗斯的关系已在贝罗夫政府时期得到了改善，1993 年 4 月，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由俄罗斯向保加利亚提供天然气的一项长期协议，1995 年 5 月，两国关系再次升温，双方在贸易、国防和管道建设的合作方面缔结了进一步的协定，根据管道建设协定，为输送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将建设从保加利亚布尔加斯港至希腊的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upolis），以及通往巴尔干半岛其他地方的管道。一个新的俄保合资公司即顶级能源（Top-Energy）公司相应成立来执行此项协定，前总理卢卡诺夫出任公司的总裁。

同样在经济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黎明。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 个百分点，并且那年头半年的贸易盈余额为 1.063 亿美元。甚至通货膨胀也似乎得到了控制，前半年的总体比率为 15.2%，同比 1994 年的同一时期则为 59.4%。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国家银行信心十足地在 1995 年下调利率多达 7 次。

这样的黎明后来被证明为是假象。甚至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快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在关于建设管道的长期谈判中，保加利亚方面发现要当俄罗斯的合伙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以致于保加利亚人指责他们是进行不公平交易。俄罗斯人甚至坚持，保加利亚要保证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而且俄罗斯方面则不作任何补偿性措施。维德诺

231

夫虽没有加入北约的意图，但要他在外国政府的命令下做出这样的保证是不可能的。1996 年 4 月，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声称保加利亚可以像白俄罗斯（Belarus）一样，与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签署一项一体化协定，这使得索非亚当局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并且这项提议激怒了许多保加利亚人。到 1996 年年底，保加利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比起维德诺夫刚执政那时更为糟糕。

然而，维德诺夫政府的重大失败不是在外交事务而是在国内事务上。一个是食品问题。我们虽不能让维德诺夫为民盟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许多缺陷背黑锅，但新政府应该对允许谷物出口负有责任。当在国内粮食短缺的时候而把粮食销往国外，其合法性是有疑问的，出口机构包括很多大的联合企业，这些企业不久之后在保加利亚事务中扮演了有害的角色，多名部长包括维德诺夫本人据说与之有很密切的联系。

在更为广阔的经济层面，1995 年底第一次显示出了先前的恢复是一种虚假的迹象。先前政府承诺的私有化计划进展微乎其微。维德诺夫政府倾向于换购计划，此计划曾在捷克共和国内施用并且比起其他代替计划对左翼政党来说更能接受，因为它把所有权交给了全体大众而不是富裕的那一部分人。然而，维德诺夫的私有化并没有保证使得所有权和对于企业的控制权转到了那些最有能力经营企业者的手里，232 也没有赚取大量的外币，更何况，在保加利亚的情况是当公司处于近乎绝望的境地的时候才能进行私有化。实际上，维德诺夫政府的心思并不在私有化上，当最终政府决定将1 500家企业，大约相当于国有资产的 20% 进行私有化的时候，经济和政治气候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1995 年 12 月发出了第一场暴风雨预警，当时财政部长宣布当年的财政赤字将比预计的多出 17 个百分点。这就给列弗在对外兑换上施加了压力，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利率于 1996 年 2 月从 8% 提升到了 42% 。危急的事件于同月出现。这年早些时候，农业信贷银行“维托沙”（Vitosha）发现其自身已处于困境之中，在 1 月份，它从保加利亚国家银行收到一笔3 300万的贷款。但即使是这样也已无法使其维持

正常的运营，因此它试图收还大量的不良贷款。但钱最终并没有收回来，于是保加利亚国家银行在2月底接管了“维托沙”。实际上“维托沙”银行已经倒闭了。

“维托沙事件”暴露出了保加利亚从共产主义转型的过渡期间的弱点，不仅是政治领域还包括经济领域存在的缺陷，突显了腐败和政治体制、腐败和经济之间的关联。在过渡期的前几年，许多工业经理与私有企业达成协议，以夸张的价格从后者购买原材料，然后将常常获得政府补贴的成品以极低的价格销售。那些经理从私有企业利润中抽取一部分，而工厂工人则因并非实际的工资增长而乐得其成。当政府试图强制实行信贷限制而规范企业时，企业要么不偿还他们购买的物资款项，要么从银行贷款来摆脱控制。银行知道这些贷款的偿还希望渺茫或者根本没有希望了。国有企业和银行实际上已不受国家的控制了。人们认为，这些都是在联合大企业的控制之下，或者用流行的说法，处于“黑社会”（the mafia）的控制之下。

保加利亚黑社会的起源尚不清楚。在苏联解体前夕，保加利亚党内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像东欧其他地方一样，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据说使用他们在党内的强势的地位，把钱转移到瑞士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1989年以后，这些钱有时会用来成立国内和国际贸易公司，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合并为松散的联合体或者是联合大企业。联合企业的财富和影响力因对南斯拉夫的制裁而得到增强。这些企业从走私非法的货物中盈利无数，并且许多钱被用来贿赂各个阶层的官员，让他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联合企业同时还卷入了对国有企业的诈取。任何从这些勾当中获利的组织都不希望看到有效的经济改革的出现，或者看到那些他们可以从中获利的企业进行私有化。而且很多类似的组织都有足够的钱买通在议会中的投票和买到在执政党中的影响力。还有很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为了保护他们利益将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1996年10月，前总理安德雷·卢卡诺夫被谋杀就是那伙和联合企业有联系的帮派干的。联合企业的势力还能确保当毫无希望的破产企业

前来要求更多的贷款时，银行始终屈从于它们的意志。正是看到这一点，热列夫总统在 1996 年 3 月声称银行正在“掠夺”这个国家。

尽管总统发出了的警告，但是危机还是加深了。列弗持续贬值，4 月 16 日，当超过两家银行不得不置于国家银行的监管之下时，那一周的星期五成了“黑色星期五”。因为担心他们的储蓄将化为乌有的储户们急忙取出了他们的存款，用之购买货物或兑换成可靠的货币。对此，政府被迫采取了行动，维德诺夫宣布将关闭最大的 64 家亏损企业，而且另外 70 家将被“隔离”，意思就是他们将不再得到国家的补贴或贷款。同时，将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其中包括把增值税从 18% 提升到 22%，对进口征税，并且大幅提高燃料和公用事业的价格来缓和预算赤字。但这些还不够。列弗继续贬值，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它将不再提供援助，除非保加利亚允许其在保加利亚的国家银行的运作中拥有一些发言权，并且还要成立不受所有政府部门控制的货币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调控流通中的货币。但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件，这招致了对银行信心的进一步丧失。在 9 月又有 9 家银行不得不置于国家银行的管制之下，尽管再一次提高了利率，从而使得当前的利率达到了惊人的 300%，外汇市场还是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接连的一场危机。通货膨胀仍未得到控制，并且在年底的时候，年度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578.6%。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不可避免地使得实际工资贬值了，而这一问题又因拖欠工资达 3 个月之久变得更为严重了。

234

对于不断恶化的危机，公众做出了反应。在索非亚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中 7 月 7 日的游行估计有一百万人参加，但公众的愤怒还是在总统选举的 10 月和 11 月期间最明显地爆发了出来。那年夏天民盟迫使热列夫总统进行初选，热烈夫在初选中失败，民盟报复了当初热列夫和迪米托洛夫总理之间的不合。民盟的候选人彼得·斯托扬诺夫（Petûr Stoyanov）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律师，他很轻松地获得了第二轮竞选，民盟候选人获得 60% 的选票而保加利亚社会党候选人只获得 40% 的选票。保共的得票比两年前议会竞选少了整整 100 万张。

保加利亚社会党内同样也表达出了对于政府表现的愤怒情绪。在11月，党内的19名领袖人物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更换领导人并组成新政府。12月21日，维德诺夫同时辞去了总理和党主席一职。但这并没有平息抗议者的愤懑，尤其是当尼古拉·多布雷夫（Nikolai Dobrev）被任命为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的时候，因为他被认为和维德诺夫其实没什么两样。

1996年底，保加利亚已处于危境之中。经济破败以及社会剥夺的情况蔓延有所加剧。任何保加利亚将被列入加入欧盟申请国名单的希望都破灭了，这也宣告了维德诺夫先前宣称的将带领保加利亚更靠近欧洲的政策的失败。在总统的选举中，公众通过了对执政党失去信心的投票，人们普遍相信执政党与许多有问题的组织的关系过于密切。235 年末的时候，即将离职的总统向国民致歉并且承认他"为保加利亚政治阶层感到羞耻"。但是直到1998年的新一届议会选举进行之前，似乎并无法摆脱僵局。

1997年1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自从1994年输掉竞选之后，现由迪米托洛夫政府中任财政部长的伊凡·科斯托夫（Ivan Kostov）领导的民盟宣布，与保加利亚社会党不同，它准备遵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建立一个货币管理委员会。同时，它要求马上进行选举，因为如此重大的举措只能由一个获国民信任的政府来实施。民盟的声明唤醒了民众。和平的示威游行开始了，示威还因贝尔格莱德温和但大规模的民众压力很快迫使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接受了塞尔维亚地区选举中反对派的胜利而深受鼓舞。然而在1月10日，当反对派代表们退出议会时，情绪变得敌对起来，晚上，警察对闯入议会大楼的抗议者采取了强硬的举措；超过100人受伤，菲利普·迪米托洛夫也在其中。当制宪会议强迫即将就任的总统斯托亚诺夫（Stoyanov）邀请议会中最大团体的领导人多布雷夫组阁时，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罢工和游行示威席卷了整个国家，保加利亚的局势更临近于公开革命的局面了，或许此时比自1989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内战的边缘。直至多布雷夫在2月4日宣布他

将辞去总理一职，并宣布将于4月进行大选，而由民盟的索非亚市长斯特凡·索菲扬斯基（Stefan Sofiyanski）组建看守政府时，这才使得情势得到了挽救。

在选举之前，一些政党进行了重新调整。民盟与较小的偏右派人民联盟组成了联合民主力量（简称UtDF），不过民盟尚且还是其中的主要力量。“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领导阶层此时加入了很多其他的小党派，其中包括一些君主制主义者，它们共同组成了救国联盟（简称ANS）。这引起了党内高层的不满，在保加利亚的北部，一些“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地方组织打破党派界限，与联合民主力量组成了选举联盟。保加利亚社会党遭遇了许多脱党事件，脱离出来的党员组成了一个新的党派即欧洲左翼。

这些调整对于选举的结果几乎没带来什么影响。联合民主力量赢得了绝对多数的52.36%的选票并在议会中获137席。保加利亚社会党则获得22.07%的选票和58席。救国联盟获19席，欧洲左翼获14席，同时保加利亚商业集团获12席。 236

维德诺夫政府改变了保加利亚政治的本质，虽然它原本并不打算用这样的方式。它试图恢复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却遭到了俄罗斯的回绝，这近似于一种耻辱。人们普遍认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其中包括最高层与联合大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极大的降低了党的道德声望。并且它在经济政策上的完全失败使其与很大一部分的保加利亚民众疏远了。这些缺陷日积月累，特别是经济上的失败，其结果便意味着保加利亚目前已别无选择，只得寻求在欧洲——大西洋框架内的庇护、保障和救助，其中主要是来自欧盟和北约的。那就预示着将不得不开始真正的改革和重建。

七、科斯托夫政府与取得稳定（1997.4—2001.6）

伊凡·科斯托夫政府取得的一个显著记录是成为了保加利亚第一个执政满宪法任期4年的后共产主义政府。科斯托夫执政期间也致力

于加强总理制衡总统的地位，可以说他即使没有解决这个主要的宪法问题，也做了很多予以缓解。当1999年12月的欧盟赫尔辛基会议同意，应该把保加利亚包括在即将举行的加入欧盟谈判的国家名单中时，科斯托夫政府便可标榜自己实则已取得的另一个显著成就。2000年3月，保加利亚获准开始就欧盟法律的31章中的8章开始谈判。

这届政府最基本的一个目的是更为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这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政策，并常常伴有争议。然而欧盟一贯地采取强硬立场，以至于1999年3月受挫的科斯托夫宣布制定长远的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民对于15或20年之后的目标没有兴趣，他威胁道，如果成员国资格的谈判不尽快开始，保加利亚将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这一议题。但是，无论布鲁塞尔开出什么条件，保加利亚和欧盟继续进行谈判是唯一的选择。

237

融入的进展首先取决于经济的稳定、恢复和改革，其次取决于遵守由欧盟和北约提出的其他要求，第三取决于控制国内的犯罪和腐败情况。而进一步的融入这一体系，保加利亚显然将能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欧盟和北约友好态度的支持。

稳定住经济相对来说是容易和迅速的。科斯托夫兑现了其竞选前的承诺，于1997年6月创设了一个货币管理委员会。列弗与德国马克相挂钩——1999年后转为与欧元挂钩，国家银行被禁止增加货币供应量，除非国家的储备物资达到大约相应的量。这剂药方虽苦口，但是却是奏效的。仅在1997年2月达到的242.7%的通货膨胀率，到1999年7月却降为1.7%。银行的利率也同样降了下来，从1996年9月的300%的高位降到1999年8月的4.42%。外债数量同样也减少了许多，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骤减了近10亿美元。财政的稳定使得工资水平从受通货膨胀打击的1996年和1997年的低谷中恢复了过来。1997年2月的公共部门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5美元，但到1999年5月，平均工资已经提高到了124美元。

经济的恢复使重新的改革成为可能。价格管制再一次的放松了，而先前维德诺夫政府曾对大约52%的货物和服务重新实施了管制。

1999年1月，随着把31家企业投放市场买卖，掀起了第二轮私有化浪潮，到2000年底，保加利亚70%的企业已归私人所有。在一些私有化的企业中有一批大企业，例如国家主要的内夫托奇姆（Neftochim）炼油厂被卖给了俄罗斯卢克（LUK）石油公司，尽管保加利亚政府保留了一份"金股"，从而对可能涉及的大量减产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另一个经济上的进步就是卖掉了大部分亏损的国有企业。1999年7月，财政部长宣布保加利亚遵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在最后期限前关闭或者出售41家大型的亏损企业的要求。在索非亚以外的克雷米克沃特斯（Kremikovtsi）的大型冶金联合企业处于那些被卖掉的企业之中，而且是以一美元的价格被卖掉的。这些努力赢得了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对保加利亚的赞许。1999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高官称保加利亚的经济行为是"值得效法"的，并且良好的管理带来了更多切实的回报，特别是以拨款和贷款的形式所带来的回报，这包括了从欧盟获得的1.255亿美元贷款和从世界银行获得的总额为2亿美元的贷款。 238

其他一些经济改革的实行是因为布鲁塞尔直接施压的结果，虽然这些改革是令人痛苦的。2000年的时候，保加利亚关闭了311家肉制品公司和230家乳牛场，因为它们都不符合欧盟的标准，同时保加利亚取消了从欧盟进口470种农产品的关税。保加利亚这么做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到2001年4月的时候，欧盟拒绝给予保加利亚所剩的570家肉制品公司的任何一家以许可，而且全国的280家乳牛场也仅有4家得到了许可。到2004年3月，只有20家牛奶公司、12家屠宰场、3家肉品加工厂和4家鱼类产品公司拥有欧盟出口的许可。对食品加工公司的限制造成了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欧盟提出的要求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由科斯托夫政府推行的其他改革也反映出了布鲁塞尔所想要的，或者假定是它想要的。1998年的时候，采用了配备国家资助的除了保加利亚语之外多语言项目的立法，目标针对"母语非保加利亚语的保加利亚人"，从而使得在2000年5月的时候在国家广播和电视上用土耳其语进行广播成

为可能。政府同样希望通过资助一些至少能用土耳其语进行教学的教育机构来给欧盟留下良好的印象。保加利亚为了能用土耳其语进行教学和广播成为可能而采取的举措并没有如预期的或者一些外部机构所要求的那么多，这也并不完全是保加利亚当局的过失。保加利亚缺少受过训练的教师和播音员，而在教学领域，很多土耳其孩子的父母，包括他们的孩子倾向于不上用土耳其语进行教学的课，而如果上了这样的课程，正如孩子们确实经常上这样的课，就等同于失去了学习另外一种外语，诸如英语或者德语的机会。2001 年 1 月，在高中推行欧盟一体化的课程是一项更明确的，旨在加强保加利亚在欧洲前景的教育改革。课堂上通过地理、历史、经济和哲学这些课程来教授当代欧洲的知识。因此，或许教育家们正下意识地引导保加利亚人形成欧洲国家的意识，正如他们一个半世纪前曾引导他们形成他们自己的、保加利亚民族的意识，一个半世纪前曾引导农民形成祖国意识的知识界，现如今引领着国家朝向欧洲一体化迈进。

239

国家生活中更大的透明度是保加利亚本身追寻的正当的目标，而且也是为了进一步提升保加利亚在欧盟中的形象。1997 年秋季，警察档案开放接受检查，并且内政部长第一次公布了一些政治家和国家官员的名字，其中的 23 人曾为共产党情报机构工作过。一份在 2001 年 5 月公布的报告披露了 129 名或自 1990 年以来保加利亚议员中大约每 10 人中就有近一人曾为前安全部门工作过，并且一批非政坛人物的名人，例如保加利亚的第一位宇航员格奥尔基·伊凡诺夫（Georgi Ivanov）同样也被指为告密者。这件事情被揭露出来使得一些政治人物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是，经 2001 年 2 月的法律许可来公布姓名并且进一步接触这些敏感文件，对于制止具有破坏性的影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影射是先前保加利亚公共生活的主要特征。真相的揭露也同样使令人不快的“档案勒索”事件变得更为困难了。

另一份重要的档案资料发现也出来了，不过，它来自私人研究而不是政府的政策。2001 年 1 月，一位爱调查研究的记者发现并出版了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再生进程”的材料。这份材料表明在1985年1月，也就是在格奥尔基·阿塔纳索夫（Georgi Atanasov）被提名为日夫科夫的总理前不久，他命令对北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进行同化。这一发现也揭示了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日夫科夫命令进行社会同化的进程或者采取相应的暴力措施，但有清楚的证据显示了他知道此事，并且并不反对这些策略。

如果说经济改革、扩大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以及国家生活中的更大的透明度在先前是自愿推行的措施，因为据认为这将增强保加利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机会，那么要接受和执行来自布鲁塞尔的直接要求就显得困难得多。特别是3条要求困扰着科斯托夫政府及其继任的两届政府。第一就是部分关闭位于科兹洛杜伊（Kozlodui）核电联合体，第二是进行司法改革，第三是清除腐败。

欧盟认为科兹洛杜伊6个反应堆中有4个是不安全的，要求将其关闭。但因为这家核电厂生产了保加利亚的至少1/3的能源，而且保加利亚国内并没有可替代能源，所以这项要求显得很苛刻。就是这项要求在1999年3月激怒了科斯托夫，并且他愤愤地补充说关闭科兹洛杜伊将摧毁保加利亚仅有的一点国际竞争力。然而，最终科斯托夫政府还是屈服于布鲁塞尔的要求，并于1999年11月同意将于2002年前关闭最老的两座反应堆，另外两座则将于2006年前关闭。欧盟作为回报，答应给予2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帮助减少因关闭反应堆而造成的影响。司法改革的问题直到科斯托夫离任后才予以了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与欧盟同样严格要求的解决腐败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正是科斯托夫政府发觉不可能予以达到的要求。

科斯托夫内阁在决定推行得到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同意的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遇到困难，尽管这些政策并不总能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赞同。科斯托夫曾在即将就职时宣称，加入北约是这届政府的目标而议会也是支持他的。甚至是曾对北约充满敌意的保加利亚社会党，几年来也一直承认确实没有别的可选择的安全伞了。因此并不惊讶的是，政府对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进行全力的外交支持，并允

许北约的飞机使用保加利亚的空军基地，这是一项特权，1999 年 6 月，俄国想要给从波斯尼亚来的、要赶赴普里什蒂纳机场的军队空运补给，希望也有这样的特权，但保加利亚拒绝了。尽管国内极度反对，但是保加利亚对于科索沃的态度得到了认可并于同年 11 月得到了回报，这年 11 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了索非亚，这是第一次一个当政的美国元首踏足保加利亚这个国家。

241 如果保加利亚想要向北约迈进，那么顺从的外交政策还必须附加上保加利亚武装力量的重建，保加利亚武装力量在很多方面仍带有华沙条约组织的印记。因此，在 1999 年 9 月的时候，政府推行了一项“2004 计划”来精简军队并提高军队建设的效率。巴尔干半岛的动荡和渴望与北约增进联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 2001 年最初几个月当马其顿政权因阿尔巴尼亚人叛乱而似乎要被颠覆的时候一表无疑。科斯托夫政府立刻缔结了一项协定，允许北约使用保加利亚的领土来运输和部署军队。签署类似协议的，科斯托夫政府还是第一个，并且它是在没有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尽管得到议会的批准并不费时也很容易。

另一个得到北约极力支持的进展就是创立了维持巴尔干地区的维和部队。1998 年 9 月在斯科普里召开了有意大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各国的国防部长参加的会议，会上同意了建立一支 3 万人的联合部队，总部于第一个 4 年将设在普罗夫迪夫，其后总部将在成员国之间轮换。其总部于 1999 年 9 月成立了。

北约将不会接纳任何与邻国存在边界纷争的国家，这一点无疑是保加利亚与马其顿于 1999 年 2 月缔结条约背后的因素。两国都否认对方对于任何领土的要求，两国间在协议文本上使用一种文字还是多种文字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它们都将成为“两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实际上，保加利亚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但已经承认了马其顿语言的地位，这意味着将近 20 个协议（其中的一些已经搁置了好几年了）可以生效了。此后保加利亚与马其顿总体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在科斯托夫执政期间，另一项重大的巴尔干双边关系的发展是与罗马尼亚就横跨多瑙河上建造第二座大桥签订了一项协定。关于这一问题曾在之前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零星地讨论过。这座桥是非建不可的。鲁塞和吉乌尔格沃（Giurgevo）之间已有的那座桥是远远不够的，卡车经常要不得不等上10天之久才能过河。罗马尼亚人曾 243 反对保加利亚人关于桥应该建在两国共同边境的最西面的观点，而罗马尼亚人是倾向于一个更东面的路线的，这条路线将更靠近布加勒斯特，并且因为在罗马尼亚境内的通行路线将更长的关系，所以将带来更多的收入。两件事情改变了布加勒斯特的态度。第一是来自欧盟的压力，欧盟想把这座桥作为泛欧洲运输第四走廊的部分来建设，一个计划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把希腊和西欧连接起来的路线。第二个就是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这次危机显示了一旦通过南斯拉夫的路线封闭后，交通路线是多么的缺乏。而且欧盟也同意提供一些财政援助。

在同布鲁塞尔关于入盟进行谈判期间，保加利亚总是与罗马尼亚并列在一起，很多保加利亚人对此愤愤不平，原因是他们认为保加利亚的改革比起他们北面这位比他们大的邻国来说更完善，并更有成效。因此，在2000年末，当宣布保加利亚的公民将可以，而那些罗马尼亚公民则不能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申根区时，对保加利亚人来说着实是很鼓舞人心的。这项协议于2001年4月生效，那意味着当保加利亚人要想在欧盟大部分地方旅行时，可以免去复杂、费时并且昂贵的签证手续。

在2000年末的时候，科斯托夫内阁极其需要诸如关于申根区自由进出的批准之类的好消息。政府的支持率直线下落，在选举年初即2001年2月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对联合民主力量的支持率比上次1997年的选举之前的民调低了30个百分点。政府不受欢迎的原因有很多。



插图41　娜杰日达·米哈洛娃（Nadezhda Mihailova），日后的外交部长，由她女儿陪同，于2001年4月在与希腊的边境上出示她的护照。更为重要的是，护照上没有签证，因为保加利亚的公民获得了可以不需要签证便自由进入申根（Schengen）区的资格。

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当开始普遍地感受到由新的改革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影响时，经济恢复减速。1998 年第一个季度，经济强劲地增长了 19.8%，但这是相对于 1997 年萧条程度的增长。而 1998 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只有 3.5%，并且 1999 年的第一季度又降到了 0.7%。经济没有出现在此程度上的大幅度增长。贸易赤字也主要因为出口的下滑大于进口原材料的增长而增加了。这部分归咎于俄罗斯 1998 年的经济危机，但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是因对南斯拉夫的制裁而造成保加利亚贸易的阻断。这激起了广大民众对于政府支持北约行动的愤恨。无论是什么原因，迟缓的经济增长率使得国内投资受挫。通货膨胀向上增长。1999 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超过了 6%，并且在 2000 年超过了 7%。这很大程度上都归咎于平均月工资的降低，平均月工资于 2000 年 11 月回落到了 110 美元。2001 年早些时候，政府更因已私有的国家航空公司的倒闭而陷入窘境，国家航空公司旗下的飞机不得不于那年的头几个月停飞。

244

经济改革的影响对那些收入固定的，尤其是领取养老金的和单亲父母来说是最痛苦的。但最普遍的问题是失业率的上升，到 2000 年 2 月的时候失业率到达了 18.4%，在一些萧条的地区，尤其是吉普赛人口聚居的地区，失业率高达 80%。失业问题的另一个令人不安方面是在年轻人中的失业问题，并且尤其是在那些学历最高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青年失业者采取了极端措施，他黑了总统的网站，此人并没有破坏任何东西，而只留下了一个抱怨工作难找的信息。斯托扬诺夫总统立刻给了他份工作，但是对大部分很多有能力和进取心的保加利亚青年的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因此他们沮丧地和一大批有才能的青年选择移民，从而离开了他们的祖国。

另一个更令人烦扰的方面是很多经济上破产的人怀疑一些少数新近的富翁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犯罪是猖獗的，并且似乎没有得到控制。2001 年早些时候，索非亚 10 天内就发生了 6 起谋杀案，尽管内政部长否认了存在犯罪的浪潮，但是有一点他也不得不承认的

就是犯罪率已经上升到平均每天就有 380 起犯罪事件的发生。甚至前国王也是受害者之一，当他于 1999 年访问索非亚的时候，小偷们偷走了他的一部手机和一些属于他女儿的珠宝。犯罪的上升以及枪支的扩散在民众之间引起了普遍的恐慌和愤怒的情绪。

人们对于严重的腐败现象表现得更为愤懑，这一怨愤成了科斯托夫政府衰落和下台的主要原因。腐败和经济犯罪的问题很难厘清。2000 年 5 月的时候，据估计，非法经济占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并且 1998 年的跨边境非法贸易额度达到 8.5 亿美元，这就相当于整个的国防预算。有人怀疑走私者使用的渠道是共产党时代的特务机关控制的渠道，并且很多走私者本身就是前特务机关的官员，后来他们通过将他们的前秘密警察网变为私有而成为商人。当科斯托夫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曾明确地表示将绝不容忍和宽恕利用职权从事腐败的部长们。不光是因为这是不道德和危害社会的，而且欧盟和其他国际机构强调，铲除腐败这一罪恶是必须的。但是这一罪恶并没有被铲除，而且随着新千年的破晓，它成了保加利亚政治的主要特征。

245

在 2000 年的夏季，一些俄罗斯商人被控有些非法行为，从而被驱逐出境，在 2001 年的 3 月，又有 3 名俄国外交官因间谍行为而被驱逐。这是保加利亚第一次驱逐俄国外交官，这使人联想起 19 世纪 80 年代对抗俄国将军的事情。科斯托夫政府并不是过分在意与莫斯科关系的下滑，并且当俄国人索要被驱逐的商人的情报材料的时候，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娜杰日达·米哈洛娃提醒他们说，华沙条约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保加利亚目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的国家。但如果在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事件上就能强调国家主权的话，那么在商人问题上最后那句狠话其实就不用说了。

驱逐某些腐化的外国人给索非亚当局增添了一些声望，但却远不够使其遮盖因国内腐败而引起的弊端。2000 年 4 月的时候，政府发言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Mihail Mihailov）被指控从一名商人手中接受 1 万美元的贿赂，尽管米哈伊洛夫否认了对其的指控，但

其后他仍被迫辞职。6 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更令人尴尬的事情，政府的欧盟首席谈判人员亚历山大·鲍日科夫（Aleksandûr Bozhkov）在总检察长的办公室就他的活动向科斯托夫发了一份报告后也被迫辞职了。鲍日科夫先前曾是负责私有化的部长，期间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10%先生”的绰号。然而，最要命的打击出现在 9 月，反对派日报《劳动报》（Trud）揭露了俄罗斯黑手党曾捐给由总理夫人叶莲娜·柯斯托娃（Yelena Kostova）管理的慈善基金会 8 万美元的款项。她并没有试图对此事进行否认，甚至争辩说把一些不干净的钱用来做好事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曾把钱转账给柯斯托娃基金会的俄罗斯商人告诉吐鲁德日报说，他曾每月给联合民主力量近 50 万美元时，丑闻升级了。就在这些事情被揭发之后，这个俄罗斯商人被逐出了保加利亚。

246

科斯托夫在 4 月时候承认，他没有花更大的力气来追究腐败是错误的，并且随后他使得一项立法得到了通过，这项法律要求政府官员在任期开始和结束的这段期间申报他们的财产。但这时损失已经造成了，政府的名誉已经受损，并且很少有人相信，在这一方面这届政府比先前的几届政府能有任何改进。

因此，联合民主力量在进入 2001 年的选举年份时，经济可能再次停滞、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或下降、上升的犯罪率和使得一部分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变得极其富有的普遍的腐败等问题困扰着它。而且该党进一步因脱党和内部不合等问题而衰落了。当政界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选战而做准备的时候，联合民主力量的支持率几乎和它主要的对手保加利亚社会党持平，保加利亚社会党目前与一些混杂的党派组成了保加利亚联盟，因为在对阿塔纳索为革新进程负责一事被揭发之后，保加利亚社会党和“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之间的联盟已不可能了。

面对即将到来的民意测验，一切迹象都似乎表明这是场难分胜负的斗争。但随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 2001 年早些时候就有谣传说，流放中的前国王西美昂二世（Simeon II）可能预期于这年晚些时

候回国参加总统竞选。这虽然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在参加竞选之前必须在国内定居满5年。但是西美昂这年4月确实回来了，宣布他将组建一个新的组织即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简称NMSS）来参加议会竞选。

247 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的纲要是公然的民粹主义的。它给自己设定了3个基本的目标。一个是要终结政治的党派偏见，另一个是要清除腐败，但最惊人的是承诺进行即刻和有效率的改革，此举将会产生一个符合欧盟标准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位前国王告诉选民说，“我准备好提出一个系统的经济举措，这些举措基于众所周知的保加利亚人的职业道德和创业技能，如果你投我一票，我将在800天内改变你的人生”。他呼吁公众对他重建道德规范以及国家和社会的物质基础给予信任。这一新的运动尤其对青年和妇女具有吸引力。西美昂承诺在党内候选人的名单中更多地加入这两个群体，并且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很多在各方面负有专长的年轻男女，其中包括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一名流行歌手，但最杰出的一批人是具有欧美经历的成功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他们为国民运动准备了经济计划。尽管此项经济计划还不是很精确，但其中保证要扶植小企业，并通过为再投资利润提供奖励和促进资本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来刺激经济的普遍增长。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同时承诺即刻增加养老金，儿童福利金和教师工资。它的民粹主义具有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它并非种族主义的，因此对所有种族群体和社会所有阶层都具有吸引力。除了对那些曾腐化这个社会和政治进程而自肥的人以外，它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运动的计划是含糊的、简易的，但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很快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并且在6月17日的选举中确立了这一领先优势。它获得了42.47%的投票并在议会中获得120席，这些席位刚好构成总数的一半。联合民主力量获51席，保加利亚联盟获48席，还有“土耳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获得了21席。2001年的选举选出了保加利亚历史上最多的妇女代表。相对

于前些年最多的10%来说，如今妇女已构成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并且她们大部分都坐在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的席位上，其40%的代表皆为女性。国民运动在选区内的所有阶层都获得了支持，有来自城市和农村的，来自知识界和专家以及工人阶级的，还有来自老人和青年的。同时也激励了本身在保加利亚的和已经移民至土耳其的土耳其人进行投票。在1994年的时候，后者中只有2 000人选择去投票，而在2001年的时候，55 000人选择了投票，他们中的许多人依据保加利亚的穆斯林支持君主的传统，把票投给了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 248

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得益于对手的衰落，特别是人们对联合民主力量4年来执政的不信任，并且进一步因它消极竞选的表现而遭到削弱，联合民主力量选择了盯住其主要对手的计划上的缺陷而不是致力于证明其本身的优势。但除了对手的因素，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它本身的实力和声望。同时毫无疑问，前国王是一个对选举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因素。他拥有个人的魅力，真正的能力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很多人希望这可能将有助于保加利亚。更重要的是，不像先前的几个后极权主义的保加利亚政治领袖，他从不属于1989年之前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与自日夫科夫倒台后统治政治事务的两个主要团体都没有联系。不过，他最大的选举资本在于他完全没有个人腐败的嫌疑。 249

八、“国王”的政府，通向欧盟和北约之路

一位前国王回到他出身地，并任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这件事真可谓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更为显著的是，尽管在国内方面面临着大量的困难，这届政府能够带领保加利亚加入北约，并且使得保加利亚还差一步就能成为欧盟成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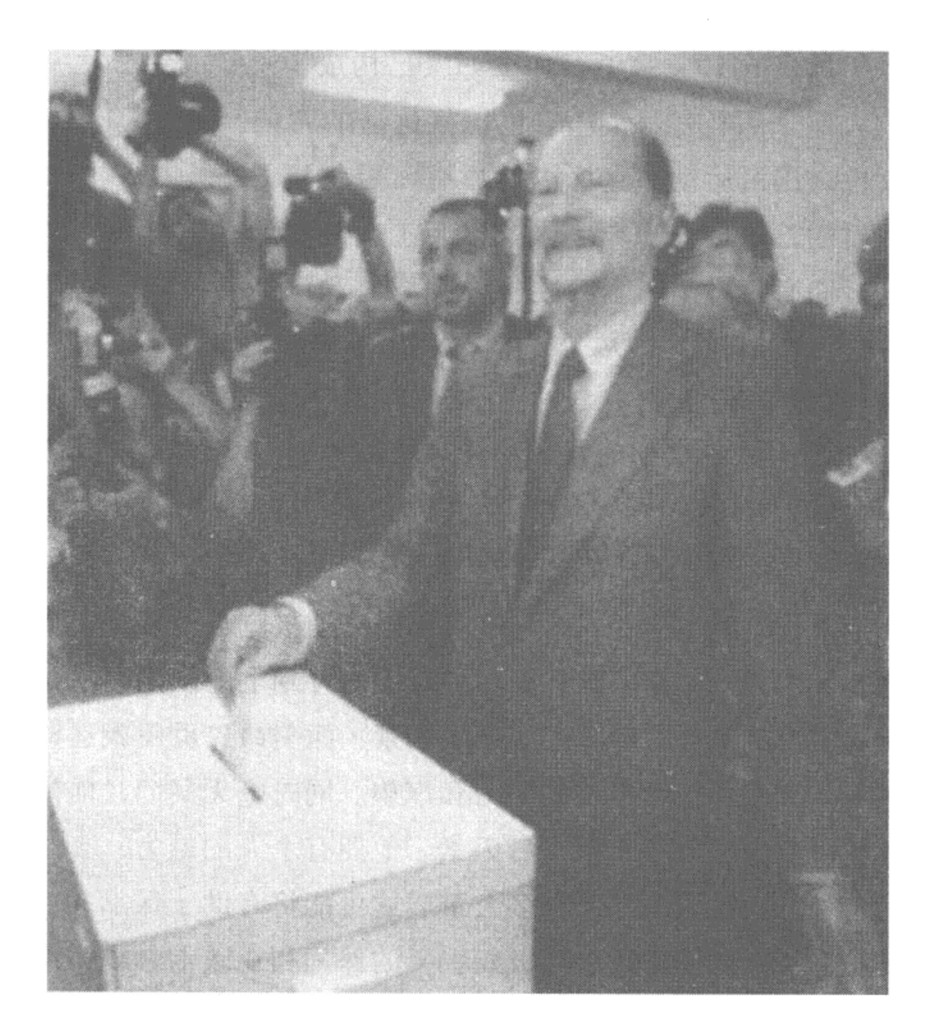


插图 42　对保加利亚、欧洲乃至全世界来说，这是第一次，一位前国王在选举中投下了他的选票，这次选举将使他当上他曾经被迫逃离的国家的总理。西美昂·科堡哥达斯基（Simeon Coburg-gotski）的党派，或者如通常所称的“国王”的党派赢得了最多的议席。

在他归国之后，西美昂选定他的官方别名为萨克森科堡哥达斯基（Saxecoburggotski）国王，虽然他仍普遍被认为是“沙皇”。仍有一些人怀疑他的目的是要恢复君主制，但西美昂能非常敏锐地把握政治发展的趋势，不可能怀有任何希望早日复辟的想法。他强调，他的当务之急不是长期的宪制的谋划，而是眼下要去完成的经济革新和社会复兴的任务。他的内阁不光包括国民运动的成员，还有两名“土耳其争取权利与

自由运动”的成员和另外两名来自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成员。他的外交部长所罗门·帕西（Solomon Pasi）来自一个保加利亚的小犹太社区，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倡议保加利亚加入北约，但是最杰出的人士是两名年轻的、新近在欧美取得成功的金融专家，31岁的经济部长并兼副总理的尼古拉·瓦西列夫（Nikolai Vasilev）以及35岁的财政部长米伦·维尔切夫（Milen Velchev）。

新政府确立的基本政策目标和科斯托夫政府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即继续努力加入欧盟，成为北约一员，加速经济改革，提高生活水平，减少犯罪以及清除腐败。

250 然而第一项任务是要开始经济改革计划，总理强调在他的政府组阁完成后他先前承诺的800天就将开始。8月2日，瓦西列夫承诺将解除对能源市场的控制，并且将加速对主要资产的私有化，例如将加速对发电站的私有化。8月19日，总理宣布一系列的专门的鼓励投资的财政改革，并且于10月的时候创设了一个2 000万列弗的基金用以对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西美昂同时承诺改革海关总署，使得其官员将“为国家服务而不是服务于他们自身”，并且将有一系列措施来清除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在社会层面，在10月1日，当公共部门的工资普遍上涨17%的时候，规定了最少100列弗，大致相当于50美元的月工资，而且从2002年1月开始，儿童福利金将增加一倍。而电费和中央供暖的收费将在2001年10月1日提高10%的公告则较不受欢迎。

对能源市场的解控以及清除腐败的努力是政府寻求加入欧盟而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加入欧盟的道路是曲折的，并且其进程有时因布鲁塞尔的摇摆不定而受挫，国内因素不时也令这一进程变得复杂化了。2001年10月，布鲁塞尔决定，尽管保加利亚已经签署了欧盟法律31章中的12章，保加利亚仍不具备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即“一个有效运营的市场经济”，这无疑是给保加利亚泼了盆冷水。在随后几个月中，布鲁塞尔加大了对保加利亚的批评力度，它强调保加利亚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清除腐败，必须重建司法体系，还有必须停止对吉普赛人

的歧视。因此于2001年12月欧盟的拉肯（Laeken）会议中把保加利亚排除在第一轮欧盟扩大的国家之外就不意外了。保加利亚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只好进一步努力达到布鲁塞尔的要求，因此于12月末议会批准了一系列旨在使国家更快地往所要求的方向改进的措施。

西美昂政权在努力穿上布鲁塞尔给保加利亚量身定做的衣裳时，251 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了。2001年11月的总统竞选中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保加利亚社会党的领导人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Georgi Pûrvanov）赢得了胜利。珀尔瓦诺夫的当选主要是因为在职总统斯托扬诺夫被他自己的民盟的支持者们给抛弃了。珀尔瓦诺夫清楚地表示，他将保护那些因经济改革计划而经济上破产的人，而且他想要与俄罗斯改善关系。这对政府来说是个令人不愉快的消息，因为事实上，珀尔瓦诺夫的声明将重起在总统和总理间的宪制斗争。

总理和其党派的关系也面临着困难。从一开始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就是一个多元的组织，这是这位前国王最初的时候为什么强调确立强有力控制的原因，举个例子，他个人坚持亲自确定在国民运动的选举名单上每个候选人是否合适。政府的职责意味着其首脑并不能总是实行如此严密的控制，国民运动中开始出现了分裂。就总理而言，也开始有些优柔寡断的迹象出现，其中一个事件就是关于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是否该转变成一个政治党派的问题。这件事发生在2002年4月的时候，但是分歧仍旧存在，并且在2004年初的头几个月的一系列脱党事件使得该党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多数，尽管脱党人员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王的政府。

在通往入盟的道路上的进一步阻碍是布鲁塞尔对于条款的严格性的坚持。这点在科兹洛杜伊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西美昂内阁面对来自保加利亚社会党、总统和相当大一部分公众意见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要求就这一条款的法律部分进行重新谈判。2003年3月，最高行政法院裁定关闭第三和第四号反应堆是违宪的。

这只是政府和司法部许多争端中的一件。2002年底，签订了就出售保加利亚烟草公司和BTK电信公司的私有化协定，其中的BTK电信

公司是保加利亚国家电信的垄断集团，但是法院宣布这两项私有化是违规和无效的。对此政府做出的回应是限制法院在这方面的权力，但[252]此举最终挑起了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堑壕战，这实际上使得两项私有化停滞了一年。布鲁塞尔明确表示了这次事件证明了欧盟对于保加利亚司法部门的顾虑，对此政府以推进限制司法部门权力的改革作为回应，并于 2003 年 9 月颁布了必要的修正案。

布鲁塞尔所提到的另外的顾虑中，吉普赛人的问题已于 2001 年秋天得到了处理，保加利亚对此做出了很大让步。政府采取了行动来加快实行使得吉普赛人融入保加利亚社会的框架项目，这个项目于 1999 年科斯托夫政府时期开始，在 2003 年的政府计划中，这些行动包括帮助年龄大于 16 岁的吉普赛文盲，在特尔诺沃和旧扎戈拉大学设立专门的课程来培训那些将要教吉普赛小孩的教师，以及 9 月的时候颁布了一项全面的反对歧视的法律。后者赢得了以布达佩斯为中心的欧洲吉普赛人权中心的支持。

如下这些进展则可以被添加到宏观经济水平上的重大发展。保加利亚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连续 5 年超过了 4%，这一直持续到了 2002 年。那年保加利亚的信用等级提升了 5 倍，并且米伦·维尔切夫被授予欧洲年度财政部长的奖项，国家财政收入比预期的多出了 1.57 亿美元，并且因为自 2001 年开始执行的改革，海关税收比预期的超出 92%。失业率尽管还是很高，已经显示出了下降的迹象，相对于 1 年前 17.85% 的失业率来说 2003 年的失业率为 14.9%。通货膨胀也降低了。2003 年 11 月的年度通胀率降低到了 2.5%，维尔切夫甚至谈到至 2003 年夏天通胀率将为零，不过这并没有达到。在至关重要的私有化领域，因保加利亚烟草公司和国家电信公司引起的尴尬于 2003 年 8 月，在由于对最后剩下的国有银行——国家储蓄银行的私有化而抵消了。至那时，着手私有化的 82.3% 的国家资产实际上已经被私有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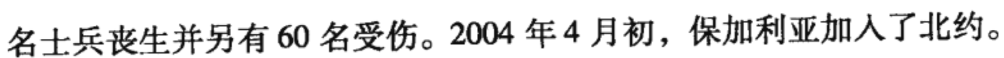
尽管并不是总受到欢迎，但政府设法调整保加利亚使其处于一个能够被考虑加入欧盟的地位的努力是有效的。2002 年 12 月欧盟的哥本哈根会议决定应该开始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就 2007 的入盟日期的目标进[253]

行认真的谈判。第二个重大的进展出现在2003年11月，那时欧盟宣布，与罗马尼亚不同，保加利亚已经有了能够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到那时为止，欧盟法律中的26章的谈判已经结束，保加利亚在2007年加入欧盟的前景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了。还有一个重大的进展是2004年2月当欧盟议会给了保加利亚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而同时却对罗马尼亚入盟资格一事表示了怀疑。这种脱钩使很多保加利亚人松了口气并对此事表示欢迎。最终，2004年6月，对保加利亚入盟的谈判在卢森堡结束了，预计保加利亚将于2007年1月加入欧盟。地平线上唯一的乌云就是欧盟委员会可能会决定，如果存在保加利亚可能无法准时执行剩下来的必要的改革，入盟日期将推迟12个月。这是清楚地在告诫切勿减缓改革的进程，它也是一个含蓄的警告：不要重谈科兹洛杜伊问题。

加入北约的道路比加入欧盟要容易一些。虽然美国KC-135“同温层”空中加油机于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使用保加利亚基地一事提升了保加利亚的形象，但是2002年2月北约秘书长在索非亚谈到，尽管保加利亚向通往北约成员国资格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保加利亚“仍留有许多事情要去做”。保加利亚始终在一个领域所做的并且仍旧在完善的是精简军队的工作，以及把保加利亚军队从一支征募的军队转变为一支职业军队。到11月，为加入北约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充分了，因此在北约的布拉格会议上，提议邀请保加利亚加入盟国，2003年3月，保加利亚议会接受了加入北约的必要的议定书。

当这项法案得到通过的时候，保加利亚享有了自第二次而且也许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上无与伦比的地位。当对于伊拉克的争论进行到最为激烈的时候，保加利亚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之一，这使它比通常具有了更高的外交姿态。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提高形象的时候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同意联军飞机使用它们的领土，保加利亚同意北约使用靠近布尔加斯在萨拉弗夫的基地，而当安卡拉拒绝美国部队过境土耳其后，这些设施更显重要了。在战后，保加利亚同意向伊拉克派遣军队，因此在波兰人的指挥下500名士兵被部署在了卡尔巴拉（Kerbala）。在2003年12月一次恐怖份子的袭击中，5

255



名士兵丧生并另有60名受伤。2004年4月初，保加利亚加入了北约。

插图43　基地在新墨西哥州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50战斗机联队的一名女兵与保加利亚的一名警察搭档巡逻靠近布尔加斯的萨拉弗夫（Sarafovo）营地。在一份关于保加利亚与西方新的联盟的惊人声明中，这一营地给美国飞机使用，用以在自由伊拉克行动期间执行补充燃料的任务。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供给联军的设施无疑帮助了保加利亚于2004年加入北约。

支持在伊拉克的联军引起了与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摩擦，但是保加利亚迅速修复了这些不和以免危及到加入欧盟的进程。保加利亚因此抵制住了美国关于缔结使双方公民免遭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协定的压力，这项决定导致了美国暂时停止了对保加利亚的军事援助。

保加利亚入盟的其他可能的阻碍是相互联系的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的问题。国王的政府在这两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001 年 10 月，政府采取了一项全国的反腐败的战略，随后的 2 月推行了一个全国行动计划，计划中包括设立一个国家部门来对抗有组织的犯罪，同时邀请了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①] 来帮助解决内政部和警察内部的腐败问题。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单在 2003 年的 9 月就有 200 名官员被解职，同时 1 800 名接受调查的官员中有 700 名是内政部官员。2004 年 3 月，保加利亚在腐败透明度指数（Corruption Transparency Index）的 113 个国家中排名第 54 位，和捷克共和国差不多而比斯洛伐克要好些，而罗马尼亚排名第 83 位。

这些指数表明了腐败不光光是保加利亚所独有的现象。然而，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所不同的地方是犯罪组织和商业以及行政部门中的腐败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地方一级。一名西美昂二世民族运动的议会成员宣称保加利亚在小国中间是独特的，因为保加利亚饱受武装犯罪团伙的困扰。通常认为这些匪徒应对千禧年后的头 5 年中的一系列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负责，这些犯罪案件中包括在 2003 年 3 月枪杀了保加利亚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身兼多家联合企业的老板的依莉雅·256 巴甫洛夫（Iliya Pavlov），还有 2004 年 1 月致使 4 人死亡的索非亚的一个电梯爆炸案。巴甫洛夫是在指证那些被控于 1996 年谋杀卢卡诺夫的人之后的一天被杀害的。

巴甫洛夫的遇害是使得司法部门处于被动地位的很多事件中的一件。另外一件事是副总检察长指控其上司总检察长的腐败和其犯罪活动。还有一件事是发生于 2002 年 12 月的一位高阶的检察官尼古

① 英国首都伦敦警务处总部。

拉·科列夫（Nikolai Kolev）被谋杀案件。有怀疑说他的死因是由于在监察部门内长期与人不合加上性格上的冲突，但不管这些谣言是真是假，很清楚的是散布这些谣言对司法部门的形象是一种损害。2003年1月，内政部秘书长兼国家警察总局局长博伊科·波里索夫（Boiko Borisov）将军起诉国家领导人，而司法部门没有支持他努力打击有组织的犯罪，这对司法部门的形象造成了更大的损害。4月，在对另一名商人谋杀未遂后，内政部准备了一份报告，其中波里索夫告诉媒体这份报告中有前政治人物和当前政治人物、地方官员与黑社会成员之间会面的照片。谣言、被揭示的真相以及类似的指控给被围攻的司法部门施加了更多的压力，但同时却使得政府加紧进行它对司法部门改革的计划显得容易些了。

毫无疑问，犯罪和腐败这对孪生的问题极其有害地影响了保加利亚的公共道德，到2003年，在保加利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黑社会”重现了。关键在于这次它是再次出现。起初的时候希望犯罪和腐败的问题已经被控制住了，但感觉这两个问题又恢复了，因而引起了沮丧的情绪。

像通常一样，公共道德同样因经济问题而遭到削弱，因为保加利亚的经济在增长，但民众未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收益，他们感受到的却是痛苦。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感觉不到令外国机构和欧盟印象深刻的这一增长。2003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年度报告中说保加利亚普通民众“受到贫困、失业和低生活水平的困扰”。一般人的工资只有每月134美元加上每个月50美元的补贴，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是欧盟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如果说失业率在2002年小有回落，那么长期失业率则令人沮丧地达到了11.9%之高。在同一年，当总的失业率达到18.1%的时候，25岁以下的青年中的失业率竟为35.6%。对于未来就业以及更广阔的机会的黯淡前景，这是可以普遍感受到的，这就更别说能拿到更高的工资，而这意味着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只能继续选择移民。2001年，有报告显示自保加利亚共产党倒台以来，大约已有将近70万人出国，其中很多人是年轻人，而2002年的民意调查表明12%到15%的接受调查的

257

29岁以下的年轻人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移民。年轻人的移民加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的低出生率已经造成了年龄金字塔上令人担忧的转变。鉴于1976年的人口中的16%是60岁以上的人，而1999年的这一比例是19.1%。这对养老金的影响是令人恐惧的。如果这些年轻的移民中的很多人，以后回国的时候，他们的技能得到了提高并且拥有更多的个人财富用于国内投资，那么国家的直接损失会因此而得到弥补。然而不能得到弥补的是对家庭和朋友的影响，父母无疑将会为他们的孩子能够拥有更大的促进自身利益的机会而感到高兴，但大部分仍然将因核心家庭的打散而沮丧，这种情况在巴尔干地区更是如此，因为那里的家庭关系从来就是如此的浓厚和重要。

全国沮丧的情绪感也因一件事而增加了，这件事就是当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的经济状况即便有也是小有改善的时候，而另一小部分人却变得极其的富有。对一个有着长期和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这是让人很难吞咽下去的苦果。

有一些保加利亚和外部世界的观察家指出，保加利亚除了寻求一个能够更进一步融入欧洲—大西洋框架之内的政策外别无选择。很多人也不会真的去质疑，加入北约并且与欧盟结束了谈判是国王的政府的主要成就。更少会有人认识到欧洲——大西洋地区主张的价值观和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例如保加利亚民族所孕育出的社会心理价值观之间潜在的冲突。一小部分人的发财致富以及多数人的贫困之间的冲突只是许多问题中的一项，这些问题在保加利亚安心于它作为欧盟正式成员的新角色的时候，将必须得到解决。

258

结　语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差不多有15年了。“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时代已经看到了它自己犬儒主义的标签，看到了因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希望破灭所带来的失望以及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而保加利亚对“后极权主义”的失望和迷惑有一些特别之处。 259

在1989年以后的5年多时间里，保加利亚竟然未能就新国徽达成一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似乎对其民族的同一性和他们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有一些疑虑。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伊万·伊莱可夫（Ivan Elenkov）和罗门·达斯卡洛夫（Rumen Daskalov）编辑的《我们为什么喜欢我们？寻找保加利亚文化的一致性》（*Zashto nie sme takiva ; v tûrsene na bûlgarskata kulturna identichnost*）一书，1994年在索非亚出版。这本书收集了50篇文章，由19位作者撰写，分别发表在1898年至1943年间的《保加利亚日报》上。所有的文章试图明确保加利亚人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保加利亚民族性（Bulgarianness）？在一个未来可能有很多挑战也有可能许多回报的时代，当今的保加利亚人要找寻他们真正同一性的线索，要在这个日益动荡和不确定的世界中为确定他们的位置找寻坐标，那就需要回到过去。他们自己的历史会告诉保加利亚人什么是他们的民族同一性，当他们将进入欧盟的时候，

他们在当代世界中的位置在何处。

260 保加利亚历史的主题之一是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之间的两重性。保加利亚曾就与西方结盟还是与基督教东方的分支结盟的问题有过一场大争论，我们可以从大争论中看到这一点。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讨论依靠俄罗斯或依靠中欧（西欧）的优点，1878年以后，保加利亚国内反俄派和亲俄派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甚至于常常带有暴力，争论以剧烈的形式继续进行。

这种对外倾向的争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可避免地与现代化的进程相连。几分诡异的是，无论是传统派还是极端激进派都能在俄罗斯找到样本，前者主要是在教会，后者注意的是从民粹派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然而，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说，西方能够提供的东西更多。与俄罗斯的经济和传统联系是较弱的。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进口同样的商品，因此，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来往；两国同样期待中欧和西欧的资本来重建和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但是，保加利亚期待西方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保加利亚已经明白，假如他们要融入那个世界，他们必须适应西方的方式和习惯。阿·康士坦丁诺夫（Aleko Konstantinov）笔下的巴伊·甘纽（Bai Ganiu）是保加利亚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巴伊·甘纽是一位见识过外部世界的农民，一次偶然的遭遇使他在两方面产生了困惑，巴伊·甘纽自然的农民式的狡猾对他很有帮助。为了让他们自己远离幼稚，巴伊·甘纽设想送他们的孩子到国外接受教育，只有少数保加利亚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但是能送往国外学习的孩子去俄罗斯的很少，大多数孩子去了德国、奥地利或法国。在伊伦科夫和达斯卡洛夫所编书中的19位作者，1个没有上过大学，3个在保加利亚上大学，1个在俄罗斯和西欧学习，1个只在俄罗斯学习，13个是在西欧学习。

在政治领域，是与俄罗斯结盟还是与它的对手结盟确实证明是非常关键的。1913年、1915年和1941年，保加利亚选择挑战俄罗斯的利益，最终给保加利亚全民族统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44年之后，

保加利亚的统治者选择了密切与俄罗斯的联系，付出的代价是保加利亚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及这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和环境福利。1989 年保加利亚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保加利亚外交转了一个圈。保加利亚外交决策者将密切与欧盟的联系作为最终目标，国内掀起了强烈亲美的浪潮。就在保加利亚努力前所未有地着手尽最大的努力融入中欧和西欧国家时，因为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经济制裁，它与中欧和西欧国家的联系被切断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幸吧；一道新幕落在巴尔干，在许多西方国家看来，保加利亚似乎掉落到地图的边缘。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保加利亚融入了西方世界，索非亚的政治家显露出相当的技巧，保加利亚保证他们对美国领导的战争进行援助的义务不会严重损害或长期损害其在欧盟的地位。到 2004 年夏，来自欧盟的公民涌入保加利亚，他们不仅仅是来度假和旅游的，而是期盼中的资产购买人。此时，保加利亚以新的形式经历了与中欧和西欧融合，英国和意大利在这一进程中的表现最为突出。 261

现代过度的大规模旅游观光和布鲁塞尔制定的苛刻条件所带来的挫折，以及这个时候表面看起来谈判者的傲慢和迟钝，使少数保加利亚人觉得也许发展同中东、北非和黑海沿岸国家的联系更好。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不过几乎没有保加利亚人欢迎这样做。19 世纪保加利亚社区的经济复兴主要基于贸易联系的扩张，这一贸易联系不是同中欧和西欧而是同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欧洲部份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1878 年的解放意味着保加利亚要面对当时他们所称的“欧洲人”的竞争，意味着那将带来大范围的经济混乱和大量现存的制造体系的毁灭：这与 1989 年后的情况是如此的相似。

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之间的两重性是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两个因素表明，在欧亚之间占据关键位置的保加利亚将总是在东西方的边缘。在当今世界，这可能是一个明显的优点。假如亚欧之间的陆上运输继续发展，就像设计者设想的那样，确要建造第二条博斯普鲁斯大桥以及计划将欧洲和土耳其亚洲部分用铁路连接起来，那么，保加利亚将是欧亚交通链 262

中的关键一环。另3个项目将加强保加利亚在世界贸易和运输结构中的重要性。第一是计划建造从亚得里亚海岸的都拉斯（Durres）通过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到伊斯坦布尔的交通干线，这将是自罗马帝国建造埃格南地亚大道（Via Ignatia）以来提供的第一条新的穿过巴尔干的东西路线。第二是打算建造一条新道路，它从希腊北部边界通过保加利亚到达将要建造的多瑙河新大桥。第三是一条管道线，它将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从布尔加斯输送到希腊港口亚历山大德鲁波利斯（Alexandroupolis）。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另一些欧洲国家，甚至于中东国家都不能担当得起一个孤立或动荡的保加利亚。欧洲将需要保加利亚，就像保加利亚需要欧洲一样。

假如保加利亚要融入欧洲，它将不得不继续与后极权时代确立的民主精神相一致。在对保加利亚历史进行审视后，我们会有理由认为这将成为事实吗？保加利亚有能力建设和支撑保加利亚文化同一性中的民主部分？

首先必须记住，自1989年以来，保加利亚已经有5次大选，3次总统选举。它经历了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少数派政府、民主力量联盟政府、两次由无党派专家（technocratic）内阁领导的政府、拥有议会多数的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同样拥有议会多数的民主力量联盟政府、前国王组成的政府。政府间的变化两次是由议会外广泛的行为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内阁发现屈从于民众的压力是明智的政策。这表明了对公众愿望的尊重，那是民主起作用的一个重要保证。同时，个人的自由得到相当的尊重，保加利亚也正在努力改善少数民族的福利。新闻和电子媒介有时会屈从于政府的影响，但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抵制政府的压力，新闻连同工会以及另一些组织享有自由。

263

如果对教育的尊重是民主的先决条件，那么，保加利亚可以被寄予厚望。没有初等教育和较高层次的学校的普及和发展，19世纪民族的复兴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阅读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索非亚、普罗夫迪夫和瓦尔纳等中心上学的保加利亚人的回忆录，必然会对保加利亚人受教育的范围和教师和学生的献身精神留下深刻印

象。从最近几年西方大学来自保加利亚的学生的质量看，传统无疑传承下来了，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专业大学预科（specialist gymnasia），专业大学预科是保加利亚中等教育代代相传的一个重要特征。

犯罪和腐败仍是严重的问题。这不纯粹是保加利亚的问题，目前，有组织的犯罪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战之间那样严重威胁到政治进程。谋杀一直来很大程度上是帮派之间争地盘的结果。腐败作为犯罪的密友仍是一个危险因素，它损害公众的道德，挫伤政治进程，破坏国家在国家社会中的形象。不过，保加利亚已清楚地表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柯斯托夫政府与腐败的斗争没有什么效果，但从 2001 年 6 月的选举中可以看出公众对其失败的反应，也确实证明了保加利亚民族整体上厌恶腐败这一毒害国家的行为。“国王”政府在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有所努力，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这尤其表现在 2003 年 9 月的司法改革上。

保加利亚的过去表明它在平均主义和民主方面是有强大基础的。当现代保加利亚民族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出现时，保加利亚社会是具有相当的同一性。征服前的贵族已经被摧毁，财富差异的再现比较缓慢。19 世纪末，保加利亚最富裕的人也要亲自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只有极少数例外；他们的劳作与较贫困的同乡或同民族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在 1878 年解放前和解放后的许多年里，城镇和制造业区差不多完全基于按传统方式组织的过程进行生产。其中，行会扮演主要角色。行会因其等级结构当然看到富裕和影响的差异，但行会同样持有集体责任感，富裕的人对不幸的人是有义务的。社会和职业分工的缺乏产生了这样一种体制和心理即所有的人机会均等，教育则提供了实现机会的条件。这样的心理留存下来，因此，1989 年以后出现的剧烈的两极分化使人们迷惑不解。醒悟到西方价值体系所带来的后果，西方价值体系的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幻灭与历史上的平等倾向……由此产生了保加利亚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的问题。

264

1879 年，保加利亚被赐予一套反映其平均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那样的社会管理新民主的效果如何？从其走过的历程看，并不完全能

令人打消疑虑，尽管比起从相同环境相同年代出现的另一些国家来，保加利亚并不是最糟糕的。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的确马上染上了腐败和庇护主义[①]（clientalism）的弊病；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也基本如此，人们也许会认为，在19世纪末的美国，用政治上的支持换取合同或另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是相当普遍的。在保加利亚建国初期，行政部门日益加强了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削弱了民主的力量，为王室专制统治和以后的共产主义集权铺平了道路。后极权主义时代已经看不到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重新表现自己的痕迹。1990年，改革派击败了前共产党关于由议会选举总统的建议；分别选举议会和总统将有助于权力的分散。立法机关和行政也不会完全掌握在总统的手里。热列夫总统已显示出不受议会控制的坚定决心，柯斯托夫似乎想凌架于总统之上，而珀尔瓦诺夫则是用一种自信，甚至是激烈的方式与国王内阁正面对抗。

265

保加利亚政治经历中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特征是偏好政治暴力，幸运的是，那不会再出现了。1895年至1923年，有3位首相或前首相被暗杀，还有另一些暗杀行为；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政府、马其顿各派系广泛地实施暴力行动，而在1944年以后，共产党毫无约束地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大规模的惩罚和预防性谋杀。21世纪出现在索非亚和另一些地方的暴力事件是极其令人厌恶的，但是，至今还没有政治性暴力。

在现代保加利亚历史上，军队一直起关键的作用。1886年巴滕贝格大公最初的废黜与军队内的某一派是有关联的；没有军队另一集团的支持，大公也不可能有短暂的返回保加利亚。1894年，精通政治权术的斐迪南大公在确信控制了陆军部和军官团之后，着手反对斯塔姆博洛夫。1923年和1934年，军队是重要政治变动的工具；1944年9月9日，旧政权同样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不过这一次是在巨大的国际和国内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不过，目前几乎没有可能发生针对文

① 指官商勾结。——译者注

官政府的军事行动。尽管华沙条约的解体和严格的预算限制导致保加利亚军队的士气低落，但军队还是保持忠诚，政府允许军队的不满通过新的军官组织拉科夫斯基军团（Rakovski Legion）偶尔向公众发布。军事政变的偏好不可能是历史传统中最引人注意的，它也没有阻止希腊、西班牙或布拉格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

自 1878 年柏林条约签署以来，民族问题从未远离保加利亚的政治层面。圣斯特法诺条约中的大保加利亚的不复存在特别是失去马其顿深深地印入保加利亚民族的灵魂之中。1878 年以来涉及外部政策的大多数重要决定都随马其顿问题而定。1912 年，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结盟，根据条约，保加利亚获得了失去的马其顿大部；1913 年，灾难性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保加利亚极力阻止塞尔维亚和希腊占领马其顿的大部；1915 年，斐迪南大公和首相使保加利亚与德国的目标联结在一起，两人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希望收回失去的马其顿；1941 年，当鲍里斯国王得出保加利亚不再保持中立的结论时，保加利亚吞并了马其顿的大部，让这味苦药丸变得甜一些。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近 50 年里，马其顿的伤痛几乎无休止地在发作并加重，而且，它对这个国家政治暴力的增长起了较大的作用。如果说对民族统一的渴望是 1878 年至 1944 年间保加利亚历史的一个持续不变的特征，那么，到目前为止，在后极权时代的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没有迹象表明它会重新成为强有力的因素。承认马其顿的独立使许多保加利亚人非常失望，但是它使另一个政府不再心存疑虑。随着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沉重地压向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大多数民众没有显示出希望重新发起领土扩张的迹象，不过，假如马其顿国将要瓦解或崩溃，谁也无法预测保加利亚将会怎样。

266

在保加利亚的历史当中，还有另一种倾向，既不注意东方也不注意西方，更不在意领土的扩张。这是内省的传统，这种内省有时非常强烈以至于产生对整个世界政治的蔑视甚至抵制。保加利亚的保护神伊凡·里尔斯基是一位隐士，隐逸主义的传统在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影响很大。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里，保加利亚文化主要在小小

的甚至常常是自给自足的村庄和修道院里传承下来，那地方按定义即便不是脱离也是远离社会和国家的官方机构。

一些观察家认为保加利亚人明显没有卷入从奥斯曼统治挣脱出来的政治独立斗争，也很少有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反抗的实例，这一切，回到内在的自我倾向是要负部分责任的。1876 年，我们已经看到几乎没有保加利亚人对武装起来的呼吁做出回应，当列强在柏林举行会议，设计将如何损害保加利亚人的条约时，在德国首都的保加利亚人没有去游说大使或影响新闻界；保加利亚人看起来似乎希望甚至认为俄罗斯人可以信赖，会帮助他们做这个工作。在保加利亚新生的初期，可以说没有一个家庭能忽视这个国家，它坚持向民众收税，教育他们的孩子以及征召他们的儿子。然而，保加利亚人对政治集体冷漠，选举中的低投票率集中反应了这一冷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人对现政权没有什么抵抗，直到盟军的轰炸有了效果，苏联进入巴尔干的前景成为现实，保加利亚人才采取行动。

共产党治下的保加利亚成为笑柄，因为它的顺从，因为它与苏联模式保持一致。保加利亚没有像其他巴尔干共产党政权那样寻求独立的政策，没有发生过类似 1953 年的柏林事件、1956 年的布达佩斯事件、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或 1980—1981 年的波兰事件；“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词在保加利亚直到 1978 年才在公众场合提起。我们现在知道，反对的行为比先前认为的要多一些，特别是在早期在农民当中。同时，1965 年未遂的军事政变和柳德米拉·日夫科娃关于保加利亚文化同一性的主张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保加利亚人都愿意完全屈从于莫斯科。尽管如此，保加利亚的顺从以及与现代人对远离世俗事务的共鸣这一方面是名不虚传的，至少是有相当基础的。

对此，有许多显而易见的解释。党严格掌控国家和社会，至少大约到 1970 年，政府确实履行了承诺。但是，也许保加利亚的宁静并不单单是警察统治和不断增长的物质福利的结果。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从世俗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根弦上的一种现代共鸣，那是当代对悠久文化传统的一种再坚持，保加利亚的文化传统拒绝这个

腐朽的、庸俗的、昙花一现的世俗世界。假如是这种情况，那么，表面看起来屈从于现存的社会秩序正好符合视政治权威与自己无关的民族传统。

然而，保加利亚人在这个主题上考虑的太天真是危险的。对于一个中世纪的僧侣、奥斯曼统治时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山里小村庄的居民、或者在德国或苏联统治下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抵制国家是可能的；但是，要创建一个现代的、负责任的和代议制的民主政治，这样做是一点也不明智。

对于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保加利亚来说，从政治事务中退出或对政治持冷漠态度还包含另一个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妥善处理好过去并克服过去的能力（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保加利亚的过去与最后解决的恐怖相比简直不算什么。第二次大战期间，保加利亚的全部犹太人都得到拯救，这是整个民族的成就，保加利亚也以此为荣。在过去，保加利亚同样为受到土耳其迫害威胁的亚美尼亚人提供安全的庇护；意识到这一点，保加利亚的亚美尼亚人组建一支自己的武装小分队在巴尔干战争中与保加利亚一起作战。另一方面，保加利亚民族国家确实对国内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施加了一些压力。在保加利亚解放后的初期，压力是文化方面的，也许保加利亚无意之中将此作为民族独立和文化解放的自然的庆祝，土耳其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无法容忍的改变。极度的文化与政治压力也对这些人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妥协，不过，1878 年后绝大多数土耳其人是自愿离开保加利亚的。20 世纪 80 年代离开的人当中多数也是这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离去的人曾在保加利亚承受了极度的政治和文化压力。

1989 年之后的政府很快修正了“再生进程”中的错误，假如保加利亚现在战胜过去有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对待另一些民族应该比认为外国控制影响他们更少一些障碍。在许多保加利亚人当中，仍然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当外人指出某一缺点时，保加利亚人会故态复萌，退回到宿命论，它最常用的词如“奥斯曼统治 500 年……”这样的态

269

度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它用过去来逃避现实甚至未来。而且，并不单单是保加利亚承受外来统治几个世纪的痛苦。那种统治有时无疑采取高压政策，但保加利亚民族、保加利亚教会和语言生存下来了。当奥斯曼从保加利亚撤离时，保加利亚仍然讲保加利亚语，保加利亚的制造业曾因作为土耳其军队的供应商而繁荣；当英国结束在南爱尔兰统治时，爱尔兰语言几乎已经消失，爱尔兰工业一直受压制以免与英国制造商竞争。过去的压制不可避免地是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对承受过的苦难的尊重是一种恰当的情感，但是，压制不应该被用作今天的失败或缺少修正它们的责任感的借口。

当保加利亚人缺少用自己的能力去适用和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的时候，保加利亚历史有许多好的方面提供给保加利亚民族。



附录1 保加利亚君主可汗

阿斯巴鲁赫（Asparukh）	681—700
特尔维尔（Tervel）	700—721
科尔米西厄斯（Kormisosh）	738—753/4
赛瓦尔（Sevar）	753/754—760
维内赫（Vinekh）	760—763
特勒茨（Telets）	763—766
萨宾（Sabin）	766. 8—9
乌马尔（Umor）	766—767
托克图（Toktu）	767—768
帕甘（Pagan）	767—768
特勒里格（Telerig）	768—777
卡尔达姆（Kardam）	777—803
克鲁姆（Krum）	803—814
奥穆尔塔格（Omurtag）	814—831
马拉米尔（Malmir）	831—836
普雷西安（Pressian）	836—852

第一王国国王或沙皇

鲍里斯一世（Boris I）	852—888
弗拉基米尔（Vladimir）	888—893
西美昂大帝（Simeon ‘the Great’）	893—927
彼得一世（Petûr I）	927—970
鲍里斯二世（Boris II）	970—971
诺曼（Roman）	971—997
萨穆伊尔（Samuil）	997—1014
加布里尔·拉米多尔（Gavril-Radomir）	1014—1015
伊凡·弗拉基斯拉夫（Ivan-Vladislav）	1015—1018
第二王国国王或沙皇	
彼得二世（Petûr II）	1185—1187
伊凡·阿森一世（Ivan Asen I）	1187—1196
彼得二世（Petûr II）（重新出任沙皇）	1196—1197
卡洛扬（Kaloyan）	1197—1207
鲍里尔（Boril）	1207—1218
伊凡·阿森二世（Ivan Asen II）	1218—1241
卡利曼一世（Kaliman I）	1241—1246
米哈伊尔·阿森（Mihail II Asen）	1246—1256
卡利曼二世（Kaliman II）	1256—1257
康斯坦丁·阿森（Konstantin Asen）	1257—1277
伊瓦伊洛（Ivailo）	1277—1279
伊凡·阿森三世（Ivan Asen III）	1279
格奥尔基·帖尔特一世（Georgi Terter I）	1279—1292
斯米列茨（Smilets）	1292—1298
恰卡（Chaka）	1298—1300
托多尔·斯弗托斯拉夫（Todor Svetoslav）	1300—1321
格奥尔基·帖尔特二世（Georgi Terter II）	1321—1323

米哈伊尔·希什曼（Mihail Shishman）	1323—1330
伊凡·斯特凡（Ivan Stefan）	1330—1331
伊凡·亚历山大（Ivan Alexander）	1331—1371
伊凡·希什曼（Ivan Shishman）	1371—1395
伊凡·斯特拉西米尔（Ivan Stratsimir）	1395—1396
近现代保加利亚国王或沙皇	
巴腾贝克·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	1879—1886
斐迪南（Ferdinand）	1887—1918
鲍里斯三世（Boris III）	1918—1943
西美昂二世（Simeon II）	1943—1946 *

* 西美昂二世在1946年9月公投后离开了保加利亚，公投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附录2　保加利亚政府首脑（1879—2004）

托多尔·布尔莫夫（Todor Burmov）	1879.11.7
克利门特大主教（Metropolitan Kliment）	
（Vasil Drumey 瓦西尔·德鲁梅伊）	1879.11—1880.3
德拉甘·灿科夫（Dragan Tsankov）	1880.3—11
佩特科·卡拉维洛夫（Petko Karavelov）	1880.11—1881.4
约翰·卡西米尔·厄恩鲁斯（俄）	
（Johan Kazimir Ehrenrot）（Russian）	1881.4—7
空缺（No prime minister）	1881.7—1882.6
莱昂尼尔·索博列夫（俄）（Leonid Sobolev）	
（Russian）	1882.6—1883.9
德拉甘·灿科夫（Dragan Tsankov）	1883.9—1884.6
佩特科·卡拉维洛夫（Petko Karavelov）	1884.6—1886.8
克利门特·图尔诺夫斯基（临时政府）	
（Metropolitan Kliment）（provisional government）	1886.8.9—12
佩特科·卡拉维洛夫（临时政府）	
（Petko Karavelov）（provisional government）	1886.8.12—16
瓦西里·腊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	1886.8—1887.6
康斯坦丁·斯托伊洛夫（Konstantin Stoilov）	1887.6—8

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Stefan Stambolov） 1887.8—1894.5
康斯坦丁·斯托伊洛夫（Konstantin Stoilov） 1894.5—1899.1
迪米特尔·格列柯夫（Dimitûr Grekov） 1899.1—10
托多尔·伊万乔夫（Todor Ivanchov） 1899.10—1901.1
拉乔·佩特罗夫（Racho Petrov） 1901.1—2
佩特科·卡拉维洛夫（Petko Karavelov） 1901.2—12
斯托扬·达内夫（Stoyan Daney） 1901.12—1903.5
拉乔·佩特罗夫（Racho Petrov） 1903.5—1906.10
迪米特尔·佩特科夫（Dimitûr Petkov） 1906.10—1907.2
迪米特尔·斯坦乔夫（Dimitri Stanciov） 1907.2—3
彼得·古德夫（Petûr Gudev） 1907.3—1908.1
亚历山大·马里诺夫（Aleksandŭr Malinov） 1908.1—1911.3
伊凡·盖溯夫（Ivan Geshov） 1911.3—1913.6
斯托扬·达内夫（Stoyan Daney） 1913.6—7
瓦西尔·腊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 1913.7—1918.6
亚历山大·马里诺夫（Aleksandŭr Malinov） 1918.6—1918.11
特奥多尔·特奥多罗夫（Teodor Teodorov） 1918.11—1919.10
亚历山大·斯塔姆博里斯基（Aleksandûr Stamboliiski） 1919.10—1923.6
亚历山大·灿科夫（Aleksandûr Tsankov） 1923.6—1926.1
安德烈·列亚普切夫（Andrei Lyapchev） 1926.1—1931.6
亚历山大·马里诺夫（Aleksandûr Malinov） 1931.6—10
尼古拉·穆沙诺夫（Nikola Mushanov） 1931.10—1934.5
基蒙·格奥尔吉耶夫（Kimon Georgiev） 1934.5—1935.1
佩特科·兹拉特夫（Pencho Zlatev） 1935.1—4
安德烈·托舍夫（Andrei Toshev） 1935.4—11
格奥尔基·基奥塞瓦诺夫（Georgi Kioseivanov） 1935.11—1940.2
鲍格丹·菲洛夫（Bogdan Filov） 1940.2—1943.9
多布里·勃日洛夫（Dobri Bozhilov） 1943.9—1944.6

伊凡·巴格良诺夫（Ivan Bagryanov）	1944.6—9
康斯坦丁·穆拉维耶夫（Konstantin Muraviev）	1944.9.2—9
基蒙·格奥尔吉耶夫（Kimon Georgiev）	1944.9—1946.11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1946.11—1949.7
瓦西尔·科拉罗夫（Vasil Kolarov）	1949.7—1950.1
伏尔科·契尔文科夫（Vûlko Chervenkov）	1950.1—1956.4
安东·于哥夫（Anton Yugov）	1956.4—1962.11
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1962.11—1971.7
斯坦科·托多罗夫（Stanko Todorov）	1971.7—1981.6
格里沙·菲利波夫（Grisha Filipov）	1981.6—1986.3
格奥尔基·阿塔纳索夫（Georgi Atanasov）	1986.3—1990.2
安德烈·卢卡诺夫（Andrei Lukanov）	1990.2—11
迪米特尔·波波夫（Dimitûr Popov）	1990.12—1991.11
菲利普·迪米特洛夫（Filip Dimitrov）	1991.11—1992.12
柳宾·贝罗夫（Liuben Berov）	1992.12—1994.9
雷内塔·因卓娃（Reneta Indjova）	1994.10—1995.1
让·维德诺夫（Zhan Videnov）	1995.1—1996.12
尼古拉·多布雷夫（Nikolai Dobrev）	1997.1—2
斯特凡·索菲扬斯基（Stefan Sofiyanski）	1997.2—4
伊凡·科斯托夫（Ivan Kostov）	1997.4—2001.6
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斯基（Simeon Saxecoburggotski）	2001.7—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B

C

D

E

F

G

H

I

J

K

N

O

R

① 书中 74 页末提到皮罗特—译者注

S

T

U

V

W

Y

Z

译后记

1996—1999 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攻读历史学博士时，选择的论文题目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尼亚外交政策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感自己在东欧历史知识方面的欠缺，自那以后，一直关注东欧史的研究。因此，当王加丰先生让我做点翻译时，我选择了《保加利亚史》。

本书的翻译得到王加丰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他的指点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谨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翻译参考了埃文斯著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的《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译者们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深为感动。附录 1 的校对参考了陈志强先生著的《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 2007 年版）。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网络上有许多默默无闻的研究者在探讨中世纪时的保加利亚，他们的研究使我受益许多。

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前言、第一、二、三、四、五章、结语和索引由周旭东翻译；第六章和附录由鲁姣姣翻译；第七章由黄晨曦翻译；第八章由吴军伟翻译；第九章由王小军翻译。全书最后由周旭东统一校对。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加上时间也较为仓促，书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误译或不能恰如其分表达原意之处，希望读者谅解，并敬请读者赐教。

周旭东

2009 年 6 月 30 日

书名=保加利亚史
作者=R·J·克兰普顿著
页码=280
ISBN=
SS号=12363526
dxNumber=000006811018
出版时间=2009.09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定价：
试读地址=http://book.szdnet.org.cn/views/specific/2929/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811018&d=1D8C093A622B3EA518B15CD9226A9311&fenlei=1112#ctop
全文地址=ab3d14ea7c7c1c6af06b2f7901b26ad9/img18/0580DFF34881E9ED3F40D1123772F5417ACD051087E2D78F9F34E8C2FF9557C24BDEA4A5E26D08B655BF6339871785C47CD09D64A636EE8FC9C5EBD824E0E11E80F6866242A981ADF6A1744CD5FCBABD80178388BE2AB595FFEF9BE118DAE8482E06CCB1B16980BB5D581A064E048F40691A/b48/qw/